



## 目 录

### 专 论

- 3 冯绍雷 /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 议程”

### 中东、亚太政治中的俄罗斯

- 39 王 晋 / 盟友还是对手？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与挑战
- 63 魏熊生，汪宁 /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
- 89 华 盾 /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 中东欧民粹主义

- 119 周 超 / 中东欧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激进化——基于匈牙利青民盟的案例析
- 153 王思羽 /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2000-2019 年）

### 俄罗斯地区发展

- 190 康斯坦丁·沃斯特里科夫 / 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状况与地区发展前景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0 年第 1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Фэн Шаолэй***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и повестка «Россия 2024» ..... (3)

### ***Ван Цзинь***

Союзник или противник? Интересы и вызовы России, Ирана и Турции в сирийском вопросе ..... (39)

### ***Вэй Сюншэн, Ван Нин***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фактор в сир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 (63)

### ***Хуа Дунь***

Момент Азии в игре держав и двухуровневом балансе---Пониман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ов в вопросах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ений ..... (89)

### ***Чжоу Чао***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я правящих популис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На основе анализа Венгерской партии Фидес.....(119)

### ***Ван Сьюй***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влияни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популизма (2000-2019 гг.) ..... (153)

###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острик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190)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0 年第 1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Feng Shaolei*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Multi-polarization and Russia’s “2024 Agenda” ..... (3)

### *Wang Jin*

Ally or Opponent?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of Russia, Iran and Turkey on the Syrian Issue ..... (39)

### *Wei Xiongsheng, Wang Ning*

Orthodox Factor in Russia’s Syrian Policy ..... (63)

### *Hua Dun*

The Asian Moment of Major Country Game and Dual-level Balance of Power---Perceptions and Stances of Russian Think Tanks regarding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 (89)

### *Zhou Chao*

Radicalization of Populist Governing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 Case Study of Hungarian Federation of Young Democrats..... (119)

### *Wang Siyu*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s of Populism in Ukraine (2000-2019)..... (153)

### *Konstantin Vostrikov*

Nizhny Novgorod Region: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 (190)

## 专论

##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 与俄罗斯的“2024 议程”\*

冯绍雷\*\*

**【内容提要】**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对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冲突与逆转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外在结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注上述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球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 议程”。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决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 2024 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关键词】**“自由国际秩序” 多极世界 全球转型 俄罗斯 2024 议程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0003(36)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选择”（项目批准号：19JJD810001）的阶段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昕提供了伊肯伯里 2009 年有关自由国际秩序报告的英文文本，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艾伦·林肯教授提供了基辛格新著《论世界秩序》的英文版本，在此表示感谢。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 引言

21 世纪以来，引发国际热议的重大议题之一，乃是世界秩序的延续和转型，以及这一背景下主要大国内部演进及其相互关系将如何发展的问题。本文的写作意图在于，针对世界秩序问题的若干关键性范畴——如“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或多极世界）的认知正在发生的变化，探讨东西方各种不同认知之间的复杂互动如何影响实际的进程。笔者试图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在当下纷乱的世界中，是否还有可能在未来世界秩序构建这样的关节点上，通过对话，探寻利益和观念的交织与互补，推动各方立场的接近。本文的初步体认是：从中长期角度看，来自不同思想谱系的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理念，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有时看似针锋相对，但并非没有可达成共识的空间。形成共识非常艰难，也必定会出现以对抗取代合作的歧见和倒退。但无论从观念、利益和战略、政策运作这几个方面看，都存在着从相互交织重叠的领域出发，一步步探寻合作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实例，本文也试图展示俄罗斯作为全球变迁中的一个关键大国，如何应对全球转型背景下国内与国际事务的相互作用，提升大国地位与影响，也谋求内外两种转型的大步推进。

首先，对于近年来学界和媒体有关世界秩序问题的争议，本文并不打算做面面俱到的引介，而是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关键性范畴，包括其中的争议和反思，进行介绍、分析，以寻求走向共识的路径。本文拟侧重介绍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以及基辛格对国际秩序演变历史的系统总结。在这三位中，伊肯伯里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所阐述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是对已有百年实践积累的美国与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成败得失及前景，所做的系统分析。这一模式现在虽然遭遇巨大争议，但若想对此作正本清源式的解读，伊肯伯里的理论还是可以作为对话的思想资源。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思想，并非独创，但显然是针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表现出的衰落，而提出的因应改进之道。多极化思想虽暂不具备那种具有全面替代性的结构模式，但已局部地转化为当今国际秩序实际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基辛格作为当今政学两界最有资格对世界秩序问题进行评说的战略大家之一，反倒显得立场超脱，似乎并未特别力挺

任何一种类型的世界秩序主张。但他通过总结历史，对于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化的机理、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见解，特别是对于“合法性与权力的平衡”这一关键点的强调，给人们带来不少启发。<sup>①</sup>

因为这三种理论具有各不相同的内容与功能，而且有着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更不用说他们背后还有迥然相异的政治立场，所以，我们期待这种叙事角度的反差，能打破既定范式，或是超越就事论事式的惯性，有助于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解和感悟。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世界秩序之争和俄罗斯“2024 议程”<sup>②</sup>这两个看似并不直接关联的过程，放置在一起加以观察分析，希望能找出这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同时也是内在互相深刻关联的动态演进逻辑，为理解未来世界构建与俄罗斯的互动的可能取向，提供哪怕是非常初步的思考。为此，笔者较倾向于使用“全球转型”这种新的表述，来描述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以来的世界整体性改变。<sup>③</sup>这种改变不仅是全球性的、地区层面的、发生在各国相互之间的，而且特别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主要大国内部。

总体来说，由力量结构改变所导致的这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重组和制度规则的变迁，以及因现代信息科技这样的外部条件的变更，所促使的观念、心理、行为范式的变化，正以或是激进式的突变，或是累积式的演进，推动着全球意义上的转型。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一个主要大国，无论人们对其现有影响力和未来可能的潜能，及其内外政策的实施，有多少不同的评价，但多少都能感受到，这个被众说纷纭的大国正在积极因应着上述这样一个全球转型的深刻过程。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序言。

② 俄罗斯的“2024 议程”这一提法，乃是笔者对于 2020 年初以来围绕着普京总统提出的俄罗斯宪法修改草案，将 2024 年以后俄罗斯国内的宪政安排、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巧妙地将这一安排与当前改善经济的短期措施相结合）以及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调整，这几件大事的长远规划和统筹部署的统称。笔者认为，这是在当前全球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内政外交与之互动的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重要进程。

③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1.

## 一、“自由国际秩序”的争论及其启示

“自由国际体系”在很多年中是美国两党共识和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新老自由主义者的多年辩护，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盛衰息息相关。毫无疑问，这是讨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时最核心的范畴之一。即使在既有的国际秩序风雨飘摇之际，这一范畴还是会受到强劲的辩护。

### （一）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

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是在国际秩序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学者之一。2006年，由他领衔撰写、并成为民主党竞选纲领的“普林斯顿报告”发表后，伊肯伯里率高级学术代表团在中国各地访问交流，当时曾参与京沪一系列学术活动的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可能还对此记忆犹新。<sup>①</sup>2009年，伊肯伯里发表“3.0版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美国和关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争论”的长篇报告。该报告阐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沿革，全面勾画了其内容框架，深入分析了国际秩序演进的各种愿景。虽然此报告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过后作者的思考和表述，带有深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经过十年来各种前所未有的国际冲突和激进演变之后，该文写作时的背景也已经时过境迁，但仍不失鲜明的当下针对性。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这一问题上，无论怀有怎样的意愿和构想，也无论形势变化如何令人眼花缭乱，都还有必要回到国际秩序构建——既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议题，同时也是一个智识领域——的原则和设计构架本身，进行有根有据的全面系统的思辨和讨论。伊肯伯里的报告可以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文本。<sup>②</sup>

#### 1. “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沿革

伊肯伯里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沿革，另一个方面则是这种历史性变化逻辑中所包含的各种维度。

伊肯伯里提出，历史地看，“自由国际秩序”有1.0、2.0、3.0等各种版本。所谓1.0版“自由国际秩序”，乃借助于伍德罗·威尔逊的思想而产

---

① 冯绍雷：“普林斯顿报告的背景、内容与评估”，《中国战略观察》，2007年第3期。

②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n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9, Vol.7, No.1, pp.71-87.

生。威尔逊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涌现、民族主义兴盛的年代。威尔逊主义虽主张国家主权和民族自治原则，但在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的复杂国际背景之下，“自由国际秩序”并未被真正实施。美国自己也不想执行有关和平和战争的协定，而是回到 19 世纪早期运用国际仲裁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状态。因此，当时的国际秩序只能算是一个 0.5 版的“自由国际秩序”。

伊肯伯里认为，2.0 版“自由国际秩序”大体上是冷战时期的国际体制。20 世纪 40 年代，罗斯福像威尔逊一样，希望建立大国合作与强制下实现和平的体制。美国通过重建欧洲、对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实现一体化、确认承诺、开放市场、提供安全保障、遏制苏联，奠定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在冷战阴影之下，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的国际秩序逻辑也宣告形成。

战后第一个十年，“自由国际秩序”原是由西方主导、多层次、有多种机制加以保障的。但是，局势的变化逐渐使得美国开始行使直接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此后十年，欧洲孱弱、苏联抗争，建立秩序的各种复杂需求，使美国主导的市场、美元、冷战同盟等机制，成为战后国际体制的关键所在。美国不仅觉得自己是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而且是一个所有者和行动者。于是，自由主义的、但同时是霸权式的国际体制出现了。

伊肯伯里认为，以下因素大大推进了 3.0 版“自由国际秩序”的问世：

（1）冷战的终结，对手消失，同时也使美国式的霸权逻辑客观上趋于终结；（2）支配式的等级制关系，逐渐变成了讨价还价；（3）究竟是美国式的单边行动还是联合国更具权威，日益成为问题；（4）国际主体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sup>①</sup>伊肯伯里认为，3.0 版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即后霸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目前只是部分地出现，其完整的面貌和逻辑还处于远不确定的状态。

## 2. “自由国际秩序”阶段性演进的特点与路径<sup>②</sup>

---

<sup>①</sup> 冯绍雷：“普林斯顿报告的背景、内容与评估”。

<sup>②</sup> 为使读者确切理解“自由国际秩序”演进中的结构性要素，也避免正文过于冗长，兹将伊肯伯里提出的有关国际秩序转型的五个关键向度置于注释中，便于查阅：（1）可供参与的范围：这里指的是，国际体制参与者仅允许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排他性集团，还是对全球所有国家开放。（2）主权独立程度：亦即，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领土范围内宣示其权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国际承认的范围内显示其统辖国内事务和执行职责的合法权利，包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向超国家体制割舍主权，或者通过协议降低自主决策



伊肯伯里认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三种版本各有其特点。就 1.0 版本而言，按照国际法的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被确认，国家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得到尊重。该体系的政治层级较为均等。该体系按照国际法来执行规则和规范。同时，当时仅有很少的政策空间，可以用来限制各国间的开放性贸易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在 2.0 版本当中，出现了以西方为主导性取向的安全和经济体系，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念也出现了修正。该体系中的新型等级体制的特征表现为：美国霸权提供公共产品，以美国式规则为导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确立起了保护人和委托人式的关系，但各自仍具有相互作用、讨价还价、表达意愿的机会。该体系强调经济规制、保护人权等领域的政策运作，政策空间也获得扩展。在未来的 3.0 版本中，非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可以被扩展成为核心治理机制的成员，该秩序覆盖全球范围。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成为主流，同时，伴有干涉性、相互依赖性的经济与安全体制。出现后霸权式的等级制度，各种不同的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组成了不同的集团，占据着国际治理体制中的各种岗位。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得到扩展，与诸多网络型合作的新领域相互匹配。该体系的政策运作空间进一步得到扩展。

那么，当下有哪几种国际秩序演进的路径呢？伊肯伯里认为，至少有三种与前一阶段“自由国际秩序”2.0 版本不同的路径。而每一种路径都包含着主权、规则、机制、权威等要素的不同组合。

第一种路径，就是“自由国际秩序”3.0 版本。这种理想中的模式与以往美国霸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相去甚远。美国将会在这一体制中丢失不少支配性和监控性的规则和机制。以往由美国通过北约等组织所提供的西方一家在多边机构中的主导性，将让位于“公共的”治理规则和机制。在 3.0 版本里，国际治理中的权威岗位将转向吸收整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同时，威斯特

---

的程度。（3）主权平等水平：是指在国际秩序内等级制的实现水平。自由体制主张平等，但自由体制也可以在具有等级的情况下被组织起来。（4）法制规范性：指秩序运行中，在多大程度按照法制原则办事。“自由国际秩序”的法制状况呈多样性：国家间互动可以严格恪守法律条文，但也可以讨价还价。（5）政策实施的宽度和深度：国际秩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国家间推行共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人权、安全政策。能够实施更多共同政策，显然也具有更多功能，包括在国家间实行干预、监督、规制、保护等举措。

伐利亚式的主权也将受到进一步的侵蚀。后霸权时代的等级制度将由若干主导国家所组成的群体来奠定基础。他们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各国际治理机构取得关键岗位，提供以前由美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确保市场开放和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将会把自己的传统霸权让位于加强合作，将会在非正式和网络式的协议中得到自己的份额。这是一个与美国和西方霸权较少联系的秩序，但是，将会更依赖共同规则和强化集体行动。

第二种路径，将会是“自由国际秩序”的 2.5 版本。联合国将会和先前十年那样，保持与各方之间的协调与讨价还价，但是将作为霸权体制的领导者。在 2.5 版本里，美国将会让出部分特权，但会保留其余部分。美国将与伙伴共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权威，但是美国无论如何会保持在军事战略领域的霸权。美国可能不参加国际法院。

第三种路径，如果“自由国际秩序”变得封闭和法制消失，那么该秩序将会被打破。“自由国际秩序”2.0 版本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各种因素将会变得碎片化，转化成为竞争性的地缘政治集团。这样的全球秩序的崩溃不一定是指原有秩序的完全瓦解，然而，只要停止开放贸易，终止以法治为规范，否定以多边决策为基础，那么既有的国际秩序就告结束了。这时的国际秩序就会演变成一个较少合作、地区层面更加分裂、各方更加互不往来的竞争性地缘政治环境。

### 3. 美国可能的几种选择及其条件

伊肯伯里提出，究竟选择这三种路径中的哪一种，取决于在国际秩序沿革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意愿及其能力，这里还存在着几种可能的选择。

首先，美国主动放弃垄断特权，让渡给国际共同体。即使是国际权力分配出现急转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当中依然还是世界舞台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国家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可能也会认为，这样一种协商式的“自由国际秩序”，比起任何别的选择要来得更好。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如美国转向 2.5 版本尚且困难，那就不用说转向 3.0 版本了。如果出现更加分散化的趋势，那么，很可能只是留下少数几个关键伙伴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安全领域的联系。

第二种可能，美国的安全能力可以转化成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协议。美

国具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一国的军事开支甚至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军费的总和。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构建全球规则和体制的谈判能力？如其他国家指望进行安全对峙，那就正好给予美国一个机会，重新返回霸权体系。

第三种，选择未来国际秩序的多种可能性。如果若干个领导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各奔东西，欧洲将会继续乐意削弱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但是，如果非西方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一旦倾向于寻求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他们未必一定倾向于“自由国际秩序”的开放和法制。但是，另一种可能是，他们确实认为：他们的利益可以在“自由国际秩序”之内得到关照。如果第二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从“自由国际秩序”2.0 引申出来的路向，应该是侧重于“自由国际秩序”内的参与和分享权威，而不是“自由国际秩序”原有的实质性特征被改造。

在上述不同方向的选择中，伊肯伯里提出了对“自由国际秩序”未来演进的两个判断：

第一，在没有战争和经济灾难的情况下，“自由国际秩序”看来不会被彻底打破或者消失。就像过去一样，“自由国际秩序”将会不断地演进。国际治理的特征将会随着各国共享并实践权力与威权而得到改变。重要的是，领导国家和新兴国家并没有想推翻“自由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法制秩序。压力和动机来自于治理方式和处于该系统中的责任承担状况的改变。

第二，美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一体制如何演进？美国在主导性不如以往的情况之下，如何继续支持这一体制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美国还要继续成为稳定并且发挥“自由国际秩序”作用的领导者？美国如何在较少特权的前提下支持这一体制？美国正处在深刻的动摇和犹豫当中——美国的力量可能提升，也可能衰落。但美国必须适应这样的新局面，即，扩大和深化“自由国际秩序”，乃是当今的现实。<sup>①</sup>

伊肯伯里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力求维持“自由国际秩序”的生存与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伊肯伯里的构想生动反映了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

---

① 冯绍雷：“普林斯顿报告的背景、内容与评估”。

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难以自保，期待通过对原有秩序的修正和转型，包括国际决策机制中领导权的有限重组，来适应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的立场。问题在于，伊肯伯里报告之后所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包括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中国崛起等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否意味着原有考量的基础不复存在？这需要从进一步拓展视野的思辨中去寻找答案。

## （二）“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性争议

伊肯伯里发表这篇长篇报告之后，有关国际秩序的争论有增无减，特别是近三四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成为国际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为便于把握从伊肯伯里报告直到最近这一领域争议的发展，笔者提供以下关于国际秩序辩论中诸多观点的一些不同的分类，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中国旅美学者、美国威登堡大学于滨教授在《俄罗斯研究》杂志上撰文提出，目前的辩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之间。其一是自由主义派别内部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争。悲观主义者认为，因出现中俄等现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因西方内部反建制势力的打击，“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寿终正寝”；乐观主义者则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依然有回天之力。其二是现实主义质疑派批评“自由国际秩序”“既不自由、又非一统天下、鲜有秩序井然”。<sup>①</sup>尤其是主张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提出大国争霸必有一战的“超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称“自由霸权体系注定失败，美国决策者应该理智地抛弃对自由霸权的追求”。<sup>②</sup>其三，注重东西方历史差异的学者，批评现实主义派别错误地认为，任何新兴力量的崛起似乎都是在破坏现有秩序，他们尖锐地指出，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最大修正的不是别人，而正是美国自己。经过综合比较，于滨教授的意见是：尽管“‘自由国际秩序’困难重重，这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来修复、修改和完善。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脏了的‘洗澡水’一起倒掉，没有人会从中获益”。<sup>③</sup>

---

① 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第23-26页。

② J. Mearshi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③ 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第52-53页。

第二种分类，由英国肯特大学国际与欧亚问题教授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sup>①</sup>在他看来，有四种类型的争夺霸权模式。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冷战后西方主导的“民主国际主义”激进扩张正在引起普遍反对。第二种是变革性（革命性）国际主义：冷战时苏联阵营革命性对抗已是过去，但当下面临着以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等期望国际秩序发生质变的左右激进社会运动。第三种是美国式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以美国第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来否定国际秩序效能。第四种是保守的（或主权的）国际主义：以中俄为代表，伸张主权与新区建构、坚持在无霸权的国际主义基础上改革而不是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萨科瓦的分类，显然受到了英国国际问题研究学派的影响，强调社会向度；同时把中俄列为国际秩序演进中的一大主题，凸显当今国际社会多样化、多极化、多元化的现实。萨科瓦的结论是，比起霸权主义，一个在多个模型之间进行竞争的国际体系可能更加平衡、有序和创新，并可更加协调地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sup>②</sup>

第三种分类，旅美俄罗斯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侧重于对国际秩序的转型问题上所出现的各类观点进行归纳和划分。按照他的划分：其一是“警世危言派”，比如，“2018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报告”强调，美国改变力量平衡的企图正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和次结构正在加速走向解体和衰朽的全球趋势”，“该趋势不可逆转，也不可能在全球规制的基础上得以重新恢复”；此外，俄罗斯的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美国的科恩（Stephen Cohen）、莱格沃尔德（Robert Legvold）等著名学者也都持类似观点。其二是“支持稳定派”，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包括伊肯伯里在内，这派观点不仅认为国际秩序的危机被夸大了，“现行国际秩序在后冷战时期出现被改变后的留存，不但可能而且应该”；“现行国际秩序的问题只是执行中的问题，而不是其生存原则出现了问题”。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提出：“虽然美国和

---

<sup>①</sup> Richard Sakw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odels of Global Ord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3.

<sup>②</sup> Ibid.

西方急剧削弱，但依然是政治、科技、经济各领域的世界领袖的美国和西方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力量，现有国际秩序不需要根本改造，而只是需要改善。即使美国不如预期，俄罗斯也会寄希望于欧洲，视之为与其一体化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其三是“双重趋势派”，齐甘科夫本人认为：“‘警世危言派’忽略了现有国际秩序同时存在着建构和解构两种过程，而‘支持稳定派’过于悲观地看待非西方力量克服技术差距、创建稳定国际政治机制的能力”。在他看来，当今始终同时存在着破坏性和创造性进程两种态势，因此，大体上也属于支持国际秩序稳健转型的一派。<sup>①</sup>

第四种分类，“西方缺失”主题下“自由国际秩序”的问题与挑战。这是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就国际秩序争议提供的另一种不同分类方式。作为影响力广泛的世界级国际论坛，该报告基于欧洲立场，每年选择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探究大变局之下如何维护自由国际秩序。《慕尼黑安全报告》醒目地提出了“西方缺失”这一范畴，认为对西方内部分裂的焦虑是慕尼黑安全论坛关注的重点。报告提出，“西方”作为一个相对紧密的地缘政治体走向衰败和“西方精神分裂”的局面，原因首先在于西方本身“出现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阵营”。该阵营中的人认为，“西方不是一个对所有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人都开放的共同体。相反，它是一个由种族、文化或宗教标准组成的社区。”该派别认为“（白人基督教）的西方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外来者’的威胁”。其中较温和者主张拒绝难民、封闭边界、反对“政治正确”；较激烈者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敌人；其中最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则诉诸袭击、谋杀不同信仰的公民和政治家。《报告》点名批评作为执政者的特朗普和欧尔班“反对自由国际主义、主张新的民族主义的立场”；称“西方内部的非自由主义势力可能成为外国非自由主义势力在西方的‘特洛伊木马’”；并直指，“北约最大的危险，既不是其他大国的崛起，也不是其周边地区的不稳定，而是内部非自由主义的崛起和西方集体身份的不稳定。”《报告》自我批评道，西方盲目自信，对中俄终将采取自由价值观过于乐观，听任危机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伤害，承

---

<sup>①</sup>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1.

认对此“还无法找到应对挑战的答案”。《报告》还提出“西方领导的联盟”任意发动“军事干预”和“在国际冲突中的军事优势”已不复存在；西方主要国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机构的支持在减少，中国等对国际机构的关键影响力在增长；作为“自由国际秩序”支持者的北约与欧盟“苦苦挣扎”，“面临巨大挑战”。《报告》指出，美国收缩产生的政治效应、过度使用经济武器导致盟友与伙伴疏离、以及国内的分裂，将会使美国进入一个“战略停滞”时代；而欧盟在全球定位、内部政治与战略上的分歧、包括在 5G 等问题上既与美国脱钩、又无法达成内部一致，都“阻碍了欧盟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报告》称，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关于缓与俄罗斯关系的提议，“招致了几乎全欧洲的批评”；美欧之间、欧洲内部围绕北溪 2 号管道的激烈争论；大多数欧洲国家在美俄、美中之间发生冲突时不会选边站，而会采取中立态度。《报告》认为，在此背景下，西方需要应对大国战略的“双轨战略”是：“在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与专制国家合作，同时加强西方的凝聚力”。《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的吸引力、民主国家占世界GDP总量的 57%，这些原因使“西方应该能够捍卫自由国际秩序，同时承认全球权力转移将带来自由秩序必须与之共存的竞争模式”。<sup>①</sup>

通过对当前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辩论的简要介绍，人们不仅看到了有关的各种观点，同时也感悟到了这些观点背后纷繁复杂的思想谱系的激烈博弈。尽管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不会在一个短时间里落幕，但是，第一，总体而言，来自各方的多数专家倾向于认为：与“自由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当前国际体制需要经过改革才能留存。而其关键问题，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所言，“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来统治全球，而是由占有行使各种各样权力的多重主体来实施统治”。<sup>②</sup>第二，鉴于“解构”与“创新”两种趋势同时存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博弈一时还难分高下。比较多的意见倾向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关国际秩序构建的合作还势必与竞争互相交织而同时存在。第三，与此同时，在关于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

---

①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Westlessness”, Feb.16, 2020,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

② 柯贵福、陶庆梅：“新型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于《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汪晖、王湘穗、曹锦清等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

究竟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的争议中，至少在《慕尼黑安全报告》发表之后，认为西方内部分裂、包括美国自身与多边体制“脱钩”才是削弱“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因的观点，与主张挑战主要来自外部的立场，互成掎角之势。

## 二、“多极世界”构想的演进

世纪之交，国际新兴力量崛起，传统西方大国出现衰落趋势。要求维持二战以来的基本国际秩序，主张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反对霸权，支持多极化发展和多边主义，同时也要求改革现有国际体制不合理方面的立场，可归为“多极世界”与追求多极化的思想流派。换言之，多极、多元、多样化乃是其基本发展趋势，而支持现有国际秩序在稳定运作前提下的改革，是其基本的战略路线。这一流派反映了当今新兴经济体、转型国家、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中国与俄罗斯被认为在这一流派中最具代表性。

### （一）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

“多极世界”的思想乃是该阵营的主要理论渊源。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是这一理论立场的主要发起人。普里马科夫是一位长期从事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的高级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多年担任大国总理和外交、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世界级政治家，这样的背景使得他在推动“多极世界”观念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虽然“多极世界”并没有像“自由国际秩序”的叙事那样，有着以西方政治理论为背景的完整系统的学理阐述，但这是基于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自然产物，有着以新兴力量崛起为背景的国际变局的强劲支持。普里马科夫对“多极世界”理论要点的归纳大致如下：

第一，在普里马科夫的阐述中，多极世界始终有一个重要的对立面，那就是美国所追求的单极化的趋势。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已经表现出的世界秩序有两种类型：多极化和两极化。理论上讲，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种类型，叫作单极化。然而，单极世界秩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不过，这种幻觉还是有过的。况且，建立单极世界的目的又成为一些意识形态学说的基础。许多战略设想、政治和军事行动均从属于这个目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



样说：某些人追求单极世界的欲望一直没有泯灭，不过客观上的先决条件却不曾存在，因此这种欲望压根就没有转化为历史现实。”“冷战后美国极力推动的单极化不仅与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两极化对立起来，而且还与‘井喷式出现的’多极化对立起来。”<sup>①</sup>

第二，普里马科夫认为，“多极世界”的基础，在于世界以市场经济原则的“同质化”为基础和意识形态不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他说：“冷战刚一结束，世界上便出现构建单极世界的倾向。不过，此时在国际关系构成中意识形态因素已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形式上，世界变得同质了，因为市场机制成为全球共同的发展模式。”<sup>②</sup>

第三，普里马科夫说：追求单极世界秩序是出于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问题的偏颇认识。他直言：以为“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输掉了冷战”，是一种“不符实际的认识”；“苏联解体不能归结于其在冷战中败北”；美苏共同努力才结束了对抗；因此，美俄仍应该具有平等权利。虽然普里马科夫的这一认知远远没有被美国精英普遍接受，但他坚持认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单极世界’致命一击。正是这场危机，使美国‘单极’金融中心的作用荡然无存”。<sup>③</sup>

第四，普里马科夫强调，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之下，世界形成若干中心是客观事实。现阶段世界多极化的特性是，美国在各极之间排名独特，依然是经济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不等于单极世界的存在。在世界各力量中心发展不均衡的前提下，多极化体系本身相当稳定。多极化世界是建立在全球化某一阶段基础上的，不仅建立在强化了各力量中心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上，而且还建立在这些中心在经济与科技相互隔绝的条件下无法生存的基础之上。<sup>④</sup>

## （二）西方语境下的“多极世界”

与“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论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和历史地位相比较，“多

---

① [俄]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李成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② 同上，第2页。

③ 同上，第7页。

④ 同上，第3-12页。

极世界”并没有像前者那样已有了从理论构想的提出、实施、修正、包括受到严峻挑战这样百多年时间的经久积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成为西方和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制度基础。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基辛格以多极化的趋势为依据，调整大国关系；到冷战后的 90 年代中期，普里马科夫不仅重提，而且推动“多极世界”的构建，“多极世界”的实践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无论如何，“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种实际运行了多年、其影响力遍及全球的基本制度。而“多极世界”还只是一种可供未来选择的方向，目前还只是一种相对局部和补充性的制度构建的尝试。这两者有着基本的区别。问题在于，正当“自由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西方对于“多极世界”作何反响。

鉴于“多极世界”这一范畴所具有的高度现实政治含义，毫不奇怪，首先会有来自竞争对手的批评。2003 年，美国当时基于“单极世界”理念，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战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声明道，“多极化——这是一种竞争对抗的理论，用最糟糕的表述是，这是一种价值竞争”。换言之，按照赖斯的说法，多极化会导致大国间新一轮类似于冷战的、包含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对抗。<sup>①</sup>然而，同样来自保守派阵营，但经验更为丰富的、被普里马科夫称为“才华横溢”的老资格战略家基辛格，在世纪之初所撰写的著作《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中，就这样写道，“美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但与此同时，推行政策的时候应该意识到：世界上似乎还存在其他一些力量中心”。用普里马科夫的话来说，基辛格根本无法忽视现存的多极世界秩序这个事实。<sup>②</sup>

### （三）“新两极世界”的争议

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和“多极世界”的实践推进，人们开始对这一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俄罗斯核心层精英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出现了笔者称之为“新两极世界”的辩论。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对一部分极端鼓吹重回对抗、漫无节制地挑动东西方对立、过于意识形态化、也缺乏理论深度的舆论再去作详细介绍。尽管这部分

---

① [俄]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第 2-3 页。

② 同上，第 10 页。

言论甚嚣尘上，但实际上，学术界和媒体界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时过境迁，无论从国际环境、国际力量结构、还是国际主体的意愿来看，冷战时代的那种全面结盟、军事对抗、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局面并不那么容易被轻易重复。

但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确还是有不少非常资深的学者，倾向于“新两极世界”正在来临的观点。2008年金融危机前，老资格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提出过“G2”的观点。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提出过“中美国”的新词，以此描摹即将来临的中美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阶段。而近年来，比如来自俄罗斯的权威国际问题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提出，“世界从多极走向两极的趋势开始形成，一极以美国为中心，另一极在欧亚。中国看起来是后者的经济中心。然而只有在中国不谋求霸权的情况下，欧亚中心才能形成”。<sup>①</sup>卡拉加诺夫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基于中俄合作的新力量中心正在出现。另一位美国资深专家、欧亚集团主席克利福德·库普钱(Clifford Kupchan)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专业会议上还论证道，“世界正在走向以中国和美国为核心的两极化。其中一个经得起实证检验的依据是，中美两家与排在后面的其他比较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间，在实力规模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凸显出中美两国地位的遥遥领先”。<sup>②</sup>尽管各国学界还有很多人并不认为所谓“新两极世界”就是当今的现实，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认为世界正在走向两极化的观点和舆论，一直在激起人们的思考和辩论。

#### （四）以“多边主义”取代“多极世界”？

与上述观点有类似之处的另一种主张来自俄罗斯。但该主张一方面强调要克服两极思维的惯性，同时又强调，应由多边主义来取代“多极世界”。这方面已经较为系统公开表达意见的，是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2018年6月26日，这位俄罗斯资深学者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网站发表了题为“为何世界不会多极化”的长文。随后该杂志2019年第一期在首篇位置全文刊登了科尔图诺夫撰写的“在多中心和两极之间”一文，再次表达对普里马科夫“多极世界”构想的不同视角的阐述。

---

① 冯绍雷：“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进展与问题”，《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4期，第29页。

② 参见克利福德·库普钱在2020年1月11-12日在清华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所举行的高端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

科尔图诺夫认为，“至少在俄罗斯，多极化的概念依然是一种用来表达总体性的政治声明和对全球发展趋势所作判断时的折中性混合物”。他认为：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关于世界秩序演变的叙事，是从两极（冷战时期）逐步过渡到“单极时刻”（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进一步向多极或多中心世界过渡。国际体系向多极化演变，在俄罗斯是被普遍公认的事实。从科济列夫一直到普里马科夫，“‘多极’和‘多中心’这两个词在俄罗斯的官方和专家辞令中最常交替使用，前者比后者更常见。含义上有细微差别，但这两个术语都强调现代世界的‘权力中心’”（两极和中心），而不是它们之间的沟通（如“多边主义”）。<sup>①</sup>

科尔图诺夫的认识是，其一，在过去的20年中，多极化的概念未能成为一种具有组织和总结知识、聚焦、解释、观察、启发、交流、规范等成熟功能的科学理论<sup>②</sup>；也并没有可靠衡量国际体系向多极化过渡的进展（或者倒退）的指标体系；更没有何时能完成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可靠预测。其二，因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差异，以往多极体系（主要是1814-1913年欧洲大国关系体系）的历史经验，已经完全不能作为现代多极理论的基础。科尔图诺夫认为，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当年维也纳会议之所以达成妥协，主政者都是专制君主，而近百年来民意波动对政治家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两百年前亚历山大一世的宽容和梅特涅的远见，已经不大可能再被今人仿效。<sup>③</sup>其三，多极系统内“极”的聚合驱动力，并没有得到经验性的证明。在科尔图诺夫看来，设想中的以地区大国为力量中心的国际架构，实际上并不成功。相反，地区大国的周边中小国家有着太多的离异、寻租、博弈，或者干脆是以邻为壑。其四，科尔图诺夫甚至自问：“我们是否真有足够理由相信，世界的确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能否断定，欧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接近独立的一‘极’？十年来非洲、中东或拉美更接近全球

---

① A. Kortunov, “Between Polycentrism and Bipolarity: On Russia’s World Evolution Narrative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1, pp.10-11.

② S.W. Littlejohn,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lif.: Wudth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p.28-29.

③ 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9 June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book/Why-the-World-is-Not-Becoming-Multipolar-19642>

一‘极’了吗？……我们无法断言世界正稳步向多极化方向迈进”。<sup>①</sup>其五，科尔图诺夫明确表示，倘若我们赞同国际体系中各国平等的原则，就应当放弃多极化构想的基础概念，从“多边化”寻找出路，以“多边”取代“多级”。“多极化世界由势均力敌的多个集团组成且寻求平衡，而多边化的世界则由兼容互补的多种制度组成”<sup>②</sup>。

科尔图诺夫的意见，可能并不仅代表他个人偏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看法。另一位代表更为主流意见的学者、俄罗斯瓦尔代国际俱乐部学术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认为，“我们翘首以待的多极化模式虽然给俄罗斯带来了机遇，却未提供任何可靠保障，不确定性倒是成倍增长。换言之，我们需要从头再来，首先是要明确，将谋求何种地位，在这场竞争中究竟需要采取哪些不可或缺的方式（军事、政治、外交、信息）。我们是否具备上述所有工具。与此同时，在冷战期间为我们带来成功的方式，如今已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毕竟如今的世界已经迥异。”<sup>③</sup>

#### （五）“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过渡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当今俄罗斯学界出现了关于多极化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的修正。这一种意见认为，多极化进程还会延续，但这是一个延宕时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表述并非一般学者。有人甚至引用普京的表述来强调这一修正，认为虽然普京一直强调“多极世界”的重要性，但在2016年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曾说，“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今天它可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承认这一点”。<sup>④</sup>科尔图诺夫对此的解读是，这意味着尽管多极世界是俄罗斯设想的一种未来秩序模式，但是现在要说“单极时刻”已经被完全消除，还为时过早。2017年，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谈到向多极化过渡时，也预计这种过渡将长期地持续下去。<sup>⑤</sup>遵循普里马科夫20年前

---

① 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

② Ibid.

③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Дом, который построил кто?// Огонёк. 24 декабря 2018. С.22.

④ Путин В.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151>

⑤ Лавров: многие политики являются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теории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хаоса. 11 августа 2017. <https://tass.ru/politika/4477015>

的总体逻辑，拉夫罗夫提出，“……时代的变化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拉夫罗夫再次强调，向多极世界的过渡将需要“几十年”，而且其最终结果并不能被预先确定。<sup>①</sup>有关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若干官方文件都指出，经单极性从两极向多中心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并不是一个既成事实。例如，2016年颁布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指出，“现代世界正经历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其实质归结为多中心国际体系的形成……但是，向多极化的普遍运动并不排除旧的、主要是单极体系所具有的‘暂时稳定’的时期”。<sup>②</sup>

普里马科夫本人曾具体地预言，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或者在第三个十年之初，多极世界将普遍确立。<sup>③</sup>显然，普里马科夫对多极化前景的判断并未变成现实。对此，齐甘科夫提出的修正意见是，向多极世界的过渡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长期过程，比如，“后华盛顿体制的转型可能要延续到2050年。”<sup>④</sup>这一判断，与上述俄罗斯官方的表达比较相似。

值得思考的是，有关多极化进程将会持续很长历史阶段，即“多极世界”可能是若干个十年之后才会出现这一判断，是否仅仅是一个关于过渡阶段的持续时间问题？是否意味着对多极化现象本身有了更为深切的洞察？抑或是对向未来国际体制的转型这一件事本身有了更新的理解？无论是从多极化转向“新两极世界”，还是转向另一方向的“多边主义”，不管怎么说，这至少意味着人们希望更从容地思考和应对这一重大而复杂、又从未经历过的全球性变局。

### 三、重回基辛格？

“自由国际秩序”虽然饱受批评，但这一西方观念形态已经成为在广大

---

① “Lavrov notes polycentric world will take decades to establish”, TASS, 25 Feb. 2019, <https://tass.com/politics/1046245>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64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③ A. Kortunov, “Between Polycentrism and Bipolarity: On Russia’s World Evolution Narratives”.

④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范围内实际管理世界事务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多极世界”思想虽然并未占整个国际格局的主导地位，但也已经局部地转化为新兴国家群体参与当今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世界秩序思考的意义何在呢？从形式上看，虽然没有伊肯伯里“自由国际秩序”那样一类制度化叙事，当年提出的“多极化”也仅是基辛格对国际发展趋势的一种描述，但问题在于，基辛格通过对于数百年来世界秩序构建跌宕起伏的复杂历史的思辨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原则、路径、功能、取向等关键问题。其铺陈之老到，思想之深刻，恐怕当今学界难出其右。尤其是当“自由国际秩序”和“多极世界”理念都沉浸于当下的无尽争议、又折射出其后五花八门的思想谱系和利益背景而难得要领之时，有必要重新回到基辛格，从他那几乎身兼国际史专家而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决策者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积累中，从他既是一位公认的现实主义均势的崇尚者，又被认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思想考量中，<sup>①</sup>从他毫无疑问是美国主导世界这一理念的推动者，但又极力主张当今世界需要多元包容合作的超越折中的立场中，去寻求借鉴。概括地看，了解基辛格眼中的世界秩序问题，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基辛格眼中的“世界秩序”及其当今特点

在《论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秩序问题”。首先是“世界秩序”。他认为：“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特征所持的理念。”基辛格这里所指的“世界秩序”，并不是一个已成为全球大一统规制系统的实际格局，而是西方和非西方地区各方有关国际社会未来发展模式的构想，是一种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来自各方，因而它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其次，关于“国际秩序”，他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在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与“世界秩序”不同，基辛格这里所说的“国际秩序”，反倒是指已经形成的、未必覆盖全部但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均势结构基础上的体制性秩序。然后是“区域秩序”，这里的“‘区域秩序’指同样的原则用于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换言之，基辛格所指的

---

<sup>①</sup> [英]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陈毅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世界秩序”范畴，是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在内的各主要权力中心所追求的理想秩序模式。而“国际秩序”、“地区秩序”则是上述观念和经验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实际制度与规范构建。这样一种划分至少表明，在“世界秩序”这一问题领域中，尚有主观的理想模式和客观上已经实际形成的模式之间的复杂博弈。<sup>①</sup>

基辛格认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构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于，第一，“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sup>②</sup>他对“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的势力是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的这一发问，表明了他对“失序”的深重担忧。<sup>③</sup>其次，基辛格敏锐地察觉，当今时代“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世界秩序的概念”，但是又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的诉求<sup>④</sup>。在他看来，世界的无序，并不在于秩序的缺失，而恰恰在于追求“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的诉求之间的竞争。他深深质疑：“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能够维持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吗？”基辛格指出，“国际社会”一词使用频率之高超出以往任何时候，但从这一词语中“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sup>⑤</sup>其三，基辛格指出，越是“在一个即时通信和政治剧变的时代”，越是要“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没有自由的秩序，“最终也会制造出自己的反对派”，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在基辛格眼中，秩序与自由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sup>⑥</sup>他对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4年维也纳体系的高度肯定，正是基于这两条原则的兼顾。而他对于威尔逊主义的批评，也恰恰在于威尔逊“创立了一个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则来维持的国际体系”，而“权力诸要素要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因而“很少有一份外交文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XVIII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序言，第VIII页。

⑥ 同上，序言，第XVII页。



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sup>①</sup>他认为，二战以来美国历任领导人对于构建世界秩序的贡献，都是“权利与合法性相平衡”的体现。<sup>②</sup>

## （二）合法性与权力的平衡——国际秩序延续和更替的核心

在基辛格看来，“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是一项核心原则。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何为“秩序”？他认为，“求得秩序两方面（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是政治韬略之本”。基辛格强调，“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特点”。<sup>③</sup>他指出，历史上欧洲国际秩序“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判断，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地生成秩序”。<sup>④</sup>也就是说，在基辛格眼中，多元化前提下的价值包容，是形成秩序的重大原则。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也把“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视为是由“大国间雄心碰撞所决定”的，认为“只有取得地缘政治的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sup>⑤</sup>似乎把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置于突出地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还是非常欣赏梅特涅的见解：“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sup>⑥</sup>比起简单化地强调权力关系，基辛格更重视各国之间的“均势”；而多元化的价值包容也需要以均衡的权力配置为基础，这样才能形成秩序。

第二个问题，基辛格一再使用的“权力与合法性”，指的究竟是什么？在基辛格的语境中，“权力”这一范畴不仅是指实力、暴力、军事力量等含义，有时还指实力的均衡和实力的多样化、多极化这样的含义。“合法性”这一范畴的使用更值得关注。除了一般将“合法性”理解为被确立的意识形态原则、得到共识的制度规范这些含义之外，基辛格在描述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时，比较明确地提到罗斯福“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即基于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第97-98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第3页。

④ 同上，序言，第XI页。

⑤ 同上，第332页。

⑥ 同上，第85页。

个人之间的信任、对国际法的尊重、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可见，基辛格对于“合法性”的理解，还是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包括像国家元首间的私人信任、伙伴关系、普遍善意这样一些范畴，也被他视作为“合法性”的应有内容。有时，他把“合法性与权力”，表述为“道德惩戒”与“暴力使用”两个方面，强调需要均衡二者，不可走极端。<sup>①</sup>

基辛格强调，“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的微妙平衡”。他强调，任何一种秩序离不开“原则”与“均势”：“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原则，以及规则受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sup>②</sup>

### （三）“权力与合法性的均衡”为何不能够轻易实现？

基于多年实践，基辛格深知“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极其复杂”。<sup>③</sup>他指出，合法性和权力均衡的建立，都是有条件、而非自动形成的。他说，当今世界不会“在某一时刻自动地融入一个平衡、合作的世界，甚至融入某种秩序”。在基辛格看来，国际秩序变更或危机只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之下：“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他指出，“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或是被负责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国家遗弃，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尽管这些挑战以武力为基础，针对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公，但是，其核心是指向观念和心理学层面的价值体系。”第二种情况，则是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化。基辛格说，或是原有权力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塌陷，如苏联崩溃；或是新兴大国“不愿扮演它未曾参与设计的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现存大国也许无力对这一体系的平衡做出调整，以包容它的崛起”。他不无担心地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即由此而起；当今大国关系急剧变化也预示着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重组。<sup>④</sup>目睹了当代国际社会的合法性与权力关系的严重失衡，基辛格警告说：“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第481页。

② 同上，第18页。

③ 同上，序言，第XIX页。

④ 同上，第481页。

两者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一旦这一均势被打破，种种束缚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基辛格的警示值得三思：“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些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彼此保持距离而已）、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sup>①</sup>

#### 四、国际秩序争议的启示、挑战及其未来路径

从本文所介绍的这三种来自不同背景和立场的国际秩序理念，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并非没有若干趋于接近的，或者是可以作为对话的空间。但是，又必须承认，达成共识何其艰难。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 （一）西方和新兴国家间在关键决策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伊肯伯里阐述“自由世界秩序”理念，以及普里马科夫“多极世界”思想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探讨：在秩序延续与转型过程中，关键决策领域的西方与新兴国家间能否合作共存。这一假设在当时的实践中并非没有重要反映：就在伊肯伯里写作这份美国版世界秩序报告的差不多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法国总统萨科奇一起，经过与中国等新兴国家领导人的磋商，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将协商世界经济政治重大问题的重要国际机制，从G7改为G20。从而完成了国际秩序转型中决策程序的一个重大演进。究其原因，一方面，基辛格说得明白：“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基辛格主张，“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sup>②</sup>而在笔者看来，另一方面的客观背景在于，在全球化进程欲罢不能的背景下，与其说当今世界是一个“极化的世界”，亦即人们常说的“单极”、“两极”、“多极”，诸如此类，还不如说，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科技和信息条件之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序言，第XIX页。

② 同上，第486页。

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代世界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网结式世界”。“极化世界”与“网结世界”的区别在于，当代世界的各个“极”，虽然依然是一个观察实力变化的重要向度，而且以实力竞争实现价值和利益目标仍然是各国的基本战略选择，但是已远远不像四五十年前那样，各“极”之间可以互相隔离而不相往来。相反，产业、价值、信息、人文等各种各样的“链接”已使得各国、各地区、各种文明相互间的关联性，远比实际上难以真正计算的各个“极”的力量消长状态，要来得更为重要。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想轻而易举、来去自由地“脱钩”，也都会不那么简单和容易。

## （二）历史借鉴与现实经验可以为秩序转型提供路径

鉴于国际秩序的延续与转型高度复杂艰难的特点，基辛格说，“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sup>①</sup>但是，历史与现实依然是未来国际转型的最好的老师。第一，多元共存的主张，实际上是得到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直到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所见证的重要经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乃是17世纪欧洲内部的多元化过程的一次实现。法国大革命后所出现的1814-1815年维也纳体系，乃是当时欧洲拥有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力的几个大国的一次合作共存，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后来恩格斯所说的“百年和平”的长期相对稳定。<sup>②</sup>而雅尔塔体系更是二战后不同意识形态大国之间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尽管冷战对抗破坏了多元合作，但是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一直深刻影响着国际局势。第二，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多种国际秩序，无不为我们留下关于秩序延续和转型中各种有效功能机制的历史借鉴。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安身立命的一个关键，按照基辛格的提示，在于其将国际规范视为复杂利益交织中的“中立性”的体现，这几乎是一个被当代人所遗忘的重要功能。“中立性”这一原则至少能避免为所谓的“互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而相互残酷搏杀。又比如，维也纳体系后的大国协调机制，虽然今天大众参与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外交决策，“秘密外交”已不可能如同当年般存在，但是大国间协调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第486页。

② 国际关系史界对此有争论，有的认为19世纪60-70年代德国统一战争期间已经打破均势，也有的认为，早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局势已被打破。但是，19世纪的国际格局因维也纳体制而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乃是历史事实。

的原则，特别是通过政治领导人会晤的形式进行交往沟通、密切磋商、甚至不同程度的互相承诺，仍然是转型期一项非常重要的机制。再比如，雅尔塔体制确立的大国政治决策，安理会犹如世界警察般的作用，尽管众说纷纭，却依然实用。伊肯伯里提出的等级制留存的可能性，还是取决于整个国际体系的设计，而并不是仅仅拘泥于形式上是否平等。包括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尽管在今天面临尖锐挑战，但是，这一秩序转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产生于和平、而不是出现在大规模战争条件之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提供的一笔宝贵遗产，迄今值得世人珍惜。在“权力与合法性的均衡”这一原则之下，有太多历史遗产依然可以供今人发掘使用。

### （三）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可能形成秩序共识吗？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辛格并非没有保留。一方面，他主张，“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sup>①</sup>但是，他具体回答这一问题时，含蓄地提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功签署，得益于当时两百个来自欧洲各方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共同努力：“他们之所以克服了重重障碍，是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决心不让战争重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景更加严峻，必须应势而动，否则就会被挑战吞没。”<sup>②</sup>但是，当年欧洲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在近似的文化基础上达成的政治妥协，能否在今天各种距离遥远、甚至经历了上千年互相敌对的历史悠久而十分辉煌的文明之间重现？今天人类能否重现当年的克制、宽容、理智和远见？基辛格在表达对当今国际秩序深切担忧之时，对此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基辛格并没有忘记提醒，“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他甚至强调，“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sup>③</sup>但他在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时，还不忘发出警告：虽然美国“一直寻求保持稳定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总是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第486页。

② 同上，第490页。

③ 同上，第430页。

与不干涉主权或尊重他国历史经验的原则相吻合。”<sup>①</sup>在这里，人们看到一个智者在向世界提供建议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提醒美国会向国际社会索要的代价。然而，美国究竟能否担当这一角色？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冷战结束之初，当时执政的共和党提出“单极世界”的主张，明白地表露出美国想成为构成“同心圆式”的世界秩序的中心。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民主党的奥巴马也提出了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的豪言壮语。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视中俄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有时近乎“敌人”），以美国利益至上的口号取代作为领导者国家的国际责任，强调单边主义、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原则。似乎与现行国际体制“脱钩”，才是美国的选择。正如基辛格所说，“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在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sup>②</sup>

面对如此矛盾的局面，既然已经不能重回历史老路听凭一个互相残杀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重现，也不能够相信任何救世主、抑或世界霸主会拯救人类，那么就只能相信，经由人类的良知，事在人为，去争取实现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从悲观论的、反思的立场来看，可能还应回到基辛格，即人类只是在面临灾难与毁灭的深渊面前才会悬崖勒马，去寻求共存之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由于可怕的三十年战争；维也纳协议的诞生是出于反对拿破仑发动的颠覆欧洲秩序、推广革命的全面战争；雅尔塔体系的确立是由于 20 世纪人类饱尝两次大战的断崖式悲剧；而晚近冷战格局的终结，则是出于人类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造成巨大伤害中，预感到的核恐怖时代全面对抗性冲突可能带来的灾难。换言之，几乎任何一次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型都源自于当时人们对战争或灾变的恐惧。

从乐观主义的国际演进的观念来看，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共存思想是每一次国际秩序演进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第二，“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基础上构建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非排他性规则，如规则的

---

①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第 486 页。

② 同上，第 305 页。

中立性、价值标准的非绝对性、程序的渐进性、行动规划的务实与可预见性、以及唯有人类才有能力构建的平等对话的公平性等等，明智的政治家可以借此推进多元文明的合作与团结。俄罗斯与西方历经多年冲突对峙后正在酝酿对话突破，中美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些都表明，即使在当前一片朦胧混沌的国际格局中，依然可以对多元并存的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期待。2017年，笔者在瓦尔代论坛上曾有幸请教普京总统，在经历了人类社会诸多国际秩序模式之后，如何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模式。普京充满自信地回答说：“当今世界面临着如此丰富复杂的变化，经济科技如此高速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今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前任何一种国际体制的简单重复？我认为，今后的国际秩序一定是和以前任何一种国际秩序不一样的重新构建。”<sup>①</sup>笔者以为，对未来世界无限发展与变化前景的敬畏和预期，以及对人类参与构建未来秩序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坚定信念，是对多样性文明能够形成秩序共识的一个难以撼动的总体理性基础。诚如鲁迅所言：“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五、“全球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2024 议程”

安德烈·齐甘科夫是提出“全球转型”这一问题的重要学者之一。他认为，关于大规模全球性变化的讨论虽然非常活跃，但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他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已经展开的辩论过程：一些学者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延续或更新改造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伊肯伯里、基辛格、林德（Jennifer Lind）和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等。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与文化的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动态性质？他们之间的相互认知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冲突，抑或反过来趋于取得共识？特别是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正在怎样作用于“全球转型”？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关键在于，倘若只是从外部结构，或简单地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发生与演进的轨迹，比如就像耸人听闻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类话题那样，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同时，齐甘科夫在研

---

① 在2017年瓦尔代会议上笔者与普京总统的对话。

读了关于俄罗斯和当代全球性转型进程相互关系问题的文献后说，尽管近期以来萨科瓦、卡拉加诺夫、雷丁（Andrew Radin）和里奇（Clint Reach）等所提供文献，已经和近 30 年来国际学界的所谓“转型学者”所写的关于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转型研究”作品有了很大区别；但是既有研究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体制本身已经出现一系列问题、而原有的转型研究一向以西方为楷模的背景下，显然再也不能像 30 年前那样，盲目地坚持以“逆转科学共产主义模式”为目标的所谓“转型研究”，而全然不顾当今“转型中”的国家与地区的现实已经发生的深刻改变。于是，齐甘科夫认为，应该在（1）总体国际秩序转型；（2）秩序转型背景下的国际关系；（3）国内制度变迁与上述两者的相适应，这三者相互结合的视角下，展开对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对俄罗斯而言，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综合：为建立新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为维护在这个世界上的巨大利益所做的非对称性抗衡；以及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在国内必须推进的改革。<sup>①</sup>

实事求是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可以轻松自如地应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内外挑战，对俄罗斯而言尤其如此。2020 年初，围绕着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和广泛讨论，显然首先旨在着手解决当下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指向 2024 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本文将这一进程命名为俄罗斯的“2024 议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未来长远发展的部署巧妙地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确值得加以关注。

### （一）中-短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

由于上文已经对世界秩序问题有较多分析，笔者将简要阐述这一背景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及国内政治经济进程。先来看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的前景与部署。

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伊万·季莫费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主编的《全球预测 2019–2024》，可能是俄罗斯方面与“2024 议程”这一话

---

<sup>①</sup>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题关联最为直接的一部作品。<sup>①</sup>该作品重点是研究世界秩序激变形势下的中短期预测。季莫费耶夫认为，在黑天鹅频出的如此动荡的时期，中短期预测要比长期预测来得困难得多。季莫费耶夫就未来四五年世界秩序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以下四种前景分析：

第一种前景，自由世界秩序的转型：重回特朗普掌权之前的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方针是改变特朗普所主张的对盟友与伙伴关系中严格的实用主义、毁坏经济上不利于美国的所有体制与机制、以民族利己主义来代替国际责任。内政是这类政策的触发器，因为特朗普正在全力以赴旨在实现 2020 年总统连任。问题在于，这样的政策非常可能在政治变动中被重新替代。一旦特朗普竞选失败，将会出现以下变化：（1）大西洋关系得到巩固，与亚太盟友的防务合作会加强；（2）重启美国与亚太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区项目；（3）谨慎处理对华关系，在对华暂时妥协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对付俄罗斯；（4）对俄罗斯施加集体的经济与防务压力；（5）在对伊朗施压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参与中东事务；（6）增加对乌克兰的经济与防务支持；（7）保持单极经济优势。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对俄罗斯不利，孤立和潜能削弱会继续，会迫使俄罗斯或是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穷于应对，或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前提下与西方妥协，实际上是使俄罗斯丧失平等对话的地位，沦落到投降的境地。“集体的西方”会觉得自己有能力迫使俄罗斯就范。

第二种前景，新多极世界：这一前景发生在美国转向务实单边主义路线难以被逆转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与中国相互独立地发挥作用，印度偏于传统的自治方针，欧盟对美国单边政策的不满导致其独立倾向增长，企图恢复前特朗普时期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失败。于是新多极世界表现出以下态势：（1）在欧盟自治趋势抬升之下，北约仍得保持，对俄罗斯实行遏制；（2）由于腐败和体制无能，乌克兰前景灰暗；（3）以美国为中心的若干地区贸易体制举步维艰，地区玩家自行其是；（4）中国的实力增长，谨慎处理与莫斯科的伙伴关系，不转向军事同盟，中美冲突受到控制；（5）伊朗适应美国制裁，在中东事务中俄罗斯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也增加参与度。对俄罗

---

<sup>①</sup>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Сборник.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РСМД). М.: НИ РСМДб, 2019.

斯来说，新多极世界的前景更容易被接受。俄罗斯有了与伙伴们周旋的更大空间，对孤立俄罗斯的企图的抵制能力增强，会有更多运作俄海外外交资产的可能性。但处于这种新多极世界，一点也不比与“自由世界秩序”打交道来得省力，玩家们各顾自己，谁也不能犯错，否则，在内政上引起的后果代价巨大。

第三种前景，两极世界的恢复：这一前景发生在中美冲突激化的情况下，美国因中国科技进步和变成国际军火市场的有力竞争者而加大对华压力。中美矛盾不可逆转：贸易战变成了经济制裁，亚洲武器竞赛加速。中美两大国的尖锐冲突刺激着原来盟友关系的巩固，并新增盟友参与。其中：（1）美国联合起亚洲盟友日本、韩国等，旨在加强安全领域的分担责任；美国还旨在与印度和越南建立“软盟友关系”；（2）俄罗斯与中国建立的针对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得以全面加强；（3）由于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关系，欧盟丧失独立性；（4）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相关发展模式。这一前景对俄罗斯的好处是，有保障地克服了被隔离孤立的状态，由于伙伴关系运作而稳固了自己的安全性。但是这些好处也带来缺点：丧失了回旋余地，成为中国小伙伴后，可能会对其出现过多的战略依赖。

第四种前景，丧失稳定并且各关键力量中心之间发生冲突：这一冲突前景仅可能由于偶然或局部原因所导致，但一旦冲突扩大会导致严重后果。特别是大国间冲突由于动用盟友关系和资源规模，会进一步刺激政治经济形势的紧张。这一前景可能的触发因素：（1）在叙利亚、黑海和波罗的海等美俄双方都有参与的敏感地区，冲突易于升级；（2）针对军事和重要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系统，与军事冲突有关的数字领域；（3）中美在南海爆发摩擦与美俄间冲突相比，一般尚可控制，但不排除冲突的迅速升级；（4）对于有关行动和意愿的单方面解读（比如，对于重大军事演习），以及企图先发制人的侵略行动。

虽然所有这些前景预测都会受到具体条件的局限，但在季莫费耶夫看来，新多极世界的发展模式尽管也需要付出代价，但对于俄罗斯最为有利。因为在这一前景下，多向度政策运用、自由回旋的余地、运用外交政策来解

决国内发展的任务，依然是俄罗斯外交的最高使命。<sup>①</sup>

对于中-短期俄罗斯对外战略来说，季莫费耶夫的评估不无道理。第一，在中-短期立足于新多极世界的立场，最大限度地基于主权国家立场，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运作，发挥俄罗斯的大国优势，服务于国内发展的需要，这是俄罗斯的基本立场。第二，前述俄罗斯学界对于“多极化”问题的含义及其延续时段的反思，可能会成为今后四到五年间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一个特点：前一阶段，对于推进俄罗斯武装部队装备现代化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为下阶段俄罗斯争取与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谈判和博弈提供了基础和回旋空间。而且俄罗斯对外战略会尽可能显示其弹性，在坚持强硬立场的同时，不放弃一切谈判妥协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机会。第三，俄罗斯外交在近年来实际上已经展示出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期很不相同的面貌：除了稳固俄罗斯在周边地区以及传统的伙伴关系以外，不仅围绕乌克兰问题本身的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令人期待的前景，而且俄罗斯居然在受到西方严厉制裁、国内经济发展受到打压的形势下，跃出外线发展，在中东、亚太、拉美、非洲都有所伸展。显然这已经不能够以苏联时期的“全球扩张”这样一类简单的判断来描摹，而是一个尽管暂处弱势，但是通过搞活外交，以提振信心为宗旨，通过首先在中东、然后拓展至在全球布局，以精心选择的目标、有限的投入、以及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广泛建立伙伴关系但也不排除在成熟条件下与美国周旋，在世界各关键地区打下楔子，以备长远之用。俄罗斯在叙利亚那样异常复杂艰难的环境中，能够一步步地站稳脚跟，以实力、智慧和信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俄罗斯新时期大国外交的一个缩影。第四，俄罗斯力争通过这样的全局安排，在今后四五年内排兵布阵，以维护自己的大国影响力。同时，为在一个较长时期的世界秩序转型过程中，不仅是以“战斗民族”，而且也以昔日运作大国外交的丰厚积累，来赢得自己的地位和份额。

## （二）“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国际政治经济学”

2020年初，普京总统通过及时改组政府、大力推动解决国内经济民生

---

<sup>①</sup>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Парад плане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ценарии динамик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С.6-11.

问题，提出以 2024 年为完成期限的 12 项直接事关民生的国家规划；同时提出宪法修正案，把改善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与解决 2024 年面临的领导人更替问题联系起来，以期统筹解决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在全球转型的背景之下，要打造一个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欧亚大国，使一个曾经千疮百孔的经济走向稳定发展，对俄罗斯来说并非易事。第一，从经济上看，俄罗斯在过去 30 年里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发生变化：1989-1999 年，是苏联经济崩塌和俄罗斯痛苦转型的阶段；1999-2009 年，是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增长的“黄金十年”，但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2009 年是 G20 中滑坡最严重的国家；2009-2019 年在乌克兰危机和遭遇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经济被经常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人称作是“失去的十年”。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认为，与其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是由能源为主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由于过于倚重国家储备基金，指望通过以国家为后盾的储备基金来推动经济所造成的。这最终导致了消费不振、私人部门萎缩。<sup>①</sup>现在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能否在一个短时期内，依然在能源主导的经济结构之下，通过削弱国家支持、发展私人部门，来赢得迅速发展呢？20 世纪 90 年代“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方案，就是旨在通过类似的路径来解决问题，结果却适得其反。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是否还记忆犹新？俄罗斯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国家，在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之下，尤其在整整 70 年厉行政治经济集权模式之后，如何来发展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在短时期内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呢？看来，这一系列问题依然令俄罗斯精英百思而难得其解。

于是，犹如资深政治家苏尔科夫所言，对于一个“长久国家”的需求出现了。这是从国家政治建构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当前走向的第二个问题。那么如何来强化国家建构呢？欧洲现代民主国家发端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市民社会传统。但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也不存在欧洲式的市民阶层基础。俄罗斯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生命的宏大帝国。俄罗斯学习西方四百多年，习得大量政治经济与人文成果，但也并没有使自己变成一

---

<sup>①</sup> 弗·伊诺泽姆采夫：“俄罗斯：经济停滞的帝国”，《财经》杂志 2020 年年刊：预测与战略。

个西欧式的民族国家。十月革命使俄罗斯走上了与西方决然对立的另一条道路，这使得俄苏国家建构与欧美相去更远。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似乎有机会使其变成一个类似于欧洲国家式的政治单位，但是转型失败、地缘政治抗争加剧，使得这样的期待又告落空。与此同时，一个前所未见的“全球转型”开始了，先是新兴国家（包括老牌帝国、但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崛起，西方本身根基动摇，出现了数百年未见的，尤其是来自西方自身内部的挑战，包括其国家建构。在这样的大变动中，俄罗斯开始寻求既是按其历史发展逻辑而来的“长久国家”，谋求符合自己国情的国家建构，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复杂而尖锐的内外挑战，但也从未放弃将这样的“长久国家”置于现代民主基础之上的尝试。事实上普京一直对于苏尔科夫的“主权民主论”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主权主外，而民主主内，两者是何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sup>①</sup> 当下普京力主对 2024 年以后的宪政体制作重新安排。普京明确表示他将不再参加总统大选，但作为强人离开之后，必须对既有政治体制做好安排：俄罗斯议会将会在任命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问题上拥有更大的权力，但俄罗斯仍然会是一个总统制国家。普京力主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推进宪政改革。普京明确说：这样的实验有可能失败。但是无论如何，在“全球转型”的背景下，无论就国家内部建构而言，还是对国家间关系来说，都应该采用更加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政治安排来推进宪政改革，这是“合法性与权力相平衡”的一次重要实验。

最后的问题，“2024 议程”所透露出来的不仅是挽救经济的“经济学问题”，也不仅是政治经济一揽子推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顺应世界秩序转型的大势，以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应对国际变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一，迄今为止，欧美国家依然流行的观念是：西方与中俄间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价值观念的对立。虽然，事实上无论东方与西方，民主、自由、安全、发展、独立、互相尊重，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理念，但是东西方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的不同道路、不同时间和不同组合方式所引起的歧见依然隔阂深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2024 议程”既明确强调维

---

<sup>①</sup>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третье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9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789>

护主权，但又力图关注公意，努力超越和克服国际歧见，这一点值得关注。其二，具体而言，俄罗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依然会坚定地推进多极化进程，但是在目标、实现方式和时间观念方面已开始调整。俄罗斯已经超越“危机应对式”的外交战略阶段，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面向全球排兵布阵的格局，因此更加关注全方位的“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既有政治与经济的均衡，又有国内与国际的均衡，兼顾俄罗斯本身处境与国外反响之间的均衡，还瞩目当下与长远的平衡。今后这四五十年，显然是俄罗斯这一幕大戏登台的一个重要阶段，值得拭目以待。

---

**【Abstract】**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selects three typical views from different spectrum, namely, Ikenberry's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ory, Primakov's multipolar worldview and Kissinger's views on the evolution of world order. These three theories hav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functions and views regard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lthough sometimes these three theories seem to be at loggerheads, yet there is still room to have dialogue or even reach consensus. It is far from enough to seek the trajectory of future world order only from the physically external structure or by simply citing precedent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oth to study debates among those views and adjustments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and to underst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o different domestic process and "global trans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Russia sets its "2024 agenda". A series of important deployments and heated discussion, such as the resign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s proposed by Putin, are obviously aimed at solving current urge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n Russia. Meanwhile, they also logically point to medium and long-ter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rangements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Putin's term in 2024. It's really worth the academia's attention to explore how Russia connects its dealing with current difficulties with deployment of futur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how it joins its transition of domestic affairs to trends of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Multipolar World, Global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просы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автор статьи обсуждает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ории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кенбер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Примакова и взглядов Киссинджера на эволюц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эти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теоритических подхода происходят из различ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и предлагают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иногда кажущиеся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этими теоритиче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сближение, диалог и даж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а между ними не исключаются.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осто искать траекторию будущей эволюци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на основе внешней структур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физики или цитирова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цеденты. Изучен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между вышеописанными подходам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ми в и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а также анализ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процессам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и «глобальным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ми»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начале 2020 года Россия запустила «повестку 2024». Ряд важ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и обширных дискуссий, включая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ную Путиным поправку к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явно нацелен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решение неотложны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и,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логически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развития после истечения нынешн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в 2024 году. То, как Россия увязывает решение текущих сложных проблем с развёртыванием будущег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ак она связывает внутренн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 тенденциями будущего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сё это достойно внимани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естка 2024

(责任编辑 崔珩)

**中东、亚太政治中的俄罗斯****盟友还是对手？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与挑战\***

王 晋\*\*

**【内容提要】**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被视为最关键的一方。俄罗斯在2015年9月直接出兵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大片土地，并与伊朗和土耳其一起，通过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索契和平进程，逐渐稳定了叙利亚的国内局势。此外，俄罗斯还积极促成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成立，推动叙利亚开启战后政治重建进程。随着叙利亚国内局势逐渐缓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俄罗斯需要面对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关切。俄、伊、土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分歧犹存，很可能导致叙利亚局势再度紧张。另一方面，俄罗斯需要处理好叙利亚一些敏感的政治和安全事项，维系叙利亚国内战局稳定，推动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实现突破。

**【关键词】**俄罗斯中东政策 叙利亚问题 俄罗斯土耳其关系 俄罗斯伊朗关系 库尔德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0039(24)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以来，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敏感和最重要的议题。

\* 本文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度一般课题“西亚、北非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发展特点及其对策建议”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审稿人提出了详尽的建议，对本文帮助很大，在此表示感谢。文中错误，由笔者承担。

\*\* 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017 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占据绝对主导权，叙利亚战后政治重建也被提上政治日程。无论是在军事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成为当前叙利亚问题关键的三方力量。<sup>①</sup>在这三方力量当中，俄罗斯的作用最为显著。一方面，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较强的军事存在。俄罗斯在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即派出军事人员，进驻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港，并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2015 年 9 月，俄罗斯军队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扭转战局，协助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通过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和拉塔基亚附近的空军基地，继续在叙利亚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外交层面主导了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首先，俄罗斯推动召开关于叙利亚和平的国际会议，保持与相关当事国，如美国、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沟通，明确了要以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原则。其次，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平台上，多次否决美国制裁叙利亚的提案，坚决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第三，俄罗斯还积极搭建推动叙利亚各方和谈的国际平台，组织与叙利亚内战冲突有关的重要外部国家，通过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平进程”<sup>②</sup>，促成了四个“冲突降级区”的建立。2018 年 9 月，俄罗斯又与土耳其共同在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建立“缓冲区”。军事上的“硬实力”与外交上的“软实力”，使得俄罗斯成为叙利亚问题最关键一方。<sup>③</sup>

关于俄罗斯与叙利亚问题，学界主要关注两个议题。一方面，学界关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的原因。学界将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归因为以下几个方面，即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威胁<sup>④</sup>，保证俄

---

① 关于叙利亚问题上各种力量的博弈，可以参见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87-119 页；王晋：“叙利亚重建的困境、归因与超越”，《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第 3-29 页；王晋：“叙利亚重建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国际关系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27-46 页。

② 阿斯塔纳在 2019 年更名为努尔苏丹，为了便于行文，本文仍以“阿斯塔纳”来称呼。

③ Zvi Magen, Udi Dekel, Sima Shine, “Russia in Syria: Between Iran and Israel”, *INSS Insight*, 2017, No.970, <http://www.inss.org.il/publication/iran-israel-russia-syria/>

④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30-176 页；Elena Pokalova, “Driving Factors behind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2018, Vol.41, No.2, pp.1-21.

罗斯在叙利亚沿海的战略存在<sup>①</sup>，维护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sup>②</sup>另一方面，学界突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作用与影响。学界普遍将俄罗斯视为叙利亚问题的“关键一方”，甚至认为叙利亚内战与政治和解进程，都是由俄罗斯主导实施的，<sup>③</sup>并讨论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得失。<sup>④</sup>还有学者突出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将叙利亚战争以及政治和解进程，归结为俄罗斯同美国的战略博弈。<sup>⑤</sup>

当前学界将叙利亚问题归结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或者是将俄罗斯视为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关键方，并不符合叙利亚的现实情况。一方面，无论是奥巴马时期还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缺少深度介入的意愿，“绝大多数美国人坚信，派遣大批美国军人到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sup>⑥</sup>另一方面，突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作用，却忽略了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影响，以及伊朗、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

作为叙利亚问题关键的三个当事方，俄伊土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决定了叙利亚问题的未来走向。一方面，俄伊土三方是当前叙利亚战场上介入最深的三方，且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关切，三方的关系决定了叙利亚战场的局势。

---

① Pavel K. Baev, “Unfriended: How Russia’s Syria Quagmire is Costing it Middle East Allies”, Brookings Institute, 2016 January 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1/07/unfriended-how-russias-syria-quagmire-is-costing-it-middle-eastern-allies/>

② 王宝龙：“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的能源地缘政治因素”，《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第89-102页；Maria Raquel Freire, Regina Heller, “Russia’s Power Politics in Ukraine and Syria: Status-seeking between Identity, Opportunity and Costs”, *Europe-Asia Studies*, 2018, Vol.70, No.8, pp.1185-1212.

③ 马建光、李佑任：“‘出兵—撤兵’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1-116页；唐志超：“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第51-55页。

④ Emil Aslan Souleimanov, Valery Dzutsati, “Russia’s Syria War: A Strategic Trap?” *Middle East Policy*, 2018, Vol.XXXV, No.2, pp.42-50.

⑤ 比如姚全就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将叙利亚问题等同于美国与俄罗斯的“博弈”。参见姚全：“美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懦夫博弈论析——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5期，第57-76页；董漫远：“叙利亚乱局：博弈新常态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44-58页。

⑥ Donna G. Starr-Deel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Syria”, in Donna G. Starr-Deelen eds., *Counter-Terrorism from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President Trump*, Cham: Palgrave Pivot, 2017, p.31.

另一方面，以俄伊土三方为主要力量的叙利亚问题索契进程，和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是叙利亚冲突管控和政治和解的重要机制。因此，俄伊土三方的相互关系，对于未来叙利亚问题的走向至关重要。本文力图分析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理清未来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本文有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要利益，已经从军事行动转变为维持现状，进而鼓励叙利亚各政治力量实现和解，早日开启政治重建进程；另一方面，俄罗斯作为叙利亚问题最关键的一方，无法单独决定叙利亚问题的走向，需要与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等其他叙利亚问题相关当事方共同协作，考虑不同当事方的利益和关切。因此，未来俄罗斯必然因为其“最关键当事方”的身份而受到各个不同当事方的期许，但是也需要在不同当事方的期许中做出取舍和退让的姿态。

本文余下篇幅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简要回顾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历史关系，突出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核心关切；第二部分梳理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和危机；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主要分析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独特地位。作为叙利亚问题最为关键的外部力量，俄罗斯既受到来自于相关当事方的期待，也因此需要调和不同的矛盾，应对多种危机和考验。

## 二、俄伊土与叙利亚的关系

从对叙利亚政府的态度上，俄伊土三方可以划分为，以俄罗斯和伊朗为代表的“挺叙利亚政府”阵营，和以土耳其为代表的“反对叙利亚政府”阵营。在对叙利亚局势态度上，又可以分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保持现状”阵营，和以伊朗、土耳其为代表的“打破现状”阵营。俄伊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与它们各自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外交政策理念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回顾俄伊土与叙利亚的历史关系，梳理出三个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持不同态度的原因。

### （一）俄罗斯与叙利亚关系回顾

叙利亚一直是苏联/俄罗斯制衡美国在中东影响力，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扩张的重要伙伴。1944年，苏联同刚刚宣布从法国委任统治下“独立”的叙利亚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两国在1946年2月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苏联承诺向叙利亚提供军事和外交帮助<sup>①</sup>，苏联也在一系列外交场合呼吁结束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1954年2月，“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上台执政，主张与苏联发展更加紧密的关系。从1955年到1958年，叙利亚从苏联接受了大约3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sup>②</sup>这帮助“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府夯实了在叙利亚国内的政治领导权。1966年2月，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少壮派军官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和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sad)等人上台执政，叙利亚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加强。<sup>③</sup>1971年4月，苏联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开设军事基地，叙利亚军事人员也开始接受苏联的军事训练。1977年，哈菲兹·阿萨德总统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举行会谈，巩固和扩大了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叙利亚也迫切需要与域外大国加强合作，以应对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因此在1980年与苏联签署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军事联盟关系正式确立。

叙利亚同苏联的联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苏联对于叙利亚的“援助”，而不是双方“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到1980年，苏联对叙利亚的经济援助为8.14亿美元，援助项目50个。<sup>④</sup>因此，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逐渐减少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叙利亚与苏联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苏联解体之后，叙利亚与俄罗斯的关系趋于冷淡。<sup>⑤</sup>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损害了苏联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也同样遭到了叙利亚的批评。<sup>⑥</sup>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寻求与西方国家的“缓和”，

---

① Rami Gina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yrian Ba’th Regime: From Hesitation to Rapprochemen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0, Vol.36, No.2, pp.150-171.

②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7, p.69.

③ 王新刚、于晓东：“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和现实困境”，《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68页。

④ 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0页。

⑤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p.18.

⑥ 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2页。

逐渐减少对叙利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92年，刚刚独立的俄罗斯派出代表团访问叙利亚，要求叙利亚偿还冷战时期欠下的债务；但是叙利亚不仅不偿还债务，而且还要求俄罗斯继续提供军事援助，这让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跌入冰点。<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同叙利亚的关系有所恢复。1997年，俄罗斯与叙利亚恢复了“战略合作关系”。1999年，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举行会谈，双方强调了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的必要性。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战争”为由，威胁制裁和打击叙利亚，促使叙利亚谋求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俄罗斯外汇储备逐渐充沛，俄罗斯也有能力扩展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普京就任俄总统后，俄罗斯在2005年宣布免除叙利亚的债务，俄罗斯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行使否决权，反对美国发起的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决议。2010年以来，俄罗斯重建了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军港，显示出重回中东地区的决心。<sup>②</sup>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俄罗斯力挺叙利亚政府。首先，俄罗斯希望通过力挺叙利亚政府来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张。俄罗斯认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存在，对于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地区扩张有着重要意义。普京指出，“叙利亚政府的崩溃，将会极大地刺激恐怖分子。当前我们需要支持叙利亚政府，而不是进一步损害他们。我们需要在战争中加强叙利亚政府的国家能力。”<sup>③</sup>俄罗斯国内舆论也普遍认为，俄罗斯“不能放弃叙利亚，因为美国正在和极端组织一起，将要摧毁世俗的叙利亚国家”。<sup>④</sup>其次，俄罗斯反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他国的“干涉”。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肆意干涉，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美国的干涉“并未带来民主和进步，反而带来了暴力、贫困和社会混乱……我们彼此并不相同，世界也并不存在单

---

①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p.18.

② Pavel K. Baev, “Russia’s Entanglement in Syria: A Protracted, Extreme Stress Factor for the Russian Navy”, *PONARS Eurasia Policy*, 2017, No.494, p.2.

③ Angela Stent, “Putin’s Power Play in Syria: How to Respond to Russia’s Intervention”, *Foreign Affairs*, 2016, January/February, p.109.

④ Philipp Gasula, “The Syrian Conflict through Russian Eyes Revisited”,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15, No.175, p.8.

一的发展模式……我们应当尊重彼此”。<sup>①</sup>此外，俄罗斯还希望保留在叙利亚港口的军事存在。1971 年建立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原苏联领土外唯一保留的军事基地，是俄罗斯海军西出地中海、打破北约对俄罗斯围堵的重要据点。因此，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是地缘政治平衡的重要手段……并将促成俄罗斯的崛起。”<sup>②</sup>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给予叙利亚政府坚定的支持和帮助。在外交层面，俄罗斯仍然将叙利亚政府视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西方提出的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决议。在军事层面，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派出军事人员培训叙利亚政府军士兵。在 2015 年 9 月更是直接出兵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军稳定战场局势，并逐步发动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叙利亚政府稳定国内社会秩序。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表示，“对于我们来说，幸好还有睿智的俄罗斯及时伸出援手。”<sup>③</sup>

## （二）伊朗与叙利亚关系回顾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伊朗力挺叙利亚政府，在当前的叙利亚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 年叛逃的前叙利亚政府总理利亚德·希贾布（Riad Hijab）认为，“叙利亚已经被伊朗所占领。现在管理国家机构的不是巴沙尔·阿萨德，而是卡塞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aimani）”。<sup>④</sup>学界将伊朗介入叙利亚问题，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有学者将叙伊两国视为中

---

① “Statement by H.E. Mr. Vladimir V. Putin,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the 70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2015 September 28, [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atements/70/70\\_RU\\_EN.pdf](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atements/70/70_RU_EN.pdf)

② Pavel K. Baev, “Unfriended: How Russia’s Syria Quagmire is Costing its Middle East Allies”.

③ “阿萨德总统接受希腊媒体的采访，指出叙利亚正在与土耳其、美国和沙特支持的恐怖分子作战”（阿拉伯语），叙利亚外事与侨务部，2018 年 5 月 10 日，<http://www.mofa.gov.sy/ar/pages996/الإرهاق-تحارب-سورية-اليونانية-كاثميرني-صحيفة-مع-مقابله-في-الأسد-الرئيس-والسعودي-أمريكي-وال-التركي-النظام-جيش-هم-الذين-يبين>

④ 卡塞姆·苏莱曼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2020 年 1 月于伊拉克巴格达死于美军的袭击行动。参见“Former Syrian PM Riad Hijab: Iran is Running Syria”, *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2012 November 22, <http://www.syriaohr.com/en/?p=3556>

东地区现有政治格局的“挑战者”(revisionist states),共同面对来自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安全威胁,因此,伊朗必须支持叙利亚政府。<sup>①</sup>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叙利亚政权的什叶派属性,是伊朗决定介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的重要动力。<sup>②</sup>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逐渐走近。20世纪70年代末期,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崩离析,叙利亚亟须寻找中东地区的新盟友。1977年,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埃及与以色列在1979年3月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标志着埃及退出与以色列对立的阵营,叙利亚与埃及的关系跌入冰点。而叙利亚与邻国伊拉克,尽管都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但是由于两国政党之前发生派系纷争,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关系也陷入僵冷状态。<sup>③</sup>伊拉克和叙利亚在1979年11月宣布中止外交关系,并且相互撤离驻对方国家使馆的人员。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一个“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激进伊朗,让叙利亚领导人看到了合作的机遇。伊朗领导人霍梅尼将叙利亚视为重要的地区伙伴,认为与叙利亚的友好关系可以帮助伊朗扩展在黎巴嫩的什叶派势力,进而对以色列形成战略威慑。<sup>④</sup>叙利亚是第一个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政府的阿拉伯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政府的国家。<sup>⑤</sup>

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为叙利亚和伊朗的友好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sup>⑥</sup>在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是唯一一个向伊朗提供援助的阿

---

①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4.

② Sherko Kirmanj, Abdulla Kukha Sadq, “Ir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Iraq and Syria: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Regional Power Bala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2018, Vol.43, No.1, pp.152-172.

③ 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关系的演变,参见 Amatzia Baram,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thist Iraq, 1968-198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p.9-22.

④ Mohsen Milani, “Why Tehran Won’t Abandon Assad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3, Vol.36, No.4, p.79.

⑤ 苏联和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和第二个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政府的国家。

⑥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6, p.18.

拉伯国家。在外交领域，叙利亚政府力挺伊朗，指责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针对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sup>①</sup>在 1980 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安曼峰会上，叙利亚代表否决了伊拉克和约旦共同提出的谴责伊朗“入侵”的决议案。在军事层面，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陈兵 3 万在叙利亚-约旦边境，向伊拉克的重要盟国约旦施加军事压力，并向伊朗运送了大批军火，其中包括伊朗急需的防空和空对地导弹。在经济层面，叙利亚关闭了伊拉克-叙利亚石油管道，切断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石油出口线路，减少了战争期间伊拉克的石油收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于以色列的共同敌对态度，以及都遭受美国制裁的共同境遇，促使叙利亚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sup>②</sup>叙利亚希望借助与伊朗的关系，在叙利亚-以色列和平谈判进程中，迫使以色列接受自己提出的“先撤军，再和平”的建议。<sup>③</sup>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伊朗都向巴勒斯坦的一些政治军事团体，如“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圣战组织”（吉哈德）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sup>④</sup>此外，叙利亚也需要伊朗帮助自己研发新的地对地导弹，进而对以色列形成战略威慑。<sup>⑤</sup>2002 年，美国将叙利亚和伊朗定性为“邪恶轴心”<sup>⑥</sup>，叙伊两国共同感到了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团体提供支持，以制衡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sup>⑦</sup>在黎巴嫩，伊朗和叙利亚

---

① Patrick Aeaale, *Assa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357.

② Edward Wastnidge, “Iran and Syria: An Enduring Axis”, *Middle East Policy*, 2017, Vol. XXIV, No.2, p.148.

③ 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和平谈判进程，可以参见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63-270 页。

④ 关于哈马斯和叙利亚的关系简述，可以参见 Valentina Napolitano, “Hamas and the Syrian Uprising: A Difficult Choice”, *Middle East Policy*, 2013, Vol.XX, No.3, pp.73-85.

⑤ 伊朗与叙利亚的导弹技术合作一直延续，可以参见 Toi Staff, “Iran Building Missile Factory in Syria-Report”, *The Times of Israel*, 2017 August 15,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ran-building-missile-factory-in-syria-report/>

⑥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 2002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中用到了“邪恶轴心”的说法，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形容为“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同年 5 月，布什又把叙利亚、古巴和利比亚加入到“邪恶轴心”的序列。

⑦ James Phillips, “Greater Iraqi-American Cooperation Needed on Counterterrorism, Syria and Iran”, *Issue Brie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3, No.4079, November 5.





### （三）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回顾

叙利亚和土耳其两国长期以来在哈塔伊省（叙利亚称亚历山大勒塔）归属、水资源利用和库尔德问题上，存在着分歧。20世纪90年代以前，叙利亚政府曾经长期支持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PKK）袭扰土耳其。1998年，随着土耳其和叙利亚签署《阿达纳协议》，叙利亚承诺放弃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土叙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步展开。2002年，秉持“新奥斯曼主义”政治理念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政府开始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土叙关系也经历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一度成为土耳其对外关系的“典范”。<sup>①</sup>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双边关系急剧恶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因而同情叙利亚的政治反对派，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逐渐恶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新奥斯曼主义”<sup>②</sup>政治理念，促使土耳其在2011年之后介入叙利亚危机，力图推翻叙利亚政府，扶持叙利亚反政府政治团体上台执政。“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将叙利亚战争视为其巩固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在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的重要机遇。<sup>③</sup>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迅速介入。一方面，土耳其与西方合作，扶持各个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组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并将其视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另一方面，土耳其帮助组建了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和其他反政府军事团体，并向这些反对派武装提供装备、训练和营地。

但是叙利亚动荡的长期化，以及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使得土

---

<sup>①</sup> “Turkey and Middle East: Ambitions and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0 April 7, pp.4-14.

<sup>②</sup> “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由美国学者大卫·巴查德（David Barchard）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在外层层面，“新奥斯曼主义”表现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奉行的介入中东、疏远西方的外交政策。可以参见 David Bar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pp.90-91; 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 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 *Middle East Studies*, 2015, Vol.51, pp.416-432.

<sup>③</sup> Cenk Saraçoğlu, “The Syrian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Islamist Nationalism in Turkey”, *Turkey Policy Quarterly*, 2018, Vol.16, No.4, pp.11-26; Adam Szymański, “Turkish Policy Towards War in Syria”, *Teka Kom. Politol. Stos. Międzynar.*, 2018, Vol.12, No.1, pp.63-84.

土耳其不得不放弃全面介入叙利亚危机的目标，转而在叙利亚北部谋求影响力。一方面，2015年9月之后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帮助叙利亚政府军稳定了战场局势，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开始在叙利亚中部、南部和北部地区进入对峙状态，土耳其所希冀的“叙利亚政府倒台”并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关系出现裂痕。2016年7月发生的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恶化了土耳其同西方的关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情报机构事先侦知甚至策划了政变。政变之后，土耳其希望引渡在美国居住的“政变组织者”——土耳其“居伦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费图拉·居伦（Muhammed Fethullah Gulen），而这一要求被美国拒绝。<sup>①</sup>一些参加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军官，也逃往希腊和德国，并得到相关西方国家的庇护。政变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对军队、司法和媒体进行“清洗”，此举遭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批评。土耳其与美欧关系疏远，而土耳其又无力单独推翻叙利亚政府，因此转而谋求在叙利亚北部的话语权。

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两项关切：一是要保证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不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二是要限制甚至清除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影响。一方面，土耳其希望在叙利亚北部建立由亲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军事政治团体控制的地区，安置叙利亚反对派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从2017年起，土耳其通过阿斯塔纳和平进程，与俄罗斯和伊朗共同商定，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De-Escalation Zone）<sup>②</sup>，以稳定叙利亚国内的战场局势。2018年10月，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达成共识，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周边建立“缓冲区”，并且设立12个由土耳其军队驻扎的“观察站”，来隔离叙利亚政府军与伊德利卜省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另一方面，土耳其警惕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认为该团体是土耳其境内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的

---

① 王晋：“土耳其政变，总统和精神领袖的对决”，《联合早报》，2016年7月21日，第A14版。

② 四个“冲突降级区”分别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中部霍姆斯省、大马士革郊区和叙南部德拉省和库奈特拉省。2018年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攻势，收复了中部、南部和大马士革周边区域，四个“冲突降级区”协议不复存在。

分支。2016年和2018年，土耳其先后在叙利亚北部发起了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和“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旨在遏制“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北部的势力范围。2019年10月，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北部“民主联盟党”控制区发动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旨在扫清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区“民主联盟党”的力量，并建立由土耳其主导的横亘叙利亚土耳其边境的“缓冲区”。

### 三、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场。俄罗斯力挺叙利亚政府，但也希望叙利亚政府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强调“政治分歧需要通过政治手段予以解决”，希望促成叙利亚政府同反对派团体实现“和解”。<sup>①</sup>土耳其否认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希望成为叙利亚北部的主导力量。而伊朗则坚定地支持叙利亚政府，希望能够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全部土地，以增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2018年，叙利亚战事逐渐平息，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也从过去力挺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失地，转而谋求现实的利益。一方面，俄罗斯希望尽快开启叙利亚政治重建，摆脱由于叙利亚战事所带来的财政和安全负担。财政方面，俄罗斯每天需要负担约400万美元的驻叙利亚费用，俄罗斯希望能够早日结束叙利亚战事，撤离大部分驻叙利亚的俄军人员和装备。<sup>②</sup>在安全方面，叙利亚战乱久拖不决，也很可能使俄罗斯成为全球极端分子袭击的目标，带来巨大的恐怖主义风险。<sup>③</sup>另一方面，俄罗斯希望能从叙利亚战后经济重建中获利。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双边贸易额较少，2018年双边贸易总额仅为4亿多美元，不及当年伊朗与叙利亚10亿美元贸易额的一半。从2018年开始，俄加强了与叙利亚的经济合作力度，与叙利亚政府签署了租赁塔尔图斯的协

---

① “Interview with Al Arabiya, Sky News Arabia and RT Arabic”, *Kremlin*, 2019 October 1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792>

② Sinan Hatahet, “Russia and Iran: Economic Influence in Syria”, p.3.

③ Grigory Melamedov, “Russia’s Entrenchment in Syria”,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8, p.3.

议；并派出多个代表团，考察叙利亚的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努力要将俄罗斯在叙利亚国内的军事和政治优势，转变为经济红利。<sup>①</sup>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需要处理好相关当事方的各种矛盾与分歧，为叙利亚战后重建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和政治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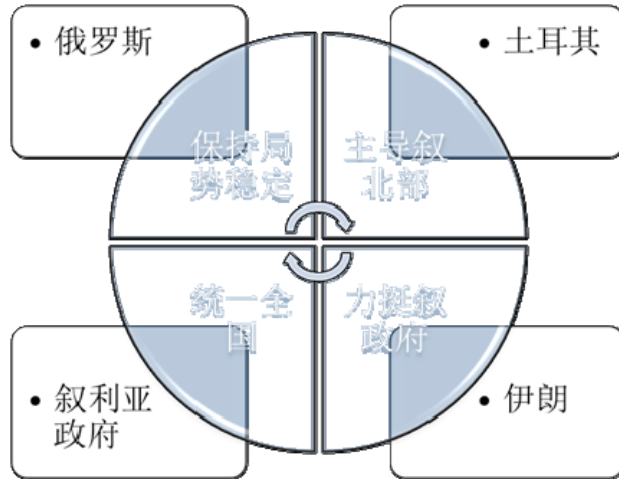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主要关切

### （一）弥合各方政治分歧

在政治层面，俄罗斯需要努力弥合各方分歧。当前叙利亚政治重建仍然困难重重，“各种和平进程可能会减少暴力，但是政治重建和政治过渡却似乎并不存在，情况可能会永远如此。”<sup>②</sup>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在政治重建问题上，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分歧。

首先，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仍然难解。美国、欧洲、土耳其和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仍然拒绝承认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仍然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为叙利亚政治和解的重要前提。而俄罗斯和伊朗则继续将叙利亚政府视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坚持推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政治军事团

<sup>①</sup> Sinan Hatahet, “Russia and Iran: Economic Influence in Syria”, pp.10-12.

<sup>②</sup> 涂颀编译：“外媒展望 2018 叙利亚局势：暴力减少，和平无望”，参考消息网，2018 年 1 月 18 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80118/2251859.shtml>

体的和解进程；认为弥合分歧、促进各方的接触与谈判，是实现叙利亚政治重建的重要前提。

其次，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在开展政治重建的路径上，存在不同意见。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围绕叙利亚问题搭建的国际协调机制，主要包括日内瓦和平进程、阿斯塔纳和平进程以及索契和平进程。其中日内瓦和平进程始于 2015 年联合国 2254 号决议，该决议宣布启动由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各派别参加的政治和谈，但因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政治团体的分歧严重，进展缓慢。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则是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召集，其目标是在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实现永久停火，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索契和平进程是由俄罗斯和联合国主导，通过设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来逐步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政治团体的和解，最终促成政治重建的实现。然而，国际协调机制越多，反而容易造成和平进程受阻。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尤其是美俄两大国，在主导和谈机制上存在竞争对抗关系。不同的协调机制自说自话、互不买账。如何实现各种协调机制的并轨融合，将会极大地影响叙利亚政治重建的进程。

## （二）处理好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在叙利亚北部，俄罗斯需要妥善处理库尔德问题。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叙利亚政府军从北部地区抽调部队，导致叙利亚北部政府军兵力不足。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的政治军事团体“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借机在当地招兵买马扩张势力。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不断扩张，“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成为当地唯一能够抵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因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然而土耳其认为，“民主联盟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YPG），是土耳其国内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因此主张通过军事手段予以打击和剿灭。

与土耳其的敌视态度不同，俄罗斯和伊朗将叙利亚库尔德人视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俄罗斯将“民主联盟党”视为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要伙伴。从 2015 年开始，“民主联盟党”就在莫斯科开设了自己的“办事处”，协调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随着 2018

年末叙利亚战事逐渐平息，一些俄罗斯能源公司也开始在叙利亚北部“民主联盟党”的控制区内勘探油田，并且计划建立横贯叙利亚北部直到西部港口塔尔图斯的输油管线。根据预测，叙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民主联盟党”控制区，原油产量可以达到45万桶/日，具有较大的能源合作潜能。<sup>①</sup>而且，在受到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中，有不少极端分子从属于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解放阵线”（Hayat Tahrir al-Sham）；因此，俄罗斯不希望土耳其通过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独占叙利亚北部，形成横亘叙北部的“恐怖分子之弧”。2019年10月，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发动针对“民主联盟党”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极大地威胁了叙利亚局势的稳定，给叙利亚问题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sup>②</sup>

伊朗也反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叙利亚政府并不敌对。尽管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不直接从属于叙利亚政府，但“民主联盟党”与叙利亚政府保持着有效沟通，其前身“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分支”曾在20世纪80-90年代长期受到叙利亚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在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民主联盟党”武装人员也极少出现攻击叙利亚政府军的事例。“民主联盟党”高层多次强调，无意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那样的地方自治机构，而是希望能够在叙利亚统一完整的前提下，谋求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的民族权利。一些观点甚至认为，“民主联盟党”实际上是“叙利亚政府在其北部的‘代言人’”。<sup>③</sup>另一方面，伊朗一直要求捍卫“叙利亚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存在。伊朗将叙利亚政府视为叙利亚唯一合法代表，因而认为，叙利亚北部“民主联盟党”控制区的最终地位，应当由叙利亚政府和“民主联盟党”协商决定。2019年以来，伊朗多次撮合叙利亚政府与“民主联盟党”

---

① Bassel Oydāt, “The Fight for Syria Oil”, *Al Ahram*, 2019 July 27,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2/8/338469/World/Region/The-Fight-for-Syria-oil.aspx>

② 关于土耳其军事行动的分析，可以参见王晋：“土耳其为自身安全用兵叙利亚北部，可能反令国内更不安全”，澎湃新闻学人，2019年10月1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64875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648751)；王晋：“暂停键还是终止键？土耳其120小时‘停火’恐难持久”，澎湃新闻学人，2019年10月1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71419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714196)

③ 关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政治主张及其与叙政府的关系，可参见王晋：“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中东研究》，2018年第2期，第35-51页。

代表举行会谈，商讨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的相关议题。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 2019 年 3 月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土耳其经济形势从 2018 年下半年以来也危机重重，因此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需要通过在叙利亚北部发动针对“民主联盟党”的军事行动，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sup>①</sup>2019 年 10 月初，随着美国宣布撤离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人员，土耳其随即发动了针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此举导致了连锁反应。叙利亚政府和伊朗仍然将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视为“恐怖分子”，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定义为“非法入侵”，因此叙利亚政府与“民主联盟党”实现了合作，政府军进驻叙利亚北部关键城镇，以阻挡土耳其的军事攻势。一旦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军队直接交火，势必进一步恶化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政治军事团体的关系，也将使得俄罗斯和联合国共同推动的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受到影响。所以，在俄罗斯的劝说下，2019 年 10 月末，土耳其宣布停止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则保证促成“民主联盟党”撤离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地区，并且建立由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共同组成的“联合巡逻队”，避免土耳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所导致的局势升级。

### （三）管控伊德利卜“缓冲区”冲突风险

在叙利亚西北部，俄罗斯需要调节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的冲突。土耳其十分担心，如果叙利亚政府军收复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将会造成更多的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此外，土耳其还希望控制伊德利卜省以便安置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方面，土耳其直接派驻 2000 多名士兵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并且积极支持和扶持伊德利卜省境内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另一方面，土耳其不断游说俄罗斯和伊朗，于 2018 年 9 月划定“缓冲区”，隔离叙利亚政府军和伊德利卜省境内的反政府武装。

为了在叙利亚的控制区“合法化”，土耳其还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从 2018 年开始，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北部叙利亚反对派占领区，举行了多轮地方“选

---

<sup>①</sup> Fehim Tastekin, “Turkey, Syrian Kurds Remain at Odds in Safe Zone Visions”, *Al-monitor*, August 19, 2019,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8/turkey-syria-united-states-kurds-at-odds-in-safe-zone-plans.html>



举”，并且串联各类反政府政治军事团体，在伊德利卜省设立各类办事处和协调机构。此外，土耳其还积极扶持叙利亚西北部土库曼人群体成立各类政治团体，如“叙利亚土库曼人大会”<sup>①</sup>，“土库曼人议事会”<sup>②</sup>，“叙利亚民主土库曼人运动”<sup>③</sup>等团体，<sup>④</sup>在叙利亚西北部推行“土耳其化”政策。

叙利亚政府坚决反对土耳其军队留驻叙利亚。一方面，叙利亚政府视土耳其在叙的军事存在为“非法入侵”，要求土耳其从叙利亚撤军。当前，土耳其“监管下”的伊德利卜省境内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大约有 10 万人，许多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解放阵线”关系密切。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提出：“无论是在曼比季（Manbij）、阿弗林（Afrin）<sup>⑤</sup>或者在叙利亚的任何地方，土耳其都是叙利亚的敌人……我们的责任是解放每一寸叙利亚领土。”<sup>⑥</sup>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和伊朗都将伊德利卜省视为“恐怖分子”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因此主张武力清剿。

“我们与恐怖分子们作战，这些恐怖分子听命于……土耳其。”<sup>⑦</sup>从 2018 年 9 月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在伊德利卜省设立“缓冲区”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周边地区部署军队，并且持续向伊德利卜省周边的战略

---

① Syrian Turkmen Assembly

② Turkmen Shura

③ Syrian Democratic Turkmen Movement

④ 这些叙利亚土库曼族反政府团体在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成立于土耳其境内。起初，这些团体的总部都设在土耳其境内，2019 年初，逐渐转移到叙利亚阿勒颇省北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内。

⑤ 曼比季和阿弗林都是叙利亚北部城镇，当前都处于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军事团体控制下。

⑥ “叙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并将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要从恐怖主义和外国入侵者手中解放我们的土地”（阿拉伯语），叙利亚外事和侨务部，2018 年 6 月 2 日，<http://www.mofa.gov.sy/ar/pages997/ملك-تشاء-من-مع-وس-تتعاون-سيادة-ذات-دولة-سورية-المعلم> الأجنبي-الوجود-من-الإرهاب-من-أراضينا-سنحرر-الإرهاب-افحة

⑦ “阿萨德总统接受俄罗斯 NTV 采访：任何宪法改革都只能由叙利亚人民做主，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有利于国际平衡和打击恐怖主义”（阿拉伯语），叙利亚外事与侨务部，2018 年 6 月 24 日，<http://www.mofa.gov.sy/ar/pages1002/مقابله-في-الأسد-الرئيس> في-روسيا-وجود-فقط-السوري-بالشعب-يتعلق-أمر-دستوري-إصلاح-أي-الروسية-NTV-قتاة-مع-في-يديو-الإرهاب-ولمحاربة-الدولي-التوازن-على-الحفاظ-مهم-الأوسط-والشرق-سورية-“Iran and Syria Hold Talks on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and Idleb”, *The Syrian Observer*, 2019 July 17, <http://syrianobserver.com/EN/news/51745/iran-and-syria-hold-talks-on-constitutional-committee-and-idle.html>

要地发动攻击，多次“误击”伊德利卜省缓冲区的土耳其军队“观察点”。2019年8月，叙利亚政府军成功收复伊德利卜省东部的汗·谢亨镇（Khan Sheikhoun），进而完全掌控了从首都大马士革到叙利亚北部地区的5号公路（M5公路），完成了对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缓冲区”观察站的分割包围态势。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极有可能将土耳其拖入战火。

#### （四）应对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在叙利亚周边，俄罗斯需要照顾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关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长期占领戈兰高地。以色列在1981年宣布实施《戈兰高地法案》，宣布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此举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了“497号决议”，宣布《戈兰高地法案》“完全无效、不具有国际法效力”。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启，以色列和叙利亚也正式举行了多轮和平谈判，其中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是焦点议题之一。但是，一方面以色列和叙利亚在边境线划分问题上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叙利亚坚持将叙以和平问题同巴以和平谈判绑定，最终双方谈判破裂，戈兰高地最终地位悬而未决。<sup>①</sup>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利亚各个政治派别都高呼“收复戈兰高地”，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合法性与号召力。以色列十分担心叙利亚会成为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大本营”，因此要求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团体不得进入距离戈兰高地周边80-120公里地区。以色列还要求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导弹和火箭弹等武器，不得转交给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武装，以防止这些武器在未来被什叶派军事组织用来袭击以色列。<sup>②</sup>

2017年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不断试图在戈兰高地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人民动员军”都多次强调，将会“收复戈兰高地”，进而“收复耶路撒冷”。由于以色列并未与叙利亚和伊朗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向叙利亚政府和伊朗直接表达不满，只能转而通

---

<sup>①</sup> 关于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的分歧，可以参见王晋：“打出‘戈兰高地牌’，有何效果”，《世界知识》，2019年第8期，第44-45页。

<sup>②</sup> 王晋：“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应对与挑战”，《当代世界》，2019年第1期，第59页。

过俄罗斯向伊朗施加压力。尽管“俄罗斯多次向以色列保证，伊朗军队不会出现在戈兰高地周边地区，但是莫斯科无法管控大马士革以南的伊朗军事力量。”<sup>①</sup>2017年以来，以色列空军多次越境进入叙利亚领空，打击戈兰高地周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以防止可能的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袭击。以色列和伊朗在戈兰高地上的对峙，一方面很可能在未来导致新的冲突，进而导致以色列、伊朗、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南部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另一方面，各方针对戈兰高地地位的争论，将给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增添新的政治障碍。

### （五）协调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团体的关系

在叙利亚各派别中，俄罗斯还需要积极推动“叙利亚问题索契进程”。俄罗斯希望通过“叙利亚问题索契进程”，促成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政治团体组建“宪法委员会”，推动叙利亚政治和解与重建的开启。根据2018年2月的索契会议联合声明，俄罗斯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sup>②</sup>开始推动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组建工作。根据安排，“宪法委员会”将由150个席位组成，其中50个席位由叙利亚政府任命，50个席位由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任命，剩下的50个席位由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指派给叙利亚重要的“社会人士”。<sup>③</sup>从2018年初提出组建“宪法委员会”至今，俄罗斯推动的“叙利亚问题索契进程的进展十分有限”。<sup>④</sup>尽管2019年11月，叙利亚政府与各个反对派团体，就“宪法委员会”组成名单达成一致，但是叙利亚新宪法的撰写，涉及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因此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叙利亚政府和伊朗对于政治重建，一直存有较强的抵触情绪。一方面，

---

① Marianna Belenkaya, “Astana Talks Show Russia Eager to Keep Plugging Away at Idlib”, *Al-Monitor*, 2019 August 5,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8/Russia-syria-turkey-astana-talks.html>

② 德米斯图拉在2018年10月宣布卸任，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挪威外交官裴凯儒（Geir O. Pedersen）为新的叙利亚问题特使。

③ “Syria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Will not be Formed’ in 2018”, *Aljazeera*, December 20,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12/syria-constitutional-committee-formed-2018-181220164134564.html>

④ Emil Aslan Souleimanov, Valery Dzutsati, “Russia’s Syria War: A Strategic Trap?” *Middle East Policy*, 2018, Vol.XXXV, No.2, p.46.

叙利亚政府认为，叙利亚政府在 2012 年制定的宪法，代表着叙利亚人民的意志和共识，其中某些章节可以略作修改，但是宪法整体需要予以保留。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Walid Al-Moualem）阐述了叙政府对于“宪法委员会”的态度，提出“宪法委员会”应以当前的叙利亚宪法为蓝本，“‘宪法委员会’应当被限定在讨论当前的宪法条文，而不是撰写新的宪法，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宪法修订过程为叙利亚人民所主导。”<sup>①</sup>另一方面，伊朗担心“宪法委员会”会削弱叙利亚政府的权力，进而影响伊朗与叙利亚未来的关系。伊朗和叙利亚政府都强调，叙利亚政府应被视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宪法委员会”中，叙利亚政府的代表需要占据“绝对多数”。<sup>②</sup>

叙利亚反政府政治团体，同样在“宪法委员会”问题上存在抵触情绪。不少叙利亚反政府政治团体长期受到美国、欧洲、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支持，因此并不信任俄罗斯。而且，在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之间，并不存在能够统领所有团体的核心机制，在如何推选参加“宪法委员会”的 50 名反对派成员的问题上，叙利亚各反对派团体之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此外，在俄罗斯和新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Geir O. Pedersen）于 2019 年初提出“宪法委员会”50 名“社会人士名单”后，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多次指责俄罗斯和裴凯儒的名单“偏袒叙利亚政府”。因此，俄罗斯能否协调好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政治团体在“宪法委员会”组成名单上的分歧和矛盾，是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能否顺利开启的重要前提。

#### 四、结语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要关切，在于维护叙利亚的局势稳定，尽早开启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难处，在于其“最关

---

① “部长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决心收复所有领土，扫除所有恐怖主义和一切外国非法入侵者”（阿拉伯语），叙利亚外事与侨务部，2018 年 9 月 29 日，<http://www.mofa.gov.sy/ar/pages1008/أكل-تظهير-على-عازمون-المتحدة-للأمم-العامة-الجمعية-أمام-سورية-كلمة-في-المعلم> فيدي-شعر-غير-أي-أجنب-وجود-أي-ومن-الإرهاب-رجس-من-راضينا

② “Iran and Syria Hold Talks on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and Idleb”, *The Syrian Observer*, July 17, 2019, <http://syrianobserver.com/EN/news/51745/iran-and-syria-hold-talks-on-constitutional-committee-and-idleb.html>

键一方”，而不是“决定性一方”的地位，无法单独主导所有议题。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之所以成为最为关键的一方，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有两大优势：在叙利亚战场上拥有能够改变战局的“军事硬实力”，以及保持着与所有叙利亚问题当事方沟通的“外交软实力”。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键性”，也促使俄罗斯不得不承担更大的责任，应对更大的安全挑战。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多年，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和社会议题彼此交织，国际和地区力量相互影响，俄罗斯需要小心翼翼地维系各方平衡，艰难推动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首先，俄罗斯需要处理好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在伊德利卜周边的关系、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系、以色列与伊朗在戈兰高地周边对峙的问题，防止叙利亚冲突再次升级。其次，俄罗斯需要努力赢得叙利亚有关各方的信任，游走于各个不同的力量之间，来维持叙利亚局势的稳定。

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开启，仍将面临重重困难。

一方面，俄罗斯没有就未来的叙利亚政治架构提出明确的原则。单纯依赖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反政府政治团体和其他叙利亚问题相关当事方的对话和谈判，难以在重大议题上形成共识。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如“维护叙利亚领土主权完整”、“中央政府权力构成”、“地方自治机构的权责范围”等，各方很难达成一致。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斡旋机制，无论是日内瓦和平进程、阿斯塔纳和平进程还是索契和平进程，都强调“维护叙利亚领土主权完整”，但是究竟采取何种体制建立未来的叙利亚政府，各方缺少共识。在全国层面，对于叙利亚政府而言，“重建”意味着恢复到叙利亚内战之前叙利亚复兴社会党领导的“威权”体制；而反对派政治团体则要求“巴沙尔下台”，坚持这是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先决条件，并通过“多党制”来构建未来的叙利亚中央政府。在地方自治层面，叙利亚复兴社会党于1963年取得政权后，高举“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力宣扬“泛阿拉伯主义”，希望借此超越叙利亚国内的教派、族群和地域差别。但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群，纷纷要求叙利亚政府

撤除“阿拉伯化”标签，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各类地方自治机构。<sup>①</sup>未来是恢复 2011 年之前的中央集权体制，还是采取新的“联邦”体制，如何安排中央政治权力，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都是叙利亚政治重建的难题。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层面，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是最关键一方，而不是决定性一方。在“军事硬实力”层面，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打交道时，需要考虑到伊朗的影响；在叙利亚北部，俄罗斯则需要考虑到土耳其的影响力；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美国和法国还驻扎着一定数量的军队（尽管 2019 年 10 月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驻军，但是仍然有能力重新将美军大规模部署到叙利亚）。在“外交软实力”层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参加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索契和平进程，在多个场合给俄罗斯的外交努力设置障碍。由于叙利亚问题错综复杂，任何一个小议题都会涉及多个相关当事方，进而影响整个叙利亚局势乃至中东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俄罗斯无法单独决定叙利亚问题的形势，仍然需要与其他相关当事方沟通与协调。

---

**【Abstract】** On the Syrian issue, Russia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critical party. In September 2015, Russia sent troops directly to Syria to help the Syrian government to recover large areas of land. Together with Iran and Turkey, Russia gradually helped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in Syria through the Astana peace process and the Sochi peace process. In addition, Russia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yria's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and advanced Syria's post-war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With the gradual easing of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Syria, Russia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on the Syrian issue. On the one hand, Russia needs to face the concerns of Iran and Turkey in Syria, and there still exist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three powers on the Syrian issue, which is likely to cause the escalation in Syria. On the other hand, Russia needs to deal

---

<sup>①</sup> 李世峻、马晓霖：“‘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时势评估与前景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78 页。

with some sensitiv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in Syria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domestic stability of Syria and promote breakthroughs of Syria's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R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the Syrian Issue, Russia-Turkey Relationship, Russia-Iran Relationship, the Kurdish Issue

**【Аннотация】** В вопросе Сирии Росс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самая критиче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Россия направила войска в Сирию в сентябре 2015 года, помогла сирий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вернуть большие участки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вместе с Ираном и Турцие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 Астане и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 Соч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а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итуацию в Сирии. Кроме того,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актив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созданию сирийског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и подтолкнула Сирию к началу процесса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 мере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ослабл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в Сирии Россия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нов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в сирийском вопрос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интересам Ирана и Турции в Сири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раном и Турцией в сирийском вопросе могут снова привести к напряжё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тране;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длежащим образом реша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деликат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и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Сири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нутренней вое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ирии и добиваться прорыва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ир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ири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Турцией,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Ираном, курдский вопрос

---

(责任编辑 崔珩)

##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

魏熊生 汪宁\*\*

**【内容提要】**俄罗斯在叙利亚乱局中的表现，近期再次成为国际热点。自2011年介入不断升级的叙利亚危机以来，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主导叙政治进程的主要外部力量。在俄罗斯此次应对叙利亚危机的外交中，东正教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帝国时期，俄国就持续介入叙利亚事务。俄罗斯与叙利亚自古以来的东正教文化交往，影响着沙俄对安提阿教会和叙利亚东正教徒的情感，成为沙俄加入中东大国角逐的突破口。此次介入叙利亚危机，是历史的延续。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的公开发言、其附属机构在国际组织对叙基督徒问题的宣传以及提供人道援助，起到了公共外交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的介入和军事行动合法化，获得了俄罗斯国内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东正教因素的上述多重影响，是俄罗斯介入此次叙利亚危机、并成功实现其外交策略和目标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俄罗斯叙利亚关系 叙利亚内战 俄罗斯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815.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0063(26)

2011年叙利亚危机升级以来，俄罗斯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最初俄罗斯提供物资和武器援助、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声援叙利亚政府；2015年直

\*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东正教外交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7BGJ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外交战略中的作用”(项目编号: 201601036)的研究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 文中错漏与失误之处由笔者负责。

\*\* 魏熊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博士研究生; 汪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接派出军事力量，在叙利亚前线参与对极端军事组织的作战。当前叙利亚危机已进入各方政治协调阶段，俄罗斯已经基本掌控局势主导权。俄罗斯为何在与美国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立场、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最终稳住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并在政治调解进程中成功掌控主导权和议程，成为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视角下，叙利亚是俄罗斯和美国争夺中东事务主导权大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且俄罗斯对叙军售数量庞大，俄罗斯还需要防止海湾石油国打通途经叙利亚至土耳其和欧洲的管线，从而和俄罗斯石油出口形成竞争。<sup>①</sup>就安全方面而言，恐怖主义若在叙利亚泛滥并扩散至高加索和中亚，将对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sup>②</sup>还有学者从普京挽救国内支持率，或用以战逼和的方式，试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解读。<sup>③</sup>毋庸置疑，分析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实际利益有助于认识错综复杂的现象。但是，单一视角无法看到事物全貌。单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外交，无法完全理解俄罗斯为何在与美国国力对比日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倾向于采取强硬甚至正面对抗的立场。而文化的维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俄叙关系的深厚渊源，以及俄罗斯外交的特别之处和成功的原因。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较早从宗教的视角解读叙利亚危机。他认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动机有多重层面，其中“东正教的传统伦理道德成为莫斯科对外政策的基石……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盟友——基里尔牧首，开始寻求扮演基督

---

① 孙德刚、王亚庆：“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政策评估”，《当代世界》，2019年第9期，第37-43页；毕洪业：“中东战略的支点：俄罗斯地缘外交中的叙利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35页；Delgado Fernanda, Correa Fernanda, “The New Energy Corridors and the Civil War in Syria: Old and New Actors”, *Geopolitics of Energy*, 2018, Vol.40, No.9, pp.8-12; Alexander Shumilin, Inna Shumilina, “Russia as a Gravity Pole of the GCC’s New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017, Vol.52, No.2, pp.115-129.

② Dannreuther Roland, “Understanding Russia’s return to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9, Vol.56, No.6, pp.726-742; Souleimanov Amil Aslan, “Mission Accomplished? Russia’s Withdrawal from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2016, Vol.23, No.2, pp.108-118.

③ Irina Zvyagelskaya, “Russian Policy in the Levant”,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Vol.15, No.60, pp.121-133; 毕洪业：“叙利亚危机、新地区战争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60-81页。

教信仰捍卫者的角色”。<sup>①</sup>2020年1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不顾战火，在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圣诞节这一天访问叙利亚。访问期间，普京造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区的圣母玛利亚东正教堂，并与叙利亚东正教最高领导人约翰十世牧首（Patriarch John X）会面。<sup>②</sup>这一访问不仅使外界认识到叙利亚生活着众多东正教徒，而且也象征着俄罗斯此次介入叙利亚危机的过程充满东正教因素。

俄罗斯在外交中运用东正教并不是新的现象。东正教弥赛亚理念发展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就是沙皇俄国时期帝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从苏联末期开始，苏联国内外就有不少历史学家发表著作，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利用俄东正教会，对抗西方在宗教界以梵蒂冈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宣传战，进行研究<sup>③</sup>，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为俄苏外交中的宗教因素研究，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复兴，俄罗斯国内和不少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开始讨论东正教在当代俄罗斯外交中的作用。如，俄罗斯学者奥莉加·采尔皮茨卡娅（Ольга Церпицкая）专门研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及其与俄罗斯外交机构的互动关系。<sup>④</sup>波兰学者艾丽西娅·库拉诺维奇（Alicja Curanović）在研究当代俄罗斯外交的过程中，提出“宗教外交”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在外交政策中利用宗教因素的国家行为，包括政府为促进国家的实际利益而与宗教组织的一整套协作机制。库拉诺维奇提出，可以利用的因素包括宗教组织的国际活动、宗教理念

---

① Dmitri Trenin, “The Mythical Alliance: Russia’s Syria Policy”, February 12, 2013, <https://carnegie.ru/2013/02/12/mythical-alliance-russia-s-syria-policy-pub-50909>

② Путин посетил церковь и мечеть в Дамаске. 7 января 2020. <https://rg.ru/2020/01/07/putin-posetil-cerkov-i-mechet-v-damaske.html>

③ 有关研究如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toine Wenger, *Rome et Moscou, 1900-1950*,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87; Васильева О.Ю.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1943-1948гг. Москва: Рос. акад. наук. Ин-т Рос. Истории. 1999; Adriano Rocucci, *Stalin e il patriarca. La Chiesa ortodossa e il potere sovietico 1917-1958*, Turin: Einaudi, 2011.

④ Церпицкая О.Л.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СПб: СПбГУ, 2006.

和宗教符号（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相应解释）等。<sup>①</sup>此外，库拉诺维奇还对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俄罗斯境内“传统宗教”组织参与俄罗斯“宗教外交”的情况，进行了概括和介绍。美国学者佩特罗（Nikolai Petro）也认为，东正教是俄罗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sup>②</sup>中国学者，如贾付强将俄苏外交中东正教会的作用归类到“公共外交”的研究范畴，并对斯大林时期东正教会在苏联外交中的活动做出梳理。认为俄东正教会作为非政府组织在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其展开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sup>③</sup>汪宁则把拓展东正教在世界的影响力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研究，认为东正教已经成为普京时期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工具。<sup>④</sup>

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俄东正教会正在与俄罗斯政府协同展开外交行动，通过教会的理念、宗教符号和国际行动，作用于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旨在通过影响公众态度、沟通或解释俄罗斯政策等多种方式，促进俄罗斯国家利益，从而成为俄罗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东正教向度是俄罗斯外交的一贯传统，当代俄罗斯的外交实践正在延续这一传统。

从俄罗斯与叙利亚两国间深厚的东正教传统关系着手，以历史和文化渊源为基础，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和对外战略，完整地认清俄叙关系的实质所在。在这次危机激化为内战的关键时刻，俄罗斯以叙利亚境内东正教徒的人道主义危机为借口和契机，与俄东正教会联合开展公共外交，并取得了成功。通过媒体和国际组织，并充分利用国际会议等各种场合，俄罗斯大肆宣扬叙利亚危机中以东正教徒为主的基督徒人道主义危机；通过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占据道德制高点，努力将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

---

① Alicja Curanović, *The Religious Factor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141-142.

② Nikolai N. Petro, "Russia's Orthodox Soft Power", New York: Carnegie Council, 2015, [https://www.carnegiecouncil.org/publications/articles\\_papers\\_reports/727](https://www.carnegiecouncil.org/publications/articles_papers_reports/727)

③ 贾付强：“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年）”，《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5-183页。

④ 汪宁、纪悦生：《俄罗斯文化复兴战略》，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0-149页。

介入及军事行动合法化，并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成功地达到了俄罗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俄叙两地的东正教传统关系渊源，挖掘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的历史和文化动因；第二部分阐述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在外交行动中的合作机制和领域；第三部分分析俄东正教会和俄政府在叙利亚危机期间的具体公共外交行动及其效果；第四部分为结语。

## 一、俄叙关系中的东正教因素溯源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迎来复兴，大量在苏联时期被破坏或充公的教堂及其他财产，得以复建或归还给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政府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俄东正教会积极扩展辖区范围和基础设施，神职人员和教徒人数不断增加。根据俄罗斯“公众意见”基金会进行的民意调查，俄境内东正教徒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97年的52%上升至2014年的68%<sup>①</sup>，作为世界上东正教徒数量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这一传统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随着东正教会的发展壮大和东正教徒数量的增加，东正教文化和东正教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明显，俄罗斯与自身历史的联系通过东正教得到了恢复。

历史上的大叙利亚地区，不仅包括现代的叙利亚国家，还包括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地区被阿拉伯人称为闪姆地区<sup>②</sup>，近代欧洲人称之为黎凡特地区。与中东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同，叙利亚曾经是罗马帝国的行省。作为古典文明的中心之一，许多基督教重要人物诞生于此，如圣金口约翰（Иоанн Злотоуст）、柱头苦修派创始人西美昂（Симеон Столпник）、圣罗麦诺（Роман Сладкопевец）等，可以说这一地区是基督教的摇篮和圣地。公元4世纪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叙利亚人即成为拜占庭帝国臣民的主

---

①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ФОМ. 3 июля 2014. <http://fom.ru/TSennosti/11587>

②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

要构成群体之一，在东正教的教义阐释、神学发展和宗教仪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元 11 世纪之前，东正教在拜占庭帝国分为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四个牧首区，相互间地位平等。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由于牧首驻扎在帝国首都而享有荣誉地位，四大牧首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主持下共同商议解决教会重大问题。安提阿东正教会全称为“安提阿和全东方希腊正教教会”<sup>①</sup>，相传由使徒彼得于公元 37 年始建。在东正教十五个地方教会（Поместная церковь）中，安提阿教会因其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而排名第三，教会管辖范围包括大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sup>②</sup>安提阿牧首区在古代即有相当数量的斯拉夫人居住，因此“叙利亚的神职人员在对许多民族的基督教化方面很有经验，并且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斯拉夫人保持着联系”。<sup>③</sup>而基辅罗斯的首位东正教都主教，就是叙利亚人。

基辅罗斯于公元 10 世纪末正式受洗，并成为隶属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都主教区。牧首派去的首任都主教，是来自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米哈伊尔（Михаил Сирийский）。米哈伊尔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施洗，并在担任都主教期间帮助大公推进基辅罗斯的东正教化。<sup>④</sup>因此，俄罗斯学者舍维列夫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感激米哈伊尔，是他第一个将基督信仰根植在我们的土地上，是他在此建立了第一批修道院，培养了第一批神学学生！因此在我们基督信仰的源头处，总能看到安提阿教会和我国教会之间的联系”。<sup>⑤</sup>

1438-1439 年，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派出庞大的高级代表团，在佛罗伦萨召开长时间的宗教会议。会议最终做出决议，将基督教的这两大分支合并，并且认可罗马在基督教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项决议在东正教各地方教会内部引发了分裂。俄国教会认为该决定是对东正教信仰的背叛，属于异端，拒绝承认该决议的合法性。从 1448 年开始，基辅都主教区宣布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决裂，并开始自行推选都主教。虽然佛罗伦萨会议决议在 1453 年

---

① Грече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патриархат Антиохии и Всего Востока

② Блохин. В.С. История Поместн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Церквей.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РГППУ, 2004. С.65-66, 68-70.

③ Рапов О.М. Рус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в IX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I в. Принят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1998, С.131.

④ Макарий Веретенников. Первосвяtitель Земли Русской// Альманах Альфа и Омега. 2011. №.60. <https://www.pravmir.ru/pervosvyatitel-zemli-russkoj-mitropolit-mihail-988-992/>

⑤ Шевырев С. Антиохийская Церковь. СПб.: тип. М-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1850. С.12.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不久即被新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推翻，但俄国自行推选都主教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不过，君士坦丁堡并未承认俄国自行选举都主教这一行为的合法性。<sup>①</sup>

自 15 世纪开始，俄国开疆扩土，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更一跃成为最主要的东正教国家。俄国统治者开始认为莫斯科是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自诩为全世界东正教会的庇护者。四大东正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处境举步维艰，因此教会领导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新兴的东正教俄国，派遣高级代表频频访问莫斯科，从莫斯科募集资金等援助。1586 年，安提阿教会牧首约阿基姆五世（Иоаким V）访问俄国，募集资金，这是四大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俄国领土。俄国当时的实际统治者鲍里斯·戈都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趁机向其表达了希望君士坦丁堡牧首和其他三位东方教会牧首认可既成事实，颁布教令在俄国建立自主牧首区的愿望。俄国这一请求不仅仅是为了使现状合乎教规，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如果继续作为君士坦丁堡的都主教区存在，俄国的都主教和许多高级神职人员，都必须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委任指派，沙皇的权力和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及掣肘。约阿基姆牧首首肯了沙皇的意愿，回到君士坦丁堡后在耶利米二世牧首（Патриарх Иеремия II）座前竭力为俄国辩护，直接促成耶利米于次年访问俄国，并于 1589 年在俄国正式设立牧首区。<sup>②</sup>俄国统治者的夙愿得以实现。17 世纪，俄国和安提阿东正教会的密切交往仍然持续，且层级和频率进一步提高。在沙皇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统治时期，俄国启动宗教改革。期间，安提阿牧首马卡里三世（Макарий III）两次对俄国进行长时间访问。牧首于 1655-1659 年首次访问莫斯科并长期停留，指导了俄东正教会在祈祷书和礼拜仪式程序方面进行的改革。时隔十年之后，他再次接受沙皇邀请，第二次访问俄国，于 1666-1667 年参加了俄东正教会全体会议，并参与对牧首尼康的审判。这一经历由马卡里三世的儿子、阿勒颇大辅祭保

---

① Петрушко В.И. Флорентийская У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бор 1441 года и Начало Автокефали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Церковь и Время. 2018. Том.82. С.99-167.

② Знаменский П.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Крутиц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одворье, 1996. С.223-224.

罗详细撰写成书记载下来。<sup>①</sup>

众所周知，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上有三大里程碑式的事件，即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受洗、1589 年脱离君士坦丁堡成立牧首区，和 17 世纪牧首尼康改革。安提阿教会和叙利亚神职人员在这三次历史性的转折时刻，都亲身参与，并且对俄国教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安提阿教会与俄罗斯之间非同寻常的历史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俄罗斯对此也铭记于心。2016 年 7 月 26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基里尔会见安提阿教会驻莫斯科代表尼丰（Нифон Сайкали）都主教时，特别强调，“我们总是对此（安提阿教会在历史上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发展的贡献）心存感激，并且对圣安提阿教会回报以同样的爱”；虽然俄罗斯与叙利亚并不接壤，但东正教徒“对相互间关系的理解，远比对其通常的认识更为广泛。正是在共同祈祷中的灵交，使得这两个不同国家和民族东正教徒之间的距离得以消除，这是他们认识和理解相互关系的方式，也成为他们定义相互关系的重要形式”。<sup>②</sup>共同的东正教信仰、安提阿教会在东正教世界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俄叙两地长期友好的宗教文化联系，使俄国统治者对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和叙利亚东正教徒）抱有特殊的情感和认同。这也为帝国后期沙俄对叙利亚事务的介入和渗透，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大叙利亚地区编制为三个叙利亚行省，由奥斯曼帝国苏丹任命的总督直接管辖。<sup>③</sup>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沙俄政府开始对叙利亚事务表现出兴趣，主要集中于叙东正教徒及安提阿教会地位和生存状况问题。最先利用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徒问题采取实际行动的，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在 1782 年 9 月 21 日写给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信中，提出一个“希腊计划”（Гре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希望与奥匈帝国一起瓜分奥斯曼帝国。信中写道，“如果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将欧洲从基督教敌人

---

①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Павел Алепп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Антиохий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Макария в Россию в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Обществ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2012.

② Слюнкин А.А. Антиох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Россия// Вестник СамГУ. 2010. Vol.75. No.1. С.125-126.

③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23 页。

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请不要拒绝帮助我在野蛮人王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古老的希腊王国（此处指拜占庭帝国——笔者注）”。<sup>①</sup>这项计划遭到法国和英国的极力反对，最终胎死腹中。

19 世纪中期，梵蒂冈天主教会和耶路撒冷东正教会在巴勒斯坦对圣迹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土耳其苏丹在法国的介入下，将原本由东正教会管理的圣墓大教堂的钥匙转交给天主教会。<sup>②</sup>沙皇尼古拉一世强烈要求苏丹废除这一“不公平的决定”，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四个东正教会牧首的任命和内部事务管理。遭到拒绝后，沙皇直接出兵奥斯曼帝国，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的爆发。结果沙俄惨败，希望建成从彼得堡到耶路撒冷的东正教世界的尼古拉一世，也郁郁而终。<sup>③</sup>

对圣地和教会影响力的争夺，导致战争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使得后继的沙俄统治者更加倚重俄国东正教会的作用，以更细致深入的方式在大叙利亚地区不断拓展俄国的影响力。叙利亚的人口结构原本以基督教信徒为主，但从公元 7 世纪开始，穆斯林逐渐占据人口多数。到 19 世纪，基督徒下降到总人口的 15%<sup>④</sup>，其中又以东正教徒为主。为了维持和扩展影响力，俄国在耶路撒冷先后成立俄国教会传教团<sup>⑤</sup>和帝国巴勒斯坦东正教协会<sup>⑥</sup>（下文简称巴勒斯坦协会），在中东地区积极开展传教、教育等活动，也经常介入当地政治事务。安提阿教会正是在俄国外交官和巴勒斯坦协会的积极干预下，于 1899 年 4 月选举出第一位阿拉伯人牧首——梅列季·杜玛尼（Мелетий

---

① Арш Г.Л. Россия и борьба Греции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от Екатерины II до Николая I.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13. С.35-52.

②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А.М. Восточная Война, 1853-1856. Том 1. Москва: Полигон, 2002. С. 324-332.

③ Якушев М.И. И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и святые Палестины в фокусе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кануне Крымской войны//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Палест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03. Vol.100. С.245-287.

④ Жантiev Д.Р. Традиц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на Арабском Востоке: Реформы в сирийских провинциях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конце 18 века-начале 19 века. Москва: ИСАА при МГУ, 1998. С.5-6.

⑤ 俄国教会传教团（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成立于 1847 年。

⑥ 帝国巴勒斯坦东正教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英语缩写是“IPPO”，成立于 1882 年。



Думани, 1899–1906), 负责管理叙利亚东正教徒事务, 而此前这一职位一直由希腊人担任。<sup>①</sup>直到 1917 年二月革命前夕, 沙皇还延续 15 世纪以来的传统, 对安提阿教会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拓展本国的影响力, 沙皇政府向巴勒斯坦协会划拨大量资金, 使其在当时安提阿牧首区的教育事业发展中,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巴勒斯坦协会由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 1882 年发布敕令成立,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总部设在俄罗斯, 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和地区, 号称是俄罗斯最大、最古老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协会首任会长是沙皇的叔叔谢尔盖公爵。直至十月革命前, 该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来自俄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高层。协会从 1895 开始在叙利亚开办学校, 资助当地东正教信徒的子女上学, 协会和俄国政府对当地办学活动给予人力和财力资助。1912 年, 尼古拉二世批准在国家预算中单独编列款项, 专门用于资助巴勒斯坦协会在叙利亚办学机构的活动, 可见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根据巴勒斯坦协会的统计, 截至 1910 年, 协会在叙利亚创办超过 100 所中小学和 2 所中等学院, 在各类学校里上学的学生多达 11550 人<sup>②</sup>, 提高了东正教徒群体的教育水平和影响力。在 20 世纪初期发源于叙利亚各地区的阿拉伯民族觉醒运动中, 有不少知名人士就是毕业于该协会创办的学校。

虽然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概念直至现代才出现, 但沙俄政府和东正教会在叙利亚的办学教育活动, 正是双方通过东正教渠道为提升俄国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 而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此次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 我们不仅可以就其方式在历史上找到相似之处, 而且也可以从文化的视角, 理解叙利亚在俄罗斯决策者认知中的地位, 以及俄政府为何在外部环境极其不利的情况下, 仍决定强势出兵叙利亚。

---

① Якушев М.И. Первый Патриарх-Араб на Антиохийском Престоле// Восточный Архив. 2006. №.14-15. С.100.

② Лисовой Н.Н. Русское духовно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Святой Земле и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7. С.194-206.

## 二、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世俗政权的互动关系，在历史上形成过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称为“交响曲”或者“和谐共处”模式（симфония）。教会拥有独立的神职和行政体系，但政府和教会为了共同利益，在内外事务上保持紧密合作。这一模式形成于基辅罗斯受洗时期，并基本延续至彼得一世改革。第二种称为“君权为尊”模式（цезарепапизм）。国家君主同时也是教会最高领袖，君主决定教会重大事务，教会沦为君主实现内政外交目标的工具。这种模式始自 1721 年彼得一世颁布《宗教章程》，他决定成立主教公会，负责教会事宜。主教公会成员由沙皇亲自任命并领导，教会因此成为沙皇治下的一个政府衙门。后来临任沙皇不断强化这一模式，一直到 1917 年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为止。<sup>①</sup>

苏联解体后，随着 20 世纪以来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成为世界主流，东正教会参与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也以新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时代精神以及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国家的国情。俄罗斯 1993 年出台的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不得被规定为国教或强制信奉……国家保障每个公民的信仰自由……宗教组织与国家机构分离，各宗教组织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sup>②</sup>1997 年，俄罗斯颁布《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其中规定，“国家不干涉公民对宗教的态度或确定宗教信仰事务……不要求宗教组织履行政府机关或其他国家组织、地方政府机构的职能；在合法的前提下，不干涉宗教组织的活动……宗教组织不得参加国家和地方机构选举，宗教组织不得参加政党和政治运动的相关活动，也不得提供物质及其他形式的资助。”不过，法律同时也规定，“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sup>③</sup>俄罗斯在法律上确立俄罗斯作为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世俗国家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承认东正教相对于其他

---

① 相关研究见[苏]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213-255 页；Irina Papkova,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Washington/Ox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8.

②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декабря 1993. <http://constitution.kremlin.ru/>

③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на 2 декабря 2019). <http://docs.cntd.ru/document/9040821>

宗教的优势地位，进行了模糊解释。

同时，自苏联解体以来，虽然新的政党在俄罗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其运作通常只服务于创建者的个人政治目的。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和政党政治的不成熟，导致俄罗斯内政外交通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sup>①</sup>，尤其是普京担任总统以来更是如此。普京号称是虔诚信仰东正教的国家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结且深受东正教道德和价值观影响。<sup>②</sup>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的特殊意义，“在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她不仅关乎我们国家组织的形成，而且在文化、道德和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特殊作用”；<sup>③</sup>“在俄罗斯的条件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东正教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就是作为俄罗斯国家体制根源的作用”。<sup>④</sup>东正教会关于世俗政权的神学解释、以东正教教义为基础的道德和价值观，曾是俄罗斯国家体制形成的源泉及其行动原则。在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会和世俗政权曾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政教分离的趋势成为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性浪潮……经历了苏联时期那个无神论时代之后，东正教在后苏联的俄罗斯社会进程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⑤</sup>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精英对东正教的特殊态度，使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关于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合作，普京明确指出，“在解决重大国内外事务方面，我们和教会是真正的合作伙伴，我们为祖国和人民的福祉共同奋斗”。<sup>⑥</sup>

2000 年 8 月，俄东正教会发布题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

---

① Michael Waller, *Russian Politics Today*,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46-164.

② 参见汪宁：《“给我 20 年……”——解读普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323-356 页；林精华：“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16 页。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иерархам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 случаю 90-летия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атриаршеств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9 ноября 2007.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679>

④ Путин надеется на вклад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вер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ащиту духо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Интерфакс. 3 февраля 2009.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act=news&div=28660>

⑤ 林精华：“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09 页。

⑥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поместн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церквей//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5 июля 2013.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942>

则》的文件<sup>①</sup>，首次对教会的地位和角色做出官方说明。关于政教关系，教会支持国家的政教分离政策，教会处于独立于世俗政权的自由地位，但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应当建立起基于“交响曲”模式的“合作关系”，协同促进共同利益。教会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关系中的平等伙伴和参与者”，并且“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法律规定政教分离的世俗原则，是两种制度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是对二者权限范围的划分，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将宗教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禁止宗教组织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决策以及对政权的行为进行评价等。因此，东正教会可以成为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全权参与者，与各个层面的国家机构展开直接合作（直接参与政治和政治斗争除外）”。<sup>②</sup>至于教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俄罗斯教会与社会合作局前局长弗谢沃洛德·恰普林（Всеволод Чаплин），做出的解释是，“教会完全有权作为社会大众的良知，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拥有发言权，并且根据上帝的旨意在政治、经济、个人和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指导”。<sup>③</sup>依据官方文件和声明，俄东正教会不参与具体的政治进程，但教会反对将其与社会剥离的企图；同时，俄东正教会确定并强化其作为社会道德与价值观指引者和发言人的角色。可见，俄东正教会在主观方面对于同政府合作，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关于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之间的关系，政治学者也多有讨论和研究。目前的主流看法是，俄东正教会已经摆脱了自彼得一世以来完全依附于政府的角色，基本获得了自主地位；同时俄罗斯政府也独立于教会，在决策及日常事务中不受东正教会的影响。教会和政府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以合作的方式展开协同行动，使双方利益最大化。<sup>④</sup>

俄政府和东正教会共同的主观意愿和客观需求，使双方在不同层面建立起常设合作机制，其中也包括外交事务。2003年3月6日，前牧首阿列克

---

①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9 июня 2008.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19128.html>

② 胡巍葳：“基于宗教原理的政治表达——《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则》解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4期，第64页。

③ Всеволод Чаплин определил позицию РПЦ: «власть имущая во всех областя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и «голос Бога»// Newsru. 12 мая 2012. <https://www.newsru.com/religy/17may2012/chaplin.html>

④ Irina Papkova,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Washington/Ox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6-32.

谢二世（Патриарх Алексий II）率领东正教会代表团首次访问俄外交部，并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Игорь Иванов）商定，建立双方间合作的常设机制——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由牧首署对外宗教联络局时任局长基里尔都主教，与俄外交部时任副部长瓦列里·洛希宁（Валерий Лощинин）牵头建立。联合工作组于 2003 年 5 月 8 日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在同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双方签署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联合工作办法》。<sup>①</sup>文件确立了双方合作展开工作的主要方向、工作组的地位和工作组的日常工作规程。<sup>②</sup>双方定期进行全体会议，总结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并确定下一阶段的优先合作项目，同时工作组下设各个常务工作小组，就具体合作项目展开持续的联合工作。工作组一直有效运转，截至 2019 年，已召开 23 次全体工作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高度评价教会与外交部的合作，“工作成果……证明我们在解决触及我国政府及国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时，成立工作组的绝对必要性……东正教价值观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和国家体制的基础，由此发展出我国外交部门与教会合作源远流长的传统……在独联体和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和平方面，我们与教会的目标一致……我们与教会一道反对任何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出现，反对任何以宗教、种族和文明为由祸乱分裂世界的图谋”。<sup>③</sup>

结合相关研究及领导人公开发言，双方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sup>④</sup>：

- （1）境外，尤其是原苏联国家的俄裔公民及侨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福利、法律地位等问题；
- （2）加强后苏联空间内的联系及交流事务；
- （3）东正教会间、基督教会间、不同宗教间关系的事务；

---

① «Порядок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② МИД России. Новый этап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Церковный вестник. 2003. №.21.

③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на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X заседания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МИД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МИД РФ. 20 ноября 2007 года. [https://www.mid.ru/vistupleniya\\_ministra/-/asset\\_publisher/MCZ7HQuMdqBY/content/id/356698](https://www.mid.ru/vistupleniya_ministra/-/asset_publisher/MCZ7HQuMdqBY/content/id/356698)

④ 对俄东正教会与俄外交部的合作，相关研究参见 Касагин П.И.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как актор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6. Vol.15. С.141-151; Василий Матияшин.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мире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8. №.12. С.51-60.

(4) 在联合国、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场合提倡传统价值观，提倡人权、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价值观维度；

(5) 在世界冲突地区实现和平、保护基督徒权益事务。

自从 2011 年叙利亚危机升级以来，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持续成为联合工作组的重要议题和事项。在 2018 年 11 月 13 日工作组第 23 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在解决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方面继续加强合作的问题。<sup>①</sup>叙利亚对于俄东正教会和政府来说，都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地区。对俄东正教会而言，在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争夺全球东正教领袖地位的过程中，俄东正教会与安提阿教会千年来形成的稳固友好关系，以及安提阿教会在东正教界的尊崇地位，使安提阿教会成为俄东正教会的重要支持者。而由于叙利亚的盟友身份，及其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地位，叙利亚对俄政府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俄东正教会和政府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中，找到了相互合作的基础。俄东正教会通过关注和宣传叙利亚地区以东正教徒为主的基督徒所遭遇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提供帮助，既可以进一步巩固与安提阿教会的关系，又是俄东正教会在东正教界，甚至全世界基督教界提升话语权和地位的绝佳机会。通过操作叙利亚境内基督徒等宗教少数派遭遇困境的议题，俄罗斯将介入叙利亚危机及其军事行动，定义为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及恐怖组织的反恐行动，使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合法化。并且，以保护叙境内基督徒等内战受害者为由，更可与西方对叙难民人权问题的关注相呼应，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以此为背景，俄东正教会和俄政府在叙利亚危机中展开了积极合作。

### 三、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具体行动及其效果

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采取联合行动。一方面，俄教会领导人及教会与政府共同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国内场合公开发言，或组织会议宣传讨论叙利亚基督徒所遭遇的人道主义危机，向国际

---

<sup>①</sup> Состоялось XXIII заседание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МИД России. 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РПЦ. 13 ноября 2018. <https://mospat.ru/ru/2018/11/13/news166548/>

社会宣扬恐怖主义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势头及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教会通过与政府共同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向叙利亚境内基督徒为主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叙利亚由属于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派阿萨德政权统治，叙利亚东正教社团对同为宗教少数派别的阿萨德政权大致持合作态度。2011 年 3 月以来，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反对派中的极端主义团体和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把普通阿拉维派信众和基督徒都作为袭击的目标，其口号是，“将基督徒赶到黎巴嫩，将阿拉维派赶到坟墓去”。在此次叙利亚冲突中，大量基督教徒遭到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杀害，还有很多人流离失所，已有数十万基督徒逃离叙利亚。据某些组织的报告估算，叙利亚境内基督徒人口比例已明显少于危机前的 10%<sup>①</sup>，叙利亚境内基督教徒面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对于叙基督徒当前面临的生存危机，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表达了严重关切。牧首基里尔在各种场合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认为“对基督徒的杀害、将基督徒从这一地区驱赶出去的企图，不仅有违人类的信仰、人权和自由，而且还是人类文明的灾难”。<sup>②</sup>在叙利亚危机升级为内战后，2013 年 6 月，基里尔牧首在教会下辖所有教堂为叙利亚基督徒募捐，仅 1 个月便募得 130 多万美元并将其转交安提阿教会。<sup>③</sup>基里尔表示，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对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援助将一直持续，直至难民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生活。<sup>④</sup>莫斯科牧首署对外宗教联系局局长伊拉里昂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也在俄罗斯国内外积极宣扬叙利亚基督徒的困境。2017 年 5 月，伊拉里昂都主教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保护受迫害基督徒全球峰会”，号召各国领导人尤其是中东国家做出努力，阻止基督徒受迫害的现象。2018

---

①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1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0 August 2016, <https://2009-2017.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htm?year=2015&dclid=256289>

② Запад вошёл в конфликт с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природой человека// Russia Today. 21 ноября 2016. <https://russian.rt.com/russia/article/334313-patriarh-kirill-intervyu-rt>

③ РПЦ передала более \$1,3 млн дл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в Сир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7 августа 2013. <https://ria.ru/20130807/954925269.html>

④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одолжит оказывать помощь Сирии// ТАСС. 5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s://tass.ru/obschestvo/4784871>

年 9 月，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天主教大学，伊拉里昂向师生发表题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对中东地区基督徒援助”的演讲，介绍叙利亚危机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立场与行动。2017 年及 2019 年，伊拉里昂率领俄东正教会代表团，连续两次参加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救助受迫害基督徒国际会议”，向国际基督教界及全世界介绍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基督徒的人道主义困境。

基里尔还督促俄政府关注叙基督教徒在内战中的生存安全。2013 年 4 月 22 日，叙利亚两位基督教主教保罗·雅兹迪 (Bouluos Yazigi) 和约翰·易卜拉欣 (John Ibrahim)，在北部城市阿勒颇被极端组织绑架。牧首基里尔次日即致函俄罗斯总统普京，请求普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解救两位遭绑架的主教。<sup>①</sup>俄政府高层积极呼应，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将)竭力阻止极端势力占据统治地位，避免导致其他民族或宗教派别受到歧视的情形出现”。<sup>②</sup>普京针对叙利亚基督徒的生存危机，也表达关切，“说到中东地区的基督徒，他们的情况是灾难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强调多次，国际社会在保护中东地区基督徒方面，做得远远不够”。<sup>③</sup>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政府在叙利亚危机上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基里尔牧首 2013 年 9 月致函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指出，“对于美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我们深感不安……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叙利亚基督徒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着完全灭绝或流离失所的命运”。<sup>④</sup>2015 年 9 月，俄罗斯派出军事力量直接到叙利亚内战的前线作战，俄东正教会积极支持政府的这一行动。基里尔牧首称，“在叙利亚与恐怖主义的作战，是‘神圣的战争’，它是对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作战……俄罗斯东正教会为在中东前线作战的所有俄罗斯

---

①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обратился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в связи с похищением иерархов в Сирии. 23 апреля 2013.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925392.html>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Центре ИППО. МИД РФ. 28 ноября 2012 года.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133058](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133058)

③ Путин: меры по защите христиан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РИА Новости. 16 апреля 2015. <https://ria.ru/world/20150416/1058989211.html>

④ Обращ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США Бараку Обаме в связи с ситуацией в Сирии.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10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3223949.html>



军人祈祷”。<sup>①</sup>2016年2月12日，基里尔牧首与梵蒂冈教皇方济各，在古巴哈瓦那实现历史性会面。双方将中东地区受迫害基督教徒的处境，作为具体合作的第一个领域，承诺共同帮助叙利亚基督教会的重建。<sup>②</sup>2016年4月6-7日，俄东正教会与梵蒂冈天主教廷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先后访问叙利亚和黎巴嫩，探访基督教各教派社区遭到迫害和破坏的情况，以及以基督徒为主的难民营，为两大教会后续的联合人道行动进行实地考察。<sup>③</sup>两大教会已进行联合工作，厘清叙利亚内战期间遭受损毁的基督教堂、圣地、基督教社区，将受损情况形成清单，对基督徒死亡、流离失所成为难民的数据也进行了统计，进而开展叙利亚境内基督教会的实质性恢复工作。

2013年7月叙利亚内战正酣时，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曾就俄罗斯社会关于叙利亚危机的态度，做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51%）不同情叙利亚冲突的任何一方，只有21%的人认为应该支持叙利亚现政权。<sup>④</sup>随着俄政府与宗教界逐渐加大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宣传，俄罗斯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中的主流声音可以概括为：叙利亚内战中存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派别对基督徒等宗教少数派别的消灭和迫害，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并在2015年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是与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进行斗争，帮助解决叙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些宣传的影响下，尽管俄国内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俄大多数民众开始对政府有关叙利亚危机的立场持支持态度。2015年10月初，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就俄罗斯政府同年9月底在叙利亚境内开展直接军事行动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政府应当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66%的民众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sup>⑤</sup>

---

①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назвал войну в Сирии священной// МК. 6 мая 2016. [www.mk.ru/politics/2016/05/06/patriarkh-kirill-nazval-voynu-v-sirii-svyashhennoy.html](http://www.mk.ru/politics/2016/05/06/patriarkh-kirill-nazval-voynu-v-sirii-svyashhennoy.html)

②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апы Римского Франциска и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13 февраля 2016.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372074.html>

③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и Римско-Католи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инициировали совместный проект в поддержку сирийских христиан//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9 апреля 2016.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425016.html>

④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ирии//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8 августа 2013. <https://www.levada.ru/2013/08/28/obshhestvennoe-mnenie-o-situatsii-v-sirii/>

⑤ Наши в Сирии: Первый Опрос// ВЦИОМ. 3-4 октября 2015. [https://wciom.ru/fileadmin/file/reports\\_conferences/2015/2015-10-09-siriya.pdf](https://wciom.ru/fileadmin/file/reports_conferences/2015/2015-10-09-siriya.pdf)

俄东正教会在国际组织和人道救援层面的实际行动，则通过上文提及的巴勒斯坦协会进行。根据史料，20世纪初巴勒斯坦协会共有三千多名成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协会活动逐渐式微。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的共同合作下，巴勒斯坦协会重新活跃在中东地区，并且取得很大发展。协会领导层中有不少都是现任或曾任政府/教会重要职务的人士，协会成为俄政府和俄东正教会在中东共同推进行动的重要机构。协会会长候任人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名，经荣誉委员会批准后，由全体代表大会投票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7年提名前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Сергей Степашин)担任会长至今。从巴勒斯坦协会的活动宗旨中，可以看出其服务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明确目的，主要包括：

- (1) 捍卫俄罗斯在中东的立场；
- (2) 确立东正教在（中东）基督教圣地的存在；
- (3) 增强俄罗斯与中东各国之间多种形式的宗教、文化和人文联系；
- (4) 组织重大的科研及朝圣活动；
- (5) 完成人道救援使命；
- (6) 捍卫中东地区基督徒的基本权利。<sup>①</sup>

在此次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政府主要通过巴勒斯坦协会进行共同行动，其任务首先是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其次是通过国际组织向国际社会宣传俄罗斯在叙利亚如何捍卫基督徒权益。2012年11月28日，基里尔牧首在协会会议上表示，“我提议，我们应支持向叙利亚无家可归和受伤的基督教徒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倡议。主要是药品和包扎材料。俄罗斯东正教会愿意加入这个项目”。2013年3月27日，巴勒斯坦协会宣布开始在俄罗斯民间募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从操作层面而言，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遍布各地的教堂负责接受民众捐献的救援物资，巴勒斯坦协会负责收集物资，并通过俄罗斯国防部提供的飞机将物资运送至叙利亚分发给民众。2013年至2016年，巴勒斯坦协会已向叙利亚民众提供14批共140余吨包括食物、衣物、药品在内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sup>②</sup>，功绩斐然。

---

①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ИППО// ИППО. <http://www.ippo.ru/historyippo/>

②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ири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ИППО. 14 февраля 2016. <http://www.ippo.ru/humanitarian/article/ot-rossiyskogo-naroda---siriyскому-narodu-307312>

2017年4月，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宗教团体联络委员会下设的国际合作处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向叙利亚民众提供人道援助事宜。参加会议者不仅有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紧急情况部的高官，还包括东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等俄罗斯主要宗教教派的领导人，以及巴勒斯坦协会、利比亚和叙利亚之友等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自此，宗教界及民间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开始由宗教团体联络委员会统筹协调，<sup>①</sup>巴勒斯坦协会和其他民间机构开始加强合作，筹募到的援叙物资也明显增加。<sup>②</sup>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协会还专门设置负责保护中东和北非基督徒的部门，向国际社会宣传当地基督徒的处境，具体行动由协会副会长、俄国防部前发言人叶莲娜·阿加波娃（Елена Агапова）领导执行。协会主要通过参与联合国、欧洲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举办的人权议题相关会议，向全世界传达叙利亚地区基督徒在冲突中的生存现状和遭遇，以及俄罗斯的具体应对行动。从2013年至2017年，协会已在上述国际平台发起或参加多次国际会议。

表1 巴勒斯坦协会发起或参加的国际会议

序号	时间	国际平台	议题	角色
1	2013.3.7 2013.6.7 2014.3.12 2016.6.1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22、23、25、32 次会议	先后四次召开以“叙利亚—通向和平之路”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讨论叙利亚冲突中宗教少数派别信徒和女性的灾难性状况	发起方
2	2015.10.2 2017.6.22 2018.6.10	欧安组织	欧安组织工作会议，IPPO报告“在叙利亚对基督徒的种族灭绝”及中东地区基督徒等宗教信徒的状况	参加方
3	2016.11.9 2017.11.6	欧洲委员会	“跨文化对话宗教维度及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参加方
4	2016.12.14 2018.10.22	欧安组织	“反对针对基督徒的敌对和歧视”国际会议	参加方
5	2017.3.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34次会议	“不同宗教间实现和平与稳定——保护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仰”	发起方

注：上述内容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及巴勒斯坦协会网站信息汇总整理。

① Состоялось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религиозной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по оказанию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омощи Сирии, ОБЦС МП. 12 апреля 2017. <https://mospat.ru/ru/2017/04/12/news144542>

② ИППО приняло участие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иссии в Сирии// ИППО. 1 апреля 2019. <https://www.ippo.ru/world/article/ippo-prinyalo-uchastie-v--gumanitarnoy-missii-v-si-405553>

2015年6月，由俄罗斯东正教会、巴勒斯坦协会协助举办的第三届青年基督徒论坛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会上决定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成立保护基督徒的分支组织，这一决定得到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代表的拥护。

可以说，这些行动收到了一定成效。2017年，在天主教世界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教皇方济各一世，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在中东的行动，他说，“我知道，俄罗斯政府说他们在中东保护基督徒。我认为这样做是有益且正确的，因为如今受难的基督徒比基督教历史初期还多，尤其是在中东地区”。<sup>①</sup>

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呼吁其他欧洲国家关注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基督徒受迫害的现状，并给予更多实质帮助。欧美国家的一些基督教宗教组织也开始参与针对叙利亚基督徒的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有的国家成立政府部门，帮助解决中东地区基督徒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2016年底，匈牙利成立副部级的救助受迫害基督徒秘书处<sup>②</sup>，任命助理部长特里斯坦·阿兹别伊（Tristan Azbej）负责中东和非洲等广大地区受迫害基督徒的救助工作。2017年度，秘书处向中东基督徒的援助金额超过700万欧元。<sup>③</sup>匈牙利还从2017年开始主办主题为“受迫害基督徒”国际大会，议题包括叙利亚基督教的现状及如何有效援助受迫害的基督徒。2019年11月26-28日，第二届大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来自40多个国家的650多名代表参会，包括叙利亚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主要基督教派的领导人与会，会议规模是2017年的两倍。<sup>④</sup>同时，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从2015年开始接收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难民。<sup>⑤</sup>有欧洲政治学者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保护基督徒的行动，提高了普京在欧洲民众中的支持率。<sup>⑥</sup>

---

① Папа Римский солидарен с Россией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щиты христиан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30 апреля 2017. <https://www.vesti.ru/doc.html?id=2883315&cid=7>

② Deputy State Secretariat for the Aid of Persecuted Christians

③ Péter Heltai, “The Hungary Helps Initiative – A Hungarian Face of Solidarity”, *Hungarian Review*, 2010, Vol.10, No.6, [http://hungarianreview.com/article/20180321\\_the\\_hungary\\_helps\\_initiative\\_a\\_hungarian\\_face\\_of\\_solidarity](http://hungarianreview.com/article/20180321_the_hungary_helps_initiative_a_hungarian_face_of_solidarity)

④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ristian Persecution convenes in Budapest”, *Catholic World Report*, 26 November 2019, <https://www.catholicworldreport.com/2019/11/26/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hristian-persecution-convenes-in-budapest/>

⑤ “Poland favours Christian refugees from Syria”, *Financial Times*, 21 August,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6edfdd30-472a-11e5-b3b2-1672f710807b>

⑥ Политолог: защита христиан Сирии подняла рейтинг Путина в Европе. 29 марта 2017. <https://ria.ru/religion/20170329/1491045726.html>

## 四、结语

在俄叙关系中，东正教因素是理解俄罗斯对叙政策的一个重要向度。安提阿教会的崇高地位和俄叙两地自古以来的宗教文化交往，在历史上影响着沙俄统治者对叙利亚东正教徒的情感。安提阿教会权益和东正教徒生存状况问题，成为帝国主义时期沙俄介入叙利亚问题的杠杆。沙皇俄国政府和俄东正教会也通过兴办教育机构等方式，增强俄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俄罗斯政府有关此次叙利亚危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延续。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政府合作，在公开场合和国际会议上，宣传叙利亚境内东正教徒的生存危机并向叙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在国际上强化了俄行动的合法性，起到了公共外交的效果，在推进国家利益和影响力方面作用明显。

叙利亚作为俄罗斯的传统盟国，是俄罗斯维持在中东影响力并参与中东事务的重要立足点。同时，俄罗斯也在逐渐恢复叙利亚塔尔图斯港自苏联解体后基本丧失的军事作用，这为俄罗斯军事力量重返地中海，并直接参与地中海周边地区事务创造了重要条件，叙利亚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维护并强化这一重要的传统势力根据地，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压，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出发点。而叙利亚宗教派别的复杂性及“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使阿萨德政权竭力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政局出现变数，远不能排除未来政权更替的可能性。如果俄罗斯仅仅依靠与阿萨德政权的良好关系来维系俄叙同盟，假使叙利亚政权更迭，那么俄叙关系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可能，这势必会对俄罗斯在中东的存在造成重大打击。因此，俄罗斯通过多个渠道尝试增强在叙利亚的软实力，如，俄罗斯推动叙利亚政府自 2015 年起将俄语列为中学必修科目<sup>①</sup>，“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等协助叙利亚教育部编写相关教材；俄罗斯政府 2016 年向叙利亚学生提供 278 个赴俄深造奖学金名额，是上一年度的 3 倍<sup>②</sup>，2019 年这一数字增加

---

① “Syrian schools to start teaching Russian as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next year”, *Middle East Monitor*, 10 February, 201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40210-syrian-schools-to-start-teaching-russian-as-second-foreign-language-next-year/>

②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Syrians Learn Russian”, *CSIS*, 15 December 201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peaking-same-language-syrians-learn-russian>

至 500 个。除大马士革大学外，俄罗斯还努力促成在拉塔基亚和霍姆斯等地大学设立俄语系。<sup>①</sup>另外，通过突出并加强俄罗斯与安提阿教会和叙利亚东正教徒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友好关系，俄罗斯尝试将这一渠道塑造成俄叙关系的另一纽带，并增强其在叙利亚的软实力。

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政府大加利用东正教因素以及俄东正教会的卖力表现，也引起了叙利亚社会的一定警惕。俄东正教会基里尔牧首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称为“神圣战争”，并为军事人员祈祷祝福的行为，在安提阿教会内部和教众间引发争议。<sup>②</sup>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来自都主教埃利亚斯·阿乌迪（Elias Audi）。他认为，“杀戮行为不应当被祝福！2003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公开谴责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现在它却用‘神圣战争’的说法支持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我们的教众并未请求（俄罗斯）来保护我们”。<sup>③</sup>安提阿教会牧首约翰十世（Patriarch John X）也认为，单纯保护基督徒的说法与基督的博爱精神相悖，而且可能会将叙利亚基督徒与叙利亚社会其他族群剥离开来并造成隔阂。<sup>④</sup>叙利亚政府也对俄叙两国事务中东正教因素的凸显保持警觉，如巴勒斯坦协会募集的人道主义物资，原本由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和最高穆夫提（伊斯兰教派最高机构）负责分发给不同信仰的民众，后来这一任务改为由不具宗教色彩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执行。可以看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与俄政府合作中过于主动的立场和表现，在大力促进俄罗斯利益的同时，也在稀释自己作为非世俗、倡导和平的宗教机构的地位和公信力。而且，一味强调叙利亚的东正教元素，在这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且宗教派别复杂的社会，可能会将东正教徒与其他族群割裂。俄罗斯在这场公共外交中追求最大化利用叙利亚基督徒的人道主义危机，却并未考虑可能

---

① Факультет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ткроютс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Латакии и Хомса// ТАСС. 26 апреля 2019. <https://tass.ru/obschestvo/6379302>

② “Some Middle Eastern Christians are speaking up against ‘holy war’ in Syria”, *The Economist*, 21 October, 2015, <https://www.economist.com/erasmus/2015/10/21/some-middle-eastern-christians-are-speaking-up-against-holy-war-in-syria>

③ 埃利亚斯都主教相关发言，可参见“Why Russia Wants Lebanon”, *Middle East Quarterly*, 23 January, 2019, <https://www.meforum.org/60026/why-russia-wants-lebanon> 以及 “The Christian Dimension of R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Al Sharq Forum*, 2 March, 2017, <https://research.sharqforum.org/2017/03/02/the-christian-dimension-of-russias-middle-east-policy>

④ “Patriarch John X Stresses Unity, Peace at Convocation”, *Orthodox Christianity*, 27 July 2015, <http://orthochristian.com/81005.html>

会对他们造成的负面效果。阿萨德政权与将自己塑造成基督徒保护者的俄罗斯合作，无助于改善其在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中的声望。阿萨德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也在淡化两国关系中的东正教元素。同时，随着重返中东的程度日益加深，俄罗斯期望在这一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提高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过于强调东正教的身份对于俄与域内国家加强关系并无助益，甚至可能成为负面资产。

有西方学者指出，此次叙利亚危机表明，冷战后的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回归国际社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sup>①</sup>当世界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军售、能源等俄罗斯的传统外交工具时，俄罗斯已意识到外交手段多样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地区。2013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首次对此进行专门论述，“‘软实力’正在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依靠民间社会、信息通讯、人道主义等方式和技术，来解决外交任务的一整套外交工具……（俄罗斯）致力于建设与俄罗斯的文化、教育、科学、体育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形象……改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方法体系，并在借鉴国际经验和本国特色的基础上寻找最优行动方式”。<sup>②</sup>

“今日俄罗斯”新闻网在全球的亮眼表现、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行动等，都是其公共外交相对成功的案例，这些方式有效提升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当某些国家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有宗教联系时，宗教可能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并成为俄罗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比如，由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轨迹，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周边国家，尤其是独联体国家几乎都有分支机构和为数不少的信徒。随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中亚、波罗的海等地区恢复扩张教区和神职人员体系，这种历史和文化联系，使得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的周边外交中尤其可成为公共外交的渠道和执行者。这一现象和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值得学界加以关注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① “The Return of Global Russi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4 December, 20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12/14/return-of-global-russia-analytical-framework-pub-75003>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Д РФ. 12 февраля 2013. [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122186](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122186)

---

**【Abstract】** Recently Russia's performance in the chaos in Syria has again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hot spot. Since its involvement in the escalating Syrian crisis in 2011, Russia has now become a major external force dominating the Syrian political process. The Orthodox facto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ussia's diplomacy in response to the Syrian crisis. Actually, early as an empire, Russia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volved in Syrian affairs. The Russian-Syrian Orthodox cultural exchanges since ancient times have influenced Tsarist sentiments towards the Antioch Church and Syrian Orthodox Christians, which then have become a breakthrough for Tsarist 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rivalry with great 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 Now Russia's involvement in the Syrian crisis is just a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Public statements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leaders, the advocacy of its subsidiary bodie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Syrian Christian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ir provis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ave all played a role as public diplomacy. They, to some extent, have legalized Russian intervention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helping to win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bove-mentioned multiple influence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constitut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the Syrian crisis and successful achievement in its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goals.

**【Key Words】**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ussia-Syria Relationship, Syrian Civil War, Russian Soft Power

**【Аннотация】**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йском хаосе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снова стали горячей тем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 момента своего участия в эскалации сирий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2011 году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главной внешней силой развития сирий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фактор сыграл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ответ на сирийский кризис.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сирийских делах ещё будучи империей. Российско-сирийск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влияли на цар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Антиохийской



церкви и сирийским православным христианам и стали прорывом дл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делах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х держа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йском кризис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истории. Публич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гла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ропаганда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п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е и оказа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омощи сыграли определённую роль в публич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в некоторой степени узаконил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и военные операции в Сирии, завоевав понимание и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Да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фактор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позволивших России вмешаться в сирий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успешно достичь свои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а также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сво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российско-сир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ирийска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мягкая сила России

---

(责任编辑 崔珩)

##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华 盾\*\*

**【内容提要】**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 中俄美三边关系 俄罗斯智库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0089(30)**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和“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的阶段性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绍雷教授、张昕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李括为本文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 华盾，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兼职研究员。

## 引言

在中国与美国各自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并相互深嵌的背景下，两国经贸摩擦可追溯历史之深、延伸领域之广、造成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一组双边经贸关系不可比拟的。俄罗斯作为与中国和美国均有深刻渊源、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国，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厘清俄罗斯智库对于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立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和理论意义。首先，俄罗斯智库的政策建议会进入俄罗斯国家外交决策议程；克里姆林宫的意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智库的基本立场。因此，倾听俄罗斯智库的声音，有益于了解俄罗斯政治知识精英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反应、期待和俄罗斯今后可能的战略走向。其次，从苏联继承者俄罗斯的第三方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的演进，有助于我们站在历史经纬上客观辨识当下之事，并对我们今天的认知与实践起到鉴戒作用。最后，归纳和挖掘此次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理路与进展，并为中美/大国关系研究提供来自俄罗斯的学术资料，为探索中美俄三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基础知识。

为客观而全面地揭示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立场，作者检索了多所俄罗斯智库和学术机构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间，公开发表的评论、报告等文献资料。<sup>①</sup>由于未找到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等机构的相关成果，本文考察的俄方观点最终来自六所智库：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和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这六所智库的发展路径、组织形式、资金来源各异，因而在俄罗斯智库组织结构中最具代表性。同时，它们又都是俄罗斯智库体系中凤毛麟角的能够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智识储备与供给机构，因而在俄国国内乃至全球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领域富有影响力。

1.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sup>②</sup>作为典型的智囊型智库，隶属于俄罗斯总统办

---

① 以 2017 年 8 月 18 日美国贸易办公室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为时间起点。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https://riss.ru/>

公斤，为总统办公厅、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联邦安全委员会等国家权力机关提供情报分析、专家评估和政策建议。该所创立于1992年（当时隶属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其前身是苏联克格勃第一管理局情报问题研究所。2009年该所组织关系变更至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但历任所长仍具有对外情报局背景：2009-2017年所长列昂尼德·列舍特尼科夫（Леонид Решетников）是原苏联和俄罗斯特工，对外情报局中将；2017年新任所长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Михаил Фрадков）于2007-2016年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由于俄罗斯政治制度设计赋予总统和总统直属执行机构（总统办公厅、联邦安全委员会等）以更大的权力，因此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是最能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制定的智库。

2.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以下简称“普里马科夫所”）。<sup>①</sup>作为科研底蕴深厚的学术型智库，其研究以学理性、系统性、跨学科性和连贯性见长。<sup>②</sup>该所在俄罗斯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中，一直排名俄国本土智库第一位。该所年度大型国际会议“普里马科夫讲坛”，在全球智库会议排名中位列第七，国家政要（总统、外长、前政要等）连年出席。<sup>③</sup>

3. 莫斯科卡耐基中心。该中心被国际学界和政策研究界认为是俄罗斯迄今最成功的国际智库。该中心由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于1993年开始筹建，1994年正式运营。美国前驻俄大使（2012-2014）、奥巴马政府对俄政策设计师、美俄关系重启策划人——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参

---

①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мени Е.М. Примак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ИМЭМО РАН). <https://www.imemo.ru/>

② 普里马科夫所的研究侧重四大版块：全球发展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国际关系体系演化与国际安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新特征。该所拥有多个周期性、常态化的科研专题，例如学术核心期刊《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之路》、《俄罗斯与欧亚新国家》、《俄罗斯经济数据》；与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合作的年度专著《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年度预测《俄罗斯与世界：经济与对外政策》；世界发展年度分析；《西方-东方-俄罗斯》年度专著。每隔几年，普里马科夫所会进行重量级的全球战略预测，例如2011年推出的《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2017年推出的《2035年的世界：全球预测》等。

③ James McGann,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 2012-2018.

与了中心建设。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智识产品，多是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批判性分析。虽然 2012 年以降俄官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严控，大大缩减了国际智库的立足之地<sup>①</sup>，但莫斯科卡耐基中心通过进行符合俄罗斯政治社会生态的转型得以生存下来。其手段有三：一是恰当的功能定位——力求为当局提供不加粉饰的分析和建议，而非变成“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反对派；二是贴近社会——对全民关切的问题进行学理性和新闻性（可读性）兼具的研究，从而收获更多受众；三是成功的运作模式——将中心打造成平台型智库<sup>②</sup>，汇聚俄罗斯国内外年轻的独立思想者。<sup>③</sup>

4.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工商联盟和国际文传电讯社联合创办，成员包括 160 位来自俄联邦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学、军方、研究所和企业界的人士。<sup>④</sup>其研究内容涵盖外交、经济、军事、全球发展、人工智能等攸关俄罗斯利益的多方面问题。该委员会在投身国内社会并拥抱世界的双向公共关系和网络渗透方面，是俄罗斯智库中的典范。<sup>⑤</sup>2018 年，其网站平均月访问量为 25.2 万人次，其中超过 40% 为国外访问，访问量按国家排名前十为：俄罗斯、美国、中国、法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德国、英国、白俄罗斯和

---

① 2012 年末，“外国代理人法”出台，规定所有接受国外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智库在内）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2014 年，俄罗斯司法部出台修正案，禁止国家公务员参与被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禁止参与外国机构资助的旅行。“Justice Ministry drafts motion banning officials’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agent’ NGOs”, 28.07.2014, <https://www.rt.com/russia/176044-russian-officials-foreigners-ban/>

② 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正式员工仅有 17 人，其中行政人员 9 人，科研人员 8 人（包括 3 位特邀专家），其很多报告并非来自卡耐基内部，且这些作品也并不都是受卡耐基中心委托而创作的。

③ 现任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认为，这三点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发展至今的秘诀。可参见特列宁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智库新世纪会怎样？”会议上的发言。Каким будет новый век «фабрик мысли»? 04.01.2019. [https://russiancouncil.ru/news/kakim-budet-novyy-vek-fabrik-mysli/?sphrase\\_id=30633502](https://russiancouncil.ru/news/kakim-budet-novyy-vek-fabrik-mysli/?sphrase_id=30633502)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PCMД). <https://russiancouncil.ru/>.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通常针对特定议题，建立由该领域各界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合作撰写相关报告。

⑤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一方面面向社会举办讲座，开放学术研讨会，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公共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则通过网络渗透发布和传播研究成果。委员会在 Facebook, Twitter, VK, Flickr, YouTube, SlideShare, Telegram, LinkedIn 拥有网络主页，并日常性地发布活动通知、研究报告等智库动态。

亚美尼亚。<sup>①</sup>

5. 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该机构与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机关（如总统办公厅、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外交部、国防部、国际事务联邦委员会、国防联邦委员会等）、强力部门、国内外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由 208 位政治家、企业家、社会和国务活动家、学者，以及强力部门、军方和媒体人士组成。该机构主要侧重国际政治研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其研究成果几乎都以俄文发表，主要面向俄国国内专家群体。<sup>②</sup>

6.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创办。该俱乐部创立的初衷，旨在改善俄罗斯较为负面的国际形象。经过多年发展，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已经演变为吸纳俄罗斯国内外学者或智库专家为成员，议题涵盖俄罗斯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重大综合性问题的研究平台。普京总统本人的年年出席，以及总理、外长、议会党团代表的经常性参与，使瓦尔代俱乐部成为世界获悉俄罗斯主张、俄罗斯展现自身精神的重要媒介之一。

以上述六家智库为典型代表，俄罗斯智库建设已然走上符合本国国情、分工明确、目标清晰的发展道路。其总体特征包括：

第一，官方背景。从资金来源和隶属关系角度看，除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作为国际智库的资金来自国外、管理层由资方聘用之外，上述其余五所均为资金来自国家拨款和准国家拨款的官办（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半官办（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普里马科夫所）和有明确官方背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智库。<sup>③</sup>而由于俄罗斯国家外交议程设

---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2018)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http://russiancouncil.ru/upload/iblock/f21/riac\\_annual\\_report\\_2018.pdf](http://russiancouncil.ru/upload/iblock/f21/riac_annual_report_2018.pdf)

②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СВОП). <http://svop.ru/>. 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方式，包括成员间定期的非正式会面、举办会议、线上或线下研讨会和讲座，组织研究项目、刊发评论文章等。委员会每月举行面向社会的线下讲座，延请国际关系专家针对时下现实问题进行讲解和分析，讲座实况会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③ 有关俄罗斯智库资金问题有三点需要注意：（1）资金来源难以确定。很多拨款是通过背景复杂的中间机构来进行划拨，例如俄罗斯外交部会把资金先拨给戈尔恰科夫基金会，再由后者分拨给各智库。而总统办公厅则先拨款给“公民社会发展基金”，后者再划拨给诸如战略研究所、高等经济大学等智库。（2）“准国家拨款”。除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资金全部来自国家拨款，其余智库为政企混合的资金结构，但大部分企业资助来

定权和决策权，掌握在较为封闭和集中的政治精英和高级官僚手中，只有这几家智库能够通过与其决策层的多重互动机制（如政府指派研究任务、智库专家参与各种议会委员会工作、国家领导人参加智库会议、智库领导或高层人员进入政府或大企业任职等）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因此，我们期待从这几家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研究中，看到它们对政界、学界、社会、国际等不同场域的作用与反作用。

第二，“智库辛迪加”。依仗坚实的国家预算、深厚的学术功底、广泛的社会关系、丰富的人力资源、独占的政治影响力，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以这几家机构为核心的辛迪加式智库垄断组织形式。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端集中在政府内部，这几家接受统一宰制的智库负责供给侧的知识产销，绝大部分高质量智力资源也被吸收进这里。与此同时，智库间存在着智力资源竞争、流转和共享现象。一方面，各智库为提高自身知识产品的市场份额而努力获取国内外高质量智力资源；但由于政策分析行业的开放性、顶尖专家的稀缺性、专家个人收入等原因，有相当多的政策分析人员在研究所、高校、智库甚至咨询公司等政策分析机构之间调动、兼职或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工作模式和组织形式具有平台性质，其成员广泛分布于政、商、学、媒各界，因而这些平台型智库与机构型智库之间共享着许多智力资源。因此，考察这几家智库有助于我们快速从整体上掌握俄罗斯政治知识精英对中美双边以及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认知与期待。

第三，社会责任。除了官办智库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之外，其他智库的重

---

自于同政府各部门有紧密联系的大公司或国企，例如，瓦尔代俱乐部的合作伙伴包括两家银行（阿尔法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和两家冶金公司（Metalloinvest、Severstal）；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创办单位包括俄罗斯工商联盟，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副总经理米哈伊尔·马尔杰洛夫是其副主席之一。因此，企业资助可以理解为一种准国家拨款，甚至仅仅是国家拨款的别样形式而已。（3）智库独立性之辩。虽然俄罗斯大多数智库均具有官方背景，但我们不宜因此简单地批评其缺乏独立性。这是因为，首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是外交关系的主体，这决定了国际关系智库基于本国利益进行政策分析与建议的正当性。其次，智库独立性分为组织独立和观点独立两个方面，二者关系未必统一；所谓独立智库为某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背书的案例屡见不鲜，智库也并不一定唯金主是瞻，且俄罗斯智库保持了以内部辩论和研讨为基本形式的观点独立性。总之，智库作为国家的一种政策研究组织方式，生长于每个国家自身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之中。

要作用还体现为，在公民社会机制下构建教育空间和公共讨论空间。智库通过深入学校举办授课、比赛等活动，体现出自身在基础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而利用网络工具吸引社会大众参与智库活动，则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建构做出贡献。<sup>①</sup>这些智库因此享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智库专家的意见势必会影响社会舆论对两个国家的认知与态度。

第四，科研外交。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创办杂志、合作研究等方式，<sup>②</sup>俄罗斯的智库活动已成为国家间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智库一方面将俄罗斯的政策理念、国际关系构想、国家意志传达给外国专家学者或政要，从而影响其国内对俄议程的制定；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对外关系紧张时，成为替代性和保障性的对话平台，弥补国家外交能力的缺口。

综上所述，从俄罗斯智库角度切入中美关系议题具有丰富内涵。

## 一、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成因

俄罗斯智库专家主要在单元和体系两个层次上，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成因：前者主要关注两国自身（尤其是中国）及双边互动，后者则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体系入手进行研究。

### （一）中国：作为中美关系变迁的决定性变量

第一种观点的基本逻辑是，中国是中美关系演变的决定性变量。在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中国国家实力与相应国际行为的变迁，在一些地理空间和领域形成了对美国的挤出效应，这引起美国国内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从而制定出对华遏制政策，最终造就了当下中美关系的“新常态”。瓦尔代国际

---

①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普里马科夫所定期与俄罗斯中学和高校合作，开展授课和国际关系知识竞赛等活动，其目的是从小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建立国际关系意识，传授俄罗斯的外交理念。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经常面向社会举办讲座和课程，开放学术研讨会、辩论会等活动。从在官网和社交网络提前发布通知，到网上预约参加，再到视频平台直播或录播活动实况，整个过程均可在线上完成。

② 国际会议例如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普里马科夫讲坛；创办杂志例如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普里马科夫所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合作研究例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与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欧盟驻俄代表处、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印度 Gateway House 全球关系委员会、格鲁吉亚冲突与谈判国际中心等外国机构的合作项目。



辩论俱乐部“亚洲与欧亚”项目主任季莫费·博尔达切夫（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俄罗斯在亚太”项目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周边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维亚切斯拉夫·霍洛德科夫（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从叙事话语、外交特征、军事行动、经济实力等角度，阐释了中国的变化和对美国在发展资源、发展模式吸引力、地区领导权等方面的挤出效应。

博尔达切夫注意到中国战略特征的两方面变化。<sup>①</sup>首先，中国正在成为苏联解体后第一个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源的替代性来源。其标志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已经从几年前一项旨在提高货物流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转变为一项旨在解决全人类发展问题的国际互动形式（这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以及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的表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曾经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亚非拉国家，有了丝路基金这一替代选项。与苏联曾经试图提供的残缺封闭且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资源不同，中国是在与西方同一空间中，提供了一个开放透明的市场经济选项。这直接稀释了西方国家的金融权力，降低了它们的地位。其次，中国传统上以双边形式解决外交问题的模式，正在向多边形式转换。中国试图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多边机制，并愈加积极地讨论军事问题。而这原本是美国及其盟友做的事情。由于美国在多边机制中力有不逮，因此它试图阻止多边机制的建立<sup>②</sup>，使中国、俄罗斯或印度等在地缘机制构建和运行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处于一种战略孤立状态。

加布耶夫认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推动力之一，首先是中国转型为国力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大国所带来的北京在国际舞台上愈加自信的行为，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投资、中国跨国企业的全球扩张，以及在吉布提驻军和作为海军据点的南海人工岛的修建。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军事、

---

①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Получится ли у Китая стать глобальным лидером? 02.05.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oluchitsya-li-u-kitaya/>

② 该观点与我国学者的分析较为一致。可参阅李括：“美国‘退出主义’与霸权的迷惘”，《文汇报》，2018年11月13日，第6版，[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8-11/13/content\\_719859.html](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8-11/13/content_719859.html)

政治、技术领域的量变已经发生质变，强大的中国已不能再被当作一个发展中大国来看待了。北京在东亚挤出美国并维护军事政治主导权的目标，变得日益明显。<sup>①</sup>

霍洛德科夫则强调，<sup>②</sup>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超过或接近美国，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产生了挤出效应。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不只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上，还体现在以减贫为代表的社会维度上，这吸引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剧了社会和财富的不平等，以及中产阶级的缩小。

对于美国遭受到的挤出效应，霍洛德科夫形象地比喻道：华盛顿的地缘政治架构在中国文明的强力阻击下已经崩塌，就像数千年前匈奴人遭遇中国长城一样。总之，与中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者直接相关，中国的上述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挤出效应，使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认为，中国国力的迅猛增长已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在 2018 年美国两党终于达成共识，在军事和技术领域遏制中国，减小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这正是中美贸易摩擦区别于一般“贸易战”（例如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战）的不同点——美国从保障国家安全的立场看待对华经贸关系。<sup>③</sup>

当然，导致中美关系尖锐化也有美国内部的动因——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一方面，特朗普在政治生涯开始以前就认为中国是美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源头，上台后其委任的政府高层也是反华议程的支持者。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世界观和性格特点，也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轨迹的重要因素。<sup>④</sup>霍洛德科夫则把这种动因的范围扩大，认为是拥有弥赛亚情结、信仰美国民族神圣

---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Большая двойка”: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ША и Китая в 2019 году. 02.01.2019. <https://www.rbc.ru/opinions/politics/02/01/2019/5c20d3ff9a7947ca00870e85>

②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ША vs КНР: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 первый этап в битве идей. 02.03.2018. <https://riss.ru/analitics/48383/>

③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ША vs КНР: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или нечто другое? 27.02.2018. <https://riss.ru/analitics/48257/>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Большая двойка”: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ША и Китая в 2019 году.

使命和生活方式优越性的美国建制派，无法接受某个国家能够超过美国<sup>①</sup>，因而产生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 （二）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作用

除了从中美自身内部找原因，还有专家从全球角度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

普里马科夫所全球科技产业政策专家伊万·达尼林（Иван Данилин）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的原因应该追溯至当代全球化的源头。<sup>②</sup>具体而言，美国作为当代全球化规范和规则的创始者，利用发展中国家新市场的开放，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减少企业成本，同时将对美国经济而言的次级部门和产业链要素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而自己只掌握最有利润的高科技和科技密集型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拥有了巨大的市场力和来自美国的许多重要的（包括一些曾经被认为没那么重要的）技术流入，而美国则逐渐“空心化”。当美国中小科技分包商和创业、生产集群一起逐渐消失时，相应的技术生态围绕着新的行业领导者在中国出现。这意味着工作岗位、专业技能、国民经济和地区发展机遇在美国的流失和在中国的增长。

虽然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美国便试图建立“没有中国参与的”贸易投资架构（TTIP 和 TPP），但新兴数字技术的诞生限制了这些政策的实际绩效。在中国大举发展从人工智能到 5G 通讯的新兴技术的情况下，就算把中国相对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纳入考量，美国领导地位丧失的情形也近在咫尺。因此，特朗普改变了原来温和舒缓的对内经济政策和对华孤立政策，转而强硬地限制中国的增长能力。可以说，从西方国家开始当代全球化进程的那一刻，便注定了今天的结局。

俄裔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安德烈·齐甘科夫（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在瓦尔代论坛撰文指出<sup>③</sup>，今天中美的贸易摩擦首先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秩序转型的持续。在此背景下，中国和美国作

---

①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ША vs КНР: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или нечто другое?

② Иван Данилин. США и Китай: война за статус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лидера. 11.06.2019.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interview/ssha-i-kitay-voyna-za-status-tekhnologicheskogo-lidera/>

③ 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Глоба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ередел: США,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10.05.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edel-ssha-kitay/>

为国际体系主要参与者的自身利益存在较大分歧：美国受到新重商主义的驱使，认为全面的国际经济开放已不再对美国有利；而中国则有能力利用全球开放促进经济成长，从而巩固已然上升的军事实力。因此，随着中美两国根据自身利益，重构金融流向、能源线路以及国际经贸盟友结构，世界正处在全球经济重新划分的起点。

纵观上述观点，几位专家都提到了“领导力”的问题，包括在东亚的军事政治领导力、科技领导力和全球经济领导力。这首先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在某些领域、地区乃至全球领导者地位的认可。其次可见他们将本次中美经贸摩擦的性质定位为领导力之争。这一定性可以看作是对中美经贸摩擦事件整体分析的逻辑起点或前提假设，将决定后续一系列动作的走向和运行。

## 二、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俄罗斯智库专家学者并未定量测算中美经贸摩擦给两国和外部世界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而侧重于分析后果和各方可能的应对策略。普里马科夫所瓦西里·米赫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еев)与谢尔盖·卢科宁(Сергей Луконин)较为全面地指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在对本国意识形态与政治架构、社会经济与军事发展、外交政策带来深远影响的同时，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多维度发展阶段。一方面，经济对峙正在走向国际化——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国际组织成员国，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其中；另一方面，对抗的领域正在从经济领域扩展至军事政治领域。<sup>①</sup>综合而言，俄国各方专家更倾向于认为，贸易摩擦势必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造成负面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对于中国的正面意义则在于，对科技发展和国内改革的促进和倒逼作用。

### (一) 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应对

#### 1. 负面影响与正面回击的可能性

米赫耶夫和卢科宁认为，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生存潜力”仍非常强；另一方面，若美

---

<sup>①</sup> Василий Михеев, Сергей Луконин. Китай-США: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ость “Торговой Войны”//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9. Том 63. No.5. С.57-66.

国继续保持强硬的限制路线，包括设置关税壁垒、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新技术，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将遭受巨大损失。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卫星-资本管理”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洛谢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осев），从国际经贸操作角度列举出中国可以采取的五种经济反制措施及其可能性。<sup>①</sup>（1）集中抛售美债。若中国抛售1.13万亿（美元）美债，那将引起美国国债收益率增长，货币市场利率提高，从而对美国经济的国家预算、家庭收支和证券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利率上涨将导致美元对世界大多数货币升值，利差交易会由此增多，资本将流向美国，美国贸易赤字将进一步扩大。（2）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中国最简单的回应是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从而提高中国公司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的竞争优势，部分补偿中国从美国提高关税中受到的损失。（3）放弃购买美国国债。逐渐降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提高国债收益率，而由于美国GDP中78%为服务业，其中包括金融业，中国停止向美国经济注资，这对美国是一项严重和消极的报复性措施。（4）在欧洲和日本寻找替代部件，减少用美元结算国际商品：这种做法可以减少对美国部件和设备的依赖性。（5）对美国企业关闭中国市场。无法进入中国市场，首先意味着美国公司将丧失巨大的销售额。其次，如果美国公司无法显示出高增速，那么它们在证券市场也将一蹶不振。此外，对于未能及时将生产转移到本土或其他地区的美国企业而言，丧失在中国生产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就算将生产线移出中国，但生产能力不可能快速替换，在与欧洲公司和日本公司的竞争中，美国公司将遭遇份额缩水和竞争力下降。

洛谢夫认为，中国不会采取第一种措施，因为中国与美国经济相互勾连，中国需要用美元结算能源、资源及其配套设备，中国央行务必掌握相当多的美元流动资产储备，以维护对外经济活动。此外，来自美国的贸易战和经济限制能够引起中国市场的资本集中外流，从而破坏中国的金融稳定，增加大面积违约的风险。对中国最危险的是投资活跃度减弱，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

<sup>①</sup> Александр Лосев. США vs Китай: финансовый театр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24.05.2019. <http://ru.valdaicclub.com/a/highlights/ssha-vs-kitay-finansovyy-teatr/>

40-45%来自资本投资和技术投资。外资的可能流出，需要以某种形式加以补偿，同时维护中国公司的美元债务，因此中国当下必须拥有相当多的美元储备。

中国采取第二种货币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为首先要防止资本外流；其次对中国生产商而言，这将提高进口部件的价格，进而使终端产品成本上涨，损害产品竞争力。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中国大约 20%的附加值来自进口部件，因此人民币贬值很可能不会补偿生产费用的增加。

洛谢夫认为中国能够采取的较为温和的、长期有效的反制措施，可能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方式。即，不再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将从美国进口部件和设备改为从欧洲和日本进口，并用欧元和日元结算。能源商品则用输出国本币和人民币进行结算，从而降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提高对人民币和欧元的需求。洛谢夫认为，俄罗斯可以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因为俄罗斯同样正遭遇来自美国的地缘经济压力。但洛谢夫也承认，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元霸权的问题，因为中国暂时没有能力为世界提供自己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WTO 等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替代性方案。

第五种方式虽然是中国最有力的报复措施，但事态恶化将使美国证券市场遭遇暴跌。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抛售的冲击波将在大多数股票平台和国家蔓延，债务市场的不稳定将对大多数经济体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从而引起全球经济危机。洛谢夫担忧，中美经贸摩擦会在全球金融领域形成战场，因此他希望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中国还能有些别出心裁的办法，能够在不伤及世界经济的前提下收到成效。

## 2. “新韬光养晦”：贸易摩擦的积极意义

与洛谢夫的担忧相反，另外四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一个几乎相同的结论——中国不会在经贸领域进行正面报复，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坚定了发展科技实力、争取科技独立的决心。

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瓦尔代俱乐部两大智库同时担任项目主管的伊万·季莫费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他在分析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

制裁时表示<sup>①</sup>，无论是因为官方语境下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政策，还是出于对美国自身信息和通信技术保护的考量，这种限制在战术上的确重伤了华为公司。但华为毕竟只是一家公司而非国家，公司的关切在于尽快使商业关系正常化，因而有很大的可能会为了解决冲突而满足美国的要求。但从战略角度看，最大的输家其实是美国公司和全球化模式，因为中国不会因此而与美国展开正面冲突，中国的回应将是更加坚定不移地增强自己的科技实力和技术独立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种决心和行动是不可逆转的，其结果便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和项目中的比重会逐渐减少。因此，短期而言，中国与美国仍将在贸易摩擦范围内表达立场与态度，同时避免发生过激的经贸战。

普里马科夫所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洛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在其《论新持久战》一文中指出<sup>②</sup>，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不会使中国放弃在高科技领域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雄心。外部刺激加快清扫了中国舆论空间里的狂言、傲慢和奏捷主义。但回归一种务实和客观的自我评价，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竞争世界领导地位的失败。长期而言，这将更加巩固而非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在当下阶段，中国的目标并不是使美国遭受对称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要在制裁压力下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在6.5%-7%，并获得下个十年里的科技领导地位。

达尼林同样认为，中国不会在贸易投资领域进行对称或不对称的报复性措施，中国将把注意力放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等领域。中国将循序渐进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保障市场和国家政策的巨大灵活性，同时建立创新经济制度与主体。达尼林尤其提到，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能力规划几十年发展并自我实现的国家。当前新形势下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到管控变革的新技能和新方法。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过这样的经验，甚至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韩国和日本，也无法完全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发

---

①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От давления на Huawei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изнес проиграет. 01.06.2019.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t-davleniya-na-huawei-amerikanskiy-biznes-proigraet/>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О новой затяжной войне. 14.08.2018.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novoy-zatyazhnoy-voyne/>

展路径。因此中国正处于发展的转折点，只有到 2030 年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是否成功完成了创新制度化和科技变革。<sup>①</sup>

此外，霍洛德科夫将当下中国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苏联做比较。他回忆起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等科技突破的喜悦，使苏联全社会充满难以形容的热情和对科学知识的渴望：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等技术学校的招生委员会，挤满了有志于成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学生。霍洛德科夫认为，中国当下所拥有的科技发展热潮是美国无法阻挡的，唯一能使中国停下来的是在政治场域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但他仍然认为，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健全的思想，抵御“新思想”和“政治转型”的美丽童话。<sup>②</sup>

## （二）对美国的影响及其应对

俄罗斯工商业联盟主席亚历山大·绍欣（Александр Шохин）认为<sup>③</sup>，因为中国对世界GDP增长和市场稳定的影响巨大，美国在与中国贸易战升级的过程中，自身有遭遇“内伤”并被卷入全球经济衰退的危险。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刊登了几位美国学者的文章，从美国角度分析了贸易摩擦的走势，几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可以归纳为：战术上，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不利于特朗普 2020 年总统竞选，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的支持，这两方面因素会使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停止贸易摩擦。但从战略上，中美两国的根本分歧仍会持续。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阿兰·卡弗鲁尼（Alan Cafruny）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都认为，特朗普有强烈的“停战”动机。<sup>④</sup>从产业链角度，复杂的全球产业链导致许多美国产业依赖中国零部件。若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则美国生产厂商的成本将会增加，美国公司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贸易战越持续，美国生产商越会

---

① Иван Данилин. США и Китай: война за статус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лидера.

②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могут ли США санкциями затормозить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й рынок Китая. 25.08.2017. <https://riss.ru/analitics/43260/>

③ Александр Шохин. Торговые войны заставляют задуматься над отменой санкций. 21.05.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orgovye-voyny-otmena/>

④ Алан Кафруни. США, Китай, ЕС: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бифуркация. 23.01.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sha-kitay-es/#masha\\_6=1:47,1:47](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sha-kitay-es/#masha_6=1:47,1:47)



把生产转移出去，以降低成本。这反倒与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背道而驰。同时，加征关税还将使商品价格上涨，从而损害美国国内消费者的利益。

从投资角度看，加征关税的后果将使美国证券市场下跌。特朗普曾对其总统任期第一年美国股市的上涨感到骄傲，当 2018 年市场回落时，特朗普曾萌生出停止贸易战的想法以重振美股。由于共和党 and 特朗普本人依赖资本助其总统竞选，因此，如果贸易战持续使资本受损，他恐怕会失去资本的支持。美国问题专家、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митрий Сулов），在论及美俄关系时也持相同的看法。<sup>①</sup>即 2020 年前，特朗普政府内政工作和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做受其关键选民欢迎的事情，这才有了在美墨边境建墙坚持、对盟友蛮横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对中国的贸易战。

而从外交角度，拉赫曼观察到，当五角大楼和大多数对外政策机关视中国为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者时，较之前任总统，特朗普个人在军事领域并未表现出很强的进攻性。特朗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几乎所有强硬的公开表态，都出自特朗普委任的政府高官，而非特朗普本人。这是因为特朗普明白中国在朝鲜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了使朝鲜问题和平地、有利于美国地解决，特朗普需要中方的协助。因此，拉赫曼认为，国际政治将作为杠杆使中美在经贸领域达成对中国有利的协议。<sup>②</sup>

但卡弗鲁尼认为，尽管如此，仍存在许多无法解决的战略问题——首先是带有经济和军事后果的技术转移。当美国企业界愈加意识到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时，会逐渐同意国会两院、国防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中的对华鹰派的做法。<sup>③</sup>这和前述几位从中国角度分析贸易摩擦的专家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达尼林和季莫费耶夫也都认为，华为问题只是特朗普大蓝图中的小计划。中国公司对美国规定的妥协，不会打消华盛顿最大化地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

---

① Дмитрий Сулов. Доклад Мюллера продлевает патовую ситуацию, а не устраняет её. 01.04.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doklad-myullera-done/>

② Ричард Лахманн. Прекратит ли Трамп торговую войну с Китаем? 31.01.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ramp-voyna-s-kitaem/>

③ Алан Кафруни. США, Китай, ЕС: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бифуркация.

### （三）对世界的影响

卡弗鲁尼认为，美国政府同时将对中东欧的北约盟友施加压力，以支持自己的对华遏制战略。欧盟已经开始限制战略性经济部门里中国公司对欧洲公司的收购，美墨加协议也明确地禁止其成员与“非市场经济体”（即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sup>①</sup>因此，全球分流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齐甘科夫指出<sup>②</sup>，在经济领域，中国会在丝绸之路沿线、北极海路、俄罗斯能源资源、近东和委内瑞拉及亚洲的投资项目，以及非洲、拉美和欧洲等等这些对北京有利的地缘经济架构中，继续利用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渐建立起来的开放机遇。中国不仅会成为全球开放的旗手，还将继续对抗美国的大国民族主义。这意味着，中美一方面会向对方部分开放自己的市场（即使不会回到曾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双边的政治矛盾势必会更加尖锐。因此，开放的趋势仍将存续，但将在更加有限的地缘经济空间中。全球范围内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提高。

#### 1. 亚洲区域内的新两极结构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政治学家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2018年6月撰文表示，亚洲区域内国际关系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组因素。一是中国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二是地区发展中的合作与冲突势头孰强孰弱。以这两组因素为二维坐标，未来亚洲国际关系有四种可能的情景：（1）“华盛顿共识 2.0”：此种情景的前提，是特朗普政府成功地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现状，减缓甚至暂停对美不利的中美力量对比变化；（2）“中印轴心”：此种情景下，美国没有遏制住中国经济、科技、军事战略和政治实力的全面增强；（3）多极均势：美国霸权依然如故，但亚洲的军事政治局势尖锐化；（4）新型两极结构：即中国实力增强，同时亚洲社会经济与军事政治的稳定性减弱（见图1）。<sup>③</sup>其他俄罗斯专家并没有如此细化地分析亚洲国际关系的可能情景，

---

① Алан Кафруни. США, Китай, ЕС: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бифуркация.

② 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Глоба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ередел: США,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10.05.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edel-ssha-kitay/>

③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Китай и США в Азии: четыре сценария на будущее. 08.06.2018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kitay-i-ssha-v-azii-chetyre-stsenariya-na-budushchee/>

而在局势不断演进的 2019 年，他们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地区和世界影响的分析，更趋近于科尔图诺夫的第四种情景——新两极结构。

从技术层面来看，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卡弗鲁尼和洛马诺夫都认为，美国公司将逐渐把自己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但洛马诺夫强调，鉴于东盟内部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这一体量上有限的好处其实无法在东盟国家之间平均分配，反而会因为地区国家选边站而导致发展领域的紧张关系。不同于 20 世纪的冷战，这次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抉择，而是在美国设备供应商还是中国设备供应商之间做选择。在西方放弃曾经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将处在一种非常不习惯的情境中，保持中立、包容、多极的原则将愈加困难。因此，保持和增加东南亚经济一体化领域的成就将变得十分困难，中美争端对地区的经济影响是消极的。<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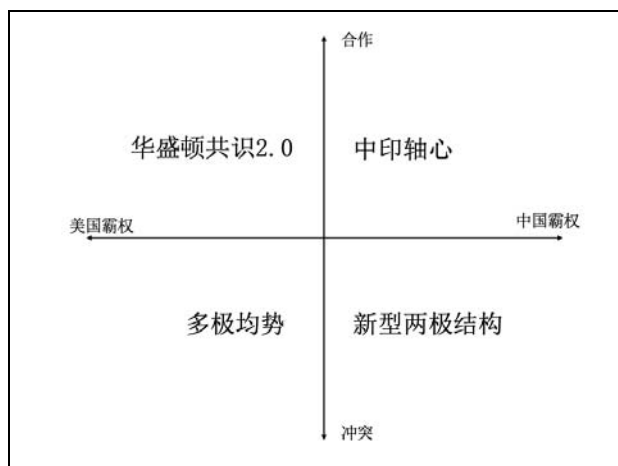


图 1 亚洲国际关系的可能情景

图片来源：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Китай и США в Азии: четыре сценария на будущее.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区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烈·古宾（Андрей Губин），也持相同观点，即中美紧张关系的增长可能破

<sup>①</sup>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Евразии на фон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25.02.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otrudnichestvo-v-evrazii/>

坏“东盟+”的工作机制，不仅对经贸议程产生负面影响，也将损害地区安全。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莱、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都愿意同时加入RCEP和TPP两个一体化联盟。大多数亚洲国家不愿意在中美对抗中选边站，而更愿意采取平衡战术，通过与两个世界经济领导者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sup>①</sup>

除了东南亚国家以外，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尤利娅·克里亚奇金娜（Юлия Крячкина）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使中日关系转好。尽管两国的历史问题仍未解决，但中国出于加强自身地位以及与美国对抗的目的，日本为了支持其可接纳的地区规则并对冲与特朗普政策相关的风险，中日会关注相互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且主要的合作平台将在东南亚地区。<sup>②</sup>韩国同样会非常谨慎地对待美国对中国在东北亚影响力的遏制，并更加希望在“两团火焰”之间保持平衡。<sup>③</sup>

纵观俄罗斯专家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亚洲影响的分析，“平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正如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所说，如果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资源的替代性来源，和制衡美国的多边机制建立者，那么世界将逐渐形成两个稳定的力量极。中小国家将可以选择向哪一极靠近，而大国——如俄罗斯、印度和欧洲，将平衡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以维护相对的国际稳定。<sup>④</sup>

当然，科尔图诺夫也指出，相较 20 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今天亚洲区域内的两极结构，会在其他国家观望、选择、平衡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不稳定，从而也没那么危险。<sup>⑤</sup>

## 2. 对俄罗斯的影响及其应对

俄罗斯专家学者将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概括为直接经济影响和间接政治影响，认为中美适度摩擦有利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俄罗

---

① Андрей Губин. Рост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между США и КНР грозит нарушить работу механизма АСЕАН. 11.06.2019. <https://riss.ru/analitics/60264/>

② Юлия Крячкина. «Новая эра»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06.11.2018. <https://riss.ru/analitics/55088/>

③ Роман Лобов. Вашингтон и Сеул: проверка альянса на прочность? 04.02.2019. <https://riss.ru/analitics/57608/>

④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Получится ли у Китая стать глобальным лидером? 02.05.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oluchitsya-li-u-kitaya/>

⑤ Андрей Коргунов. Китай и США в Азии: четыре сценария на будущее.

斯学者的一致观点是，无论如何，俄罗斯应谨慎地进行政策选择，经济上继续与中国合作，而在对外政策上保持机动性。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Алексей Маслов）指出，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比例达到 35%（因为人民币有 5% 的较高收益率，而美元只有 0.49%），一旦美国对中国进行金融打击，俄罗斯可能因此遭受金融风险。<sup>①</sup>

中美贸易摩擦还将通过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对俄罗斯产生间接影响。洛马诺夫认为，如果美国印太战略继续推进，将带来美国向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那么东盟国家则将在未来处在今天欧洲的地位。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将是，东盟很有可能在未来扮演反俄政策工具的角色。在外部力量试图将区域经济分裂为两个阵营的背景下，加强建立共同的欧亚经济空间对于俄罗斯和东盟具有重要性和现实性。因此，俄罗斯应矢志不渝地反对使用经济合作作为政治压力的杠杆，继续推动大欧亚一体化倡议，维护欧亚经济发展的一致性。<sup>②</sup>

除了上述两点负面影响以外，其他俄罗斯专家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俄罗斯的影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齐甘科夫与霍洛德科夫不约而同地提到“中美国”这一概念，并认为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反面，“中美国”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sup>③</sup>，“中美国”的失败对俄罗斯而言是好事。<sup>④</sup>

乐观的同时也有谨慎。齐甘科夫认为，对俄罗斯最为有利的环境，并不是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尖锐化，而是中美保持较远的距离。因为中美关系尖锐化，会把处于脆弱经济地位的俄罗斯，置于一个夹在两大国中间复杂选择的境地。因此，俄罗斯的利益要求它保持地缘政治和时间的机动性，它要做的是，既要加深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又要保持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联系。

---

① Маслов: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Китая и США сказывается также на России. 13.05.2019. <https://planet-today.ru/geopolitika/item/104630-maslov-torgovaya-vojna-kitaya-i-ssha-skazyvaetsya-takzhe-na-rossii>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Евразии на фон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25.02.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otrudnichestvo-v-evrazii/>

③ 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Глоба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ередел: США,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10.05.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edel-ssha-kitay/>

④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ША vs КНР: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или нечто другое? 27.02.2018. <https://riss.ru/analitics/48257/>

达尼林认为，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没有哪一种情景是对俄罗斯有明确利益或零风险的，与美国发生额外冲突或与中国发生冲突，都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俄罗斯要理性地考量自己的能力，清楚地确定自己在当下极为复杂的情形中的利益和机遇。俄罗斯应该利用与中国科技合作的机遇，但同时也要避免与美国产生摩擦，缓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技术限制，不能小视美国的制裁和其他限制能力。俄罗斯比较讨巧的做法，是与欧盟保持同步，因为欧盟中很多国家能够清醒地评估形势，比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了解贸易战后果的严重性。<sup>①</sup>

霍洛德科夫则认为，由于特朗普政府已将俄罗斯和中国放在美国的同一个对立面（虽然俄罗斯更多是军事政治安全威胁），与中国的互动，对俄罗斯而言，预示着广泛的机遇。因此，俄罗斯要放弃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而积极采纳中国的经济经验。<sup>②</sup>

####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势**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势，已在中美各自应对部分有所涉及，即中国不会与美国展开正面冲突，而是更加专注科技实力的提升和国内改革；美国方面则以特朗普 2020 年竞选连任为第一要务，摒除一切可能影响连任的不利因素，包括贸易摩擦对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双方势必将达成贸易“停战”，但双方战略上的根本分歧仍会持续，正如加布耶夫所说，和平条约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对抗的终点，而只是进入更残酷战争的序幕。<sup>③</sup>

霍洛德科夫也敏锐地观察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铁铝施加关税所依据的《1962 年贸易扩展法》，出台于美苏冷战正酣之时。该法案的目的，是通过限制来自苏联阵营的货物供应，保护国家安全。今天的美国要对铁铝供应国排名十名开外的中国施加高关税，标志着美国对华认知已进入了冷战模式；而特朗普 2018 年 1 月 30 日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则是丘吉尔在美国

---

① Иван Данилин. США и Китай: война за статус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лидера.

②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ША vs КНР: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 первый этап в битве идей. 02.03.2018. <https://riss.ru/analitics/48383/>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Мир как пролог к войне. 15.03.2019.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909517>

富尔顿著名的铁幕演说的翻版。<sup>①</sup>

此外，达尼林从科技角度评估，认为美国仍在相当广泛的领域是全球技术和创新的领导者。中国的研发水平仍远落后于美国，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生产和其他重要的知识经济产品，仍然初生在美国。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要转变为创新领导者，将是一个长周期、高成本的复杂过程。对中国而言，除了 GDP 增速“新常态”（6%–7%）和其他内部因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于中国是严峻的挑战。同时，中美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互依赖水平，中国暂时无法保证整个技术系统完全进口替代，美国也依赖来自中国的各种工业产品和资本供应。因此，现在无法确定谁将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竞争中胜出，况且这一轮竞争会持续甚至超过 2020 年代。能够确定的是，对抗对中国和美国都是有害的。只有两国内部均出现强有力的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利益集团时，双方才能够达到某种形式的均衡。

### 三、大国博弈：俄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研究的现实主义映像

俄罗斯智库界对中美经贸摩擦成因的研究，在单元和体系两个层次上可以归属古典现实派和结构现实派两种观点。古典现实派聚焦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内部互动，认为是中国在地缘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以及特朗普上台带来的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加速到来。结构现实派则强调全球产业链结构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转型，决定了中美经贸及衍生领域竞争的必然性。

俄罗斯智库专家学者着墨最多的是对“影响”的分析。与其说俄罗斯在乎中美摩擦是怎么来的，不如说它更在意中美摩擦会对两国自身、地区、世界，以及深嵌在国际事务和国家间关系中的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各种分析基本上可以归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民族主义范畴，即中国和美国在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超越了经济利益本身而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例如，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可能会受损，虽然会与美国达成妥协，但倾举国之力发展高科技的决心会更加坚决；特朗普政府也会为了 2020 年总统大选和地缘政

---

<sup>①</sup> Вячеслав Холодков. США vs КНР: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 первый этап в битве идей.

治因素而缓和对华关系，但两国政治经济的竞争甚至对抗的势头不会停止。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外部国家，也会在中美之间按照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权衡定计。

俄罗斯智库各方专家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和政策主张，并无根本性分歧，更多的是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和对未来走势的普遍共识——中美经贸摩擦标志着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已经成型，且摩擦和竞争将从经贸领域外溢至其他领域；俄罗斯应保持战略机动与平衡，既要加深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又要避免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生更大冲突。

总体而言，俄罗斯智库界基本遵循着国际关系古典现实主义范式。这表现在诸位专家学者并不回避“贸易战”（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的提法，以及他们对事件成因（中国对美国在地区领导力、发展模式吸引力等方面的挤出效应）、影响（在亚洲形成分庭抗礼的两极结构）和未来走势（中美战略分歧和对抗的持续）的分析与归纳之中。其逻辑是经典的修昔底德式的大国博弈观点，即中国权力的增长和中美均势的变化，引起了美国对丧失地区和全球优势地位的忧虑，从而导致美国发起对华关税摩擦和技术遏制；中国出于同样的原因采取类似措施。威慑、科技竞赛、地缘政治经济结盟、树立威望等等措施，随即在两国之间展开。

这符合俄罗斯外交政策分析和战略界对国际关系冲突性的基本认知和理论方法，即在世界其他很多业内同行不断尝试探索新的理论范式时，“俄罗斯学派”大多仍旧是侧重大国博弈的古典现实主义的拥趸。如果说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主要范式，是因为它更好地解释了战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那么，拥有冷战遗产继承者身份的俄罗斯当代专家学者以现实主义视角观察中美经贸摩擦便是自然。在他们看来，冷战时代的权力政治一直在持续，中美之间发生的仍旧是大国对权力的宣示、维护与竞逐。

然而，俄罗斯智库界在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下的分析，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前提假设方面存在局限性，且具有一定的代际特征。

首先，大多数俄罗斯专家学者将国家作为主要的和统一的分析单位，将两国的国际摩擦与国内政治分离，并未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嬗变来观察中美国家间关系的演变。只有老一辈学者如米赫耶夫、洛马诺夫、霍洛德



科夫等人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给予关注，并强调中美摩擦的胜负手是中国的发展与改革能力。而如博尔达切夫、加布耶夫等年轻学者，则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动态。相较之下，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切入点更加精准和深刻。因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成因和影响，根本上产生并作用于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米赫耶夫和卢科宁对中国国内政治变迁，以及前述洛马诺夫对中国国内舆论转向的敏锐察觉，是个中亮点，体现出外国专家对研究对象国的了解和洞察。

同时，俄罗斯专家学者更加关注中美经贸摩擦在亚洲区域内而非全球范围的发酵和溢出，换言之，他们对事件“影响”和“前景”的研究，限定在亚洲区域之内。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在这里表现出的重要话语特征——鲜有“全球两极格局”等类似提法；尽管“新冷战”、“全球分流”等诸多类似含意的表达，在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界已大量涌现。在本文考察的一系列材料中，仅有的表述要么来自美国学者卡弗鲁尼一人，要么是更多俄罗斯专家所说的“亚洲区域内”的两极结构，而非全球两极格局。但另一方面，多位专家又都在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下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对全球领导权的竞争，已经超出了亚洲区域范畴，但他们又对“全球两极结构”避而不提。这一矛盾从侧面证明了俄罗斯智库和国家对当下国际格局的主观认定，即，不认同全球两极格局的形成或存在，而强调多极或多中心结构，从而维护或避免（俄罗斯）失去世界性大国地位的话语。

其次，如上所述，所有俄罗斯专家学者都不回避“贸易战”的提法。虽然这种表达可能约定俗成或简单明快，但这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提法，同样是以古典现实主义权力争夺与对抗逻辑为前提假设的。然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一方面不能狭隘地用输赢简单化地评判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另一方面，敌对的眼光并不利于理性的学术思考，反而会陷入政策分析的狭圈。同时，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会使决策者忽视利益协调与合作的一面，甚至导致对运用军事实力推进利益的过分强调，以及对彼此威胁的误判。<sup>①</sup>

---

<sup>①</sup> Michael J. Mazarr, “This is not a great-power competition: Why the Term Doesn’t capture today’s reality”, 29.05.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5-29/not-great-power-competition>

#### 四、俄罗斯“双层均势”战略与中美俄三边互动的亚洲时刻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现实主义评估，不仅是对现实的归纳，同样也是基于俄罗斯自身利益的演绎。换言之，若中美关系按照古典现实主义逻辑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中长期，国际关系发展轨迹将向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 （一）俄罗斯智库对中美关系研究的基本背景与政策建议

俄罗斯清楚地明白，其国家发展正处在三个不利的外部条件叠加之中。一是“俄-西方”关系矛盾，具体体现在认同意义上对俄罗斯国内进程和对外政策的负面认知，和地缘政治意义上对俄制裁的常态化。二是中俄互动表现出的明确界限，即经济和军事技术合作仍将保持，但在政治上，与其说彼此会为对方利益牺牲对美关系，不如说双方都会利用对方的存在加强自己同美国的谈判地位。三是中国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将使中美关系占据世界政治的主导地位，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将逐渐限制俄罗斯在传统领域的领导地位。<sup>①</sup>

与此同时，以俄美退出“中导条约”为标志的俄美军事政治矛盾，以中美经贸摩擦为标志的中美经济政治矛盾，两组大国竞争一方面将导致全球性，尤其是国际安全领域负面因素的累积（区域战争、恐怖主义、核安全等），另一方面意味着中美俄三边互动空间的僵化，单纯三角制衡的有效性减弱。

在上述一系列背景下，俄罗斯智库提出了基于俄罗斯利益的务实主义建议——既消极批评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对世界的不良影响，又在中美之间寻求均衡和机动（这与克里姆林宫的意志较为一致<sup>②</sup>），并要跳出中美双边

---

① 这是普里马科夫所对俄罗斯所处外部环境的剖析。可参阅[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登金主编：《2035年的世界：全球预测》，杨成、华盾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223页。

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世界”国际电视台采访时说，“今天俄中关系对于我们两国和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我这样说没有任何夸张……理性地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干预（中美）谈判进程。但是，这个‘但是’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确前所未有地处在较好较高的水平上，我们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战略伙伴。我们同情我们的战略伙伴一方，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深深地相信，任何破坏现存国际经济关系的行为，都将给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带来损失。我希望我们和所有的伙伴，包括美国，在曾经的G20框架下，能够找到某种建设性的、为经济合作建立必需稳

或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辖制，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推进俄罗斯的政策主张。正如洛马诺夫所说，俄罗斯将继续大力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等既成概念，探索和深化与周边世界的政治经济互动，参与制定积极的区域主义战略，构建新的世界结构和全球化制度。<sup>①</sup>

## （二）俄罗斯的全球与亚太区域均势战略

俄罗斯智库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政策立场，体现出俄罗斯在全球和亚太区域两个层次上的“双层均势”策略。均势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政策指南，其目的是在国家间进行适度调节，制约霸权国的能力。<sup>②</sup>俄罗斯的目标则是防止中国和美国建立地区或世界霸权，其手段是分而治之，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表达对中国的支持，从而在全球层面与中国一道制衡美国。而在亚洲（欧亚或东亚），俄罗斯试图利用中美矛盾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制约中国的权力投放。俄罗斯在中美之间寻求均衡与机动的政策立场，正是其在全球均势与地区均势之间的张力下找到的政策平衡点。

换言之，俄罗斯的目标是在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濒临崩溃的情景（假设）下，成为一个“公正和警觉”的均势维持者，分别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制约美国与中国的实力，限制冲突范围。<sup>③</sup>事实上，早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便已做出了中美竞争背景下俄罗斯作为战略平衡手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只是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基本面，推迟了该进程的到来。<sup>④</sup>因此，如果说2014年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被迫加速“向东看”战略，那么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及衍生领域摩擦的显著增强，则为俄罗斯继续该战略增添了主动力。直言之，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美国与欧洲，其中的任何一组双边关系走近，

---

定条件的解决方案。” Интервью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елерадиокомпании «Мир». 13.06.2019.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741>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Евразии на фон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25.02.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otrudnichestvo-v-evrazii/>

② 均势概念存在多种含义、目标和方法。参阅[美]多尔蒂、[美]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第44-45页。

③ 同上，第45页。

④ 杨成：“俄罗斯版‘亚太再平衡’战略提速”，《半月谈》，2015年4月22日，<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sz/hqkd/2015422/132342.shtml>

都不利于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俄罗斯均势战略的实质，除了抗衡霸权国以外，还要在欧亚大陆成为一枚楔子，阻隔或分离任何一组强有力的双边关系。这也是俄罗斯智库专家学者乐见“中美国”失败的原因。

### （三）中美俄三边关系死锁与竞合新模式

俄罗斯扮演均势维持者的场景，并非在单纯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内部，而是在亚洲区域内还有其他国家行为体参与的情况之下。因为，鉴于中美、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中俄关系的有限性，理想中（或理论上）的三边制衡机制几近失效。大数据分析显示，后冷战时代中美俄三边互动的特征包括：（1）中俄相互鼓励对方对美国采取强硬政策；（2）中俄在对美行动上具有协同机制，即俄罗斯的对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跟从中国的对美行为，且中国会在美国对俄合作（冲突）时进行奖励（惩罚）予以俄罗斯报偿。<sup>①</sup>换言之，若俄美关系无法好转，中美关系便无法缓和，反之亦然。因此，单纯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已经处在死锁状态之中，即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弹性空间都极其有限，无法触发另外两组双边或整体三边关系进程。若无外力作用，该三边关系和其中任意一组双边关系，都将被阻塞在当下状态。其可能的后果有二。一是中国和俄罗斯分别被美国在金融、科技（知识）和军事领域的结构性霸权钳制在当下状态。二是中俄结盟。但由于中俄建立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关系基本原则，对俄罗斯而言（对中国亦然），只有在亚太多边体系下调动更多动态资源，才能盘活已然僵化的三边关系。

因此，在未来中长期里，俄罗斯的重点将是在亚太地区寻求建设性的国际合作道路。这一东方维度不只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互动的战略备选项，更是其突破中美俄三边关系枷锁、扭转不利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并在长远未来成为世界秩序新规则制定者的必选项，其目标除了维护前述双层均势以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跟随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将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等多方面的战略重心，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的亚洲（欧亚或亚太）；同时在俄欧关系或早或迟复苏之时，达到东西双头外交的总体平衡。这也是某些俄官

---

<sup>①</sup>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72页。

方人士眼中的俄罗斯“转向东方”政策的实质。<sup>①</sup>

其次，具体而言，在国际安全领域，若中美对抗性增强、全球不稳定因素累积，俄罗斯作为传统军事政治强权国家，其地位和作用反而会借势增强。共同的安全利益将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俄罗斯与包括中美在内的亚太国家的合作关系，这甚至可以发生在俄罗斯没有调整对欧关系的情况下。

第三，在区域经济和创新发展领域，中美对抗将催生亚洲其他国家对新型经济联盟或一体化平台等多边经济治理模式的强烈诉求，因此俄罗斯通过其欧亚一体化倡议，有机会加入新型区域主义经济制度的构建之中。

比较之下，在毗邻欧盟的后苏联空间中，俄罗斯欧亚区域主义广泛地包含微观的经济一体化目标（共同经济空间）、中层的政治动机（与欧盟平等对话），甚至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因素（新帝国）。<sup>②</sup>而在面向太平洋的亚太地区，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为了促进其东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国际政治考虑。即，无论是在安全抑或经济领域，介入亚太事务都将使俄罗斯跳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在后苏联空间和“欧洲-大西洋”空间之外的另一个平台上，与中国和美国相遇，获得额外的与中美对话的政治经济地位，促进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

**【 Abstract 】** Russian think tanks have a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o official stances of the Kremlin. Behind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for military,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adership. As a result, the domestic agenda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will be profoundly affected and spillover effects will emerge: forming a bipolar structure in the

---

① 刘惠：“普京前顾问卡拉加诺夫：俄已部署武器可确保 15 年和平”，《澎湃新闻》，2019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the 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03310](https://www.the 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03310)；[俄]德米特里·索洛维伊：“战略文化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与意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28 页。

② Piotr Dutkiewicz, Richard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 the view from withi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3-13

Asian region. Even if these two countries will reach a compromise on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due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China will not give up its ambitions to gain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ership, nor will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its strategic intention to curb China's momentum for development. Russia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void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promoting the "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initiativ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ased on the deduction of their own interests, Russian policy analysts defin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s a game of great power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flect Russia's double-level balancing strategy aiming at balancing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globally and regionally. Russia will play the role of a strategic balancer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verall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versing its adverse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Russia's invigorat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ll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model of bilateral and trilater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 Key Words 】**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China-Russia-U.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Russian Think Tanks, Russian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ов уникаль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торговых тр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такж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зиции Кремля. 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и торговыми трениями стоит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 сфере во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лидерства, что оказывает далеко идущ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на внутреннюю и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двух стран, а также имеет такие побочные эффекты ка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биполяр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 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Даже если две страны из-з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достигнут компромисса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торговых вопросах, Китай не откажется от своих амбиций по завоеванию мирового лидер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а США не развоя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намерение сдерживать динамику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Россия должна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Китаем, избегать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ухудш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ША и Западом, а также продвигать инициативу «Большо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сходя из сво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налитиков оценивает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трения как игру держав, их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отражают цель России по двухуровневому балансу США и Китая в Азии и мире в целом. Россия сыграет рол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баланс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частия других 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сь обще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е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изменит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ую внешнюю обстановку развития вне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Активизация Росси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приведёт к созданию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и трёхсторонне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тр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нтр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责任编辑 崔 珩)

**中东欧民粹主义****中东欧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激进化**  
——基于匈牙利青民盟的案例分析

周 超\*

**【内容提要】**提起民粹主义政党，学界的印象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地位几乎始终处于“局外人”的境地。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发地突出和引人注目。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民粹主义兴起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势力的勃兴主要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以建制派挑战者身份踏入政治舞台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无法长久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尤其是成为执政党联盟一员的民粹主义政党，其主要前景无非就是：坚持自身的挑战者立场，进而损失选票和实际支持率，最终黯然出局；或者是被主流政党的立场同化，使自身的实际立场和政策主张逐步趋近于建制派势力，软化自身的民粹主义立场。然而，通过对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持续执政至今的青民盟（FIDESZ）的分析，可以发现，类似青民盟这样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没有放弃自身的激进立场，反而提升了在大选中的支持率。将“人民与他者”的二分对立进行外化，是民粹主义政党保持自身立场和执政地位的有效战略。

**【关键词】**欧洲民粹主义 中东欧民粹主义 匈牙利青民盟 匈牙利政治 维克多·欧尔班

**【中图分类号】**D08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0119(34)

\* 周超，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博士生。



## 引言

进入新千年之后，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自中东欧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之后，由于来自欧盟层面的制约大大减弱，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力在中东欧大举增强。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一举夺得执政地位；匈牙利这个过去被认为政党体系稳固性居于中东欧之最多的国家，执政的匈牙利社会党（MSZP）政府不断被各种丑闻所困扰，在野的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FIDESZ）趁机大加挾伐。<sup>①</sup>2010年，青民盟正式取代社会党执政。如果说在2010年之前，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主要局限于中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的话，那么此后在欧洲难民危机的推动下，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欧老牌民主国家也有了不小的增强。2013年，德国选择党（AFD）在德国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2017年，法国极右政客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差一点取得最终胜利；英国独立党（UKIP）在选举中的逐渐强势，迫使执政的保守党将脱欧议题放入全民公决并最终通过，进一步撕裂了英国社会。民粹主义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推动了民粹主义研究方向的转变，部分学者开始转变态度，不再把民粹主义看作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开始认真探讨民粹主义现象稳定存在的可能性。但多数学者依然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策略上，探寻是何种策略提升了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支持率。而一旦处于执政地位，民粹主义政党将会采用何种战略保持自身执政地位和激进立场的统一？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同时，受到既有研究成果的限制，西方学者依然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现象是周期性的、短暂的，难以长久保持对整个政治系统的巨大影响。比如塔格特就提出，“民粹主义政党、运动和政治家很容易骤然兴起并暴得大名，但是要把这种强势的劲头保持下去却颇为不易。”<sup>②</sup>卡诺瓦也提出，“民粹

---

①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3-6页。

② Paul Taggart, “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4, Vol.9, No.3, pp.269-288.

主义运动就像是烟火一样，暴兴和消逝都在一瞬间。”<sup>①</sup>不过，新千年之后，基于对西欧民粹主义政治发展十余年的考察，阿尔伯特兹和麦克唐纳尔提出了相对立的观点，即认为无论是总体上的民粹主义运动，还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都逐步趋于稳定化，摆脱了过去的“周期化”特征。<sup>②</sup>

乍看起来，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周期性”现象的观点似乎处于逐渐衰退之中，但是针对民粹主义政党如何有效保持自身执政地位的策略的研究，依然相当缺乏。不过，就既有的研究而言，处于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似乎的确面临着不少挑战和困境，“执政者地位”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似乎是真实的。

所谓执政地位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学界既有的研究主要指向两类：民粹主义政党的制度化缺点（institutional weakness）和政策-意识形态的立场（policy-ideological stance）。就民粹主义政党的制度化缺点而言，汉纳什根据对奥地利自由党（Austria Freedom Party-FPÖ）在2000-2004年活动的研究指出，作为民粹主义政党，初获执政地位<sup>③</sup>之时，这些政党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有关政策制定的经历也几乎为空白；作为从政所必不可少的资源——职业官僚，民粹主义政党也十分缺乏；民粹主义政党往往处在魅力型领导的强力直接率领之下，内部的组织化程度很弱。这三大近乎是与生俱来的缺点，注定了处于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将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民粹主义政党往往难以长久保持自身的执政地位。<sup>④</sup>不过，针对汉纳什的论点，阿尔伯特兹和麦克唐纳尔做出了部分反驳，这两位学者指出，任何政党，一旦首次成为执政党或是进入执政联盟，都会面对支持率下降的问题。居于执政地位而造成的支持率下滑，并不仅仅是获得执政地位的民粹

---

① Margaret Canovan, *The Peop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89.

② Daniele Albertazzi, Duncan McDonnell, *Populists in Pow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165-166.

③ 2000年，奥地利自由党在选举中表现出色，被纳入执政联盟，严格来说只能算是参政党。但是其选举成绩和选举之后所获得的地位，在战后欧洲政治史中已属突破。不过，由于面临欧盟的压力，时任奥地利总理的沃尔夫冈·舒塞尔（Wolfgang Schüssel）采用劝说的方式，令自由党自动退出执政联盟。

④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3, Vol.26, No.3, pp.91-130.

主义政党所特有的困境。<sup>①</sup>而塔其斯·帕帕斯以及穆德和卡特沃瑟的研究指出，魅力型领袖并不是民粹主义的本质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联甚至还相当微弱。<sup>②</sup>因此，制度化水平的偏低、魅力型领袖的直接领导以及政党组织化程度的偏弱，并不仅仅为民粹主义政党所独有。结合塔其斯·帕帕斯以及阿尔伯特兹和麦克唐纳尔的观点，可以认为，汉纳什所提出的第一类执政地位的挑战，是所有新获得执政地位和联合执政地位的政党面临的共同困境，而不仅仅是民粹主义政党所独有的。

但是，第二类挑战，即政策-意识形态立场的挑战，民粹主义政党自身的特殊性就极为显著。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民粹主义政党主要是以激进反体制挑战者的身份进入政坛的。在民粹主义政党的立场和政策阐述中，既有的民主建制是被精英所垄断和操控的，人民的声音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效代表；而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人民之声和人民主权地位的体现，必须掌握政权，让政权和政府真正回到人民手中。<sup>③</sup>因此，民粹主义政党所秉持的民主观，主要是一种救赎式的民主观（*redemptive democracy*）。但是，一旦取得执政地位，民粹主义政党将不得不面临实际的民主统治需求（*practical democracy*）。在民主的救赎面和民主的实际统治面之间，存在着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一旦处于执政地位，民粹主义政党往往发现他们很难保持和兑现先前的承诺。<sup>④</sup>并且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是作为反精英、反建制的挑战者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而一旦成为执政者，他们自身就成了统治精英的一分子，开始履行统治精英的职责和功能，这种身份定位上的矛盾几乎是民粹主义政党所独有的，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应当对此多加关注。

民粹主义这种政策-意识形态以及身份定位上所固有的矛盾和冲突，必然要求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相应的策略来应对和克服，以确保所获得的执政地

---

① Daniele Albertazzi, Duncan McDonnell, *Populists in Power*, pp.167-169.

② Takis S. Pappas, "Are Populist Leaders 'Charismatic'? The Evidence from Europe", *Constellations*, 2016, Vol.23, No.3, pp.378-390; Cas Mudde(Ed.),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③ Benjamin Moffit, Simon Tormey, "Rethinking Populism: Politics, Mediatism and Political Style", *Political Studies*, 2014, Vol.62, No.2, pp.381-397; Yves Mény,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④ 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1999, Vol.47, No.1, pp.2-16.

位以及实际执政的成功。但是，学术界对此类策略的研究却依然比较单薄。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整个欧洲（西欧-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势力有了明显的增强，西方政治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是其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有效抑制乃至打压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而非深入了解其兴起的原因以及其保持甚至增强自身执政地位的策略。<sup>①</sup>

在少数关于民粹主义政党应对执政地位挑战的策略的研究中，缪勒<sup>②</sup>根据对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研究指出，为了适应并增强自身的执政地位，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和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采取的策略，就是加强对国家的控制（occupation of the state）、大规模的任人唯亲（mass clientelism），以及区别性的法律条文主义（discriminatory legalism）。<sup>③</sup>姑且不论缪勒的分析是否客观、全面，类似做法也往往被其他类型的执政党所采用，而非仅属于民粹主义政党。并且，缪勒所提出的三种策略，与执政地位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意识形态立场的挑战也没有直接关联。

彼得·斯帕什和弗拉斯提米尔·哈弗里克<sup>④</sup>通过对斯洛伐克执政党“方向-社会党（SMER）”的研究指出，在1999年成立之初，方向-社会党也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党，其本身的诉求，除了民粹主义的反建制之外并无其他。但是胜选成为执政党之后，方向-社会党根据实际的执政需求完善了自身的内部政党架构，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逐渐从纯粹的民粹主义向左翼民粹主义（left-wing populism）转变，最终转型成为社会民主党，摆脱了原先的民粹主义身份。对于斯帕什和哈弗里克的最终论断，尚存疑虑，毕竟在针对难民问题上，方向-社会党坚决反对难民配额的立场，使得其看起来

---

① Cas Mudde(Ed.),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②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p.44-49.

③ 区别性的法律条文主义，主要是指法律与正义党和青民盟利用自身的议会多数地位，通过针对政治反对派实际政治影响力的立法来对其进行打击，比如匈牙利的新媒体法和波兰的宪法法院改革。

④ Peter Spač, Vlastimil Havlík, “Overcoming the Danger of Incumbency. The Case of Smer Party in Slovakia”, 2015-8-22, ECPR Conference Paper,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bf938929-12e1-4a27-91cd-b4230e1bf112.pdf>

并不那么主流。但是两位学者提出的民粹主义政党的“主流化战略”的确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乍看起来，有时候那些暂时未获得执政地位、但处于支持率上升阶段的民粹主义政党，也会做出向主流政治靠拢的趋势，以弱化自身的极端形象（即使在此时，执政地位并未成为现实而仅仅只是更靠近了一步）。比如在 2010 年匈牙利大选中势头强劲的尤比克党（JOBBIK，“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党”），就在 2013 年公开表示要摒弃政治暴力并且与极右民间团体划清界限。<sup>①</sup>主流化策略，似乎是民粹主义政党无可避免的选择。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文通过对 2010-2018 年执政的匈牙利青民盟的政策报告和政策的分析，进而认为，为了巩固并加强自身的执政地位，民粹主义政党并不必然会选择主流化战略。相反，他们通过将民粹主义诉求中的“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中的“精英”群体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为包括欧盟等地区组织乃至全球性组织的“他者”，进而将“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外化为“人民-他者”的两分对立。处于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能够在维持自身激进民粹主义诉求的同时，巩固甚至加强自身的执政地位。通过这种外化战略（strategy of externalization），民粹主义政党能够有效克服执政地位对自身政策-意识形态立场所带来的挑战，而不必向主流政治靠拢。

## 主要概念和方法论框架

自 2010 年大选获胜以来，匈牙利青民盟已经连续两度胜选成为执政党。在 2018 年的大选中，再次胜选并且掌控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外界对 2018 年的选举结果多有诟病，在选举的结果公布之后，匈牙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sup>②</sup>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观察，匈牙利的选举在程序

---

① M.Goettig, C.Lowe, “Special Report: From Hungary, Far-right Party Spreads Ideology, Tactics”, 2014-4-9,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2014-04-09-sns-rt-us-europe-farright-special-report-20140409-story.html>

② “Election 2018---Demonstrations against election results held in Pécs, Debrecen”, *Daily News Hungary*, 2018-4-16, <https://dailynewshungary.com/election-2018-emonstrations-against-election-results-held-in-pecs-debrecen/>

和结果上的自由性无可置疑，公正性有所欠缺（free but not fair）。<sup>①</sup>自转轨以来，匈牙利青民盟毫无疑问是中东欧地区最为成功的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不仅保持了自身的执政地位，还保留了激进的民粹主义立场和诉求。而政府总理、党主席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也被学界认为是典型的魅力型领导人。<sup>②</sup>

本文中的“民粹主义”，采用莫菲特的“政治风格定义”，即“通过诉诸‘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粗鄙性风格，以及渲染‘危机，崩溃和威胁’等表演性手段，来构建政治关系的一种政治风格”<sup>③</sup>。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通过对匈牙利执政党、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sup>④</sup>在2010-2018年期间的政治话语分析，来探究处于执政地位的青民盟，是否通过将“人民-精英”之间的两分对立进一步外化，来克服来自自身执政地位的挑战；以及青民盟如何在保持激进的民粹主义诉求和立场的同时，巩固并强化自身的执政地位。

政治话语分析（PDA）的主要方法论框架，由厄内斯特·拉克劳以及马丁·依霍夫确立。<sup>⑤</sup>本文的分析主要关注三个方面：（1）在“人民-精英”两分对立中，“人民”这个群体的范围以及主要诉求的动态变迁；（2）在两分对立中，“精英”作为“人民之敌”（Public Enemy），其群体的范围以及主

---

① OSCE, “Hungary,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014-4-6 <https://www.osce.org/odihr/elections/hungary/121098?download=true>; OSCE, “Limited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Hungary-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018-4-8, <https://www.osce.org/odihr/elections/hungary/376639?download=true>

② Takis S Pappas, “Are Populist Leaders ‘Charismatic’? The Evidence from Europe”, pp. 378-390.

③ Benjamin Moffit, Simon Tormey, “Rethinking Populism: Politics, Mediatisation and Political Style”, *Political Studies*, 2014, Vol.62, No.2, pp.381-397.

④ 对于青民盟的政党分类，参见 Zsolt Enyedi, “Paternalist populism and illiberal elitism in 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16, Vol.21, No.1, pp.9-25; Hanspeter Kriesi, Takis S. Pappa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6; Emilia Palonen, “Performing the nation. The Janus-faced populist foundations of illiberalism in Hunga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18, Vol.26, No.3, pp.308-321.

⑤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Ernesto Laclau, “Populism. What’s in a Name?”, in Francisco Panizza(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5; Martin Nonhoff, “Politische Diskursanalyse als Hegemonialanalyse”, in: Martin Nonhoff(Ed.), *Diskurs – Radikale Demokratie – Hegemonie*,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7.

要的“罪行”（General Crime）的动态变化；（3）“人民-精英”二者之间的主要冲突与斗争集中点，及其在民粹主义政治话语建构中的动态变迁。综合而言，就是在外化战略中，“人民”和“精英”这两大群体各自所涵盖的范围、主要的立场诉求，以及矛盾冲突点所发生的变化。<sup>①</sup>

塔其斯·帕帕斯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民粹主义魅力型领导人所应当符合的三大条件<sup>②</sup>：在党内能够有效地集中权力控制；直接性的和魅力型的领导风格；政治激进主义。据此标准，青民盟主席维克多·欧尔班毫无疑问属于民粹主义魅力型领导人。因此，本文的文本样本来源主要是欧尔班在博依纳图什莱德<sup>③</sup>夏季学校（Băile Tușnad Summer University）开幕式上（2010-2018）的讲话，以及欧尔班本人的国情咨文。如果特定年份的文本无法获取，那么其余的关键报告将会被纳入分析，具体的文本资料参见文后附录。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匈牙利青民盟的政治话语分析，来验证如下假说：处于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将“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进一步外化为“人民-他者”的两分对立，将“精英”的范围扩大到本国以外的国际行为体（如欧盟，非政府组织等）的方式，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地位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激进民粹主义话语和立场。

同时，已有的研究已经指出，危机在民粹主义政治风格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对民粹主义强化对建制派精英的抨击乃至最终掌权，都很有帮助。<sup>④</sup>不过，莫菲特提出，对于民粹主义而言，危机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概念或事物，危机本身是民粹主义政治风格一个有机的内部构成部分；因为危机的存在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感知，民粹主义总是倾向于将社会的负面因素，通过媒体等一系列途径竭力渲染成危机，从而打击建

---

① Martin Nonhoff, *Diskurs – Radikale Demokratie – Hegemonie*,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p.186.

② Takis S. Pappas, “Are Populist Leaders ‘Charismatic’? The Evidence from Europe”, p.4.

③ 博依纳图什莱德夏季学校位于罗马尼亚境内，每年开幕式上都会有大量青民盟骨干和高层出席，党主席也是必做报告，其报告内容往往被认为是指引着青民盟此后一年的政策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④ Hay Collin, “Crisis and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Interrogat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Vol.1, No.3, pp. 317-344; Koselleck Reinhart, “Cri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6, Vol.67, No.2, pp. 357-400.

制派势力，提升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危机可成为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有力工具。而且，西方学者已经指出，2008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了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将攻击的矛头从本国的精英转向欧盟层面的精英。<sup>①</sup>笔者有理由相信，2015年欧洲的难民危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此，将危机因素纳入本文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笔者在此后的文本分析中，也会着重考察青民盟和欧尔班本人是否有突出危机因素的表述，以及青民盟的“外化战略”在青民盟的危机建构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莫菲特（Benjamin Moffit）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民粹主义政党总是倾向于建构和渲染危机，然后提出通过强人领导和简单化的方式来解决危机，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身的支持率。民粹主义政党的危机建构主要包含六个步骤<sup>②</sup>：

- （1）识别社会发展中的不足和失败；
- （2）将危机和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某种整体社会制度架构（Wilder Frame）联系起来；
- （3）建构出“人民”和“危机造成者”之间的两分对立；
- （4）通过一系列的传媒手段来渲染危机和对立；
- （5）提出通过强人领导和简单化的手段来解决危机；
- （6）持续性地宣传和渲染危机。

在本文此后的文本分析中，笔者也会按照莫菲特所提出的“六步骤模型”来分析对危机的宣传和渲染，是否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并进一步分析将对危机的关注点从国内层面上升至整个欧盟层面的过程，是否与从“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到“人民-他者”的两分对立的转化过程存在某种有机关联。

---

①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Dealing with populists in govern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Democratization*, 2016, Vol.23, No.2, p.205.

② Benjamin Moffit, “How to Perform Crisi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Key Role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4, Vol.50, No.2, pp.189-217.



## 对青民盟“国家协作体系”<sup>①</sup>的政治话语分析

本文中的文本分析资料库，主要涵盖青民盟主席欧尔班在 2009–2018 年的 17 篇关键性演讲。文本资料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欧尔班总理的国情咨文以及在博依纳图什莱德夏季学校开幕式上的讲话。个别年份的文本资料无法获取，笔者将其余关键性讲话纳入分析文本库，所有文本资料来源详见附录。

在具体展示文本分析结果之前，有一点必须强调。根据笔者的分析，“人民-精英”两分对立的进一步外化，并不是在青民盟 2010 年大选胜利之后才逐渐发生的。2009 年，在奎茨什露天餐会（Kötse Civic Picnic）<sup>②</sup>上，作为青民盟主席的欧尔班就已经简明扼要地将其未来的施政方向勾勒了出来：

本人所确信的一点就是，本国的政治结构、政治风格和政府形式，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应当服务于本民族的繁荣昌盛。但是很显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基于外在压力所建立的政治结构和政府形式并未能够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因而本党着力于提出某个替代性的选择。当然，是否真正接受这个选择，有赖于我国人民的投票表决，但是我本人和本党都确认，匈牙利人民和民族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自始至终充斥着价值观争论和政党权力斗争的政治体系，而是一个某政党能够实现真正有效和出色统治与治理的政治体系，一个真正胜任执政党地位的政党能够长期保持权力的体系。（PM Orbán's speech at the “Civic Picnic” in Kötse 2009）

通过这段讲话可以看出，重塑匈牙利国家政治的倾向，在青民盟胜选执政之前就已经清晰地表露出来了。而这一倾向随后决定了匈牙利的政治发展

---

① “国家协作体系”是青民盟在 2010 年大选获胜之前就提出的一个概念（匈牙利文：Nemzeti Együttműködés Rendszere-NER），主要内涵是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一味鼓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这在匈牙利国内造成了国家和社会之间毫无必要的长期对抗。故而青民盟提出此替代性的统治模式，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掌控以及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来弱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统一发展，也即整个国家范围之内的协作体系的建立。

② 奎茨什露天餐会（Kötse Civic Picnic）：在匈牙利小镇奎茨什（Kötse）举办的活动，有大批匈牙利保守派政治精英和民族主义学者出席，是青民盟宣传自身主张和凝聚支持的重要舞台。

方向，直到今天。同时，“人民-精英”两分对立的外化趋势也已经出现。在欧尔班的讲话中，突出了当下匈牙利的政治结构是“外在因素”决定的结果，而当时仍处于执政地位的匈牙利社会党（MSZP），作为“精英”和“人民之敌”，却并没有被过多着墨。

本文文本的时间维度为 2010-2018 年，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考察。区分的主要标准是青民盟对于“人民之敌”以及危机的建构、阐释和渲染。2010 到 2015 年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青民盟和欧尔班的话语重点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本国的经济自主，而和国际投机资本展开斗争，避免本国落入债务陷阱。第二阶段为 2015-2018 年，阐述重点则是在欧洲难民危机的背景之下，避免本国成为移民国家，保持匈牙利民族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和独立性。

## “人民之敌”及其主要“罪行” ——对 2010-2015 年青民盟的政治话语分析

下文主要通过图表示例的方式，来展现青民盟对于“人民之敌”及其“罪行”的话语建构，以及欧尔班和青民盟为了对抗这些威胁而进行的一系列旨在捍卫匈牙利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努力。上侧图标为“人民之敌”及其“罪行”，下侧图标为青民盟的抗争手法和主要诉求。

依据对欧尔班讲话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建构中，主要的“人民之敌”是指自由资本主义精英（Liberal Capitalist Elites）、欧盟和跨国公司。这三类行为体构成了“人民之敌”的主体，是青民盟领导匈牙利人民进行抗争的主要对象。而匈牙利国内的“人民之敌”，如左翼自由派政治精英（常被青民盟指斥为“前共产党分子”），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人民之敌”的主要罪行和后果有：通过投机资本使匈牙利陷入债务危机，使得匈牙利处在附属于西方国家的地位；这种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制，从根本上破坏了匈牙利的民族自决权，引发了匈牙利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人口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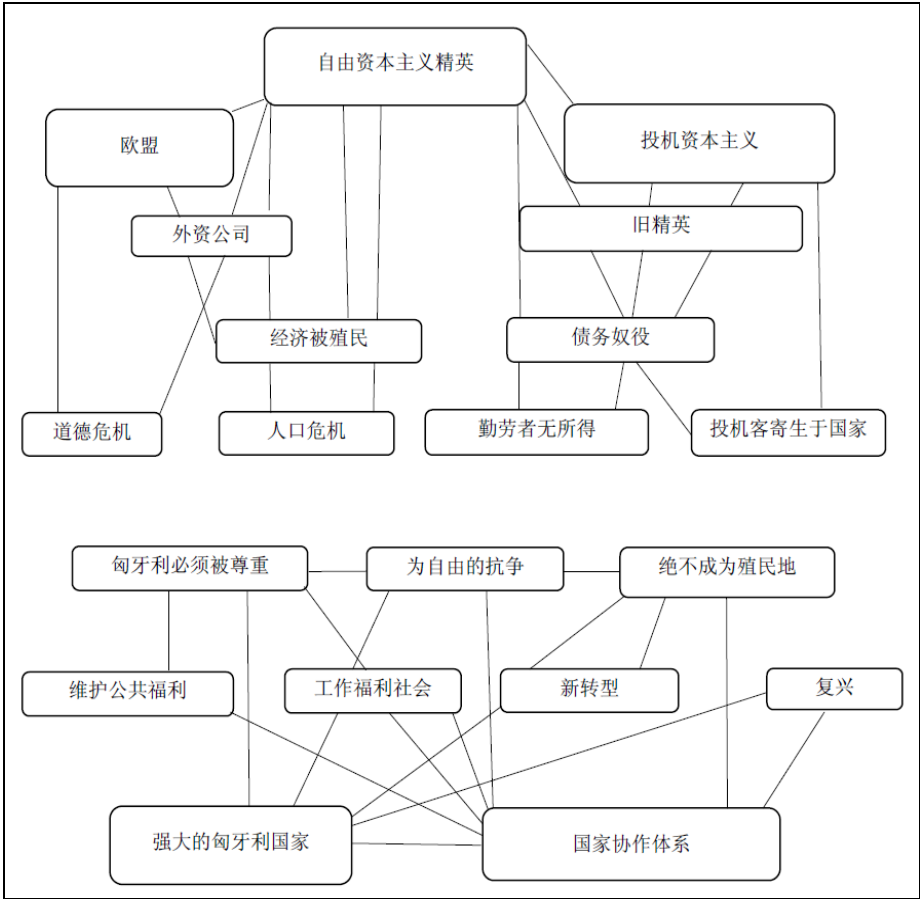


图1 “人民之敌”及其主要罪行以及青民盟的抗争（2010-2015年）

来源：作者自制

在欧尔班看来，投机资本和自由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其对欧洲传统价值的背弃是引发当下欧洲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国家对本国传统价值的坚持和强调，使得它们在国际竞争中更为成功：

成功的资本主义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更需要道德的基石作为支撑，而道德基石则来自于对上帝的笃信。（PM Orbán's Băile Tuşnad summer university speech 2010）

而且，在欧尔班看来，投机资本和自由资本主义对匈牙利社会道德的瓦解作用，集中体现在对工作道德的腐蚀上：

（20 世纪）90 年代的转轨，我们看到的是辛勤工作的匈牙利人沦为转轨的失败者，而与此同时，肆无忌惮的投机分子却拿着整个民族的财富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冒险。这些人消耗着匈牙利民族的活力，毁坏了整个民族的潜力。（PM Orbán's commemorative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1956 revolution 2010）

在欧尔班的论述中，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操纵之下的匈牙利左翼自由主义精英，即使自身已经处在危机之中，也不遗余力地对抗匈牙利的民族复兴倾向：

过去的岁月，我们看到了什么？蔓延的腐败、滥用的权力、飙升的犯罪率以及创纪录的失业率，这一切都把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推向进一步衰落的深渊。但是在西方国家以及仰他们鼻息的原执政派看来，这些都没什么问题。我们决不能够接受这种状况，我承认，我们的实际地位是脆弱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挑战！（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1）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人民-精英”两分对立的外化，在青民盟执政后的第一年（2011）就已经出现。作为与“人民”相对立的“他者”，其中包含了暗中掌控匈牙利经济命脉的国际资本。但是在此期间，青民盟对国际资本的抨击依然较为隐晦。2011 年和 2012 年，匈牙利先后出台了新的媒体法和宪法修正案，削弱权力制衡机制和媒体自由，这引起了欧盟的关注和攻击。来自欧盟的压力促使青民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欧盟，强调欧盟是和匈牙利人民所对立的“他者”之一。2012 年，在纪念 1848 年革命的讲话中，欧尔班毫不含糊地指出，欧盟是匈牙利民族的自由之敌，就和当年的苏联一样：

曾经的匈牙利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引来了苏联的疑虑和坦克。今天，匈牙利人民再次要求开创自己的新路，摆脱债务的压迫，并认为强大的民族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强大欧盟的基础，也因此，我们不得不面临布鲁塞尔怀疑的眼光。但是，诸位，我们最终会证明，我们自己才是正确的，

真正的未来属于辛勤工作的欧洲人民，未来的世界也属于辛勤劳作的人民！（PM Orbán's commemorative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1848 revolution 2012）

通过这段讲话可以看出，欧尔班主要建构了两组“人民-他者”的两分对立关系。第一组是支持强化民族国家在欧盟内作用的辛勤的欧洲人民和欧盟官僚的对立，第二组则是勤劳的匈牙利人民和欧盟官僚的对立。第一组对立关系多少有被欧尔班主观构建的痕迹，但是匈牙利和欧盟的紧张关系则是客观存在的。欧尔班将这两组关系等同起来的做法，说明他要把匈牙利和欧盟的冲突斗争置于更广阔的欧洲背景之下，使得他这个民粹主义领导人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具有重要性。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是：

客观事实就是，过去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火炬早已经熄灭。摆脱经济-金融危机的药方和新的转轨方略，不可能从西方获得。相反，我国在危机处理方略上倒是具备某些优势，西方国家都会来效仿我们的做法。（PM Orbán's Băile Tuşnad summer university speech 2011）

通过上面引述的几段讲话可以看出，根据外化战略的逻辑，欧尔班建构了青民盟治下的匈牙利与欧盟之间的对立冲突；并且强调这种对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欧盟不能平等对待匈牙利，总是把匈牙利视为二等成员，意图用债务手段控制匈牙利。而与此同时，同样处于“人民-他者”对立的“他者”中的“本国精英”（主要是指匈牙利国内反对派，以匈牙利社会党为主要代表）则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青民盟政治话语中的权重和地位不如“欧盟官僚”那般突出。而且，通过将2002-2010年间执政的以匈牙利社会党（MSZP）为代表的左翼势力比作受制于外国势力的傀儡，青民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2010年以后匈牙利国内反对派的合法性，牢牢地将国内反对派置于“人民之敌”的位置。

2014年，随着大选的临近以及数年间与欧盟的冲突，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对“人民-他者”两分对立的激烈程度的描述也进一步加强：

在我党2010年胜选之前，和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巨头等敌人的斗争早就已经开始。但是不幸的是，在此之前，匈牙利人民在各个战线上都处于溃败的状态。而自2010年，遵从人民的选择，我们的战斗才进

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已经赢了几个战斗 (battle), 但是我们仍未赢得整个战争 (war), 我们必须不断前进。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就是两条路, 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接受我们所能够被施与的一切, 还是作为战斗者去争取我们所应得的所有。(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4)

通过这段讲话可以看出, 将“人民-他者”的两分对立从“战斗”(battle) 升级为“战争”(war), 青民盟话语中对立的激烈程度大大提升。从语义上讲, “战斗”的结果主要是指胜负, 而“战争”的结果则关乎存亡继绝。2014 年的国情咨文, 表明青民盟政治话语中的“危机”已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整个匈牙利民族的存亡。这种扩大, 可以被看作是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后, 匈牙利拒绝欧盟移民配额、强调保持自身民族和文化存续的先声。

从 2009 年的奎茨什讲话到 2014 年的国情咨文, 笔者发现, 欧尔班很少被动地跟随实际情况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话语和表述。相反, 欧尔班很善于预先设定相关的话语和讲述, 而这些话语和讲述在此后的现实进展中能够被青民盟自如地运用。比如在 2009 年奎茨什讲话中强调对匈牙利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坚持, 以及 2014 年国情咨文中有关“战争”的描述, 就被有效地运用于 2010 年之后与欧盟的对抗、2015 年之后对欧盟难民配额的拒绝。

非自由主义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 是一个由政治学者扎卡利亚所发明的概念<sup>①</sup>, 这个概念被欧尔班有机整合进了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 并且作为青民盟的自我政治价值观定位:

我们不得不说, 民主并不必须是自由的。一个并非自由主义的国家也有可能是民主的。而且, 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 建基于自由主义民主之上的国家恐怕无法有效应对此后国际竞争的压力。因此, 自由主义, 无论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 还是对社会本身的理解, 我们都必须和这样的主义一刀两断。(PM Orbán's Băile Tuşnad summer university speech 2014)

---

<sup>①</sup>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7, Vol.76, No.6.

欧尔班的 2014 年博依纳图什莱德夏季学校讲话，就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宣言”。在这篇讲话中，欧尔班明确将自由主义置于敌人的位置。虽然此时青民盟政治话语中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经济方面，但是对自由主义的这一定位，使得青民盟能够在后续的政治发展中将一系列“敌人”（比如政治正确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纳入到自由主义的帽子之下，进行抨击和打压。而“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之下，也很快丧失了自身原有的意味，变成一个用于囊括诸多不同事物以便于话语建构和阐述的“空符征”（empty signifier，或译为“空的所指”）<sup>①</sup>。

同年，匈牙利国内媒体揭露出许多匈牙利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接受来自挪威的经济资助。欧尔班抓住这个机会，立刻将匈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到“人民之敌”的范畴之中：

仔细审视一下我国国内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就可以看出，他们虽说在匈牙利活动，但是却接受外国的资助，根据外国的利益需求对匈牙利政治施加影响，他们仅仅只是外国利益在匈牙利的代理人而已。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要建立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会反对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对于那些站在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民族利益对立面的、为外国利益代言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是一定会反对的！（PM Orbán's Băile Tuşnad summer university speech 2014）

在这段讲话中，通过将匈牙利国内的诸多非政府组织描述为外国利益的代言人，青民盟从根本上拒绝了承认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地位。而且通过这种描述，欧尔班暗含的意思就是，只有他和他所领导的青民盟，才是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同时，将非政府组织纳入“人民之敌”的范畴，欧尔班和青民盟在政治话语建构上又占得了一个先机。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后，面对欧盟的要求和国内人权组织的压力，欧尔班非常方便地将二者描述为互相勾结的集团，匈牙利人权组织秉承欧盟要求施

---

<sup>①</sup>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69. “Empty Signifier”，一般译为“空符征”或者“空的所指”，特指一些词汇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使用者有意或是无意歪曲其本意或是扩大其内涵与外延，在一定时间过后，逐渐丧失自身本有意义，转而成为使用者依据实际使用需要而囊括一定对象的涵盖性名词。

压政府接纳难民，二者共同威胁到了匈牙利民族和文化的同质性及存在。

通过对上述几段讲话的分析可以看出，2010-2015年间，“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的外化，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就已较有扩展。从“人民之敌”及其“罪行”来看，青民盟在其执政的第一个任期之内，“人民之敌”的对象，就从本国自由主义精英扩展到了国际投机资本、国际自由资本主义精英和欧盟，最终将本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囊括在内。其“罪行”主要集中在意图用债务问题来压制匈牙利的经济自主，将匈牙利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但是，通过对对立冲突的激烈程度从“战斗”（battle）向“战争”（war）的描述转化，青民盟政治话语中的“人民-他者”对立冲突的集中点，也已经暗含了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同时，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本国精英”作为外国势力操纵的“傀儡”，从一开始就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 青民盟政治话语中对“人民”以及“人民之声”的建构<sup>①</sup>

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人民”以及“人民之声”（VOX POPULI）是作为与“精英”对立存在的事物，而“人民之声”则自然是作为真正人民代表的青民盟所着力实现的目标。“人民”的概念主要涵盖两个层面：“人民”首先自然是指匈牙利公民；同时，参照青民盟政府向外国匈牙利族发放匈国护照<sup>②</sup>的做法，这一群体也涵盖国外的匈牙利族裔成员。因此，“人民”这一群体，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既具有包容性（不局限于匈牙利国家疆界），也具有排斥性（主要面向拥有匈牙利族血统的人）。其次，“人民”主要是指“辛勤工作的匈牙利人民”。这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的划分标准，也同时具有包容性（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辛勤工作的，无论他身处匈牙利境内或是境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和排斥性（不辛勤工作的人是不道德的，也就不属于人民这一群体）。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辛勤工作的人民”，这两大群体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同时与置于自身对立面的“精英”

---

<sup>①</sup> 也即“国家协作体系”（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所着力实现的目标。

<sup>②</sup> 张弘：“匈牙利与乌克兰的跨境少数民族问题”，《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处在冲突斗争之中。<sup>①</sup>

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人民之声”被归纳为三大类别：首先，欧尔班和青民盟提出，匈牙利需要一次新的转型来实现匈牙利民族的全面复兴；其次，为了保护公共福利和民族利益，匈牙利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再次，匈牙利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强大国家的建设，二者之间密不可分，而能够同时支撑这两大目标实现的手段，就是“工作福利社会”<sup>②</sup>（workfare society）的建设：

此次选举（2010）赋予我党的三分之二多数，乃是一次革命，这是“投票站的革命”（Revolution of the Ballot Boxes），这说明我国民众支持对我国现状、对现有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我国的宪法、法律体系、公共道德和价值观都必须彻底变革。媒体、学校、环保现状乃至公共物品采购机制也必须更新。和人民、民族、理性与道德处于敌对地位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更张。2010年之前的国家，既不能代表我们的民族，也无法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在自由民主制之下的国家，无法有效运用其权力来维护民族利益，无法促成一个强大的匈牙利。（PM Orbán's commemorative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1956 revolution 2010）

在纪念1956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改革进程的讲话中，提出了“投票站革命”这一概念。青民盟明确表示，此后在自身主导之下的匈牙利发展道路（也即匈牙利民族-国家的复兴道路），将会完全不同于1990-2010年之间的道路（其中包括彼时按照自由主义民主原则统治匈牙利的青民盟政府：1998-2002）。而讲话中所提出的“根本性变革”，包含青民盟再次执政以后对匈牙利宪政、法律以及政府体系的一系列实质性重组，也即被欧盟一再抨击的“民主倒退”。青民盟对“强大国家”作用的突出，则是因为欧尔班不认为自由主义道路能够解决当下匈牙利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唯有重新突出国家的作用，才能够解决青民盟政治话语中的“问题”。当然，在这一时期，“强大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经济层面的，即加强国家对经

---

<sup>①</sup>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p.117-125.

<sup>②</sup> 即公民必须接受职业培训，并且通过实际的工作或是从事某种公益活动，来获取享受社会福利的资格。

济的干预以维护匈牙利的经济自主。但是，在 2015 年以后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强大国家”这一概念能够很方便地进一步运用于“民族-文化”领域，即，抵制难民配额和难民的涌入，防止匈牙利变为移民国家，维护匈牙利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同质性及其存续。

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工作福利社会”也是作为和投机资本主义以及西方福利社会制度相对立的概念被提出来的。除了作为“精英”的对立面外，在欧尔班的表述中，“工作福利社会”还是实现统合匈牙利人民、共同建设强大的匈牙利国家的根本途径，是匈牙利人民的要求：

匈牙利人民要求自尊和自立，匈牙利人民也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同时，匈牙利人民清楚地明白，这一切自尊和自立，唯有通过辛勤而得体的工作才能获得。匈牙利人民并不认为工作是一种负担，相反，匈牙利人民认为工作是一种光荣。对于真正的匈牙利人民来说，投机取巧地靠福利而活并不值得高兴，匈牙利人民需要去辛勤地工作。（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1）

通过这段讲话可以看出，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建构中，唯有“工作福利社会”才能够助益本国的经济独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匈牙利民族的道德复兴。因此，“工作福利社会”也就具有了经济-道德的双重意义。为了建设“工作福利社会”，青民盟引入了新的工作法案，设置了固定统一税率，支持在税收和金融上对家庭提供补贴。这一系列措施大大不同于此前匈牙利政府的经济政策，因而从实质上改变了匈牙利的经济-社会现实。

通过对 2010-2015 年间青民盟主要政治宣言和政治文本中“人民”以及“人民之声”的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人民之声”的主要内容，在欧尔班总理 2010 年于博依纳图什莱德夏季学校的讲话<sup>①</sup>中就已经基本和盘托出，此后的讲话主要是进一步细化这些内容。而作为“人民之声”的集大成者和最终实现手段，青民盟所提出的“国家协作体系”这一概念，则囊括了“人民之声”中的所有各种各样的诉求，也便于青民盟依据此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发展，在这一概念中塞入新的内容。青民盟的“国家协作体系”

---

① “PM Orbán's Băile Tuşnad summer university speech 2010”, 2010-7-24,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ulki-kooperacio-tervezlet/orban-viktor-beszede-a-balvanyosi-nyari-szabadegyetemen-es-diaktaborban-2010-julius-24>

作为“人民之声”的集大成者，成为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精英”对立面的“空符征”<sup>①</sup>。

### 青民盟政治话语对“人民之敌” 及其主要“罪行”的建构（2015年以后）

2015年以后，欧洲局势的重大变化就是难民危机的爆发。在此背景之下，青民盟的关注点迅速转化为匈牙利民族的生存以及民族同质性的存续。青民盟的政治话语建构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作为“人民之敌”的“自由主义精英”，其主要“罪行”则转化为触发难民危机并要求匈牙利接纳难民。青民盟则代表“人民之声”来应对和克服这些挑战，维护匈牙利的民族利益。

通过对这一阶段青民盟关键政治文件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人民之敌”主要包括自由派普世主义精英（Liberal Cosmopolitan Elite）、欧盟、作为监察团体的非政府组织（Watchdog NGOs）、外来移民，以及在背后掌控和操纵这一切的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与前一阶段类似的是，匈牙利国内的自由主义左派精英（前执政党-MSZP）的地位进一步被降低，甚至被匈牙利本国的监察团体-非政府组织所代替。而精英的主要“罪行”，则被指责为蓄意摧毁欧洲文明以及通过引入难民来有意改变欧洲既有的族群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后，欧尔班总理大量使用阴谋论的语调来描述当时的难民问题，其对难民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完全符合莫菲特的“民粹主义危机操控”的定义。<sup>②</sup>将“人民-精英”两分对立的冲突集中点，从经济问题向民族-文化的存续问题转化，这表明青民盟对极右民粹主义的三大核心诉求之一——本土主义<sup>③</sup>的充分接纳。而这一转变趋势充分说明了居于执政

---

①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p.110-117.

② Benjamin Moffit, “How to Perform Crisi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Key Role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4, Vol.50, No.2, pp.189-217.

③ Cas Mudde(Ed.),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3-5.

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其民粹主义立场和诉求完全可以进一步激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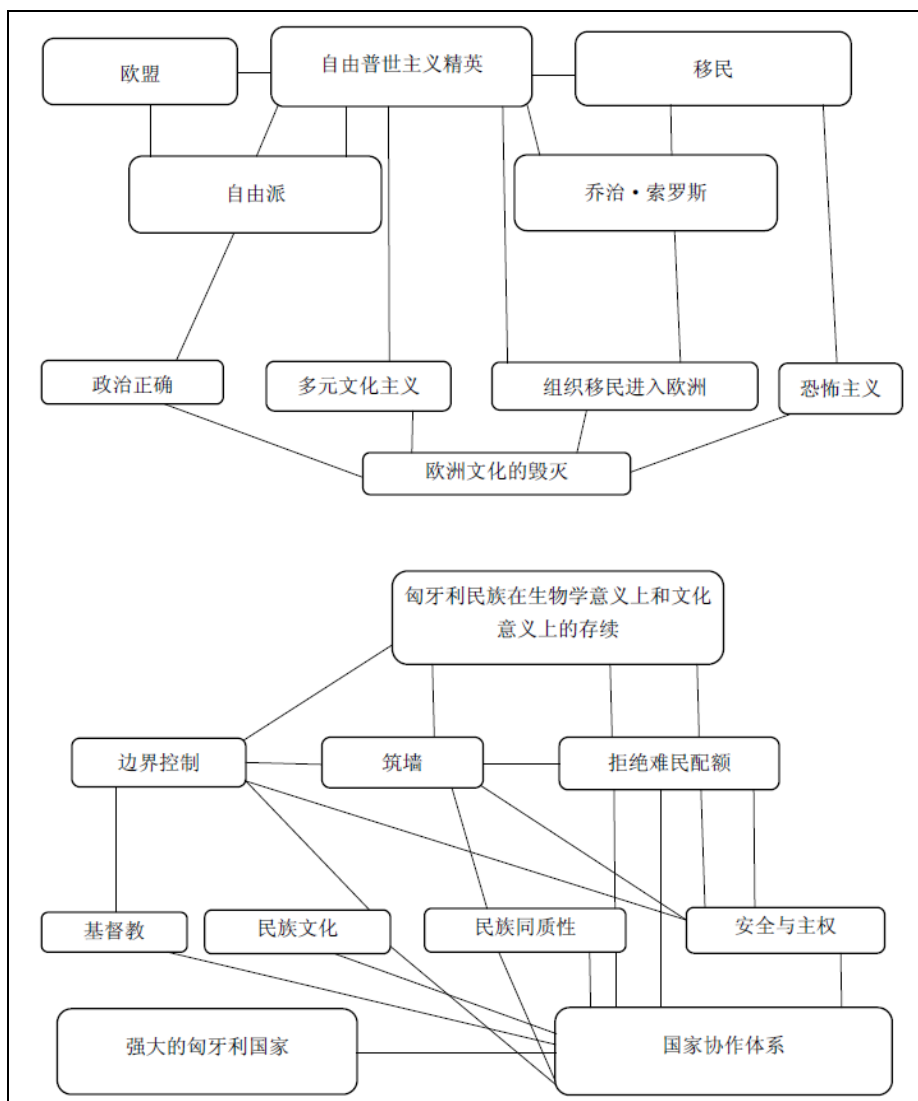


图2 “人民之敌”及其主要“罪行”以及青民盟的应对（2015-2018年）  
来源：作者自制

在政治话语建构上，欧尔班再次走在了局势发展的前面。在 2015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中，欧尔班总理首次表明了自身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而当时距离欧洲难民危机爆发还有数月时间。这一话语框架，在随后的情势发展中，便于青民盟主动且便利地调用：

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就是，恐怖组织经常从西欧国家的移民社区中招募成员。而欧盟的南部边界——我国的边界也包含在内，在当下则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移民浪潮的冲击。这种情况使得各国政府在头痛不已的同时又束手无策。欧洲当下的困境无法依靠自由多元文化主义（Liberal Multiculturalism）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对于拒绝接受欧洲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意图破坏欧洲文化的人，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庇护吗？（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5）

在这段讲话中，通过将外来移民和恐怖组织相联系，以及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已属过时，欧尔班奠定了青民盟此后的基本政治话语架构。这种架构随后被青民盟政府应用于应对难民危机和拒绝欧盟的难民配额，直至今日。同时，欧尔班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拒斥，可被看作是其此前的反自由主义立场的自然延伸，体现出青民盟在政治立场上的连贯性。同时，欧尔班在对“人民之敌”及其“罪行”的话语建构中又加入了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和此前的论述一起，构成了欧尔班针对自由主义政治精英“阴谋论”的完整逻辑链条。

在当下的世界看来，经济因素似乎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这也许有道理。但是我想说，在我看来，生命的因素应当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这就是说，维系匈牙利民族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存续的因素，比单纯的经济因素更为重要。但是，当下的欧洲依然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性所束缚，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家所设定的政治正确性，其内含的禁忌实在太为繁杂，尤其是其对欧洲民族构成现状和民族主义诉求的忽视，几乎处于霸权的地位。在自由主义政治精英看来，世界上的观点只有两种：他们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5）

在这段讲话中，欧尔班明确引入了民族存续的问题，并且赋予其相较于经济问题优先的地位。同时，欧尔班将“政治正确性”列为“人民之敌”，并且强调正是自由主义政治精英对这一概念的操控和运作，使得欧洲无法正视欧洲的民族主义现实和民族问题。这两大因素的加入，随着此后欧洲难民

问题爆发的推动，促成了青民盟“政治阴谋论”的进一步完善。

在欧尔班总理 2016 年的国情咨文中，其关于“危机”的言辞更为严厉。“危机”的情况、级别以及危害性，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对“移民”问题的描述。

本政府自执政以来，自始至终致力于几大目标：恢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缩小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恢复公共秩序，捍卫公共安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存续。但是，现如今，这些目标都处于危险之中，造成这些危险的原因就是——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而且，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我国的当下，更是我国的未来。21 世纪的第三和第四个十年将会是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对于这一趋势，我国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在接下来数年中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外来移民在人数上完全压倒欧盟国家内部的主体民族。让我们抛弃幻想，不要执念于所谓的理论或是乌托邦，我们应当直面现实，那就是欧洲本土人民和欧洲文化已经处在外来移民和移民文化的包围之中！（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6）

仅就这段讲话看来，似乎移民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移民对欧盟成员国的经济有着显著的助益作用，对欧盟国家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也并不存在威胁，这一点早就被西方学者的研究所证实。<sup>①</sup>而且，匈牙利本身的外来移民人数很有限，原本不存在恐外情绪迅速滋生的土壤，而且匈牙利本身也并不是难民危机期间中东难民的主要目的国。<sup>②</sup>因此可以认为，匈牙利民众对于移民和难民危机的恐慌情绪，主要是青民盟通过政治话语建构渲染推动造成的。青民盟对难民危机的渲染、操控和利用，完全符合莫菲特所定义的“民粹主义危机操控六大步骤”。<sup>③</sup>这一渲染、操控和利用

---

① [法]帕特里克·威尔：“移民：多元欧洲的弹性架构”，载于安东尼·吉登斯主编《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1-214页。

② Political Capital Report, “Beyond Populism, Tribalism in Hungary and Poland. A Study Political Capital Institute”, 2018-8-31, p.17, [https://www.politicalcapital.hu/pc-admin/source/documents/pc\\_beyond\\_populism\\_study\\_20180731.pdf](https://www.politicalcapital.hu/pc-admin/source/documents/pc_beyond_populism_study_20180731.pdf)

③ Benjamin Moffit, “How to Perform Crisi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Key Role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4, Vol.50, No.2, pp.197-208.

的过程，也表明了青民盟民粹主义立场的进一步激进化。

而在青民盟看来，造成难民危机并且使得欧洲未来受到威胁的罪魁祸首，依然是普世主义自由派精英。

在布鲁塞尔和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知识精英总是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但是绝大多数欧洲民众视民族国家为自己的归属。很明显的就是，精英无法迫使人民接受同样的归属观，所以他们选择忽略人民的诉求。因此，欧洲真正的问题就在欧洲之内，威胁欧洲未来的人就来自欧洲。这些人就是那些意图违背人民意愿来重塑欧洲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他们的手段是把一批批的移民运进欧洲，数目高达以百万计。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怪异联盟产生了：人贩子、人权活动组织以及欧盟高层领导。（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6）

在这段讲话中，难民危机被青民盟描述为普世主义自由派精英用以削弱欧盟民族国家民族同质性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精英才能够按照普世主义的方式来统治整个欧洲，但也正是这种方式，使得欧洲民族国家无法守护自身的民族文化。通过“怪异联盟”这一表述，将欧盟高层领导、人权活动组织和人口贩子联系起来，不仅牢牢地把“人民之敌”的标签贴在前二者身上，其阴谋论的论调也更加突出。

2016年，面对来自欧盟的难民配额压力，匈牙利坚决抵制，并准备在国内举行是否接受配额的全民公投。<sup>①</sup>在此背景之下，欧尔班总理在2017年国情咨文中的措辞和语调更为激进：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根据多数成员的意志来组织和运作的共同体。那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反民主的。从政治角度来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把真正的政治权力从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和议会手中转到

---

<sup>①</sup> 面对欧盟的难民配额要求，匈牙利国内在2016年下半年曾经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欧盟是否有权在不经匈牙利国会认可并接受的情况下，将接纳相应数量难民的任务摊派给匈牙利。虽然这一公投最后由于法定人数不足归于无效，但是匈牙利的抵制立场从未改变。相关细节见“Nations in Transit Hungary Report 2017”，<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2017/hungary>

所谓的普世主义精英手中。这些精英是什么人？他们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媒体业的巨头，以及不经由选举产生的国际组织的高层。这些就是索罗斯全球帝国的全景。而且，匈牙利人民已经通过公投表明了自己的意志，但是索罗斯和他的党羽依然充耳不闻，不遗余力地将一批批难民带入欧洲。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了一点，那就是要使得匈牙利政府和议会无法按照匈牙利人民的意志进行运作！（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7）

在这段讲话中，欧尔班明确地将自由主义列为反民主的意识形态，这样，欧尔班也就顺便将自己所着力宣传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由民主的“特例”提升为民主的“常态”。其政治话语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内在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自由主义民主在现实中是无法存在和运作的。同时，“人民之敌”的涵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索罗斯所掌控的国际关系网、匈牙利国内的人权组织，均被纳入欧尔班所声称的“亲移民联盟”中。这一“联盟”最终包含了欧盟、索罗斯以及对青民盟政府的移民立场持批判态度的国内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因此，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有关“人民之敌”的话语建构最终完成；而“敌人”的主要罪行链条也最终成型，即通过不负责任地移入难民来破坏欧洲各国民族和文化的同质性。

## “人民之声”以及青民盟应对难民危机的措施

这一阶段，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人民-精英”两分对立的“人民”群体，其含义在相当程度上被简单化处理了。面对难民危机，青民盟一开始着力宣传难民对匈牙利就业市场的潜在冲击，强调难民可能会抢走匈牙利百姓的工作<sup>①</sup>，也即“辛勤的匈牙利劳动者”将成为难民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伴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青民盟政治话语的激进化，这一“群体”在青民盟政治话语中的地位迅速退向次要。

如我所知，匈牙利人民总是坚持应当坚持的常识而不是所谓的政治

---

<sup>①</sup> “Immigrant billboards being destroyed”, *Budapest Business Journal*, 2015-6-8, [https://bbj.hu/politics/immigrant-billboards-being-destroyed\\_98829](https://bbj.hu/politics/immigrant-billboards-being-destroyed_98829)



正确。他们对空谈不感兴趣，而只关注客观的事实；他们对抽象的理论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理想的工作和能够承担的物价。对于失业是当代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鬼话，匈牙利人民是不屑一顾的。匈牙利人民所需要的就是从债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不愿意看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习俗的人进入或是居住在他们的国家中，因为这些外来者无法被我们的民族文化所同化。而且，他们是我国公共秩序、就业市场和生活水平的威胁。（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5）

在欧尔班总理的这段讲话中，“人民”群体的话语建构依然处于经济层面，但是文化-民族层面的含义迅速突出。此外，这段讲话表明了青民盟政府对于难民问题的简单化处置策略，那就是——坚决拒绝。而针对现实问题的简单化应对策略，是民粹主义政党激进化立场的本质特征。<sup>①</sup>这段讲话很清楚地表明，处于执政地位的青民盟的立场进一步激进化。

综合分析这一时期青民盟的关键政治讲话，可以看出，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建构中，“人民之声”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安全、主权，以及在“人民之敌”所触发的难民危机中保存匈牙利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同质性。为了实现这三大目标，青民盟所提出的应对措施是强化边界控制，在南部边境（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接壤）筑墙阻止难民流入，并坚决拒绝欧盟委员会的难民配额要求。而确保“人民之声”以及相应措施得以实现的最根本保障，依然是青民盟早已经提出的“国家协作体系”。唯有通过“国家协作体系”，各种保障措施才能够得到实施，“人民之声”才能够得到实现。在“人民之声”的建构中，“国家协作体系”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囊括“人民之声”和实现措施的“空象征”，保持了自身在青民盟政治话语建构中的稳定性。

在欧尔班总理 2016 年的国情咨文中，应当说，其民粹主义的激进立场和排外态度，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点：

为了边界防卫和国家安全，我们向南部边界增派了所需设备和人手，因为我们知道，为了保卫欧洲的边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从匈

---

<sup>①</sup> Strömbäck Jesper,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8, Vol.13, No.3, pp.228-246.

雅提<sup>①</sup>时代就是如此。我们要让布鲁塞尔的高官、人贩子以及移民们知道，匈牙利是一个主权国家，唯有遵守我国法律，接受我国法律权威以及边检人员管束检查的人，才能够被允许入境。仅仅保卫我国的南部边界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条战线——外交上的斗争也很重要。当下的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联邦主义者和主权主义者。前者要把欧盟变成美国式的合众国，后者则支持强化主权国家在欧盟内部的地位。同时，前者要求强制性的难民配额分配而后者坚决反对此举，这才是难民问题当下如此突出的根源所在。我们决不能够接受布鲁塞尔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也不接受轻率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任何人都不能迫使我们吞下这种苦果。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反同性恋者以及反犹分子，决不允许进入匈牙利境内，因为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国家被暴力所充斥，也不能允许我国的女性被流氓阿飞所骚扰！（PM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016）

从这整段讲话中可以看出，通过把保卫边界和安全的需求与 15-18 世纪抗击奥斯曼帝国入侵联系起来，两大需求被赋予“战争”的隐喻。同时，和 2015 年之前的讲话相比，此时“人民之声”所涵盖的内容更多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展现。而在 2015 年之前，青民盟的政治文稿中所提出的“工作福利社会”等概念，都是在强调这些举措能够使匈牙利人民为自身挣得光明的未来，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表达的。而 2015 年之后的“人民之声”所涵盖的内容，是强调“人民之敌”及其“罪行”会危害匈牙利民族和文化的存续，为了人民免受这种“罪行”可能带来的末日（doomsday），青民盟政府必须采取边界控制等一系列措施。综合而言，在青民盟的政治话语中，2015 年之前的举措主要是为了“迎福”，2015 年之后则是为了“避祸”。同时，在 2015 年之后的政治话语中，极右排外主义的立场达到了高峰，“人民之敌”所涵盖的对象达到了最大化。同时“人民-精英”之间的两分对立，进一步外化成为“人民-他者”之间的两分对立，这一“外化”进程也达到了顶点。

---

① 亚诺什·匈雅提（János Hunyadi），是 15 世纪匈牙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领导匈牙利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的斗争。匈雅提和巴尔干诸国王公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整合并推动了巴尔干国家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各种斗争。

## 结语

本文通过对 2010-2018 年间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领导人欧尔班的关键政治讲话的话语分析,证明了处于执政地位的右翼激进民粹政党完全可以通过“外化战略”,通过将“人民-精英”的两分对立扩大为“人民-他者”的两分对立,来保持自身的激进立场。而且,就青民盟的案例而言,这种“外化”并不是一个逐渐产生并推进的过程,而是早已有之。在青民盟 2010 年选举大胜之前,就已经明确表明要全面改变匈牙利政治发展的轨迹。青民盟的激进立场,是胜选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就青民盟执政之后的表现看,“执政者”的地位没有对青民盟的激进立场造成任何困扰。相反,通过“外化”战略,不断扩大“人民之敌”的涵盖范围,青民盟不仅坚持了自身的激进立场,保持了执政地位,还巩固了在匈牙利政坛的统治地位。

在青民盟的整个政治话语建构中,对危机的展示和宣传占据了核心位置。危机对于青民盟政治话语中对“人民”、“人民之敌”及其“罪行”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青民盟的政治话语紧紧把握危机这一因素,并进行发挥:2010 年之后主要是全球的经济-金融-债务危机,2015 年之后主要是欧洲难民危机。危机因素推动了青民盟的反精英立场,从“反本国精英”向“反欧盟层面精英”的转变。<sup>①</sup>在青民盟的案例中,在危机和外化战略的贯彻与实施之间,存在着极其强烈的关联性。未来一个可能的考察方向就是,如果并不存在可供利用的危机,处于执政地位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是否可能使用“外化战略”。

本文采取的案例研究,主要是关注匈牙利一国的执政党——青民盟,自然具有局限性。但是,匈牙利处在欧亚交通联结的枢纽地位,同时,就中东欧的民主转型而言,匈牙利长期处于排头兵的位置,其转型的成就世所公认,

---

<sup>①</sup> Hanspeter Kriesi, Takis S. Pappa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5, p.307;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Dealing with populists in govern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Democratization*, 2016, Vol.23, No.2, p.205.

政党系统也被认为是转轨国家中最稳定的。<sup>①</sup>匈牙利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以及长期执政，毫无疑问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政党起带动作用。可以这样说，冷战时期西方民主的展示橱窗是西柏林；冷战之后，为了继续推进西方民主，设法将转轨进程相对落后的原苏联成员国和东南欧国家融入西欧民主制<sup>②</sup>，这一展示橱窗东移到了匈牙利等维谢格拉德国家。但是，这种橱窗却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因为欧盟毕竟无法完全掌控成员国的内政，对于橱窗内所展示的物品，欧盟也不能完全起决定作用。匈牙利所出现的“民主倒退”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自然也会促使其他后进国家民粹主义政党效法，其“外化战略”也会被其余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民粹主义政党所学习，这一点，毫无疑问。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联结亚欧，走入西欧是“一带一路”亚欧部分的必然诉求，匈牙利就处在亚欧“一带一路”打通的关键位置。匈牙利青民盟通过外化战略实现长期执政的成功经历表明，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其未变的诉求之一就是不停地寻找敌人，扩大“人民之敌”的涵盖对象来维持自身的激进立场。伴随着中国-中东欧“16+1”机制的深化发展，中国在中东欧的政治经济存在必然会逐渐上升，如何在加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同时，避免成为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所针对的对象，长期保持中国-中东欧友好合作的氛围，值得关注和深思。为此，需要理解和认识“外化”战略在中东欧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手中是如何被使用的。

---

① Enyedi Zolst, Fernando Casal Bertoa, “Patters of Inter-Party Competition(1990-2008)”, *European Party Politic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ds. Paul Lewis and Radoslaw Markowsk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147-168.

② 完善且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是欧盟东扩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的有机组成部分，候选国唯有在民主表现上符合欧盟的标准，才能正式入盟。

## 附录<sup>①</sup>

### 附录（一）

**1. The speech of Viktor Orbán at the “Civic Picnic” in Kötöcsé, 5 September 2009.**

<http://www.fidesz.hu/hirek/2010-02-17/meg337rizni-a-letezes-magyar-min337seget/>(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2.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șnad, 24 July 2010.**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beszede-a-balvanyosi-nyari-szabadegyetemen-es-diaktaborban-2010-julius-24>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3. Commemorativ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anniversary of 1956 revolution and freedom fight, 23 October 2010.**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unnepi-beszede-a-kossuth-teren-2010-oktober-23>(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4.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7 February 2011.**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orszagertekelo-beszede-2011-februar-7>(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5.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șnad, 23 July 2011.**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fsikeres-allamot-csak-akkor-lehet-felepiteni-ha-eros-nemzet-all-mogotte>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6. Commemorativ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anniversary of 1848 revolution and freedom fight, 15 March 2012.**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miniszterelnok-unnepi-beszede-a-kossuth-lajos-teren>(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

① 文本资料库分为两部分，附录（一）为匈牙利文本原件，附录（二）为匈牙利总理办公室提供的英文翻译件。英语翻译文本为话语分析的主要对象，对于没有英语翻译件的文本，则依靠谷歌翻译参照。

**7. Commemorativ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anniversary of 1956 revolution and freedom fight, 23 October 2012.**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nem-fogadjuk-el-hogy-idegenek-kormanyozzanak-minket>(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8.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3 February 2013.**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magyarorszag-jobban-teljesit-leirat>(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9.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şnad, 29 July 2013.**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a-kormany-nemzeti-gazdasagpolitikat-folytat>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0.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7 February 2014.**

<http://2010-2014.kormany.hu/hu/miniszterelnokseg/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felivelo-korszak-kuszoben-allunk>(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1.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şnad, 29 July 2014.**

<https://mNo.hu/belfold/orban-viktor-teljes-beszede-1239645>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2.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7 February 2015.**

<http://www.kormany.hu/hu/a-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a-kemenyendolgoz-o-emberekrol-szolnak-a-kovetkezo-ev>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3.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8 February 2016.**

<http://www.kormany.hu/hu/a-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evertekelo-beszede>(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4.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şnad, 23 July 2016.**

<http://www.miniszterelnok.hu/orban-viktor-eloadasa-a-xxvii-balvanyosi-nyari-szabadegyetemes-diaktaborban/>(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5.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0 February 2017.**

<http://www.kormany.hu/hu/a-miniszterelnok/beszedek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19-ev-ertekelo-beszede>(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6.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şnad, 22**

**July 2017.**

<http://www.kormany.hu/hu/a-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beszed-a-xxviii-balvanyosi-nyari-szabadegyetem-es-diaktaborban>(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17.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8 February 2018.**

<http://www.kormany.hu/hu/a-miniszterelnok/beszedek-publikaciok-interjuk/orban-viktorevertekelo-beszede20180218>(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附录 (二)**

**1.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7 February 2011.**

<http://2010-2014.kormany.hu/en/prime-minister-s-office/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viktor-orban-s-state-of-the-nation-address>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2. Commemorativ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anniversary of 1956 revolution and freedom fight, 23 October 2012.**

<http://2010-2014.kormany.hu/en/prime-minister-s-office/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ktor-orban-s-speech-in-budapest-on-october-23>(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3.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3 February 2013.**

<http://2010-2014.kormany.hu/en/prime-minister-s-office/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ktor-orban-s-state-of-the-nation-speech>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4.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7 February 2014.**

<http://2010-2014.kormany.hu/en/prime-minister-s-office/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ktor-orban-s-state-of-the-nation-address>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5. The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Orbán at the summer university in Băile Tuşnad, 29 July 2014.**

<http://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ktor-orban-s-speech-at-the-25th-balvanyos-summer-free-university-and-studentcamp>(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6.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7 February 2015.**

<http://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the-nextyears-will-be-about-hardworking-people>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7.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8 February 2016.**

<http://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

ktor-orban-s-state-of-the-nation-address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8. Prime Ministe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0 February 2017.**

<http://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ktor-orban-s-state-of-the-nation-address-20170214> (accessed: 1st December 2018)

---

**【Abstract】** When referring to populist parties, the academic circle tends to hold that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m is almost always “outsider”.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in recent years, populist parties and leaders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conspicuou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rena. In addition, since the rise of Western neo-populism in the 1990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e rise of populist forces is mainly a cyclical phenomenon. The populist parties who enter the political arena as challengers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are often unable to maintain their own influences or political status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for the populist party which has become member of the ruling party alliance, its prospects are mainly to adhere to its own challenger position, and then to lose votes and actual support rate, and eventually ends as failure; or to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party’s position, with its actual stance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gradually similar to the establishment, softening its own populist position. Neverthel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ungarian Federation of Young Democrats(FIDESZ), which has been in power in Hungary since 2010, it could be found that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like the FIDESZ have not abandoned their radical positions, but instead increased their support rate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Externalizing the dichotomy of “people and other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populist parties to maintain their own stance and ruling position.

**【Key Words】** European Populism,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Hungarian Youth League, Hungarian Politics, Viktor Orbán

**【 Аннотация 】** Когда речь идёт о популист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склонны считать, что популис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почти



всегда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лож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утсайдера». Однако нельзя отрицать, что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татус популис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и лидеров на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рене стал более заметным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 к себе растущее внимание. Кроме того, со времен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нового популизма на Западе в 1990-х года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 целом полагало, что популизм являе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циклическим явлением, и популис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которые вышли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арену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истеблишмента, не могу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у популист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членом правящей коалиции, есть следующ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сво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озиции соперника, а затем потерять голоса и фактичес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выйти из игры, или ассимилироваться с позицией основной партии, так что её ф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зиц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ближаются с позициями истеблишмента, а 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популистские позиции смягчаются. Однако анализ партии Фидес, которая находится у власти в Венгрии с 2010 год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право-радикальные популистские партии, такие как Фидес,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отказались от своей радикальной позиции, но и подняли уровень поддержки на всеобщих выборах.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народа и других» является эффективной стратегией для популистских партий по сохранению своей позиции и правящего статус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популизм,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популизм, венгерская партия Фидес, венге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иктор Орбан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 (2000-2019年)\*

王思羽\*\*

**【内容提要】**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政治民粹主义伴随其政治经济转型进程不断蔓延加剧。进入21世纪,虽然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出现仅十几年,但乌克兰已然成为后苏联空间中遭遇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突出案例。在经历了2014年的政治危机和持续的顿巴斯冲突后,乌克兰政治逐步进入了民粹主义全面盛行的新阶段。乌克兰民粹主义相较整个欧洲区域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极端化,强烈的反民主属性和家长制政府偏好,分裂矛盾的意识形态,过度渲染和营造社会危机,以及盲目的区域一体化期待。究其成因,可归结于该国历史上对统治精英“外来化”的认知,独立后缺乏新的民族国家认知与主流意识形态,“团结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整个社会对阶层分化和等级制度的共识。这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将对乌克兰政治持续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关键词】**乌克兰民粹主义 乌克兰政治文化 乌克兰政治 乌克兰精英

**【中图分类号】**D7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153  
(37)

###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民粹主义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数据库”(项目批准号:17VDL001)乌克兰国别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 王思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题。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危机持续不断，民粹主义政党和思潮，对乌克兰国家转型进程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新生的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公仆”及其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横扫 2019 年乌克兰的总统和议会大选赢得执政权，引发了研究界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的广泛关注。

乌克兰不仅是欧亚地区民粹主义现象最为显著的转型国家，也是当今全球性反建制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突出案例。其民粹主义从何缘起，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特征和动因又如何，对乌克兰政治产生了怎样的政治影响？透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乌克兰国家转型困境的本质和趋势。

学界关于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文献，与对拉美和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明显稀缺，且主要以乌克兰语文献为主。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关注的较早的学术文献，可追溯到发表于苏联时期的维德林（Д. Выдрин）的文章“民粹主义技术—分析政治伎俩的经验”。<sup>①</sup>在随后的数年里，学界围绕乌克兰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起源、成因等若干重要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第一种观点以乌克兰学者格里岑科（О. Гриценко）为代表，他认为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叶的俄国古典民粹派。由于乌克兰民粹主义显著的“文化本质主义”特征，并强烈映射到文化和政治层面，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在近代的发展与历史是一脉相承的。<sup>②</sup>中国学者马龙闪也做出了相似的界定，他认为在整个沙俄地区，民粹主义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度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产物，因此其产生应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俄国社会。<sup>③</sup>第二种观点认为，整个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政治与社会都应当被视为（民粹主义）研究的对象，这也是早期普遍的观点，

---

① Выдрин Д. Технология Популизму. Опыт Анализа Полити - Ческих Уловок// Диалог. 1990. №.3. С.36-46.

② Гриценко О. Світоглядне. Історичне і Культурне Коріння, Феномен Популізму в Пострадянському Просторі// Матеріали Українсько-Білоруського Семінару. К: УЦКД, 1999. С.7-25.

③ 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2 期。

是基于对民粹主义现象较为“广泛”的解释。罗马纽科<sup>①</sup>、维拉·乌勒佳克<sup>②</sup>、尤里·马卡拉<sup>③</sup>等人指出，鉴于现代乌克兰政党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特征的联系，民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乌克兰独立后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政党所固有的特征。即，在现代乌克兰政治中，所有政治力量都有民粹主义倾向。基扬卡（І.Б. Кіянка）认为，这种简单的界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因为民粹主义在该国的苏联系统垮塌之前无从谈及，正是公民政治的出现，才使该国的民粹主义有了表达形式和发展方向。<sup>④</sup>第三种观点反对一概而论，强调要对乌克兰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更准确的解释和判定。此种观点将乌克兰当代民粹主义的起源判定为，从反对库奇马运动到“橙色革命”爆发的政治转变阶段（2000–2004年），或“后共产主义国家第四次民主化浪潮”时期（1996–2004年）。<sup>⑤</sup>帕夫连科<sup>⑥</sup>、伊万·波博奇<sup>⑦</sup>认为，由于民粹主义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和模糊性，民粹主义和蛊惑人心的政治行为不能简单等同，对于作为政治斗争方式的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民粹主义，二者之间必须

---

① 罗马纽科认为，乌克兰政党的民粹主义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因为他们的纲领具有普遍性，目的是吸引“每个人”，而非特定的社会群体。参见 Романюк А. Популізм і розвиток партійної системи в Україні, Партійна система сучасної України: еволюція// Україна-Європа-Світ.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збірник наукових праць. 2012. С.242-258.

② 维拉·乌勒佳克和尤里·马卡拉强调，乌克兰社会的特点是政治文化水平低，社会流动性强，各政党利用人群的直觉和情感，通过民粹主义蛊惑人心。参见 Бурдяк В, Макар Ю. Популізм – складова діяльності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політичних партій// Україна-Європа-Світ.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збірник наукових праць. 2012. Вип.10. С.130-138. [http://nbuv.gov.ua/UJRN/Ues\\_2012\\_10\\_14](http://nbuv.gov.ua/UJRN/Ues_2012_10_14)

③ Бурдяк В, Макар Ю. Наукові підходи до дослідження і розуміння політичної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ії в країнах ЦСЄ// Україна-Європа-Світ.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збірник наукових праць. 2013. Вип.12. С.209-219.

④ Кіянка І.Б. Популізм як виклик публічному управлінню: історичний аспект// Демократичне врядування. 2018. Вип.21. [http://nbuv.gov.ua/UJRN/DeVr\\_2018\\_21\\_8](http://nbuv.gov.ua/UJRN/DeVr_2018_21_8)

⑤ 麦克福尔提出，“第四次民主浪潮”是指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前共产主义精英纷纷垮台阶段，始于1996年的罗马尼亚，接下来是保加利亚（1997年）、斯洛伐克（1998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1999–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和乌克兰（2004年），参见 M.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2002, Vol.54, No.1, pp.212-244.

⑥ Павленко І. Ідеологічні трансформації провідних політичних партій України// Стратегічні пріоритети. 2008. №.1. С.13-19.

⑦ Побочий І.А. Політичний популізм і його місце в сучасному протистоянні політичних сил в Україні// Мультиверсум. 2008. Вип.70. С.42-52. [https://filosof.com.ua/Jornel/M\\_70/Pobochuj.pdf](https://filosof.com.ua/Jornel/M_70/Pobochuj.pdf)

加以区别，而后者则始于 21 世纪初的乌克兰。乌裔加拿大学者塔拉斯·库兹奥在此基础上直接指出，乌克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发源，是“尤利娅·季莫申科联盟”党团（BYuT）的出现。<sup>①</sup>

民粹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有争议的术语，可用于指称各种各样的现象。<sup>②</sup>政治学家威尔·布雷特将其描述为，“一个因滥用和误用从而导致概念畸变延伸的经典案例”。<sup>③</sup>所以目前研究界用来解释民粹主义核心要素时，多采用一种共识性框架，即，从三个重要且紧密联系的特征，来更好地理解和判定民粹主义的定义。一是分别将人民和精英视为两个（在各自内部）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二是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建立一种本质上是道德性的敌对划分；三是将人民视为在道德层面掌握绝对制高点的一方，并强调从精英手中恢复或夺还“被窃取的”的人民主权。<sup>④</sup>同时，民粹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的集合。其意识形态对政治的“广泛”认识，只取决于一个单一的分歧，即“好人民”与“坏精英”之间的道德冲突；其政治行动则是遵循由“精心修饰的大众形象”的领导者，率领一个虚构的、包含全体“人民”的子集，运用政治运动手段实现特定的政治动员，其特点是自下而上性和不妥协性。

笔者认为，以上定义可以更明确地对“乌克兰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第一，在不同时期，乌克兰政治参与者的集体行动动机，是否紧密而

---

① Taras Kuzio, “Democratic Revolutions from a Different Angle: Social Popu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s 2004 Orange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12, Vol.20, pp.41-54.

② Margaret Canovan, *Popu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1, p.3; Margaret Canovan, “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82, Vol.30, No.4, pp.544-552; Tjitske Akkerman, “Populism and Democracy: Challenge or Pathology?”, *Acta Politica*, 2003, Vol.38, pp.147-159; Cas Mudde,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

③ William Brett, “What’s an Elite to Do? The Threat of Populism from Left, Right and Centr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013, Vol.84, No.3, pp.410-413.

④ Ben Stanley,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8, Vol.13, No.1, pp.95-110;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Vol.39, No.4, pp.541-563; Cas Mudde,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 Kirk A Hawkins, “Is Chá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9, Vol.42, No.8, pp.1040-1067; Matthijs Rooduijn, “The Nucleus of Populism: 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3, Vol.49, No.4, pp.573-599.

明确地与上文所述的这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第二,在该意识形态指导下,以“人民”身份为主导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能够直接引领或极大地加强乌克兰社会的民间政治动员。第三,由于民粹主义对“人民”和“精英”的泛化定义,<sup>①</sup>使得民粹主义者可以自由地与“政治光谱”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因此,乌克兰某一较大政治团体或其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高度变化或矛盾分裂的意识形态表达,也可以被视为判定与甄别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及其规模的重要指标。

基于这种对民粹主义“严格”的衡量标准设定,可以发现,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独立意识较强的原苏联共和国,其在苏联末期和独立初期,乃至1994年的议会大选,虽然存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并诞生了多个较有影响力的政党,然而其最大的动员驱动力与合法性,仍是由“反苏联”和“去共化”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对民主权利的呼吁所共同推动的;而非源自“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尽管在东欧和中欧国家,政治危机和重建制政党都是伴随民主化开始出现的,但此时重建制行为者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在乌克兰制造一种长期的、全系统的政坛洗牌,或是一场选举“地震”。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多数政治精英,都分别流入了乌克兰社会党、劳工党和1994年恢复称号的乌克兰共产党之中。这使他们在乌克兰政坛中的影响力和声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依靠在该系统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特定表述,无法揭示该时期乌克兰政治和民粹主义之间的明确关系及程度,充其量只是“模糊”。与之相反的是,在2000年底开始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中<sup>②</sup>,运动领袖和抗议者们愈来愈明确地表达出反寡头和重建制情绪,包括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对“人民权利”恢复的愿望,以及对以库奇马为首的传统政治

---

① 前者可基于阶级、种族或民族、宗教信仰等,后者被描绘成一个同质的实体,可以是政治、经济或文化的。

② “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是一场持续且在逻辑上为承接关系的抗议运动,始于2000年12月15日开始专门针对“磁带丑闻”的抗议,并持续至2001年初的基辅清场行动,2002年季莫申科车祸事件导致了再度抗议。2002年9月17日,乔治·贡加泽遇刺两周年纪念日,两万人在基辅大游行。2003年3月10日,“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再次于基辅大游行。此后近两年中存在不间断但分散的抗议活动,直到“橙色革命”爆发。然而“橙色革命”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该运动的直接结果或过程的一部分。

精英的谴责与声讨。“惩戒行窃的腐败精英”作为当时的重要口号，不仅体现了这场持续性冲突的道德性<sup>①</sup>，还体现了无妥协的对抗性。从2000年底的“磁带丑闻”引发的抗议开始，乌克兰当局就不被视为合法竞争对手，也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辩论和解释的空间，只因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些都使这场长达四年多的反对库奇马政府的持续性政治浪潮，不同于其他一般形式的民主化政治运动。除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模式上符合前文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还带有“西方和苏联现代化的双重融合”愿景，既包含了对西方民主契约精神的渴望，也有着对苏维埃国家“秩序”道德责任的期待。<sup>②</sup>其兼具左右翼的矛盾且分裂的意识形态表现，是现代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从而使得这场政治运动对于乌克兰而言，不仅是“一场席卷中东欧国家民主革命的浪潮”，更代表着民粹主义开始在乌克兰现代政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也将以此作为起点。

此外，其他一些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较为集中于其成因方面，并过度拘泥于某个单一变量的作用。如涅乔斯娜认为，该国民粹主义是公共治理失败的附属品，即政府当局采取的一些必要但不受欢迎的行动，造成了冲突，促进了民粹主义者对舆论的操纵。<sup>③</sup>普里亚特科<sup>④</sup>、尤里·马茨耶夫斯

---

① Kirk A Hawkins, “Is Chá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9, Vol.42, No.8, pp.1040-1067.

② 福尼尔的研究指出，把橙色革命视为与苏联历史的彻底决裂是错误的。由于乌克兰独立后十年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失败的特殊性，橙色革命更应该被视为人们对苏联（国家责任）和西方（民主监督）“秩序”双重恢复的向往。参见 A. Fournier,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beyond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in Paul J. D’Anieri, Editor, *Orange Revolution and Aftermath: Mobilization Apathy and the State*, Washington DC and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10-128.

③ Нечосіна О.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мотивації в популістському управлінському впливі// Актуальні проблеми держ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іння. 2002. Вип.90. С.159-167.

④ 作者指出，乌克兰“制度体系丧失吸收社会需求的能力”，为政党在争取选举承诺和权力的斗争中，向公共空间引入这些要求和利益的解释，提供了更多机会。与此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不仅在于政治家缺乏对其承诺负责的动力，而且还因为现有制度迅速削弱了履行这些任务的能力。参见 Прядко Т.П. Актуалізація Популізму Як Один Із Проявів Зростання Психологічної Тривожності Суспільства В Умовах Глобалізації// Молодий вчений. 2017. Вип.49. №.9. С.137-142.

基、亚历山大·卡辛斯基<sup>①</sup>认为，乌克兰民粹主义是作为制度危机的结果而出现的。奥列斯·利斯尼丘克<sup>②</sup>认为，民粹主义本身即是成因，因其叙事和话语在乌克兰的公共传播中逐步占据霸权地位，导致乌克兰政治陷入了社会失去信任与官员放弃责任的恶性循环。维拉·乌勒佳克、尤里·马卡拉<sup>③</sup>则指出，在当代乌克兰政治中，政治家从一开始（乌克兰独立）就被迫使用某种民粹主义手段，在权力斗争中遵循相应的风格，因此，民粹主义一直都在乌克兰政治精英身上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将乌克兰民粹主义置于全球民粹主义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比对、归纳分析，还比较欠缺。同时，已有的成果未囊括俄乌历史问题和乌克兰特有的政治文化，忽略了民粹主义对乌克兰现代政治危机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民粹主义发展与演化，重点就其民粹主义的特殊表现进行归纳；从历史和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其成因，并对该国民粹主义造成的一系列政治影响，进行论述和总结。

## 二、乌克兰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独立后的乌克兰民粹主义政治，始于季莫申科及其所代表的政党集团主导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民粹主义特质的公众政治运动与政党政治。它不仅符合前文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同时这一政治现象还首度对独立建国后的乌克兰政治系统，产生了剧变性的影响。乌克兰的民粹主义经历了从登台出现到浸染泛化，最终全面成为

---

① 马茨耶夫斯基的观点是，乌克兰民粹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其民主制度的弱点所致；缺乏改革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出现。然而，这种民粹主义在东西部政治力量的角逐中都被掩盖了。参见 Ю. Мацієвський, О. Кашинський. Витоки популізму у Центрально- Східній Європі// Ідеологія та політика. 2017. №.2(8). С.15-37.

② О.В. Лісничук. Популізм в Україні: теоретичні засади і проблеми вивчення феномену // Наукові записки. 2015. Вип.4(78). С.63-73.

③ 两位研究者指出，乌克兰政治精英从一开始（苏联解体）就旨在广泛动员群众反对统治精英和国家机构（苏联时期遗留的传统精英——政党、工会等），并以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为基础，意识形态化的想法和符号只是次要的。参见 Бурдяк В, Макар Ю. Популізм Складава Діяльності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Політичних Парій// Україна- Європа-Світ.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збірник наукових праць. 2012. Вип.10. С.130-138. <http://journals.urau.com/index.php/2225-3165/issue/viewFile/5525/1983>



主流的发展历程，贯穿该国 21 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是后苏联空间中遭遇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突出案例。

### （一）民粹主义的萌发（2000-2004 年）

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第一场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政治事件导火索，是 2000 年 12 月发生的库奇马磁带丑闻事件。<sup>①</sup>该事件极大影响了乌克兰独立后的国内外政策实施，并波及时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的政治前途，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2000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1 年 3 月 9 日，在基辅爆发大规模抗议，反对派发起了一场被称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UBK）的非暴力抗议运动，要求库奇马立即辞职。尽管当时的乌克兰经济有所增长，库奇马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却低于 9%。反对派力量包括政党组织、公民社会和媒体，他们要求“重置”精英权利。这场运动造成了一系列重要影响。首先，危机虽没使库奇马政权垮台，但却严重破坏了乌克兰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公众对乌克兰公共机构和精英的信任大幅度降低。其次，“年轻乌克兰知识分子”的 1000 多名成员签署了一份联名书，反映了年轻人对精英和寡头执政系统的期望幻灭<sup>②</sup>，也意味着民粹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在堆积。再次，这场运动不断得到乌克兰政客和政党的支持，因此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政治影响力。如，尤利娅·季莫申科及其党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还有来自最高拉达议长奥列克桑德·莫罗兹为代表的乌克兰社会党的声援，以及乌克兰一些边缘化政治团体的支持和参与，例如乌克兰国民自卫队（UNA-UNSD）和乌克兰人民运动。最后，由于议会中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支持时任总理尤先科，所以直接导致了乌克兰的政坛洗牌。2001 年 4 月 26 日，尤先科从政府辞职后成立了“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组成强大的反对派力量，导致政坛对立的加剧和“橙色革命”的爆发。

---

① 丑闻始于 2000 年 11 月 28 日的基辅，乌克兰政治家奥列克桑德·莫罗兹公开指责库奇马总统参与绑架记者乔治·贡加泽和许多其他罪行，并对外公开了总统秘密谈话的精选录音，据称证实了库奇马绑架贡加泽的命令。该丑闻演变成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为四年后的橙色革命奠定了基础。

② T. Kuzio, “Civil Society, Youth and Societal Mobilization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6, Vol.39, No.3, pp.365-386; T. Kuzio, “Ukraine is Not Russia: Ukrainian and Russian Youth Compared”, *SAIS Review*, 2006, Vol.26, No.2, pp. 67-83.

同时，季莫申科、尤先科等政治领袖的纲领性思想趋于成熟，其所率领的团体也在这场抗议运动中趋于完善，并在 2002 年和 2004 年的竞选活动和“橙色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可以被视为现代乌克兰街头政治运动的起点，和乌克兰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孵化器，不仅唤醒了政治冷漠的年轻人，还直接推动了橙色和后橙色政党的出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与约在同时期发生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政治危机不同，这场运动除了要求进一步的自由民主之外，还反映出强烈的自由社团主义和家长式保守主义诉求。包括对私人 and 公共领域的定义模糊、对资本主义公司纯粹的逐利性，以及国家对分配不公现象缺乏干预等问题的强烈不满。因此，曾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乌克兰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分化为两个派别。一个是社会民粹主义色彩愈加强烈的激进反对派（祖国党-国家救赎阵线-季莫申科集团），另一个是由温和的民族民主党人组成的“建设性反对派”（我们的乌克兰）。

作为乌克兰现代政治中较早带有明确社会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团体，季莫申科集团是一个包含了祖国党（全乌克兰联盟“祖国”）、共和纲领（乌克兰共和党“索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共和党等四个政党的党团。其整体政治立场为中间偏左，同时带有亲欧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色彩。以“团结互助”（Solidarism）为口号，反对阶级或种族斗争，反对在生产生活中的弱干预型小政府模式，倡导社会各单元结构间的和谐状态。<sup>①</sup>季莫申科本人是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家，她通过 2002 年 12 月在国际道德与政治会议上的讲话，毫不留情地抨击精英政治，指出乌克兰当前的国家权力和大众传媒，都是资本系统的工具，并将其归结

---

<sup>①</sup> 团结主义分两种，世俗和非世俗的。纯粹世俗的团结主义思想和哲学基础，是 19 世纪由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和法国律师布尔乔瓦（Leon Bourgeois）奠定的，早期影响仅限于法国。在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波兰等国，团结主义思想则基于天主教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社会学说。并由教皇皮乌斯十一世和德国罗马天主教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海因里希·佩斯进一步深化，从教义角度对社会和经济层面上的团结主义道德和伦理概念，进行了更规范和明确的定义。这两种团结主义均持有“对社会负责的市场经济”思想，成为许多二战后的欧洲政党（包括法国中间派、奥地利人民党、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基督教民主党等）的社会经济思想基础。德国前总理阿登纳的许多政治理念，都深受该思想的影响。

为“民主”的弊病。其讲话还充斥着对发达国家政治与经济系统的不屑。<sup>①</sup>在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丑闻事件后，乌克兰民众对寡头精英政体的不信任与焦虑感，集中爆发。在此背景下，季莫申科的民粹主义理念与口号，为其所率领的新建政党联盟（季莫申科集团）赢得了民意基础。该集团在接触媒体机会和地方政府支持度都很有限的情况下<sup>②</sup>，仍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的7.26%选票，夺得最高拉达450个席位中的22个<sup>③</sup>，远超各方预期。<sup>④</sup>作为其党团的基石与核心，季莫申科亲自领导的祖国党，当时已拥有25万名党员，并吸纳了大量年轻人。可以说，祖国党的潜力比从属于尤先科集团（我们的乌克兰）中的任何政党都要巨大，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sup>⑤</sup>同时，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季莫申科对尤先科2004年的选举至关重要。她的个人号召力与感染力、她营造出的反寡头政治和反腐败语境的煽动效果，以及“强盗进监狱”的著名口号，极大地推动了橙色运动的爆发。如果没有她和她的党团，橙色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可以被视为乌克兰民粹主义实践的首次成功。季莫申科掀起了一场社会性的“道德净化”，将“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勾勒为“善意与邪恶”的斗争，使任何人在这场革命中妥协，都变得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后橙色时代”的乌克兰政治环境陷入了泛民粹化的泥潭。

## （二）政治环境的泛民粹化（2004-2014年）

---

① “Yulia Tymoshenko, Speech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rality and Politics”, Dec.6, 2002, <https://awpc.cattcenter.iastate.edu/2017/03/21/speech-a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morality-and-politics-dec-6-2002/>

② 季莫申科因涉嫌在燃气公司贪污而被起诉，并被短暂监禁。她领导的季莫申科集团，与乌克兰社会党一样，几乎被官方管控的主流媒体封禁。参见“Ukraine’s election frontrunners”, *BBC News*, 28 March, 2002.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1898223.stm>

③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е об’єднання Батьківщина. Участь у виборах народних депутатів України по багатомандатному округу. 08 апреля 2012. [http://da-ta.com.ua/mon\\_mainnews/861.htm](http://da-ta.com.ua/mon_mainnews/861.htm)

④ Ian Jeffries,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Baltic and European States in Transition”, *Routledge Studies of Societies in Transition*, Oxford shire: Routledge, 2004, Vol.22.

⑤ 祖国党在2002年大选中获得了13个议会席位，获得了近200万选民的支持。25万名党员中约有11万人受雇于制造业，近5万人工作于人文学科，30%为年轻人，近一半为女性。该党在2002年后迎来蓬勃发展，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22.26%和30.73%的支持率。相比之下，尤先科集团只有13.96%和14.16%的支持率。

“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社会分裂加剧。伴随着持续的东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对乌克兰政治文化的渗透进一步增强。在这一阶段，乌克兰民粹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民粹主义话语语境与反建制主张等特质，成为政党快速发展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迅速。如，有着明确社会民粹主义特征的季莫申科集团，在 2006 年和 2007 年议会大选中，分别获得 22.26%和 30.72%的支持率，一举成为乌克兰议会第二大党。即便在 2011 年 6 月投票制度修改后禁止党团联盟参选，该集团内的祖国党仍在 2012 年选举中赢得 25.55%的支持率。另一方面，乌克兰各派政党开始出现整体性的泛民粹化转变。如地区党和乌克兰民主改革联盟这种发展势头较好的党派，均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民粹化转型来提高支持率的。地区党早在 2004 年总统大选之前就将其政治意识形态向左翼民粹偏移，其结果是，亚努科维奇夺走了东部地区原属于乌克兰共产党的很大一部分选民。<sup>①</sup>乌克兰民主改革联盟则从 2010 年更名后<sup>②</sup>，就以反对传统政治精英<sup>③</sup>、发动更严酷的反腐败惩戒运动等激进民粹主义纲领，赢得了更高的支持率。

其次，民粹主义成为寡头精英间恶性竞争的工具。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政治学专家尤利娅·拜登科(Yuliya Bidenko)指出，后橙色时代的乌克兰，虽然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 60%-70%的选举投票率，但乌克兰人似乎更多只考虑如何依靠选举来对抗或改变精英，却对参与日常决策不感兴趣。<sup>④</sup>这导致了乌克兰政治的特殊性，即，由于多数大型政党高度依赖领导个人魅力，以及与寡头集团的紧密联系，使形态各异的政治主张（苏联历史判定、对俄

---

① 2004 年 10 月，亚努科维奇承诺将工资和养老金翻一番，并进一步削减燃料价格，以吸引选民，特别是共产党选民（其中大多数人在第二轮投票时支持他）。

② 2010 年 7 月中旬，“新国家”党（原“欧洲首都”党）更名为乌克兰民主改革联盟。参见“New Country party renamed UDAR of Vitaliy Klitschko”, *Kyiv Post, Interfax-Ukraine*, July 13, 2010, <https://www.kyivpost.com/article/content/ukraine-politics/new-country-party-renamed-udar-of-vitaliy-klitschk-73378.html>

③ Кличко знайшов собі нову партію.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Субота. 24 апреля 2010. <https://www.pravda.com.ua/news/2010/04/24/4964575>

④ Oksana Iliuk, “How Has Populism Influenced Political Culture in Ukraine?” *Ukraine World*, May 22, 2019, <https://ukraineworld.org/articles/ukraine-explained/how-has-populism-influenced-political-culture-ukraine>

关系、入欧选择、反腐败、社会福利等关键问题)和辩论沦为逢场作戏。政客惯用“腐化官僚”、“人民窃贼”等激进口号,来打击和讨伐其他竞争对手,一切均是为了维持自身合法性。因此,乌克兰政坛逐步沦为一些寡头利用民粹主义这一工具,遏制或控制其他寡头的平台。

### (三) 民粹主义全面盛行(2014年至今)

2014年危机之后,乌克兰政治逐步进入了民粹主义全面盛行的阶段。持续的内战和经济衰退,导致更大规模的民粹化浪潮;同时,形式远大于实质的新型民粹主义政党随之崛起。在2019年总统大选中,“人民公仆”候选人泽连斯基,通过运用网络政治的方式,成为该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他的当选也标志着更“纯粹”且全面的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反精英和反建制思潮达到了空前的烈度。根据基辅国际研究所在2018年底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当被问到“在乌克兰的公共活动中,最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是谁?”这一问题时,具有明确态度且比例较高的回答主要来自普通居民(29.8%)和志愿者(24.4%),来自政客、中央部门官员、司法人员和地方官员等政治精英群体的回答总共仅占6.7%,记者和媒体的授信度还不到8.5%,而态度不明确的受访者比例则高达25.8%。当被问到“希望由谁在不久的将来改善乌克兰的局势?”时,超过53.9%的受访者选择不清楚或不认为它会发生;在明确的回答中,较多的答复是通过反对派执政或控制权力(15.4%),以及能在正确方向上制定决策的公众人物(7.4%)。当被问到“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问题应归咎于谁?”时,几乎4/5的受访者(78.9%)都将矛头指向一处,即,无能、腐败的政治家和官僚。<sup>①</sup>在这样的背景下,泽连斯基与其他民粹候选人多重的政治承诺相比,几乎什么也没有答应。在一定程度上,他代表的是“没有政策”。正如表1所示的那样,泽连斯基的胜选,不是因为他提出的任何一条具体政策或政治理念吸引人,而仅仅因为他是“民粹主义”品牌的全新候选人。该品牌的基石和理念是:“政治家不过是人民的仆人”。该政党及其候选人充分利用了乌克兰人对政治愤世嫉俗的态度,借助一部备受欢迎的同名电视剧《人民公仆》,讽刺那些“典型的”

---

<sup>①</sup> Прес-Релізи Та Звіти Суспільно-Політичні Настрої Населення: Листопад-Грудень 2018 Року. 11 декабря 2018. <http://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806&page=9&t=3>. 该民意调查仅在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领土上进行。

乌克兰精英政客，并对寡头们加以指责。候选人泽连斯基在电视剧和现实中的身份重叠，使整个大选就像是乌克兰人期待的“人民公仆”突然从电视屏幕中跳了下来，随后发起了一场草根竞选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分选民甚至搞不清海报是泽连斯基主演的电视剧广告，还是对他真正竞选总统的宣传。对乌克兰人来讲，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的“平民”符号象征和“反精英”的表演趣味，远超选举本身所代表的实质意义。高达 54.4%的受访者投票选择他的理由是，这是从未见的新面孔；24.9%受访者的投票原因，是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与之直接互动；甚至有 6.1%受访者的投票理由，是其在电视剧中所饰演的总统角色成功。由此可见，有很大一部分公众在选举过程中痴迷于信息娱乐，他们忘记了乌克兰正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也不在乎政治家能真正带给他们什么。选举过程可以被视为“谁更民粹主义”的政治选秀，和绝大多数乌克兰人对现状不满的纯粹宣泄。

可以说，在 2010 年以来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反建制、反精英叙事取得成功的背景下，“人民公仆”党的出现并非特例。包括斯洛伐克的独立人士党、立陶宛的工党和国家复兴党、捷克共和国的ANO等，所有这些政党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他们的领导人均宣称自己是非政治背景的局外人，每个人的履历都被巧妙地用于更广泛的反建制、反意识形态甚至反政治的叙事中。<sup>①</sup>其中不乏商人、大学教授、记者和演员，例如斯洛文尼亚第九任总理马里安·沙雷茨，就与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有较高的相似度，此人也曾因其喜剧演员和政治讽刺作家的职业生涯而闻名。同样，这些政党都避免使用传统的标签来描述他们的政治方向，并宣称已经超脱了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冲突。<sup>②</sup>在乌克兰，腐败丑闻、政府危机、经济困难，以及随之而来对政党和政党民主信任的侵蚀，为泽连斯基这样的候选人与“人民公仆”的出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使之与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有很大相似之处。乌克兰的情况正如弗拉斯蒂米尔·哈夫利克在中欧地区民粹主义的

---

① Gintaras Aleknonis, Renata Matkevičienė, “Populism in Lithuania: Defining the Research Tradition”, *Baltic Journal of Law & Politics*, 2016, Vol.9, No.1, pp.26-48.

② Vlastimil Havlík, Vít Hloušek, “Dr Jekyll and Mr Hyde: The Story of the Populist Public Affairs Par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4, Vol.15, No.4, pp.552-570; Juraj Marušiak,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as a Challenge for the Party System in Slovakia”, *Politologický Časopis*, 2017, Vol.24, No.2, pp.179-200.

研究所述，“对当前执政精英的不满，不一定会转化为对既有的反对党，或在意识形态上持有对立立场候选人的支持。在对政党系统和政体制度信任度低的背景下，投票给一个非政治背景的民粹主义新面孔，似乎是一个可行的选择。”<sup>①</sup>因此，“人民公仆”在乌克兰的成功绝非偶然，它象征着乌克兰新型民粹主义政党政治时代的来临。

表 1 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票给泽连斯基的受访者中的比率，%

最多可以选择两个答案	乌克兰整体 (100%)
他是体系之外的人，是政治“新面孔”	54.4%
相信他的诚实，他与寡头间保持着独立性	29.8%
可通过社交媒体充分参与并分享他的观点，喜欢他的竞选方式和程序	24.9%
支持他的民主理念，即通过全民公决做出重要决定，完全由人民做主	20.1%
他宣布提名，表明了意图的严肃性	16.7%
当前政客都很“邪恶”	8.8%
已经发生针对他的迫害运动，证明了他对当前系统的威胁	6.1%
我喜欢他在《人民公仆》中饰演的总统	6.1%
其他	0.9%
很难说	0.3%

数据来源：基辅国际研究所<sup>②</sup>

### 三、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原因

乌克兰民粹主义在短时间内迅速得以发展，与其特有的近代历史、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后苏联转型国家国情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动因使得该国的民粹主义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作为其邻国的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相比，具有显著的异质化特征。乌克兰民粹主义在反建制、反民主、意识形态多变，和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高期待等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

#### （一）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点

民粹主义在乌克兰的发展，扎根于该国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经济与社

① Vlastimil Havlik, “Technocratic Populism and Political Illiberalism in Central Europe”,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19, Vol.66, Issue 6, pp.369-384.

② КІС. Суспільно-Політичні Настрої Насе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 Січень-Лютий 2019 Року. 14 февраля 2019. <http://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823&page=7&t=3>. 该民意调查仅在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领土上进行。

会环境，进而形成了一些独有的特征，并渗透到了该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之中，有些方面比当今欧洲民粹主义表现得更为极端和激进，有些方面则截然相反，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极端化。民粹主义常见的关于反对腐败精英的激进语境，是“一种认为社会最终被概化成两个在各自群体内部同质，且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sup>①</sup>，即，在“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的二元观中，政治应该是前者一般意志的表达。在乌克兰，这一语境和言论，可以被视为该国民粹主义发展历史中最悠久、最有效、最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其烈度甚至远超其他国家。库奇马磁带丑闻事件以来，民粹主义者一直将“腐败”当作最有力的煽动工具，来反对当局和寡头。虽然说反精英言论是全球民粹主义话语系统的核心，但在乌克兰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乌克兰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经常攻击腐败和寡头，但寡头与乌克兰政党重要资金来源的紧密联系，使公众对总统、执政党和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如，季莫申科本人虽然是较早举起反腐败与反寡头大旗的民粹运动家，然而她在成为国会议员的时期内只参与了55%的反腐败投票；银行改革投票低至34%，能源投票低至13%，而这两个部门一直被诟病充斥着腐败和遭受寡头控制。根据盖洛普中心的调查，在2019年3月总统大选之前，仅有9%的乌克兰人对其国家政府有信心，这是连续第二年世界上最低的信心水平，低于原苏联国家的中位数(48%)以及2018年的全球平均水平(56%)。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91%)认为整个政府腐败横行，不可信赖。<sup>②</sup>如表2所示，乌克兰社会对政府机构、政策制度以及媒体，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们最信任的群体或单位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志愿者组织或教堂，而信任度最低的是政府和议会机构。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候选人，都抓住这一点来煽动共鸣，以树立自己的道德信誉和廉政能力。“我是局外人，为普通民众辩护，其他竞争者都来自于腐败的精英阶层”，这种极端的语境在乌克兰逐步被建构起来，使得几乎所有民粹主义者都陷入其中，并充分运用它来反对所有人，利用“腐败、寡头、

---

①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Vol.39, No.4, pp. 541-563.

② Zach Bikus, “World - Low 9% of Ukrainians Confident in Government”, Gallup, March 21, 2019, <https://news.gallup.com/poll/247976/world-low-ukrainians-confident-government.aspx>



官僚精英”来打击对手。这使得乌克兰的“反精英”和“反建制”色彩，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都极具代表性。

表2 乌克兰社会对社会机构或组织的信任度民意调查

(百分比值为信任者比例与不信任者比例的差额/平衡值)

2012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b>信任最高前5位（排序由高到低）</b>			
教堂（44.7%）	志愿者（44%）	当地普通居民（65%）	当地普通居民（56%）
媒体（12.2%）	教堂（40%）	志愿者（54%）	志愿者（47%）
公共组织（-2.4%）	非政府组织（14%）	教堂（40%）	教堂（28%）
军队（-2.4%）	军队（12%）	军队（30%）	军队（24%）
反对派（-28.6%）	移民（-1%）	流离失所者（14%）	非政府组织（16%）
<b>信任最低前5位（排序由低到高）</b>			
最高拉达（-64%）	俄罗斯媒体（-74%）	最高拉达（-77%）	最高拉达（-72%）
政府（-53%）	最高拉达（-72%）	俄罗斯媒体（-74%）	俄罗斯媒体（-71%）
警察系统（-47%）	乌克兰政府（-66%）	乌克兰政府（-63%）	乌克兰政府（-63%）
乌克兰总统（-44%）	反对派（-56%）	乌克兰总统（-55%）	乌克兰总统（-54%）
反对派（-28.6%）	乌克兰总统（-48%）	反对派（-46%）	反对派（-4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基辅国际研究所统计数据自制<sup>①</sup>

2. 较强的反宪政民主性。很多学者都强调了民粹主义者的反民主属性，指出民粹主义者不仅是反精英主义者，同时也必然是反多元主义者。<sup>②</sup>这导致了民粹主义最危险的特征：他们坚信，只有自己是正确的，从而不尊重他人的意见。<sup>③</sup>这一点在乌克兰的民粹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虽依赖民主制度，却经常将议会、最高法院等民主政治机构认定为“腐败”，并加以嘲笑，称其被不负责任的精英控制而非反映“人民”的意志。因此，民粹主义者对于“宪政民主制度”本身构成了威胁。首先，乌克兰的民粹主义

① КІІС. Довіра Українців До Соціальних Інституцій. 18 апреля 2012. <http://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81&page=39&t=3>; Довіра До Соціальних Інституцій Та Груп. 15 января 2016. <http://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579&page=20&t=3>; Довіра Соціальним Інститутам. Грудень 2018. 29 января 2019. <http://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817&page=8&t=3>. 该民意调查仅在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领土上进行。

② Jan-Werner Müller, “Parsing Populism: Who is and who is not a populist in these days?”, *Juncture*, 2015, No.2, Vol.22, pp.80-89.

③ Stefan Rummens, “Populism as a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Cristo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A.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Pierre Ostigu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54-570.

者更倾向于后苏联国家都具有的威权主义稳定之路。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除2019年上台执政的“人民公仆”党外，乌克兰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政党，都试图将全部权力推向中央政府并捍卫强政府制，试图借助民粹主义工具以谋求高度的权力集中。其次，他们普遍对苏联式家长制政府有怀旧之情，该特点无论在“亲西方”或“亲俄”的民粹政党身上都有所体现。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提及苏联，但在能源、社会福利、私有化等不同领域的诉求中，均表达了对苏联式的“强政府管控”的期望，加剧了人们在经济层面对管理者的依赖；同时，将权力视为个人收益的来源，而不是为社会服务。第三，由于公民社会水平偏低，导致政府和政党都缺乏透明度，并惯用欺骗手段，使民粹主义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也能对社会舆论进行诱导，从而降低了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并使得虚无主义盛行。第四，通过倡导直接民主，进而对民主制度本身进行破坏。“民主倒退始于投票箱”<sup>①</sup>的现实，在乌克兰激烈上演。近年来，该国民粹主义与直接民主之间的关联不断增强，频繁在关键议题上煽动公投。<sup>②</sup>泽连斯基能够胜选的几个主要因素，都在于其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网络政治的方式，来抵制精英和国家机构，并成功地与选民建立起直接联系。在乌克兰，这种“直接民主”已经遭到了滥用。

3. 空洞、分裂的意识形态。乌克兰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灵活、善变和非正规表现，已经超越了莱因哈德·海尼施提出的“海德现象”<sup>③</sup>，或塔格特的“高度变色龙”定义的一般性特征。<sup>④</sup>乌克兰的各个民粹主义政

---

① Steven Levitsky,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8, pp.145-221.

② 2010年，亚努科维奇就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继续部署黑海舰队建议进行全民公投，并在2012年11月通过了乌克兰全民公投的法律；2019年5月，刚当选总统的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呼吁就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6月，呼吁就加入欧盟和北约进行全民公投。季莫申科领导的一项签名收集运动，则专门用来举行反对土地改革的全民公投。

③ 莱因哈德·海尼施称，“民粹主义可以散布于左、中、右翼每个角落，他们经常将左右两端的社和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海尼施以此来描述在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基于权宜之计和机会主义之上的民粹主义现象。参见 Reinhard Heinisch, Oscar Mazzoleni, *Understanding Populist Party Organisation: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6, 23-34.

④ 塔格特将民粹主义者描述为“不情愿的政治”个体，只有当他们感到“受到危机威胁”时才参与政治，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往往处于变化当中。参见 Paul Taggart, *Populism*, Philadelphia: Open Press, 2000, pp.10, 25.

党，不仅在思想和立场上常态性地在政治光谱表上高速变化游移，迎合和利用不同的意识形态来动员选举支持；甚至经常支持与其党纲和口号完全相悖的政策，完全不被原则性的政治纲领或固定的价值观所束缚。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多端或自相矛盾的分裂程度，已经远超捷克、波兰、奥地利、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如季莫申科和其领导的祖国党虽然是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的观察成员，但她的言论和党派的利基政策，往往与乌克兰左翼的社会党完全重合。在很多问题上，其政治纲领与随机临时口号，同其政党的政治价值观完全相悖。“反对派-终身”作为左翼地区党的继承者，其保守的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诉求，却与欧洲最极端的极右保守主义政党几乎一致。2019年赢得执政的“人民公仆”党，干脆以“没有意识形态”作为该党的核心意识形态。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一旦离开首都基辅市20公里或100公里，在那里没人能理解右翼、左翼或中立的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可见，乌克兰民粹主义几乎不存在“右翼”和“左翼”的固有组织形式及其代表的价值传统，其意识形态只能以模糊混沌、虚无分裂来形容。

4. 过度渲染和营造社会危机。在乌克兰，一部分危机现象可以被视为该国民粹主义内在要素的呈现，即民粹主义者通过对“危机”进行语境强化，营造“危机感”以谋求政治利益。<sup>①</sup>民粹主义参与者积极地“表现”和创造危机感，而不是单纯作为信息受体，对真实存在的外部危机做出反应。<sup>②</sup>在乌克兰，这一特点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政治经济转型不顺所导致频繁的经济、政治、能源和军事危机，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因危机缠身而面临重重困境的国家。然而，民粹主义者不仅充分借此动员选票和煽动不满，还在斗争和诉求过程中加剧和营造更强力的“危机”感，使该国的危机和民

---

① 本杰明·莫菲特指出，广泛的民粹主义现象，即危机不仅是催化民粹主义产生的“中立性”外部客观现象，同时民粹主义本身即是危机的一部分。参见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2017, pp.124-125.

② 塔格特将危机视为民粹主义的内在要素，他强调，危机感是民粹主义分析家感兴趣的，而不是客观的。危机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相反，重点应该放在民粹主义参与者创造危机感的能力上，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种意识为他们的信息注入紧迫感和重要性”。塔格特等人对危机和民粹主义的观察表明，危机绝不仅仅是人们“客观”经历的中立现象。参见 Paul A. Taggart, *Populism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75.

粹主义现象本身形成一种往复的因果循环。该国民粹主义者经常对“当局”提出批评，但自己又没有提供替代政策，只是通过操纵或提供虚假数据一再地夸大危机，从而导致更大的危机。<sup>①</sup>这种通过语境和叙事的危机催化，使得乌克兰的诸多公共事务问题被刻意放大，由困境演变为“危机”。然而，无论是“亲西方”还是“亲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仍都在试图利用公众对这种公共生活状态的不满与挫败感，进行政治盈利。民粹主义表现危机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在危机与国家治理的失败点之间建立联系（金融体系、政治体系、公共政策等），从而拥有强调采取某种必要行动（或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来自纠正现有错误并阻止危机的话语权及合法性。泽连斯基、季莫申科和格里琴科等民粹领导人，都在2019年总统大选的过程中，夸大在天然气价格、内战拖延、土地改革和对俄谈判等问题上的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只有当危机被认为是危机时，危机才成为危机；当政治行动的失败，透过在政治或文化领域的放大效应，而成为公众广泛关注的对象时，才能被认定是“更广泛问题”的征兆。<sup>②</sup>在乌克兰，这种特点表现得极为明显，近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投身于这种渲染和表演工作当中。

5. 对于区域一体化的高期待。近年来，在整个欧洲，甚至俄罗斯，民粹主义者都具有浓厚的仇外种族主义、反“文化多元化”等“排他性”诉求，导致了对区域多边一体化进程强烈的质疑浪潮。然而在乌克兰，绝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不仅对区域多边一体化整合表现出积极态度，甚至将推动乌克兰加入区域一体化的承诺，当作其获得民意支持的核心内容，使该国民粹主义与整个欧洲地区形成了鲜明反差。由于乌克兰并没有大量难民停留和申请庇护，以及特别的民族历史关系<sup>③</sup>，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二分法的语境化

---

① Skubenko Maksym, Yulia Tymoshenko, “Antolohiya Manipulyatsiy”, *Vox Ukraine*, 21 November, 2017, <https://voxukraine.org/uk/yuliya-tymoshenko-antologiyamanipulyatsij/>

②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Californi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24-125.

③ 由于在苏联时期分布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遭受迫害的历史，多数民粹主义者甚至一直将这些穆斯林群体视为可以“团结”的反俄盟友。较有影响力的鞑靼族穆斯林领导人穆斯塔法·哲米列夫一直都是乌克兰各派政党的拉拢对象；他先后多次以民粹主义党派成员的身份担任乌克兰国会议员至今。这种案例在当今欧盟几乎已经绝迹。

并不显著<sup>①</sup>，广泛而明确的“排他性”文化动员也缺乏社会民意基础<sup>②</sup>，文化或种族歧视现象并不常见<sup>③</sup>，这些要因使乌克兰尚未出现欧盟国家目前正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当前欧洲拥有执政党或最大反对党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对区域一体化机制表达反对或质疑，而在乌克兰，舆情却截然相反。2013年，有50%的乌克兰受访者支持加入俄罗斯的关税同盟，42%的人支持加入欧盟，反对一体化的人不足10%。<sup>④</sup>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与顿巴斯战争爆发后，并未对该国民众关于加入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观念造成质变影响。2019年2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进行公投，有70%的乌克兰人准备投票赞成加入欧盟，56%的人赞成加入北约，36%的人仍选择加入欧亚关税同盟<sup>⑤</sup>；当被问到外交政策时，有45%的被调查者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有14%的人表示支持加入关税同盟，还有25%的人表示乌克兰不应选择任何区域系统，另有15.3%的人不持立场，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总比例仍

---

① 在1994年以来的七次议会选举中，极端的民族主义党派只在2012年有较好表现，当时斯沃博达（自由）党赢得了10%的支持率，但远低于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参见 Batkivschyna, “Party of Regions gets 185 seats in Ukrainian parliament”, *Interfax-Ukraine*, 12 November 2012.

② 根据2016年欧盟统计的结果，包括英国在内的28个国家中，45%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是欧洲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在乌克兰该数字的峰值仅为20%，绝大多数乌克兰选民对该问题从未感到担忧。在乌克兰，民族地区主义政党或保守种族主义政党，也未能对该国政治产生长期有效的影响力。参见 Посилення управління міграційними процесами та співпраці з питань реадмісії у Східній Європі (MIGRECO). Дослідження з питань інтеграції, злочинів на ґрунті ненависті та дискримінації різних категорій мігрантів. Представництво Європейського Союзу в Україні вул. 2014.

③ 基辅新欧洲中心和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乌克兰受访者表示，他们从未因其语言、宗教或种族、文化习惯而受到歧视。参见 Euromaidanpress, “Ukrainian millennials: apolitical, with family values, and a bit more pro-democracy than Western peers”, December 2, 2017,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7/12/02/ukrainian-millennials-uninterested-in-politics-dream-about-family-and-children/>

④ Кількість прибічників і противників вступу України до НАТО зрівнялася у 2016. за вступ до ЄС майже половина опитаних українців. Interfax-Україна. 18 августа 2016. <https://ua.interfax.com.ua/news/political/364499.html>

⑤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进行的调查显示，实际上，即使在俄乌交恶后的2016年，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国家和民族仍抱有一定的好感，对俄罗斯国家抱有正面评价的比例仍高达40%，其中67%的受访者对俄罗斯人（或俄罗斯族裔）持积极态度。负面评价均单纯地指向俄罗斯政府，只有8%的受访者对俄罗斯政府有积极评价，而他们主要来自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政府控制部分。参见 Як Змінювалося Ставлення Насе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 До Росії Та Населення Росії До України У 2016 Році. Report of KIIS. 10. февраль 2017. <http://www.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680&page=2>

高达 59%。如今，乌克兰民粹主义政党的关注重点，已经从 2014 年之前在融入欧盟还是融入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进行选择的争执，转向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和落实加入欧盟一体化的预期。<sup>①</sup>

表 3 欧洲各国主要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盟的态度

对欧盟的态度	欧洲主要的民粹主义政党	在本国的地位
强硬的欧盟怀疑论	五星运动（意大利）	执政党
	法律与正义（波兰）	执政党
	中央民主联盟（瑞士）	执政党
	社会主义者党（摩尔多瓦）	执政党
	进步党（冰岛）	执政党联盟
	自由党（奥地利）	最大反对党
	芬兰党（芬兰）	最大反对党
	自由党（荷兰）	最大反对党
	谁拥有国家？（拉脱维亚）	最大反对党
	新佛兰德联盟（比利时）	最大反对党兼多数党
温和的欧盟怀疑论	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	执政党
	青民盟（匈牙利）	执政党
	ANO 2011（捷克）	执政党
	激进左翼联盟（希腊）	最大反对党
	VMRO-DPMNE（北马其顿）	最大反对党
亲欧盟	方向-社会民主（斯洛伐克）	执政党
	GERB（保加利亚）	执政党
	塞尔维亚进步党（塞尔维亚）	执政党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洲各国最新立法机构选举结果自制。

2019 年参加大选的“人民公仆”（选民的 62%）、祖国党（选民的 59%）、“欧洲团结”（选民的 86%）、“声音”（选民的 85%）等民粹政党，都将“入欧”设定为执政承诺中的纲领目标。总体来讲，欧盟目前虽做出了接纳乌克兰入欧申请的承诺，但仍未示以明确的路线图。欧盟将乌克兰列入欧洲睦邻政策（ENP）和“东部伙伴关系”（EAP）优惠政策的国家目录，加上 2014 年欧盟与之签署的《协会协议》，实则在很大程度上近乎赋予了乌克兰有实无名的“非成员入欧”待遇；同时也模糊化了乌克兰加入其一体化项

① Юлія Сахно. Геополітичні Орієнтації Жителів України: Лютий 2019. Report of KIIS. 27.02.2019. <http://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827&page=1>

目的具体时间和步骤，在对俄罗斯关系问题上为自身保留了足够的空间。然而对于基辅来讲，在对俄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民粹主义者在 2019 年大选期间利用“入欧”误导和煽动民意，使人们相信加入欧盟一体化的进度，与其化解国内社会与经济危机的程度，存在着必然联系。这实际上是粗暴而盲目地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用入欧作为社会兜底和经济增长的责任转嫁，不仅将对其国家对外政策形成“绑架”效应，甚至还会进一步导致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外交空间中失去灵活性。

## （二）乌克兰民粹主义特征的主要成因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与该国的近代历史、民族身份建构以及对国家观念的重新形成等有很大关系。从历史比较的视角看，其成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上对统治精英“外来化”的认知。乌克兰最早期的民粹主义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这期间，乌克兰的古典民粹主义逐步形成，其最主要特征之一即是民族主义。然而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沙俄革命运动历史中，很多民粹派人物甚至都被学界不加区别地纳入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行列之中。<sup>①</sup>其早期思想通过文学和社会运动，清楚地呈现在当时的“乌克兰民族身份”的基本框架中<sup>②</sup>，即神圣化的乌克兰语言和乌克兰民间传说遗产。<sup>③</sup>并排斥那些被判定是外来的、非乌克兰的事物，强调“无阶级”的乌克兰人民才是乌克兰人，并伴随对其精英阶层的非乌克兰化的认定，这使得乌克兰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浓厚的“乌克兰精英永远背叛”的社会本质主义思想。<sup>④</sup>乌克兰政治思想家米科拉·米赫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独立乌克兰（1900 年）》中

---

① 姚海：“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 19 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② Гриценко О. Світоглядне. Історичне і Культурне Коріння, Феномен Популізму в Пострадянському Просторі// Матеріали Українсько-Білоруського Семінару. К: УЦКД, 1999. С.7-25.

③ 例如圣西里尔和麦迪乌斯兄弟会的《乌克兰人民的起源》，运用浪漫主义强调了乌克兰民族认同感，以及社会平等思想。参见 S. Kozak, “Between history and messianism”, *Праці НТШ*, 1921, Vol.224(CCXXIV), p.63.

④ 社会本质主义要求人们相信某些社会类别（例如性别、种族、年龄、宗教），标志着根本不同的人。本质主义具有有害的后果，支持社会观念定型并助长成见。

就指出，乌克兰社会的精英们并不总是看到他们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共同性，不仅缺乏团结感，也没有为自己的人民服务。<sup>①</sup>另一位政治学家德米特罗·顿佐夫，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试图解释乌克兰民族发生悲剧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是，根源在于乌克兰社会主要精英阶层的整体堕落，“哥萨克贵族慢慢地自我摧毁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所有精神标志，失去了对最高民族事务的兴趣（对荣耀不感兴趣但对菜肴感兴趣），而把自己献给了最高统治阶层（在莫斯科的沙皇俄国政权）”。<sup>②</sup>古典民族民粹主义者指出莫斯科政权统治下的乌克兰精英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转变，是一种乌克兰民族道德与精神力量的衰落，导致了国家灭亡和人民灭亡。乌克兰的精英们无法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就无法充分满足其人民的利益。在该思想的因果论当中，乌克兰民族政治精英的软弱，正是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屡屡遭到失败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的灭绝实际上是指该群体被外来者同化，并为外部的胜利者服务。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帝国后，本国贵族的很大一部分并入了俄罗斯贵族系统，而官僚机构和知识分子也转而为“另一个国家”服务。在1917-1920年革命爆发期间，乌克兰则再次错过了争取自身独立的机遇，其原因仍被当今许多学者归咎于乌克兰精英的软弱无能，和在乱序的极端环境下无法对人民施加适当的影响，导致人民迷失了方向，缺乏动员和有效组织。此后，苏联时期乌克兰民族精英阶层的处境则变得更加困难，苏联政府实质上将政府体制转变为去民族国家化的巨型机器，目的是剥夺民族自决意识。但是在二战结束后近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尽管乌克兰民族运动精英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中都已不存在，其精英系统也早已被完全纳入到效忠苏联中央政府与国家的唯一执政党之中；<sup>③</sup>但是，带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思想和活动，仍然能够在高压的政治生态下，保持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微弱延续，甚至还能不时得到部分苏共、乌共领导人以及部分乌克兰民众，特别是西乌克兰民众的有限支持，为日后乌克兰实现建立独立

---

① Сабадуха В. 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ціональна Ідея У Вимірах Особистісного Буття// Психологія І Суспільство. 2012. №.2(48). С.21-30.

② Донцов Д. Де шукати наш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традицій. Дух нашої давнини. К.: МАУП, 2005. С.170-171.

③ Брюховецький В. Ключ до формува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євроцентричної елітосвіта// Дзеркало тижня. 2003. №.44. С.15-21.



民族国家的目标，预备了精神和组织基础。<sup>①</sup>

由于独立以后的绝大多数现代乌克兰精英是在苏联时期形成的，不可否认，在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和建立其基本制度之初，部分苏联培养的精英阶层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他们频繁进行恶性政治斗争，无视国家利益而通过革命方式下上台，充当寡头集团代理人并谋取私利，对于任何政策失误和试错的成本代价，他们也概不负责。这既是杰尤巴所说的，突然涌入的伪精英阶层，形成了“毒蛇混合物”，其中大量的苏联时期职业官僚、煽动者、寡头富商和一些出身可疑的人，像碎片一样快速混杂在了一起。<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真正体现出自己是属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但却无一例外地可以被验证出是苏联培养的产物。这就是当前乌克兰精英阶层成为一种颇有争议的社会现象的根源所在。当乌克兰已经成为新的国家，而精英却仍然被视为一群“外部”统治者遗留下来的代理人。更糟糕的是，他们仍保有乌克兰国内最强大的资源分配权力和谋利能力，因此很容易就被民族民粹主义者认定为“乌克兰人民”的对立面。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季莫申科、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在内的乌克兰领导人，始终面临这样的责难，即，因自身或家族成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苏联时期的官僚履历，从而遭到其他政客借助民族民粹主义手段的反对，常被指责为俄罗斯政府或寡头集团的代理人。政治精英会否被贴上“非乌克兰”标签，取决于此人是否拥有苏联高级官僚的履历背景，这是乌克兰中西部地区比较常见的社会本质主义偏见，也是后苏联时期乌克兰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普遍的“反精英”现象的成因之一。

2. 缺乏新的意识形态。到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它仍没有任何关于乌克兰民族国家或民族意识形态的愿景。新的“乌克兰”国家身份定义及其解释，并未在“苏联”基础上发生质变。该国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争取独立的斗争，却并未形成一个共同的“乌克兰”概念。由于其自身仍旧是多民族国家，单纯狭隘的民族主义无法作为国家建构的价值核心。如莫迪尔曾指出的，

---

① 葛汉文、丁艳凤：“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演进、政治诉求与极端发展”，《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Дзюба І. На слігу надійся, а сам не плошай// Нац. Безпека і оборона. 2003. №.9. С.34-36.

“乌克兰的独立来得如此突然和出乎意料，这将对该国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sup>①</sup>初期掌权的原苏共精英要么不了解新概念的必要性，要么畏惧对自身权力造成根本性改变。因此，他们没有做出一致的努力来重新定义乌克兰的民族与国家身份，从而继续利用原苏联的理论基础来理解社会、民族和国家概念。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更名，或“去苏化”立法后，国家没有改变所继承的苏联式结构，也从未正确地、批判性地评估苏联遗产，尤其是对权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再定义。这使得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权的替代者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多元化的公民社会，进而使得该国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未像其邻国波兰、匈牙利或波罗的海三国那样得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乌克兰精英官僚仍以苏联意识形态为主导，对公共生活进行管理，并仍保留着苏联时期的行为习惯、心态和价值观念，因此导致其很难在短期内制定出具体的国家转型计划。在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背景下，乌克兰精英阶层并未很好地实现和满足该国复杂的国家建设需要，向社会提供或传递全新的价值观引导。这使得乌克兰国家独立后，缺乏一种可以决定国家发展主要方向的民族意识形态、指导国家发展的主要道德和精神价值观体系、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自身不受破坏的原则标准。因此，乌克兰的精英们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最大过失在于，在独立建国初期整个国家政治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没有承担起引导责任，也完全没有付诸相应的实际行动。<sup>②</sup>他们没有寻找并商定一种清晰的精神价值观体系，即，无论每个乌克兰人的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政治主张如何，这种价值观都必须从每个社会个体那里获得共识，并成为巩固国家的基础。这样做不仅能够使这些精英阶层快速主导并融入新的乌克兰社会中去，也能尽快摆脱来自民族主义者们的指责。对于该构建怎样的国家核心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乌克兰国家身份，怎样对待与俄罗斯联邦共有的几百年历史，构建一套怎样的适用于乌克兰的普世价值与道德目标，通过怎样的方法去实现？乌克兰的政治家和政党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甚至自身在脱离苏联的政治生态后的多

---

① A.J. Motyl, *Dilemmas of Independe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3, p.50.

② Головатий М. Політична еліта сучасної України: регіональний і національний контекст// Політичний менеджмент. 2006. Спеціальний випуск. С.42.

年间一直是迷茫的。这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空洞的政治集团在乌克兰变得越来越普遍。为了谋取政治与经济利益，它们愈加朝着民粹主义方向演化，其政治价值观不仅自相矛盾和不断变化，还经常暴露出薄弱、分裂、高度个性化且缺乏原则尺度的特点。

3. “团结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团结主义”是乌克兰的古典政治文化传统，它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以及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扎根于该国历史之中。<sup>①</sup>“团结主义”的主要思想，是要在外部和内部的严重威胁或危机时期巩固社会。在19至20世纪，德米特罗·顿佐夫、尤里·伊万诺维奇·莱姆等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都具有浓厚的古典团结主义思想，并将其视为该国社会统一的基础。他们认为，团结是乌克兰社会心理上固有的，由长期无祖国状态（祖国指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国家）和沦为邻邦（波兰立陶宛联邦和沙皇俄国）附庸的历史所造就出来，是推动国家经济复兴的组成部分和基础。乌克兰独立以后，这种古典团结主义传承，很快与该国的现实处境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国家本位主义的现代团结主义思想体系。即，加强国家的团结职能要先于经济进步，这经常被乌克兰政治家们当作逃避经济治理失败责任的借口。由于全球化与团结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性，<sup>②</sup>尤其是对乌克兰来讲，苏联解体后其迅速地被迫卷入到全球化的经贸系统及其所导致的结构性危机中，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高度社会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明显而尖锐的矛盾，造成了该国社会问题的加速溢出和复苏停滞。更不幸的是，独立后的乌克兰在相邻的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日

---

① 塔塔连科指出，团结一直是乌克兰构建国家独立性理论的一部分。该思想强调基于共同的公共利益，构建共同责任和共存原则，推动各部分利益与整体价值和谐。即，社会中每个子集的利益都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平衡，强调只有通过不同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代表以及普通公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重大的社会进步。既拒绝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又反对极权主义下的平等主义，提倡在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动员阶段，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众利益。参见 Татаренко Н.О. Солідаризм: виклики стратегії національного економі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Електронний ресурс)// Науковий віс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ї академії України. 2015. Вип.22(3). С.13-23. [http://nbuv.gov.ua/UJRN/Nvda\\_u\\_2015\\_22\(3\)\\_4](http://nbuv.gov.ua/UJRN/Nvda_u_2015_22(3)_4)

② 全球化的目的虽是将团结作为目标，并将实现团结的手段带到全球范围，但其整个意识形态过度依赖于对世界团结发展的积极后果的先验性预测，基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的恶性竞争使团结的基础被摧毁，包括国家在内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分层加剧。参见 Гергель Г.В.Ф.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М.: Мысль, 1990. Т.113. С.468.

益受到推崇与效仿的趋势背景下，基于团结主义理念<sup>①</sup>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不仅没能奏效，分配失衡与不公反而因不断融入全球化而加剧。自 1991 年独立以来，该国一直处于腐败和治理不善的状态，其结果是，乌克兰经历了原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最糟糕的经济衰退，而乌克兰人却拥有对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最强烈的渴望。乌克兰没有经历类似波兰的鲍尔斯洛维奇（Leszek Balcerowicz）那样迅速削减政府开支和补贴的“休克疗法”改革，不仅使其私有化进程相较其他东欧国家严重拖延<sup>②</sup>，同时不完整的法律和不透明的私有化程序造成了动荡和腐败的环境。允许通过法律漏洞来对国有资产私有化，加剧了国有资本向极少数个人转移的问题，导致一部分家族和群体借助“自由化”改革钻了空子，使 20 世纪 90 年代的乌克兰经济成为后苏联地区寡头与裙带资本主义现象的典型代表。因此，有不少乌克兰人将寡头经济的根源归结于私有化改革的失利，使该国对高度自由开放市场系统产生了较为普遍的怀疑论调，并且从 2000 以后持续了十多年。在这种怀疑论的语境下，寡头们反对引入真正的自由开放市场及公平机制，担心使其利益受损；民众则希望扩大政府开支，为社会福利兜底；民粹主义者们在迎合舆情而做出更不切实际的补贴承诺。这种状态造成了乌克兰政府和人民肩负着越来越重的赤字重担，而乌克兰的债权人却富裕起来，民粹主义者也在团结主义的呼声语境中羽翼丰满起来。在这种情势下，乌克兰民众将负面情绪的矛头，指向控制债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通过对乌克兰外债回购实现债权控制）、各大私人银行，和其他私人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乌克兰短期与中长期外债

---

① 在发达福利型国家，团结主义是塑造增长和增强普通民众福祉的社会分配理念基础，并确保可支配收入均等化，以缩小贫富差距感，这被视为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平衡的生产性需求结构的重要条件。参见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苏联解体以来，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多年来一直呼吁乌克兰私有化国有资产。然而乌克兰的经济私有化改革进程和效率，明显落后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的大型（或“大规模”）私有化于 2000 年前就已完成，在乌克兰关于进一步私有化的议程却始终迟滞不前。2005 年 10 月对安赛乐米塔尔·克里维·里钢铁公司的私有化是少有的成功案例之一；2011 年通信业巨头乌克兰电信的私有化进程则遭遇困境。2018 年乌克兰政府再度批准了拟于当年私有化的 23 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清单。截至 2019 年 10 月，总统泽连斯基才签署一项法律，废除了禁止私有化 20 年之久的国有企业名单，该清单包含 1000 多家国有企业。

债权主要掌握在私人债权人手中)。这实则反映出该国社会对公共福利的广泛期待愿景,与该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严重不匹配,但被寡头和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团结主义”语境放大,转嫁为一种对全球化进程和自由开放市场秩序的不满。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团结主义思潮,是一种强烈要求国家对整个社会,尤其是每个公民的命运负起真正责任,为生存、个人才能和价值实现创造最有利的条件,确保高水平的社会发展和个人保护的意识形态导向。在德国、比利时以及1989年剧变后的波兰均得到了成功实践。乌克兰社会经济学者所倡导的团结主义思想,同样也是要求国家作为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塑造社会发展模式,建立起服从于公共利益的逐利系统,形成国家履行社会义务和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sup>①</sup>;要求社会的富裕群体,必须与其他人口团结起来,并在应用这种模式时放弃享乐主义。

然而在乌克兰,这种思想却反遭寡头和政客们的片面曲解和利用,从库奇马执政时期开始,众多在政府和议会身居要职的政治精英,都试图用团结主义的思想打击竞争对手、巩固自身特权和谋取私人经济利益。它造成了两大民粹主义现象,首先是,部分具有寡头背景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借用团结主义营造一种认知错位,使乌克兰民众更倾向于相信是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消极后果,特别是寡头经济、腐败现象和失业问题。这导致在21世纪的头十年,“私有化”被民粹主义语境歪曲成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词汇。这部分精英先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成为寡头或寡头的代理人,第二步是则是通过2000年后“反对私有化”的语境,继续依靠大规模的裙带资本主义获益。<sup>②</sup>如此,即防止了新寡头的出现,又达到了

---

① Барр Р.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М.: Междунар, 1995. С.441-550.

② 2018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乌克兰2%的公司控制着所有乌克兰公司总营业额的20%以上和资产的25%以上。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具有政治裙带关系的私人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经济红利,包括公共采购、补贴贷款、预算转移,限制和阻挠进口贸易法规,通过特权非透明地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收购,设置有利的税收制度等。乌克兰的政治关系与经济生产力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拥有政治联系的公司规模大,员工多,但它们的生产力却较低,营业额增长速度缓慢,甚至亏损。这是造成该国经济增长下降和竞争性经济下降的原因。参见 Oleksii Balabushko, Oleksandra Betliy, Veronika Movchan, Ruslan Piontkivsky, Mykola Ryzhenkov, “Crony capitalism in Ukrain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edness and firms’ performanc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The World Bank, 2018.06.12.

长期控制乌克兰经济的目的，并依此来维护自身“好人民代表”的形象。其次是，以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和波罗申科为代表的传统民粹主义领导人，假借团结主义，倡导强政府和权力集中，维持对经济和社会资源高度管控的能力，纵容漏洞和腐败。因为对于乌克兰而言，团结的意识形态被视为“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的途径”<sup>①</sup>，所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被人们视为形成自给自足系统、一切服从国家利益、快速隔绝国民经济结构与外部负面影响的先决条件。<sup>②</sup>2000年以来，除了新上任的泽连斯基之外的乌克兰领导人，均试图强化中央政府在市场中的家长式职能，对从投资到市场调节、提供公共资源、制定劳动力市场标准、控制价格等领域进行管控。然而在乌克兰，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是一种共生状态，加剧了该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影子经济现象<sup>③</sup>，最终造成了乌克兰民众对政府和传统政治精英的彻底失望，选择“人民公仆”党和泽连斯基这样的全新力量来执掌议会和政府，帮助他们实现团结主义的预期愿景和现状改善。可以说，团结主义在乌克兰一度曾沦为寡头及其代言人的意识形态牟利工具，但也成为他们失信的根源之一，推动了新型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公仆”党及其候选人的出线成功。

4. 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被等级制度“合法化”认知所支撑，即透过阶层攀升获取特权，成为乌克兰优势与弱势群体都接受的意识形态。<sup>④</sup>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乌克兰人的生活成本结构只能由食品成本决定。由于缺乏客观衡量指标来反映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因此人们普遍缺乏阶层对比的参照标准，进而缺乏阶层攀升的强烈意愿和预期，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贫穷且经济状态糟糕，并遵循着这种认知状态进行生活。而且

---

① Пleshko M.B. Ідеологія солідаризму в програмни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політичних партій України// Політологічний вісник. 2009. Вип.40. С.149-160.

② Лист Ф.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М.:Социум, 1997. С.323-341.

③ 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乌克兰的影子经济在2018年已增长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7.2%，高于2017年的46.8%。参见Igor Kossov, “Growing shadow economy nearly half of Ukraine’s GDP”, *Kyiv Post*, Oct. 14, 2019, <https://www.kyivpost.com/business/growing-shadow-economy-now-almost-half-of-ukraines-gdp.html>

④ J. Sidanius, S. Levin, C.M. Federico, F. Pratto, “Legitimizing Ideologies: The Social Dominance Approach”, in J.T. Jost, B. Major,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Ideology, Justic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07-331.

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规范，可以改变对这种“穷人生活方式”的认知。<sup>①</sup>同时，由于乌克兰的公民社会基础较差<sup>②</sup>，人民对政府机构和法治环境的信任度低，对参加社会组织或政党的态度并不积极。加之政府的腐败严重，处于中低阶层的乌克兰人普遍鄙视行政机构和政治组织，因此对于通过公民政治来改变自身阶层状态的方式态度冷漠。这使得大多数乌克兰低收入弱势群体平时在政治上更多地表现出被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优势群体理应对比弱势群体更多地获得资源分配上的权利，而弱势群体的成员会接受自己面对的不公压迫。就乌克兰而言，两个团体都接受这样的思想，它造成了乌克兰民粹主义的反民主性，即，社会的公平和平等，以及正义思想，仅仅是一种口号，其实质并不为所有人所接纳。弱势群体要么透过一切途径成为新的优势群体，并“理所当然”地对资源进行占有，要么通过一种广域的整体福利提升（例如加入欧盟区域一体化获取援助和补偿）来提高分配基数，而不是透过政治参与和司法制度建设来改善这种“不公平”状态。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09 年对乌克兰进行的田野式访谈，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经济繁荣或变得有钱，对他们而言比民主制度更为重要（74%对 50%）；有 78%的人表示，如果不得不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强劲的经济，而不是民主制（12%），该比例差额在欧洲各国中是最大的。<sup>③</sup>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解决目前他们所关心的危机并使他们重新获得“苏联式国家”保障，比构建民主制度系统和激励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更为重要。因此，阶层攀升或者获得更多保障，成为一种乌克兰的共有意识形态。这使得乌克兰政府的合法性，被

---

① Саєнко Ю. Середній клас у соціологічних вимірах. М.: Шуль ги. 2002. С.60-79.

②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3 公民社会发展报告，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 2017 年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指标（1 是最高，7 是最低），乌克兰的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指数在全球评分系统中属于中间偏下水平；在后苏联和东欧地区，乌克兰属于中等水平。以美国国际开发署 2017 年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例，乌克兰 2017 年的得分是 3.2，相比之下，捷克共和国是 2.6，拉脱维亚是 2.6，立陶宛是 2.3，爱沙尼亚是 2.1，波兰是 2.3，阿尔巴尼亚是 3.7，摩尔多瓦是 3.8（部分举例）。参见“2017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Sustainability Index”，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7,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6oX\\_dkNSMwEhDfpdiozHzGCiOLiTQj\\_/view](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6oX_dkNSMwEhDfpdiozHzGCiOLiTQj_/view)

③ 第一个选择由于不是单选，所以两个选择的比例之和并非 100%；而第二个民调选择题是单选题，因此比例之和是 100%。参见“Two decades after the Wall’s fall”，Pew Research Center, Washington, 2009, <http://www.pewglobal.org/2009/11/02/end-of-communism-cheered-but-now-with-more-reservations/>

夹在少数寡头垄断与操控的现实压力，与民众趋向家长式保守主义的社会愿景之间，并造成“运用强政府来管控和惩戒不公，并对每一位公民的福祉负责”的民粹主义口号愈加泛滥。

#### 四、乌克兰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

长期以来，在转型危机的压力与困境之下，乌克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剧烈变迁。民粹主义对其政治发展主要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意味着乌克兰的多重危机还远未结束。

1. “反精英和反建制”极端化，导致政府和执政党合法性被严重削弱。从橙色革命时期开始，乌克兰各政党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和赢得信任，建构起一套“反精英”和打击寡头的语境。并将其与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现实捆绑在一起，不断加强对社会舆情的浸染和诱导，迫使公民在对当下政府、政党和制度的绝望中转而支持他们。同时也诱发了大规模的政府“失信”，曾几度导致乌克兰当局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引发政治抗议运动。持续不断的危机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肥沃土壤，使“反精英”言论纯粹沦为寡头精英间的政治游戏工具。无论是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还是波罗申科，都曾相互指责和批判对方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背后的寡头和腐败集团服务。这种对“反精英”语境的滥用成为常态，使乌克兰政坛处于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恶性竞争之中，任何政客或政党都无法全身而退，从而使整个国家持续陷入一种盲目反对“精英”、打倒“贪腐官僚”的浪潮之中。这样的循环过程将乌克兰政治推入了一个死结，即每一个只有通过“反精英”倾向才能上台执政的候选人和政党，最终都会沦为新的打击对象。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指责和质疑，很难建立起可靠的权威，也无法赢得广泛的支持，致使乌克兰处于政治动荡的风险隐患当中。

2. 反宪政民主的倾向，导致中央财政负担加剧和国家机构职能弱化。民粹主义对苏联“家长式政府”的偏好倾向与舆情煽动，逐步拉大了选民预期与实际情况的差距，加剧了乌克兰的财政赤字和国际负债，使该国经济衰



退状况进一步恶化。如前文所述，乌克兰民粹主义早在库奇马政府时期就带有许多苏联的特征。苏联式的财产所有权与收入分配形式，仍然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意识。因此乌克兰民粹主义者无论持左的或者右的意识形态，均夹杂了强烈的国家主义和社群主义价值观，继续引导“政府不考虑我，国家不想要我”的负面感知，强化民众对苏联时期国家责任的传统认知，激化人民对国家福利的持续过度依赖。<sup>①</sup>民粹主义者还做出不切实际的执政承诺<sup>②</sup>，很多关于立法、改革和预算支出等有用的信息，常被民粹主义政党媒体或政党领袖夸大和误导传递，使得如今部分乌克兰人无法对国家的服务与保障能力，以及诸多问题的发展程度具有准确、科学的认识<sup>③</sup>，完全罔顾乌克兰的经济现实。即使在该国严重的养老金赤字比例和债台高筑的数据面前<sup>④</sup>，乌克兰各个民粹政党仍在继续倡议加大社会福利，而政府则只能进行“装饰性”改革。奥夫恰连科将 2017 年养老金改革草案戏称为“选民的社会倡议”。<sup>⑤</sup>同时，乌克兰民粹主义政党对直接民主的滥用，严重削弱了国家机构的决策职能。泽连斯基和季莫申科等人都希望在加入欧盟、加入北约、对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上，以全民公投结果进行定夺和落实，刻意忽视或绕开立法、政府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并借此来逃避政治责任和博取选民好感，使

---

① T. Kuzio,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011, Vol.25, No.1, pp.88-113.

② 乌克兰媒体计划 NV（用 NV 改变时间）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由国际组织 Internews 实施的公益媒体计划，旨在分析该国变化和推动积极改革。根据 NV 在 2018 年底对乌克兰主要总统候选人进行的政治光谱调查，排在前七位民调最高的候选人均带有原苏联“家长式”政治倾向。参见 Maxim Butchenko. Гола правда. Що залишитися від ідеології топ-7 політиків України, якщо прибрати популізм. Час змін з НВ. 11 грудня 2018. <https://nv.ua/ukr/ukraine/politics/hola-pravda-shcho-zalishitsja-vid-ideolohiji-top-7-politikiv-ukrajini-jakshcho-pribrati-populizm-2512394.html>

③ 例如季莫申科在 2017 年“新方向”的电视直播中指责 2018 年乌克兰政府完全没修道路。实际上，据基础设施部长沃拉迪米尔·奥梅利安（Volodymyr Omelian）称，2018 年共修建了总长 3800 公里的道路，这种案例非常常见。参见 D. Kiryukhin, S. Shcherbak,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Post Communist States: Ideas of Justice in the Ukraine and Rus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07, Vol.2, No.2, pp.92-106.

④ 2017 年该国养老金约占预算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占 GDP 总额的 12%，同年赤字比例为 1.4%，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达 71.8%；而同时乌克兰却设定了欧洲最低的退休年龄，使该国陷入严重的养老金赤字危机。

⑤ Nataliya Trach, “Ukraine Spends 12% of GDP on Pensions; This Has to End”, *KyivPost*, June 16, 2017, <https://www.kyivpost.com/business/ukraine-spends-12-gdp-pensions-end.html>

国家机构彻底沦为投票箱和计票器。然而，全民公投的结果并不等同于明智或科学的选择结果，它往往可能被非理智的情感或错误的信息所左右。

3. 意识形态的混沌与分裂，导致社会碎片化和政策断层。长期以来，乌克兰国情一直伴随着独特的“二元对立性”，即天主教与东正教、农业区与工业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西部与东部。<sup>①</sup>加上乌克兰独立后社会严重缺乏公民政治文化和完整的政治价值系统，民粹主义多变分裂的意识形态，与这种二元对立的特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加重了该国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原子化”状态。准确地讲，乌克兰民粹主义政党高度的“变色龙”特征，进一步瓦解了当代乌克兰社会的政治价值系统。民粹主义政党和选民政意的相互绑架，使所有社会单元的关注重点，聚焦于生活水平和社会福祉的高低，执着于摆脱当前的危机状态，却对解决之道和脱困逻辑毫不关心。因此没有任何固定规范的意识形态能将大部分人凝聚起来，形成利益共同的多数，进而有组织地推动社会整合。同时，意识形态的空洞化，也加剧了该国领导人对待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态度，具有不可预测性。如，在对待原苏联时期“大饥荒”问题、官方语言政策、区域一体化选择等问题上，每届政府均以否定前任的立场来增加其合法性，摇摆反复的立场和交接断层，造成了一些长久战略的不可持续性，使乌克兰面对的难题始终无法有效得以解决，却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4. 过度渲染危机，消耗了国家治理的效能与公信力。乌克兰民粹主义者将“危机”视为政治谋利的工具，致使评估政府治理绩效的衡量标准遭到彻底破坏，因此没有一届政府能够真正解决公民的多重需求——对更多福利、国内和平、经济安全和体面生活条件的诉求。乌克兰政治在“放大选民意志”的层面，走到了激进而危险的极端：民粹主义用“危机感”绑架了人民意愿，放大社会对当下状态的恐惧感，扭曲了评价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且理智的判定水平——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当局做得还远远不够，只有自己才能付诸实现。实际上，这种幼稚的举动，几乎毁掉了国家进行治理时的民意绩效系统，使乌克兰国民对国家的信赖度持续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其结果是，

---

<sup>①</sup> 苟利武：“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6期。

没有任何领导者能使该国民众真正获得满意。这也是为何在 2019 年大选中，不具备任何政府管理或参与公共治理经验的候选人——泽连斯基，及其所在政党——“人民公仆”，能够赢得支持。然而，民粹主义者已经彻底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人们只能从中不断获取到更多的担忧和焦虑情绪，却很少了解到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真实情况与能力。

5. 过度期待区域一体化，导致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乌克兰绝大多数的民粹主义者，将加入欧盟和北约视为解决当前政治与经济危机的出路，多数民众也将入欧进程，与更高的社会福利、更优越的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从而忽略甚至无视该国在入欧进程上仍需要面对的多重问题与困境。这不仅使“入欧”成了纯粹的民粹运动政治口号和社会宣泄方式，还自我压缩了对外战略的选择空间。如今，乌克兰国内的局部冲突已变为大国间展开全球地缘争霸的舞台，纵使其已经签署了不少于四项和平协议<sup>①</sup>，也难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和恢复正常的对俄关系。只要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都不愿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问题上让步（也不太可能让步），只要乌克兰仍然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那么这种动荡的局势就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从而使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预期变得愈加遥遥无期。对此，欧盟的提议是“没有机构的一体化”，即乌克兰在法律上无法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只是不被排除在欧盟塑造的单一市场进程之外，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其加入欧盟的前景。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取消，将使乌克兰的支柱性工业遭受欧盟方面持续的竞争。此外，乌克兰对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志越深，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越难以修复。其结果是，乌克兰的一体化选择，使自身陷入了东西方对抗的灰色地带，进退两难，最终遭到了两侧的区域一体化项目的双重隔离。虽然从表象上看，乌克兰正逐步被纳入西方大家庭，然而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来看，乌克兰无论在安全还是在合作方面，均处于史无前例的国际孤立状态。在其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完全受制于大国间关系变化影响的背景下，被入欧“民意”裹挟，只会限制自身的对外战略空间，进而长期处于安全困境之中。

---

<sup>①</sup> 包括 2014 年初和 2015 年初签署的两项明斯克协议，以及《基辅协议》和《日内瓦宣言》。

## 结语

泽连斯基和“人民公仆”以压倒性优势胜选，代表着该国已经度过其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乌克兰的政治博弈，不再围绕“亲西方”或“亲俄”这个核心分歧，而是在改革建制派和新兴民粹主义者之间展开；也标志着民粹主义经过多年的蓬勃发展，最终撬动了乌克兰传统的精英式政党竞争系统。以季莫申科、波罗申科等人为代表的，半寡头半官僚性质的传统精英政党的民粹主义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乌克兰的民粹主义模式和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方面，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首先，该国新兴的民粹政治政党“人民公仆”及其领袖泽连斯基，作为一支近乎“白纸”的力量，获取乌克兰国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和总统职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摆脱传统寡头政治裙带关系造成的长期制约和束缚，回应社会民众的广泛期待，解决一些拖延至今的难题。其次，民粹主义过度迎合民意和强调直接民主，可能导致政府决策职能弱化，甚至导致决策判断失误，在此形势下该党能否解决关乎该国未来的内战与对俄关系等核心问题，仍具有不确定性。最后，乌克兰的政党格局经历了此次重新洗牌后，可能会催生旧政党的民粹化转型或其他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未来的竞争情势，将取决于当前执政党对遗留问题的解决能力，因为乌克兰民众最期待的是看到变化，这也是“人民公仆”党能够脱颖而出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从国际与全球角度来看，乌克兰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演化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前沿性。它不仅印证了在长期持续的国家治理失衡和危机隐患的环境下，民粹主义会成为催化、放大和加剧社会危机的不可控变量，而且还表明了民粹主义运动会不断演化：乌克兰民粹主义者由最初的暴力性、高松散、弱组织、低效率的街头反对派，逐步变为高组织力和动员力、非暴力，以及高效利用合法政治工具的成熟政党，并对建制形成侵蚀，在精英系统中迅猛泛化，最终解构建制系统。因此，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与问题或不应被低估轻视，它可以被视为当今全球泛民粹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发展趋势的缩影，以及相关比较研究与公共危机管控应对政策的重要案例。

---

**【 Abstract 】** Since Ukraine's independence, political populism has continued to spread along with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new century, there has just been over a decade since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appeared. Nevertheless, Ukraine has become a prominent case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which has been swept by populist waves. After the 2014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ongoing Donbass war, Ukrainian politics has gradually entered a new stage of populism. Compared with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Ukrainian populism has som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going extremes in anti-elites and anti-establishment, strong anti-democratic attributes and patriarchal government preferences, contradictory ideologies, excessively sensationalizing and giving rise to social crises, blind expectation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reason could be attributed to several aspects, namely, its 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ization" of its ruling elites, the lack of new nation-state awareness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 "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social consensus regarding stratification and hierarchy. This particular populism has continuously had a series of negative effects on Ukrainian politics

**【 Key Words 】** Ukrainian Populism, Ukrainian Political Culture, Ukrainian Politics, Ukrainian Elit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Украи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пулизм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 вместе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ми. В новом веке популис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движения существуют более десяти лет, и Украина стала заметным примером б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пулизма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осл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2014 года 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войны на Донбассе укра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вступила в новую стадию популизма.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о всем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регионом, украинский популизм имеет некоторые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 основном проявляющиеся в крайностях анти-элиты и анти-истеблишмента; обладании сильными анти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и качествами 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ми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деологии разде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м кризисе; слепом ожидан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Причин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популизма 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следующими аспектам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ризнанием страной «экстернализации» правящей элиты,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нов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й идеологии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ей «единства» и все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консенсусом в вопросе классовой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и и иерархии. Данный отличительный популизм продолжает оказывать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украин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популиз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Украины, укра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ская элита

---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地区发展****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状况与地区发展前景\***

康斯坦丁·沃斯特里科夫\*\*

**【内容提要】**下诺夫哥罗德州一度是俄罗斯改革的前沿阵地和代名词，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版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目前，该州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行政中心，其政治经济进程值得关注。从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莫斯科成功地规范着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进程，地方政府依赖中央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从下诺夫哥罗德州内部的政治发展来看，历任州长面临的都是大致类似的复杂局面：联邦中央、总统派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地方政治经济精英、联邦层面的大型企业、地方层面的商业利益，等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与竞争。由此，州长在联邦层面的工作经历和影响力，在地区层面的协调手段和整合力，即，同时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支持和认可，并在中央与地方同时具有关键影响力，是地方政治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下诺夫哥罗德新任州长格列布·尼基京，年富力强，是俄罗斯新生代州长的代表，也大致具有上述品质，其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执政状况，值得关注。

**【关键词】**俄罗斯地区政治 俄罗斯地区政治精英 下诺夫哥罗德州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0190(2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欧亚伙伴关系背景下的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7BGJ032），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 康斯坦丁·沃斯特里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остриков），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农业大学国家、市政和经济管理教研室副教授。

## 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生态变迁

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生态，在联邦中央的作用下经历了结构性变迁。政治学者达辛和马克雷切夫认为，“下诺夫哥罗德州已经完全融入全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之中。”<sup>①</sup>联邦层面的政治事件成为地方政治进程的催化剂。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在下诺夫哥罗德政坛催生出了涅姆佐夫（Б. Немцов）这样的政治人物。此类政治人物的出现，推动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氛围。在涅姆佐夫当选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之后，政治氛围又促进新经济环境的产生。在上述政治、经济进程的作用下，下诺夫哥罗德州成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试验场，使得该州市场机制出现的时间，早于其他保守派领导人留任并妨碍自上而下经济改革的地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一直比较灵活，能够应对联邦政策的挑战。例如，涅姆佐夫时期是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形势最稳定的时期，涅姆佐夫是少数没有与保守精英发生激烈冲突的“民主派”领导人。涅姆佐夫在担任州长期间，经常邀请联邦层面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参与、支持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动议。普京执政后，伴随着联邦层面的政治变化，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转向保守官僚主义模式。总统派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积极推动非政治、技术型的发展路线。其结果是瓦列里·尚采夫（В. Шанцев）被任命为州长，此后，他主导了该州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作为保守主义联邦政策的代表人物，尚采夫在其任职的十年期间，没有处理好同存留下来的地方保守精英之间的关系。<sup>②</sup>尚采夫根据意识形态提拔进入政坛的官员，不能与地方精英相互融合，这也不足为奇。因此，免除尚采夫的州长职务并任命一名同样的技术官僚担任新州长，完全合乎逻辑。

2017年9月26日，普京总统颁布命令，免去尚采夫的下诺夫哥罗德州

---

① Дахин А.В, Макарычев. А.С. Эксперт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пыт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в публич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убли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А.Ю. Сунгурова. СПб.: Норма, 2006. С.55-75.

② Полпред Президента в ПФО назвал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нешатной. 17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s://nn.dk.ru/news/polpred-prezidenta-v-pfo-nazval-politicheskuyu-situatsiyu-v-nizhegorodskoy-oblasti-vneshtatnoy-237070361>



州长职务，同时任命格列布·尼基京（Глеб Никитин）代理州长职务<sup>①</sup>。尼基京是“普京的”新一代州长代表人物之一，用于取代担任国家不同领域（包括从苏联时期开始）领导职务的前一代地方长官。值得一提的是，他出生在列宁格勒，这一点在新时代的俄罗斯十分重要。他的教育背景与普京任命的其他地区领导人没有差异。他先接受了“经济与财政”教育，之后再接受“法学”教育。重要的是他毕业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的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和市政管理”专业。尼基京在该学校学习期间，于2007年在总统直属财政学院完成了论文答辩。其后的工作经历与其同一代的地方长官没有区别，先后历任主管专家、处长、圣彼得堡市城市财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直到担任俄罗斯联邦工业与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尼基京还曾是“战术火箭武器”公司、“俄罗斯航空”公司、“国防工业”综合体公司、“堪察加天然气工业”公司、科罗廖夫“能源”火箭航空综合体公司董事会成员。他还担任过“统一动力系统”公司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委员会委员。<sup>②</sup>上述企业在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尼基京作为董事会成员，在这些大企业代表国家的利益。此外，尼基京出身于工业与贸易部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Данис Мантуров）的团队，曾经加入过“俄罗斯技术”集团（Ростех）。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尼基京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执行总裁谢钦关系密切。总的来看，尼基京出身于圣彼得堡市政府，但当时是雅科夫列夫担任市长的时期，而不像现在大多数“圣彼得堡帮”出身于索布恰克领导的圣彼得堡市政府。尼基京属于常年从事国有财产管理工作的官员。这意味着，尼基京长期以来就是“普京的储备干部”。

2018年12月26日，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展览馆主馆举行了尼基京的就职典礼。<sup>③</sup>值得一提的是，下诺夫哥罗德州地方精英对于这一任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事实上，不仅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很快开始表示反对，而且

---

① Торжество госмашины: чем запомнился 2018 год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РБК -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составил подборку глав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уходящего года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бизнес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е. 18 декабря 2018. <https://nn.rbc.ru/nn/28/12/2018/5c263dfe9a7947fcfd43a1de>

②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атриц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16-28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http://www.polit-nn.ru/?pt=analytics&view=single&id=5217>

③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全国性政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也表现出对立倾向。尼基京给予坚决反击。首先，“统一俄罗斯党”下诺夫哥罗德州分部代理秘书、国家杜马议员瓦基姆·布拉维诺夫（Вадим Булавинов），因酒驾被捕。之后，“公正俄罗斯党”下诺夫哥罗德州分部领导人亚历山大·波奇卡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очкарев）被捕，当时调查委员会对他发出传讯，要调查他收受一位希望成为国家杜马议员的企业家贿赂的案件。尼基京与“统俄党人”布拉维诺夫关系变得十分恶劣，后者被认为是称职的“统俄党”下诺夫哥罗德州分部领导人。尼基京与布拉维诺夫的关系状况被曝光在媒体上。该州媒体在亿万富翁、下诺夫哥罗德市前市长、下诺夫哥罗德州议会前副主席奥列格·索罗金（Олег Сорокин）的掌握之中。此外，尼基京还需要面对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强力部门中有许多人不忠于他的局面。他仅与俄共的地区分部达成了协议，该党没有推举受到下诺夫哥罗德人欢迎的弗拉基米尔·布拉诺夫（Буланов Владимир）参加州长选举，而是推出了鲜为人知的叶戈罗夫（В. Егоров）。

需要指出，在 2018 年的州长选举中，此类政治技术方面的手段被使用了不止一次。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了新西伯利亚州，当时俄罗斯总统任命的安德烈·特拉夫尼科夫（Андрей Травников）与俄共代表、新西伯利亚市长安纳托利·洛科季（Анатолий Локоть）达成协议，后者不参与州长选举。作为交换，特拉夫科夫将不干涉洛科季二度当选新西伯利亚市市长。总的来看，尽管面对着不利的政治形势，格列布·尼基京仍然参加了选举。尼基京不仅在政治舞台上积极行动，而且还推动、维护自身和某些金融集团的经济利益。

“嘎斯”汽车厂<sup>①</sup>董事会事件表明，地方精英明显不想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看到尼基京。尼基京不仅期待在该公司实现自己的利益，还希望代表们支持他的“俄罗斯技术”公司领导谢尔盖·切梅佐夫（Сергей Чемезов）的利益，后者是一位具有联邦层级影响力的商人。当时，切梅佐夫集团和拥有“嘎斯”公司控股权的杰里帕斯卡集团，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发生了利益冲突。在基里延科（С. Кириенко）担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期间，协

---

<sup>①</sup> ПАО «ГАЗ»（Горьковский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й завод），高尔基汽车厂，中国人称之为“嘎斯”，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助杰里帕斯卡掌控了“嘎斯”公司。不过，杰里帕斯卡的公司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导致他的地位有所下降。因而，切梅佐夫试图借助尼基京掌控该公司。尼基京在大选前一个月提议解散公司董事会。尼基京和切列梅佐夫自然进入了新一届董事会。这样，尼基京在经济领域也挑起了与地方精英的冲突。对于尼基京而言，仅有的希望在于得到部分地方工业企业家的支持，因为地方企业家寄希望于吸引来自联邦层面的投资，以帮助其企业实现技术现代化。尽管如此，俄罗斯政治学者始终认为，尼基京在大选前的政治地位处于弱势，并且预测他在选举中将遇到问题。

不过，在 2018 年 9 月 9 日统一投票日举行的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选举中，格列布·尼基京获得了 67.75% 的选票，这一数据相当于俄罗斯总统任命州长得票率的平均水平。所以说，部分政治学者预测错误，他们错误地估计地方精英将阻挠尼基京当选。但是，他们认为民众将接受联邦中央任命的州长并没有错误。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 40.5%，考虑到投票人数，应该说，在联邦中央给予尼基京高度信任的情况下，民众对尼基京的支持率并不高。毋庸置疑，下诺夫哥罗德州人不喜欢“外来人”（чужаки），因而他们的投票率不高。格列布·尼基京的前任、执政多年的瓦列里·尚采夫，也是莫斯科任命的州长。尚采夫从 2005 年开始领导该地区，之前他在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莫斯科市政府担任副市长。他在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初被任命为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sup>①</sup>俄罗斯政治学家认为，尚采夫被免去下诺夫哥罗德州长职务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年龄过大——到 2017 年 6 月尚采夫年满 70 岁<sup>②</sup>，但这是他去职的表面原因。众所周知，普京看重年轻州长，虽然这些人缺乏政治经验，但是他们拥有在“普京等级制体系”中工作所必需的技能。还有一些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尚采夫去职的原因在于他与地方精英的冲突，尤其是他与下诺夫哥罗德市前市长奥列格·索罗金（Олег Сорокин）的长期冲突。联邦中央不得不安排时任俄罗斯总统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米哈伊尔·巴比奇（Бабич Михаил）和地区执法机关出面调解。巴比奇曾经

---

① Дахин А.В, Макарычев. А.С. Эксперт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пыт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в публичной политике.

② Эксперты: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нарушает круг интересов местных элит. 6 февраля 2018. <http://m.club-rf.ru/52/detail/2297>

不止一次地批评瓦列里·尚采夫。在尼基京被任命为代州长之后，巴比奇在2017年10月25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地区精英必须团结。<sup>①</sup>下诺夫哥罗德州是地方精英不团结的少数地区之一，这导致进入地方议会和执行机关的反对派力量能够掌控该地区。因此，“精英团结”不仅是消弭精英之间冲突的口号，而且旨在将反对派驱赶出地区领导层。前州长尚采夫不愿意解决同地方的冲突，从而影响了该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招致巴比奇的批评。<sup>②</sup>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9月的选举之后，巴比奇卸任了全权代表的职务。随后，俄联邦总统任命巴比奇担任驻白俄罗斯大使，他成功消除了围绕着两国关系的不和谐声音。俄罗斯政治学者瓦连京娜·布兹马科娃（Валентина Бузмакова）认为，巴比奇确实通过其全权代表的职务，掌控了下诺夫哥罗德州。<sup>③</sup>尚采夫当然对此十分不满，他批评巴比奇采用军事手段管理该地区，称巴比奇为“战争狂人”。新任全权代表伊戈尔·科马洛夫（Игорь Комаров）受到普京的重用，他支持“外来人”尼基京，与引起地方精英不满的、富有侵略性的巴比奇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基里延科（С. Кириенко）在总统办公厅影响下诺夫哥罗德政治，总统办公厅不仅需要协调地方精英与州长的关系，还需要弥合地方精英与俄罗斯总统全权代表的关系。基里延科在担任俄罗斯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期间，推动尼基京进入该机构，这是证明基里延科暗中支持尼基京的一个案例。

实体经济学院（Институт акту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院长尼基塔·伊萨耶夫（Никита Исаев）认为，首先，新州长是一位年轻的、有活力的、高效率的领导人；其次，尼基京给该地区带来了大笔资金；第三，尼基京开始更换当地的官员，这有利于解决地方精英与州长之间的冲突。但是，远不是所有专家都认同伊萨耶夫的乐观判断，他们认为尼基京很快将离开这一地区。此外，在尼基京获得任命到被选举期间，地方精英对其滋生了不满，因为他“正在损害许多政治、商业利益。”俄罗斯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日梅里科夫

---

① Михаил Бабич. Переход на одноглавую систему управления Нижним Новгородом – это оптим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25 октября. <http://ria56.ru/posts/5435835834583548.htm>

② Там же.

③ Валентина Бузмакова.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авит Бабич. 22 декабря 2018. <http://club-rg.ru/52/opinions/1315>

(Александр Жмыриков)认为, 尼基京的未来并非取决于他本人, “尼基京现在的表现符合他的职责<sup>①</sup>, 他没有做任何不正常的事情, 他是否离开该地区不取决于他自己, 而是取决于他的老上级俄罗斯联邦工业与贸易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的处境。如果丹尼斯·曼图罗夫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则尼基京可能从莫斯科获得新的任命。因此, 一切取决于俄罗斯统治精英的情势。如果一切照旧, 那么尼基京将暂时留在下诺夫哥罗德州。”<sup>②</sup>可以说, 州长的宝座是在莫斯科获取更高职位的跳板, 尤其是普京任命的州长回到莫斯科的先例非常多。2018年12月28日, 尼基京被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为国务委员会生态工作组组长。国务委员会是普京总统的政治产物, 标志着格列布·尼基京和此前的16位地区领导人进入了普京亲信的行列。这给予了尼基京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包括政治在内的各方面管理决策的大权。

另一位俄罗斯政治学者、国民社会发展基金会下诺夫哥罗德分部领导人叶甫根尼·谢苗诺夫(Евгений Семенов)质疑尼基京将离开下诺夫哥罗德州。<sup>③</sup>他的论据来自尼基京本人的举措。尼基京熟悉该地区工业, 并参与制定了下诺夫哥罗德州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战略规划。而且, 他发起了清理地区政府官员的行动。谢苗诺夫指出, 目前在地区州长选举中, 没有强有力的反对派领导人。<sup>④</sup>所有人都期待格列布·尼基京在选举之后, 在组建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方面, 做出出乎意料的重大人事决定。早在2018年9月底, 尼基京已经解散了前任政府, 同时拉拢亲近自己的力量。新州长的第一件事情是批准对列别捷夫(В. Лебедев)的任命, 他是下诺夫哥罗德统治集团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从2014年开始在联邦委员会代表下诺夫哥罗德州。此外, 列别捷夫还是卢克石油公司下诺夫哥罗德州分公司的领导, 他在联邦层面代表该公司的利益。列别捷夫也是所谓地方“能源游说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得到任用的还有魏因贝格(А.В. Вайнберг), 他目前是下诺夫哥罗

---

① «Торжество госмашин»: чем запомнился 2018 год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РБК-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составил подборку глав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уходящего года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бизнес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е. 28 декабря 2018. <https://nn.rbc.ru/nn/28/12/2018/5c263dfe9a7947fcfd43a1de>

② Эксперты: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нарушает круг интересов местных элит. 6 февраля 2018. <http://m.club-rf.ru/52/detail/2297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7.03.2019>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州立法机关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中的代表。此人曾在伊戈尔·马特维延科(И. Матвиенко) 交响乐团演出中心工作,并由演艺圈进入政界。<sup>①</sup>他在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后,成为下诺夫哥罗德州议员,并担任议会副主席。尼基京组建的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中既有下诺夫哥罗德人,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管理机构的人员。例如,分管能源、住宅与公用事业和生态的副州长安德烈·哈林(Андрей Харин),于2017-2018年在莫斯科的一家能源公司工作。另一位分管体育、旅游和文化的副州长亚历山大·尤戈夫(Александр Югов),从2004年开始在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2018年3月开始领导该机构的地区分部。还有一位“瓦良格人”(Варяги)<sup>②</sup>得到任命——玛琳娜·拉科娃(Марина Ракова)被任命为城市建设、城市集合发展局局长。<sup>③</sup>之前她担任塞瓦斯托波尔市建设和城市建设局局长。副州长谢尔盖·莫洛佐夫(Сергей Морозов)也是一位“瓦良格人”,在获得现在的任命之前,他曾在2016年4月到2017年11月期间,担任圣彼得堡市建设委员会主席。<sup>④</sup>

叶甫根尼·谢苗诺夫认为,格列布·尼基京不信任下诺夫哥罗德官员,在担任州长后的一年时间里,本地官员的长期政治倾轧已经耗尽了他的信任。<sup>⑤</sup>尽管如此,在这一年时间里尼基京还是找到了忠于他的下诺夫哥罗德人,而且尼基京心知肚明,“瓦良格人”不宜过多。下诺夫哥罗德人安德烈·格涅乌舍夫(Андрей Гнеушев)被任命为副州长,分管社会政策问题;下诺夫哥罗德人德米特里·克拉斯诺夫(Дмитрий Краснов)负责地区安全和反腐败。原副州长叶甫根尼·柳林(Евгений Люлин)留任高位,他在新政府中负责发展工业和农业。他是该地区权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被委派发展实体经济,这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此外,叶甫根尼·柳林还负责联络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负责联络州政府的分支机构,以便落实发展战略。<sup>⑥</sup>他在2019年的任务,是将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工作效能提高一倍——他打算

---

①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② 瓦良格人指由外地调任而来的政府官员——译者注

③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④ Там же.

⑤ Эксперты: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нарушает круг интересов местных элит.

⑥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将大约 40 个工业企业纳入“高效州”(Эффетивная губерния)计划,提升效能的项目在卫生领域大约有 200 个,在教育领域大约有 1000 个,在社会领域不少于 600 个。有必要单独介绍这位官员。柳林是土生土长的下诺夫哥罗德人,和所有苏联式的行政机关人员一样,他仕途的所有阶段均在本地区不同企业度过。21 世纪初,他进入石油领域,并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卢克石油获得了较高的职位,先是担任副总经理,后成为总经理。此外,他还拥有多年政治经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担任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在 2000 年代中期成为下诺夫哥罗德州议会主席。得到石油巨头支持的新州长,自然不会将这位经验丰富的经济部门领导人、政治家排除在圈外。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普卢特尼克(Александр Прудник)的研究表明,叶甫根尼·柳林是下诺夫哥罗州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之一。<sup>①</sup>就影响力而言,他居于第三位,仅次于尼基京和总统派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联邦委员会成员科马洛夫。其工作得到的评价很高,仅次于尼基京。就工作的业绩而言,柳林超过了包括州长在内的所有人。如果说到地方精英的支持,没有人能够与柳林相提并论,联邦层面的精英也很熟悉柳林,毕竟柳林很早就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界活动。但是考虑到其年龄较大,他的仕途前景更多限于地区层面。叶甫根尼·柳林还得到了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的支持,基里延科在担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时,曾经积极支持其担任州长。尼基京使用柳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地方工业精英的让步,后者长期支持柳林。

下诺夫哥罗德人中担任部长职务的,有投资政策部部长格涅乌舍夫和副州长克拉斯诺夫。<sup>②</sup>如果谈到该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物,需要提到出身于“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莫斯科文(Д. Москвин)。<sup>③</sup>需要指出,就影响力和公共空间的参与程度而言,他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排名中处于第四档次。除了莫斯科文外,还有几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两度当选

---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атриц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16-28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http://www.polit-nn.ru/?pt=analytics&view=single&id=5217>

② Там же.

③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атриц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16-28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http://www.polit-nn.ru/?pt=analytics&view=single&id=5217>

下诺夫哥罗德市市长的卡维诺夫是其中的一位。卡维诺夫（А.А. Кавинов）是一位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在 2000 年代中期曾经在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担任过不同的部长级职务，还在州议会中任职，拥有在多个商业机构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地区燃料能源部门。纳扎罗娃（Н.В. Назарова）是下诺夫哥罗德州精英的另一位代表，曾在能源部门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在不同时期领导过该地区多个能源公司。

非“统一俄罗斯党”的下诺夫哥罗德人中，需提及俄共党员布罗茨基（В.Н. Блоцкий），他还领导了几个从事渔业的商业公司，在国家杜马中代表该地区农业部门的利益。自由民主党党员库尔久莫夫（А.Б. Курдюмов）是非“政权党”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长期领导俄罗斯联邦政府信息部门的下诺夫哥罗德州分支机构。

地区层面体育机构的代表，也容易被推举到联邦层次，并且经常被总统办公厅在议会选举时用于吸引额外的选票。下诺夫哥罗德的斯瓦特科夫斯基（Д.В. Сватковский）便是这样的人物。他是现代五项运动的俄罗斯冠军和奥运会冠军。除了体育活动之外，他也从政，并在 21 世纪初曾担任过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投资政策部长。

联邦精英也经常从地方选拔官员进入不同权力机关，实现权力交接。具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家尼科诺夫（В.А. Никонов）便是此类出身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官员。他是苏联党务活动家莫洛托夫的孙子，从苏联时期开始他就已经在联邦层面的国家机关担任不同职务。国家领导人委托尼科诺夫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他在俄罗斯政界享有较高的威望。考虑到他得到了联邦领导人的支持，学者们对于他的仕途前景评价很高。<sup>①</sup>此外，上文提及的下诺夫哥罗德当地人莫斯科文，是俄罗斯联邦层面的卢克石油公司的代言人——他在该公司担任过不同职位。

2018 年底，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成员的组成，依法获得批准。下诺夫哥罗德政府是一届年轻的政府。从履历上看，可以说，下诺夫哥罗德政府主要由工业与贸易部、俄罗斯技术集团的官员构成。需要指出，该地区高层领

---

<sup>①</sup> 参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атриц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另外，此人目前是俄罗斯国家杜马教育与科学委员会主席，是《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积极推动者——编译注



领导人平均年龄是 40 岁。

选举之后，尼基京开始采取行动。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包括下诺夫哥罗德市前市长奥列格·索罗金，他被起诉收受贿赂。他的案件与 2012 年下诺夫哥罗德市苏维埃区 453 公顷住宅建筑用地综合开发权的拍卖有关。<sup>①</sup>

“Инграстрой”公司获得了开发权，该公司目前隶属于索罗金妻子艾拉达·纳戈尔娜（Элада Нагорна）拥有的“Старт-Строй”公司。2019 年 3 月 7 日，奥列格·索罗金被判处剥夺自由十年并在重刑犯监狱服刑，同时还被处以 4.608 亿卢布罚金，剥夺其长期担任国务相关职务的权力。于是，这位颇有影响力的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家，以公式化的方式从政治斗争中消失。此外，还有下诺夫哥罗德州议员亚历山大·格鲁什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лушков）和上文提到过的“公正俄罗斯党”地方领导人亚历山大·波奇卡列夫。

格列布·尼基京采取同样的方式重组了市级管理系统。除了下诺夫哥罗德市长外，还有几个城市的市长被换掉。忠于新州长的人被任命到各个地方。这完全不是新的制度安排，此前尚采夫被任命为州长时，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将自己的人从莫斯科带出来安插在本州的位置上，并在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依靠这些人。<sup>②</sup>伴随着尼基京和潘诺夫（Ранов）分别执掌下诺夫哥罗德州和下诺夫哥罗德市，就像在前州长尚采夫执政时期一样，两个人之间再次产生了摩擦。潘诺夫不喜欢尼基京干涉城市事务，潘诺夫任命自己的人为副市长。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目前下诺夫哥罗德州政界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尼基京和潘诺夫。在市长不再由直选产生而是通过市议员选举产生后，潘诺夫依照新的规则当选市长。下诺夫哥罗德市的管理，也在州长的视野和关注之中。早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由时任代州长尼基京提出动议，下诺夫哥罗德州立法会议通过了关于下诺夫哥罗德市统一管理体制的法令。同年 10 月 31 日尼基京签署了通过的法令，12 月 13 日下诺夫哥罗德市杜马修订了相关的规章。<sup>③</sup>

---

① Потянулись к выходу.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няют местны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46. 14 ноября 2018.

② 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в 2018 году Болела и Избирал. 28 декабря 2018. <http://www.pravdapfo.ru/articles/91664-nizhegorodskaya-oblast-v-2018-godu>

③ Михаил Бабич: Переход на одноглавую систему управления Нижним Новгородом-это оптим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25.10.2017. [http://ria56.ru/posts/54358358345\\_83548.htm](http://ria56.ru/posts/54358358345_83548.htm)

另外，捷尔任斯克地方自治市<sup>①</sup>也转变为单一领导模式。伊尔库茨克原市长伊万·诺斯科夫（Иван Носков）被选举为该市市长；负责社会经济问题的全俄国民阵线（ОНФ）总部成员阿列克谢·列夫科维奇（Алексей Левкович）被任命为巴拉赫内区（Балахнинский район）区长；原州政府领导人亚历山大·谢洛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Щелоков）被任命为阿尔扎马斯（Арзамас）市长。不过，州长团队在市级层面接班的工作没有一次性完成。提前中止化学家城（指捷尔任斯克市）领导维克托·涅斯特罗夫（Виктор Нестеров）和谢尔盖·波波夫（Сергей Попов）的职权、选举新市长已经提上日程。伊凡·诺斯科夫（Иван Носков）对于整个地区来说都是外来人：他之前一直在伊尔库茨克工作，2018年2月才到下诺夫哥罗德州。捷尔任斯克市的选举遵循了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的设计——选举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地方杜马投票。俄罗斯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普鲁特尼克认为，“捷尔任斯克市、阿尔扎马斯市和此前的下诺夫哥罗德市、巴拉赫内区的领导人更替与地方管理危机相关，州长决定重建对地方的掌控。虽然诺斯科夫和谢洛科夫不属于地方精英，但是他们得到了地方精英的信任。”

尼基京每次回应反对者批评时，都会强调，他进行的地方政治改革以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支持作为保障。反对者指责州长罔顾民众坚决主张恢复市长直选的社会民意。值得一提的是，潘诺夫积极解决本市的问题，使得他在地区内的影响力有所增加，却导致他与财政部门之间产生了矛盾。因为没有及时将剩余的补贴返还联邦预算，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遭到联邦国库管理局的批评。联邦国库管理局本想处罚市长，但是市政府将责任推给了下属部门和地方机关。此外，联邦反垄断局解除了尤里·谢戈列夫（Юрий Щеголев）的下诺夫哥罗德市建筑局局长职务，因其涉嫌在建设“泽尼特”居住区（ЖК Зенит）幼儿园时收受贿赂而受到刑事指控，从而失去了信任。<sup>②</sup>2018年12月，联邦反垄断局下诺夫哥罗德州分局认定，在建设幼儿园时存在带有卡特

---

① 捷尔任斯克市位于奥卡河畔，是下诺夫哥罗德州第二大人口城市，以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命名，化学工业发达——编译注

② Смена власти, городскоеодноглавие и аресты депутатов. Топ-5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2017 года. 16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fedpress.ru/article/1922723>

尔交易特征的违法行为，并将案件指向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和市属机构“下诺夫哥罗德基本建设管理总局”<sup>①</sup>、“СК Система”公司（曾用名“Строитель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Дом”）。可以说，联邦政府试图削弱潘诺夫的影响力，干预下诺夫哥罗德市长和州长间的摩擦。就潘诺夫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个人排名而言，他的工作总体上评价十分高。<sup>②</sup>可以说，州长正在撤换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和下诺夫哥罗德州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市长。

格列布·尼基京不仅在地区层面，而且在城市层面推行总统的路线——他将没有政治经历的人提拔上来。他在本地区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十分积极地参与公共空间。他不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且不同于那些未被视为自己人的外放者，他还得到了联邦精英的支持。问题在于，最初是尼基京提拔了潘诺夫，尽管两个人之间显露出了矛盾，但地方精英没有将潘诺夫视为“自己人”。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尼基京巩固在本地区统治的手段背后，缺乏任何宏观规划。在他参与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没有包含任何实际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内容。不管怎样，2018年的政治倾向显露出来——格列布·尼基京是来自联邦执政上层的人，俄罗斯总统任命他和其他同事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所有人都是总统的储备干部，均拥有不弱的游说能力。并且，他们也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上述所有条件能够帮助格列布·尼基京。不过考虑到瓦列里·尚采夫也拥有所有这些条件，那么尼基京工作的具体结果可想而知。

在涅姆佐夫离开之后，地方统治精英看起来十分孱弱，内部纷争是极大的消耗。无论是下诺夫哥罗德州内精英派系之间，还是地方精英和联邦精英代表之间，在2018年之前，激烈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停歇。俄罗斯政治学者往往引用当地精英多年来长期内斗和缺乏影响下诺夫哥罗德州发展的建设性思想，来说明该地区精英的衰朽。达辛（А.В. Дахин）认为，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至2003年，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至2011年，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如同俄罗斯大多数联邦主体一样，下诺夫哥罗德州精英是影响力部

---

① МКУ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апитальному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Нижнего Новгорода.

② Паспорт региона. Рейтинг влия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ерсон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30 ноября 2018. <http://xn--80aafecgczwveheyh2f.xn--plai/content/pasport-regiona-reiting-vliyatelnosti-politicheskikh-person-nizhegorodskoi-oblasti>

分保留至今的苏联党政官僚，<sup>①</sup>包括原全俄列宁共青团工作人员、现在进入联邦圈子的基里延科和格列博夫（Л. Глебов）。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涅姆佐夫将出身于商业和科学界的官员，吸收到下诺夫哥罗德精英团队中，为地区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涅姆佐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后，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精英在行政方面表现得较为稳定。

之后，下诺夫哥罗德州精英呈现出围绕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和在联邦层面有影响力的人物，分化为派系的趋势。起初，这些派系追随涅姆佐夫，之后又追随基里延科。下诺夫哥罗德州精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与垂直权力的强化和各层次精英整合有关。首先，联邦区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精英进一步转变——下诺夫哥罗德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首府，基里延科被任命为该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于是产生了三个地区精英政治聚合的中心：（1）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2）州长办公厅；（3）俄罗斯总统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这些权力中心之间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拥有同样的政府权力属性，导致精英结构被破坏。<sup>②</sup>21 世纪初被任命为下诺夫哥罗德州长的尚采夫，以及两年前任命的新州长尼基京，均承担着解决精英分裂、实现精英团结的任务。同一时期，在精英构成中新增了代表联邦工商业集团利益的地方精英派系。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层面的上述情况表明，联邦中央对于地方精英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尽管如此，尼基京延续了下诺夫哥罗德州原州长涅姆佐夫遗留下来的传统，后者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团结了包括出身旧官僚的官员、联邦精英的“新人”和联邦及地方企业代表在内的地方精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地区政治体制。尼基京在这一方面得到了长期被认为是涅姆佐夫伙伴的基里延科的支持。在福布斯杂志的排名上，基里延科和尼基京均进入俄罗斯前一百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行列，分列第 63、64 位。<sup>③</sup>

---

① Дахин. А.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элит(на примере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с. 2003. №.4.

② Там же.

③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попал в рейтинг Forbes. 30 августа 2018. <https://www.zercalo.org/news/18461-gleb-nikitin-popal-v-rejting-forbes>

## 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社会经济发展

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时期，下诺夫哥罗德州在地区工业生产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该州缺少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的自然资源。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某几种非金属矿产资源拥有可靠的原料产地，某些资源相对不足；部分缺乏的矿产资源需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购入。针对上述特点，自经济改革开始，该地区领导人重视形成竞争性经济环境的伙伴模式（涅姆佐夫同样也建立了竞争性的政治环境）。该地区政治领导人从改革开始便奉行支持私人企业的政策。下诺夫哥罗德州在形成市场组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该州建立了企业支持基金会、推行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带动了该地区的国际投资增长。<sup>①</sup>在涅姆佐夫进入联邦政界后，继任州长在惯性的作用下，维持了前任州长构建起来的投资环境。尚采夫执政时期，面临国际投资减少，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制裁的背景下，下诺夫哥罗德州积极运用一度被忘却的国家订单，刺激经济发展。国家订单主要针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科研项目。地区官员希望国家政治领导人在危机时期关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实体经济部门。虽然俄罗斯在全国层面仍然高度依赖原料部门，但缺少能源的下诺夫哥罗德州在选择优先方向时，侧重发展实体经济部门。为此，具有政治经验的权威经济管理者叶甫根尼·柳林被任命为副省长，由他负责地区实体经济部门，并积极推动科研力量。在俄罗斯国内科研费用占GDP的比例方面，下诺夫哥罗德州居于首位。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下诺夫哥罗德州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6%，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内临近地区情况最好的仅为1%。<sup>②</sup>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下诺夫哥罗德州取得的成果，可以关注涉及城市公共事业的五个主要项目的实施结果。这些项目都已经完成。未完成的计划指标集中于三个项目：道路安全和质量、建立现代中学教学环境和确保住房及公

---

① Об исчерпанности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властной элиты 25 августа 2004. <http://www.polit.nnov.ru/2004/08/25/elita/>

②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орган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о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январь-декабрь 2018 года (1 часть).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2019 г. С.20.

用事业质量。最后一项完成的部分不到计划总数的 47%。<sup>①</sup>反对州长的人提及城市道路不佳，下诺夫哥罗德市和其他居民点的城区中心到处是大水洼，街道上垃圾没有收走以及城市垃圾场混乱无序。需要指出，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也有此类情形。

增加经济活跃的下诺夫哥罗德州居民群体数量，是另外一项重要的发展指标。前文提到过，20 世纪末该地区曾经积极鼓励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因为按照经济改革理论家的设想，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助于提高地区生活水平、促进下诺夫哥罗德州劳动力资源的再生产。按照人口数量计算，下诺夫哥罗德州能进入俄罗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十个州行列，而下诺夫哥罗德市是俄罗斯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城市群十分特殊，该城市群人口超过 200 万，仅次于莫斯科城市群和列宁格勒州城市群。下诺夫哥罗德城市群包括了捷尔任斯克、克斯托沃 (Кстово)、博尔 (Бор)、巴拉赫纳 (Балахна) 和扎沃日尼亚 (Заволжья)。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就像俄罗斯的整体情况一样，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地区人口状况不佳，主要表现为人口自然减少(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所带来的人口数量下降。下诺夫哥罗德州城市化水平较高，大约 78%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目前有 160 万人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工作，失业人口 15 万人。绝大部分人在工业部门就业。大多数劳动力在私营经济部门工作，之后是国有经济部门。<sup>②</sup>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人口构成中，退休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人口持续“老龄化”，形成了衰退型的成年人口结构。在农村，人口结构早已表现出此类问题：在农村人口构成中，退休年龄人口占 30.2%，其中女性为 39%。<sup>③</sup>因此，需要指出，为加快经济改革、发展创新经济，新州长必须着手构建新型生产力。只有推动人口再生产、提升私人企业活力、寻找劳动激励的新形式，特别是在有希望的经济、科学、技术领域，才能实现上述目标。下诺夫哥罗德州因

---

①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январь-декабрь 2018 года (1 часть).

② Там же.

③ Интервью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А. Е. Ереминой. Газет «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правда». 28 марта 2017. <https://minec.government-nnov.ru/?id=94196>

为 2018 年经济增长速度突出，得到了超过 1.52 亿卢布的联邦预算奖励。<sup>①</sup>这对新州长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突破。

作为一个得到了联邦中央额外激励的快速发展地区，下诺夫哥罗德州也积极与其他地区发展经济关系。总的来看，下诺夫哥罗德州企业的出口额高于进口额。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计划拓展与俄罗斯出口中心的合作，以推动下诺夫哥罗德州企业增加出口。这些工作得到了原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的关照，他曾表示将帮助该地区解决相关问题。尼基京本人也说过，将与俄罗斯出口中心签署协议。尼基京在联邦政府具有相当影响力，并有实际的行动。

下诺夫哥罗德州主要的贸易伙伴是莫斯科市（占贸易额比重最大）、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圣彼得堡市以及经济关系同样稳定的地区，例如鞑靼斯坦共和国。下诺夫哥罗德州计划扩大向鞑靼斯坦供应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和软件产品。<sup>②</sup>尼基京指出，鞑靼斯坦共和国、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首要伙伴。建立这些伙伴关系，标志着下诺夫哥罗德州优先发展与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关系，其目的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创新发展的同时，拓展在俄罗斯的内部市场。

之后，下诺夫哥罗德州还与四个地区签署了经贸、科技、文化合作协议。如果分析这些协议，可以发现与这些地区开展合作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地区拥有的工业实力也能推动下诺夫哥罗德州实体经济部门发展，包括楚瓦什共和国、弗拉基米尔州、坦波夫州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还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在工业领域开展合作，签订了大量协议，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冶金企业出口机械制造产品。

下诺夫哥罗德州也需要开拓国际市场。近邻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白俄罗斯（占下诺夫哥罗德对外贸易的 23%）、哈萨克斯坦（8.1%）和乌克兰（4.7%）；在远邻国家中，贸易最多的是荷兰（14.9%）、德国（17%）和中

---

① Интервью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А. Е. Ереминой.

②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3 апреля 2017. [http://www.mid.ru/web/guest/maps/ru/ru-niz/-/asset\\_publisher/9Q8MSIsRKgBA/content/id/2472780](http://www.mid.ru/web/guest/maps/ru/ru-niz/-/asset_publisher/9Q8MSIsRKgBA/content/id/2472780)

国（12.5%）。中国是下诺夫哥罗德州最稳定的外贸伙伴之一，按照贸易额计算，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超过一百多个贸易伙伴中稳居前五位。下诺夫哥罗德州还与法国（8.3%）、意大利（4.4%）开展合作。<sup>①</sup>至于政治关系，可以观察到，近年来访问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外国代表团数量显著增加。总计有250个外国代表团访问过该地区。近邻国家一贯表现出高度积极性，特别是西欧和东欧国家（匈牙利、德国、希腊、丹麦、马耳他、荷兰、斯洛伐克、芬兰、法国、捷克）。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主要的合作伙伴是阿富汗、玻利维亚、以色列、印度、印尼、古巴、中国、韩国、日本。此外，2018年下诺夫哥罗德州组织了超过15个官方代表团出访国外（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比利时、德国、伊朗、西班牙、中国、摩尔多瓦[共两次]、法国、捷克）。就对外贸易水平而言，下诺夫哥罗德州在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鞑靼斯坦共和国。<sup>②</sup>根据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海关统计数据，下诺夫哥罗德州是2018年该地区吸引外资增长速度（42.1%）最快的地区之一。<sup>③</sup>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出口结构中，实体部门产品占有最大份额，特别是机械制造产业。下诺夫哥罗德州也期望得到联邦中央的帮助。尼基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在与工业贸易部长副部长莫洛佐夫会晤时，说服对方投资三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5亿卢布。<sup>④</sup>这是联邦中央对地区产业部门的巨大支持，可以说毕竟任何一个地区都希望获得这样规模的资金。该地区冶金、石化、机械制造领域的大型企业包括“Выксунский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股份公司，该公司隶属于由安纳托利·谢德赫（Седых Анатолий）担任主席的联合金属冶金公司（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谢德赫在2018年底进入俄罗斯最富有的商人排行榜。此外，还有隶属于“卢克石油”

---

①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3 апреля 2017. [http://www.mid.ru/web/guest/maps/ru/ru-niz/-/asset\\_publisher/9Q8MSIsRKgBA/content/id/2472780](http://www.mid.ru/web/guest/maps/ru/ru-niz/-/asset_publisher/9Q8MSIsRKgBA/content/id/2472780)

② Там же.

③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④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провел рабочую встречу с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министр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 РФ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Морозовым. 22 августа 2018. [http://www.vremyan.ru/news/gleb\\_nikitin\\_provel\\_rabochuju\\_vstrechu\\_s\\_zamestitelem\\_ministra\\_promyshlennosti\\_i\\_torgovli\\_rf\\_aleksandrom\\_morozovym.html](http://www.vremyan.ru/news/gleb_nikitin_provel_rabochuju_vstrechu_s_zamestitelem_ministra_promyshlennosti_i_torgovli_rf_aleksandrom_morozovym.html)



集团的“下诺夫哥罗德石油有机合成”公司、隶属于奥列格·杰里帕斯卡“俄罗斯机器公司”的“高尔基汽车厂”公司以及其他大型工业企业。

## 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发展前景

长期发展项目在地区同联邦的关系中可以起到推动作用。编制地区发展文件是列入联邦计划，以及获取大量预算资金的前提条件。在格列布·尼基京被任命为代州长后，他于 2017 年末倡议制定下诺夫哥罗德州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就像涅姆佐夫时期一样，尼基京当时召集超过 400 名地区和联邦层面的专家参与编制文件。他们有一个全局性任务，即制定规划地区未来十余年前景的详细发展计划。因而，不仅要考虑到地区特点，还需要符合普京总统提出的全国首要任务：提高生活水平、建立舒适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推行负责任的社会政策。专家集体大量工作的结果，是编制了一揽子计划——《2035 年前下诺夫哥罗德州社会经济发展战略》。<sup>①</sup>2018 年秋，该战略通过了联邦政府的评估，符合普京总统“五月”命令中规定的目标和任务。最终，俄罗斯政府为落实与战略相关的国家计划，向下诺夫哥罗德州拨款 594 亿卢布。其中，该地区在 2019 年获得 132 亿卢布。<sup>②</sup>尼基京表现出自担任工业贸易副部长以来游说联邦政府能力。此外，尼基京就职以来，几乎所有联邦政府部长都在 2018 年访问了下诺夫哥罗德州，这些部长们再次确认该州拥有巨大的地方生产潜能。<sup>③</sup>

州长及其团队提出的任务是，优先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5G、电子工程、科学研究、通讯与IT技术、机器人技术、第六代纳米工艺和生物技术，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比重需要超过 10%。目前看来，尼基京的政绩不错。在其担任代州长时，在联邦政府的居中协调下，他与国有企业“俄罗斯原子能”、

---

①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до 2035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т 21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889.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2018 г. С.57.

②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③ Отчё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боты в 2018 году. 14 апреля 2019. <http://m.government.ru/news/36422/>

“俄罗斯技术”签署了建立联合企业的协议，实施产品完整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体系（PLM体系）。该项目五年费用预计为 50 亿卢布，而且使用的是联邦投资。<sup>①</sup>因此，在得到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后，尼基京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标——确保在 2035 年之前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竞争力达到日本、芬兰和德国的水平。前州长尚采夫也曾提出过同样雄心勃勃的任务。毋庸置疑，尼基京在政府的影响力高得多。即便如此，地方资源仍不能满足管理机构使用。地区政府本身也承认，无论按照乐观的估计，还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相关的目标很难实现。此外，新州长面临的具体任务也十分紧迫。

首先是确保人口稳定增长。下诺夫哥罗德州正面临人口下降的趋势。<sup>②</sup>其原因包括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在人口短暂增长之后，死亡率再次超过出生率）、人口老龄化、育龄女性数量减少和俄罗斯全国存在的新趋势——家庭的吸引力下降。2017 年离婚夫妻数量占结婚夫妻数量的 70%，甚至移民顺差也没能补救局面，因为迁往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青年人数量在增加。<sup>③</sup>人口流失问题关系到解决现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贯穿所有问题的红线。

新州长的第二项任务是确保该地区稳定增长。这项任务事关经济的基础性变革，首当其冲的是研发和采用新技术、发展创新型商业。众所周知，不同于其他州，下诺夫哥罗德州将本州的资金优先投入发展科学。尽管“道路安全”项目的预算资金逐渐减少，交通可达性仍然有所提高。另外，下诺夫哥罗德州也打算由部门规划转变为项目导向规划，这可视为在预算经济条件下的统一管理方式。<sup>④</sup>

第三，需要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下诺夫哥罗德州工业生产集中，环境污染严重）。笔者认为，对于工业地区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sup>⑤</sup>2019 年 3 月，

---

① 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центр динамичным развитием IT. 23 июля 2018. <http://pvzrayon.ru/2018/07/23/nizhegorodskaya-oblast-zainteresovala-federalnyj-centr-dinamichnym-razvitiem-it/>

②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орган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о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январь-декабрь 2018 года (1 часть).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2019 г. С.33.

③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俄罗斯总理主持召开了关于生态问题的国务会议，普京总统安排格列布·尼基京参加此次会议，本次会议要求联邦中央更加关注地方的生态问题，包括下诺夫哥罗德州。<sup>①</sup>

第四是医疗问题。当地的专家承认下诺夫哥罗德州居民死亡率较高。高死亡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是缺少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医疗救助不及时以及影响死亡率的其他原因（包括过量饮酒、刑事犯罪、道路基础设施质量差、农村和边远地区经济落后）。医疗人员匮乏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全州医疗机构总共拥有 1425 名医疗人员<sup>②</sup>，并且缺少专业性强的专家。该地区许多人寄希望于普京总统 2018 年 2 月发表国情咨文后开始实施的“本地医生”、“本地教师”计划，愿意前往农村的青年专家在这个计划下可以获得 100 万卢布的差旅费。

总而言之，当谈到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发展前景时，可以说该地区的发展前景，整体上客观地反映了近些年来积累的问题、世界经济形势负面影响和下诺夫哥罗德州前州长不连续、混乱的管理决策引起的问题。在地方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和尼基京实际活动之外，还必须落实国家任务。例如，2018 年世界杯也推动了下诺夫哥罗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公正地说，这些项目并非来自地区倡议，而是国家政治领导人交代下来需要完成的。尼基京曾经是联邦官员，他清楚这些项目对于联邦中央十分重要，因而必须竭力完成。

## 结语

尼基京得到了工业和国防游说集团的支持。但是，下诺夫哥罗德州精英的冲突未能消弭。新州长的执政风格与原州长尚采夫全然不同，后者促使地区形成政治竞争空间，加剧了已有的问题。尼基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解决“尚采夫执政体系”完全无法应对的问题。尼基京的管理经验当然有所裨益，可用于团结社会、增强联邦中央对地区的政治支持。联邦中央给予下诺夫哥罗

---

①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провел заседание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Госсовета РФ по экологии. 26 марта 2019 г. <https://www.smol.kp.ru/daily/26954/4012051/>

②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s://government-nnov.ru/>

德州大量财政拨款，显示了对尼基京的支持。联邦的财政支持着眼于解决下诺夫哥罗德州“技术老化问题”——不同领域的企业主要资产折旧率接近70%-80%。联邦已经给予了投资，未来几年也计划给予额外的投资。此外，地区正在引进新的知识密集型和生态友好型技术（首先在原料加工领域）。如果下诺夫哥罗德州未来能够继续获得联邦中央的投资，那么现阶段形成的政治局面将对尼基京十分有利。

一旦有利的外部经济和政治条件消失，下诺夫哥罗德州业已存在的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基础设施发展薄弱、投资不足、大多数生产企业的设备严重老化（近年来工业实现增长主要依靠利用旧生产力，缺少技术现代化）。一方面，大部分联邦和地区项目都需要联邦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动员该地区所有政治力量，以支持尼基京落实这些项目。

作为“年轻一代州长”的代表人物，作者认为，下诺夫哥罗德州年轻的管理者格列布·尼基京新州长需要不断解决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包括：

第一，提升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效率，避免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决策的混乱无序，推动地方政府向当地居民开放。这里也需要克服在该州拥有稳定组织的联邦和地方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落实经济领域的大项目，满足社会的利益。

第二，与可以签订合作协议的俄罗斯其他地区，形成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这里指的是拥有大量下诺夫哥罗德州工业部门必需的自然资源的西伯利亚地区。

第三，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扩展与基础研究部门的联系，而且需要扩展商业机构与科研部门的联系。

第四，巩固下诺夫哥罗德州与俄罗斯政府专业部委之间的联系。这里指的是负责实体经济的政府部门，因为下诺夫哥罗德州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产品。新州长尼基京在这一方面拥有较强的政治和行政能力，一方面，他曾担任过工业贸易部副部长，另一方面，他得到了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的支持。

（翻译 崔珩）

---

**【Abstract】** The Nizhny Novgorod Oblast used to be the forefront and synonym of Russia's reforms, and accordingly had a special position in Russ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At present, this oblast i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the Volga Federal District, who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 deserves at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Moscow has successfully regulated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Nizhny Novgorod Oblas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lso relies on both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izhny Novgorod Oblast, all previous governors have been faced with similar complex situation: related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resident's plenipotentia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Volga Federal District,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t the federal level, local businesses, they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local politics and economy if the governor is experienced, influential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has means of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abilit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at is, the governor is supported, approved by and influential in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Gleb Nikitin, the new governor of the Nizhny Novgorod Oblast,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governors in Russia. He has the above qualities and his governance in the Nizhny Novgorod Oblast i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Russian Regional Politics, Russian Regional Political Elites, the Nizhny Novgorod Oblast,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занимала когда-то передовую позицию и была синонимом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форм, она также имела особый статус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ландшафте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данная область является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м центром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и её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внимания. Суд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федеральным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Москва успешно регулируе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а местны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также полагаются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и финансов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сменяющие друг друга губернатор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похожей ситуацией: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зидента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мест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круп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на местном уровне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аспекты обоюд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пыт работы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средства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то есть поддержка и признани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его ключев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и местном уровне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гарантией здоро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овый губернатор Нижнего Новгорода, Глеб Никитин, является молодым и влиятель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России, он также обладает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ыми качествами, его руководящий статус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вним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

（责任编辑 肖辉忠）